M. Aurel Stein

#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三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巫新华  伏霄汉 /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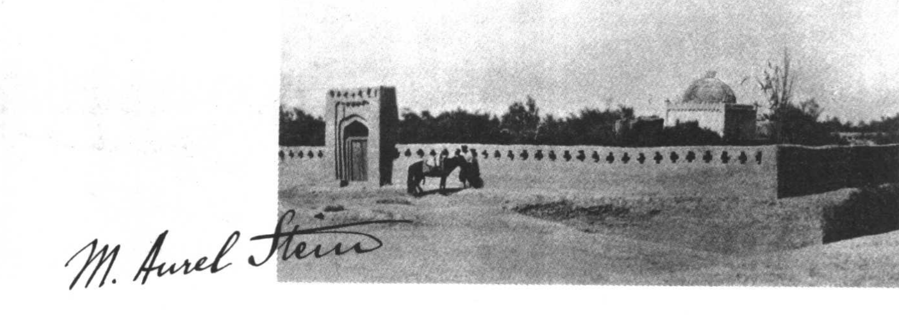
#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巫新华 伏霄汉 / 译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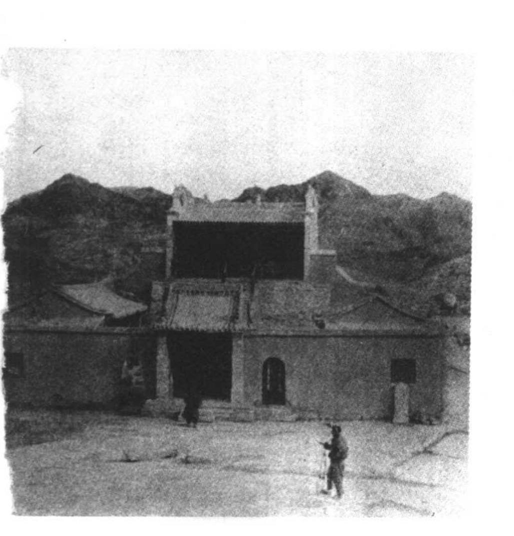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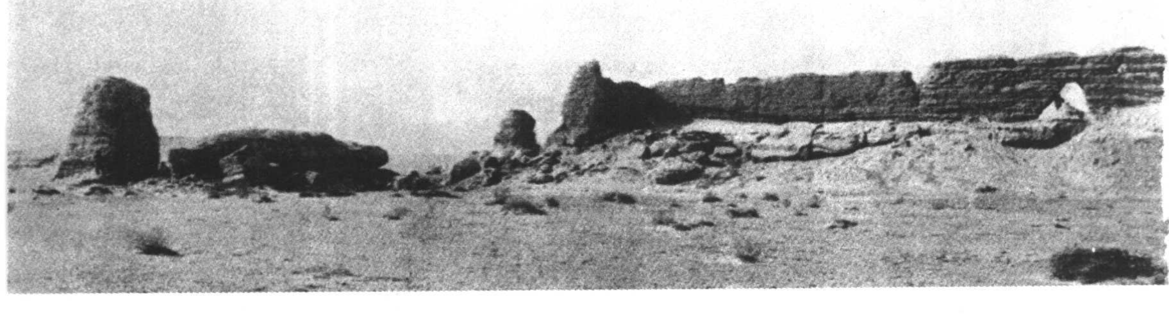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卷二













##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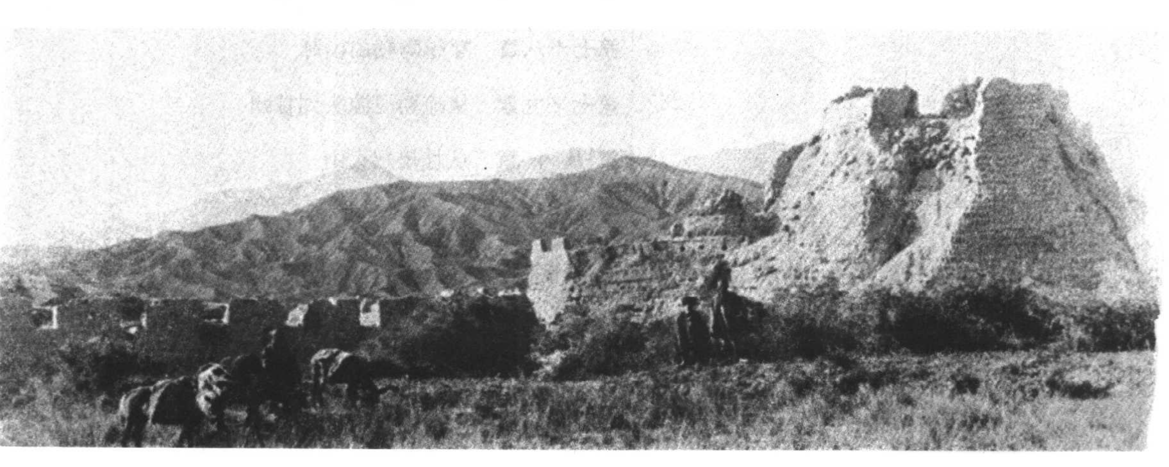




## 卷 四







# 第四十九章

## 走近古代边区

新的探索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营地去考察，尽管当时已近黄昏，周围也是一片阴沉沉的。但是由于要取水和放牧，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再启程。我们小心地在横七竖八的陡峭的黏质阶地里穿行了大约2英里，然后到达了一个类似浅水湖的干涸的湖床，这个湖床朝着西南方向延伸开去。尽管这里没有什么植物，但的确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浅的湖岸线，不久前这里或许还有水呢。在向导的建议下，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又走了1英里左右，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宽阔深邃的湖床决口，让人想起阿拉伯和埃及洼地（干河道）。它的底部只有1英里来宽，一路走下去会发觉开始是细腻的沙土，接着突然变成粗糙的砾石，风一吹，扬起的沙尘让人分外觉得阴森和荒凉。

随着洼地稳步向东抬升，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已到达疏勒河的下游湖床了。但我们没有这样继续走多久，因为向导突然发现一条自南通向洼地的狭窄小道，他似乎对自己的方位感特别自信，很轻松地就找到了朝上的道路。我们爬上了坚实沙砾构成的陡峭悬崖，来到一个平坦而多卵石的高地，这里离洼地底部足足有100英尺高。由于洼地是突然断裂的，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走不久就会看不到它了。

现在地图上所显示的老湖床位置其实是在两个月后才标上去的。

在平坦的沙砾路上行走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却也异常地单调乏味。差不多有整整10英里，我们在这条路上见到的仅仅只有两三个长着低矮芦苇的低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如果说我一直对这次行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话，那也是考古考察的特点所要求的。法国外交服务部的伯宁（M.C.E. Bonin）先生曾经出版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在1899年所作的一次横穿中国的旅行。从书中的大致描述看来，伯宁曾经尝试着沿敦煌到罗布泊这条路线走，但可能由于没有可靠的向导，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中国同伴不愿再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在到达哈拉淖尔以西的第一块湿地后就被迫返回了。在这段旅程中，他碰到了一些废弃的烽火台，周围还有一段墙壁遗址。尽管这位著名的法国旅行家对这些废弃物的古老和悠久做了很巧妙的猜测，甚至还证明这可能是条古线路，并对其历史意义做了评价，但这并不能帮我解决问题，除非我现在手里有份地图或者线路图来事先把这些废弃的遗址标注出来。幸运的是，我可以向阿不旦的师傅打听，因为他们是这条路线的真正开拓者。一位善于观察的老人告诉我，我可能走上了通向托格拉克—布拉克（Toghrak–bulak）的第一个炮台——他是这样叫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希望的确是有的，在我们走了大概13英里的地方第一次发现了塔形的土墩，但它离北方太远了，等到我们注意时已经来不及折回去了。但是又走了2英里左右，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处烽火台，而且令我高兴的是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它是由坚固的土坯砌成的，大概有15平方英尺，高约20英尺。我检查了一下，土坯是由很结实的黏土做的，长14英寸，宽7英寸，有4英寸厚，还在土坯之间发现了我们熟悉的柳枝层。这使我对其古老的历史毫不怀疑。

烽火台的两边是陡峭的遭侵蚀的小沟壑，位于断裂的干涸河床的边缘，这样保护起来非常容易。塔的底部在海平面以下80英尺的地方还显示出盐质粉化的迹象。

在西侧，邻近塔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小的但破坏很严重的建筑物的房基，我想可能曾经是看守人的住所。我很快就在一个斜坡上找到了一些铁制器械的小碎片以及木屑和牢固的毛织品，这就进一步证实我的猜想。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找更多的东西了。但是这个显示人类活动的第一处遗迹，在下面洼地深深的阴影下显得更加的荒凉和寂寥。

然而一想到新奇的考古工作，我就有了信心和力量。在我们的车队幸运而顺利地走完沙砾地后，我就开始催促他们加速了。走了约3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狭窄又极其陡峭的山谷，在冰封的小溪边还长着很多芦苇丛和小灌木。人们很快点起了火，来看看我们停留下来的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在这个长着茂盛芦苇丛的地方找寻水源，因为我们有很多冰块可以利用。至于牲畜，它们只要在沼泽里的薄冰上扎几个洞就可以轻易地喝到略微带点咸味的水。据说要看到有生命的树木还得再往北走。所以托格拉克一布拉克这个停留之地的名字看来并非虚言。这条两个月前还流经的河现在连涉水过去都很难了，但我们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清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刮了整晚的风，掀起阵阵浑浊的尘土，这时西北风又改变了方向。但我很早就强迫自己起来，因为急于想找寻更多的废弃塔的遗址。我们沿着朝东的路线走了不到3英里，就发现一个面向东南的废弃遗址立在一个褶皱似的低地上。我马上带领车队来到水源附近——我们的营地就要驻扎在这里——同时飞快地跳下车向遗址方向奔去，同去的还有勘测员、蒋师爷、提拉巴依（Tila Bai）和两个提着坎土曼的民工。

这段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远，因为一个宽阔的洼地把这块平原截断，洼地里是茂盛的红柳灌木，还有很多枯死的胡杨。我们从底部攀上100来英尺高的陡峭山坡，来到一个多卵石的平台，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废弃烽火台的位置。仔细观察这座方形塔，发现它是用晒得很结实的土坯建成的，间隙有规则，用薄薄的芦苇秆塞在中间。

尽管用的是这些材料，但这座废弃的烽火台还是足足有20多英尺高。北面的墙壁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但由于稍稍向里倾斜，所以看起来像个被截断的金字塔。靠近南面的地方有很少的碎砖屑，除了烽火台本身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建筑物了，周围是一片平坦的沙砾表面。

举目四望，发现在塔的北面，约20码靠近平台边缘的沙砾土上长出一排芦苇丛，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沿着这排芦苇往东走到一个矮土墩的顶上，发现这排芦苇又直接朝着另一座烽火台的方向延伸出去，那座烽火台在靠东约3英里的位置，远远地看是一个清晰的墙壁的形状。很明显这是中国古代长城的一部分，伯宁在他的书里提到过，现在我对它也特别关注。只要在土墩上稍稍做一点勘察就可以证实我们所站的位置的确就是古代长城遗址。

烽火台的一侧往奴拉合（Nullah）方向倾斜，在我们把堆积在下面的细沙砾和流沙清除干净后，一面完好的墙壁凸现出来，黏土混着沙砾做的壁层间水平塞着些芦苇束。在外部顺着墙壁的垂直方向还有另外一些树皮捆起来的芦苇束，经过加工修饰之后就成了墙面。芦苇墙面的厚度大概是8英寸，长度一律是8英尺。现存墙壁的高度大约是5英尺，当然这只是我们所测量位置的高度数据。

现在我们已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这堵墙的建造细节了，它们本身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它们的建造时间以及起源。但幸运的是，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些不错的古物。在残垣断壁的顶部有些芦苇束裸露在外面，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质地粗糙类似麻料的白色织物碎片，跟我们在罗布泊发现的一样，还有托格拉克（胡杨）树枝，几块颜色鲜丽的丝绸、木板碎屑，最后还有一块结实耐用的木头，这块木头制作得很精致，大约4英寸长，尾部打了个孔，木板上还写着5个精美的汉字，书法很棒。

即便是我这个不懂汉语言的人，也可以感觉到这几个汉字书法的时代肯定很久远。凭直觉我想可能是在汉代，并跟蒋师爷说了我的猜测。但我这位真诚的伙伴显

M. Aurel Stein

然对自己的学识相当谦虚，他坦白说对中国的朝代和地理的了解不是很专业，只说这种字体肯定比公元10~12世纪的宋朝还要早。

后来我时常拿我的大胆和他当时所表现出的谨慎与犹豫开玩笑，但我想我自己在研究古董方面的大胆猜测肯定是对的。蒋师爷准确地读出了那一小段文字，但从内容上根本看不出它的年代，木简上面写着："卢定世衣橐"（Lu Ting-shi）。在周围几平方英尺内又发现一些小物件，从这些东西看来，长城沿线的地段肯定一度有人居住过，尽管这里很荒凉。但至于他们是如何进入这里，也就是我很幸运地要进行考察的方面，当时我们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些小物件可能是当时修建长城和烽火台时驻扎在这里的兵营里的东西，偶然和建筑材料混合在一起了，也可能是烽火台附近的小驿站里的遗留物，后来在修葺过程中混到近旁的城墙里了。

|⑬敦煌长城西段尽头的烽火台|



但是在东边出现的长城要比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得重要得多，我们在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从这个角度来讲，幸运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根据我后来的仔细勘测发现在烽火台上可以俯瞰全局，所以这里是我们建立平面制图的绝好位置。而且它正处在其他烽火台的对接线很近的地方，烽火台以西2英里的地方又有两座烽火台立在一个类似沙砾褶皱或者阶地的隆起上。而往西南更远的位置则至少还可以找到两座烽火台。在向东的长城尽头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但再往前的另一座烽火台好像开始改变方向往东北了。

天已经很晚了，我们也不能往西南方向继续勘测了，但我决定沿着长城和烽火台往东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样我就不会感到遗憾了。我们从陡峭的沙砾斜坡到灌木丛生的奴拉合南部地区，一路上城墙变得越来越高。这里现存的长城部分连续了大约1英里，地面以上部分的高度是5~6英尺，但基部好像被风刮来的流沙掩埋了几英尺深。

几乎不需要任何手段（如打碎等）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建造方法很特别。除了水平面上的装饰表层很多地方被风蚀掉之外，其余那些被夯实的黏土和扎成捆的芦苇都保存得相当好。黏土大概有7英寸厚，尽管是用沙砾和小石头这些粗糙的材料调和而成，但还是结合得相当牢固。芦苇束跟黏土一样厚，捆得很紧，切割得很整齐，并且被很仔细地稳固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排装饰物。长城墙体的平均厚度在8~9英尺之间。

长城再往东有很多地方都遭到了侵蚀，但还可以在多沙和卵石的洼地里找到一些残留的芦苇层，这些洼地就在下座塔附近不到1英里的地方。这也就可以证明尽管遭到了破坏，但其建筑方式和风格是一样的。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土坯间放着几根胡杨树枝以加固边角，隔一段距离就会被一条芦苇拧成的绳子绑住，这些芦苇绳后来又被塞进了砖缝里。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地理环境是多么

恶劣，但自从塔群被建立起来后，这个沙漠地带的资源也慢慢改变了。很偶然地，我发现在南面有一块专门腾出来供踏脚的地方，好像有人曾经从这里用绳索爬上去过。很明显，烽火台上面的小空地是供一两个人放哨或者发射信号的。

过了这座烽火台，长城好像变得不再连续了。往东北全是光秃秃的沙砾平路，经过这段路，我们继续往东走，这是通向下一座烽火台的方向，现在离我们还很远。这样走了不超过 1 英里，勘测员就很敏锐地发现跟我们路线平行的沙砾土上有个微微的隆起，周围和顶部有些快被石化的芦苇。仅仅把表面弄碎观察了一下，我就可以肯定我们又一次来到古长城边，这些芦苇显然是被完全风化的部分长城底部里的。

继续往前走，这个几乎不能被察觉的小隆起逐渐形成一个直立的脊状凸起，有 6~8 英尺高，这里的一段长城被沙砾和流沙掩盖住了。在离最后一座烽火台大约 3 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矮土墩，这时是在长城以南 12 码的位置。无需对考古有很深的了解就可以认出这个土墩是被完全风化了的瞭望台的残存碎石，通过后来发掘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很明显，这座长城是有意面向北方的。

|⑭中国古代戍堡，即玉门关故址|



自这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沿着长城的直线走2英里，我们就到达了老远就看到的大型烽火台。它看起来很抢眼，25英尺多高，矗立在一块平坦地面的土墩上，在这上面可以俯瞰到全局。它的结构异常坚固，地基就有大概23平方英尺。用的砖也是晒过的，加上建造时土壤里或者所用的水里的盐分混杂进去，使得这些土坯变得异常结实和牢固。

平坦的沙砾路现在成了宽阔的卵石洼地，而且天色已近黄昏，但我们没费多大劲就过了洼地，一路沿着长城往东北又走了3英里。一座很大的炮台挺立在一块高耸的黏质阶地上，成为我们极好的指示标志。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我还有时间爬上地基去弄清楚其建造的不同之处。我发现它不是用砖建起来的，而是一层层规则的结实的黏土，每一层都自下面一层的边缘向后倾斜了一点点，这样就呈现出一个被截断的小金字塔的模样。由于饱含盐分，所以这座建筑在黑暗里显得神采奕奕，闪闪发亮。

从建筑风格可以看出，当时在建造时离水源还是很近的，而且可以证实现在也不是很远，因为站在这个高度望过去可以看到我们营地上闪烁摇曳的篝火。骑马穿过高高的灌木和繁盛的托格拉克走2英里就到达营地了，半路我们还过了一条咸水小溪流，但到了才发现营地原来在一个小湖边，尽管也是盐水湖，但在湖边却可以找到可饮用的水源。

这里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干芦苇和刺灌木可供累了一路的牲畜们大吃特吃，还有大大的胡杨树干可以添加柴火帮我们御寒，随着海拔不断上升，天气也越来越冷了。但当温暖的火光投射在周围的丛林上时，人和牲畜的满足和喜悦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出来。这时候我们的营地看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毫无疑问，结束长途旅行胜利在望，每个人都异常兴奋，但真正令我开心的却是新奇又迷人的沙漠探险又一次在我面前展开了。所以后来，每当回想起那个晚上我就会感到很高兴。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章

## 敦煌途中的遗迹

第一天的考察过程中，很快就看到了大量的考古学遗迹。这些足以使我相信，在我所经过的遗迹之外，以及继续向东的路途中仍然有望继续发现遗迹，这些都属于一个早期的边防体系，即对应着甘肃边界上的“长城”，因此，我心里很清楚，在敦煌进行短暂休整后，只要民工和牲口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应尽快返回这些遗迹进行详细的考察。当然，同时我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以便能进一步熟悉古长城的各个方面细节。

1907年3月9日早晨，我允许牲口可以多吃一会儿草，而民工们在装好行李后也在休息。这时我沿着头天晚上的路线折回，直到我又来到了长城一线上。长城在这个地方折向北然后继续延伸，同我们营地附近的小湖的湖岸形成直角。在离湖岸的盐层25码内，我发现了由于盐渗入而看上去像是石头的黏土层和芦苇束层。我在此处的观察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湖的水平高度仅比长城城墙露出的地基低4~5英尺，说明从长城修建以来，此地气候并不是很干燥。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发现这个湖还被当作一种替代品守卫长城线，而在别处都是用独特的长城去守卫的。显然那些修建长城的人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屏障，这样可以节省建筑人力。

在我们开始当天行程后不久，我便可以确定这个推论了。沿着小湖弯弯曲曲的南岸走了约1.5英里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山脚下，这座山很陡峭。而小湖正好在山的东边。由山顶向下俯视，可以看见在路上有一座巨大的正方形的烽火台，它周围有一圈城墙。城墙已经塌了，看上去建得很粗糙，明显比烽火台晚建成。但是沿着山脊只需向上爬一会儿，便又能看见古长城城墙中那很有特色的芦苇束了。这段长城从早上我最后到过的长城对面的湖岸开始，然后爬过小山，向下延伸到了另一个沼泽盆地处。

当我注意到，在这段长城的更远处还有两座烽火台时，我便可以确定长城或多或少地与疏勒河水系的末端平行，而我们所走的路线可能就是在长城以内，或是在靠近长城线的地方。从营地出发，走了约5英里后，在第二个盆地南端附近，我们就又经过了一个烽火台。显然，长城在这个地方继续向北延伸着，但是我们在烽火台附近却找不到长城的痕迹。

当天余下的路途中，可以看到在我们左侧灰白色的水平线上，有一连串的烽火台，好像一条黄色篝火线。但是想到达这些烽火台所在地，则要穿越宽旷的沙漠或是沙砾戈壁，这会使我脱离整个队伍，太危险了。所以，我当时无法去那儿。万幸的是，我们可以使用平板仪精确地测定这些烽火台离我们路线的位置，由此发现烽火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2英里或3英里。

在继续走了约10英里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长条形的洼地边缘。这处洼地芦苇茂盛，显然洼地中有泉眼。在洼地中，我们看到一座虽然小、但外观坚固的废弃堡垒。堡垒的墙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厚约3英寸，逐层上筑，相当坚固。堡垒保存仍相当完好，高将近30英尺。堡垒地基足有15英尺厚，呈正方形，每边长约90英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庇护所呀！它不仅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也可以抵挡寒冷的东风。对我们来说，简直像是到了家似的。堡垒内没有住过的痕迹，只有少量过路

人在此休息后留下的垃圾。然而当我从坚固的墙的一角残余的粗糙的梯子爬上了堡垒顶部，环顾这片荒漠时，我确实觉得我站在了一座几个世纪前由英勇的人们和自然界共同守卫的建筑上。

在堡垒顶部视野开阔，所见的景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南面，可以见到低矮的洼地融入了胡杨和红柳丛林带中。更远处，有一片赤裸裸的沙砾缓坡一直伸向远处高山的同样光秃秃的山群。东北面，远处有4座烽火台，在我们身后被太阳照得发亮，在昏暗的光线中，通过望远镜，我想我能辨认出四周那些烽火台所静静守卫着的长城。我发现这个堡垒所处的位置很优越。堡垒墙的高度正好方便守卒监视烽火台一带的地区，可以容易看见沿长城线所发出的信号。但这些会是多久以前的事呢？在北边的地平线上，库鲁克塔格那些昏暗光秃秃的小山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些山曾见证过长城和烽火台的修建，又目睹了长城和烽火台的遗迹最终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但是这些问题可能只有死神才有答案。

古老的疏勒河水系在远处的山麓下与长城线之间的某个地方拐向西行。但是即使是从山顶四处察看，我也没能找到那个地方。后来，我们继续向前走，穿过一片赤裸裸的沙砾台地。当天晚上，我注意到我们的路线正在越来越靠近一个东西向的开阔的沼泽盆地，而这个盆地显然是疏勒河河谷的一部分。

我们沿着这个盆地陡峭的黏土岸走了约1英里后，来到了岸边附近一座建得很粗糙的烽火台处。暮色中，我看到了在盆地边上的低地上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赶在天黑之前匆匆去看过以后，我发现这座建筑有3个宫殿似的大厅，总长有440多英尺。墙壁很厚，有25英尺左右。这座建筑利用了一处天然的黏土台地作为地基，台地高约15英尺，使整个建筑外观显得更加雄伟。它周围有坚固的长城遗迹，四角还有高塔像是在守卫一个宫殿似的。对于荒野上的行人，比如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荒漠上走了几个月的人来说，这座建筑物看上去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的修



⑮ 南山沙果林纳穆吉木（Shagolin－Namjil）山脉和疏勒河源头的盆地

建用途很令人疑惑：它所处的地点清楚表明它不是一个边防据点，那么这座雄伟的建筑物，只有3个巨大的大厅，又没有居住所需的各种配备，究竟为什么修建它呢？

这个问题当天晚上并没有解决。我发现我们营地东面约1英里处有泉眼，而营地附近的地方有大量干枯的芦苇，很容易引起火灾。幸运的是，开始时的一些火苗很快被扑熄了，但是我们仍不得不重新找营地。当然在黑暗中要找到空旷的盐田地作为较安全的营地是相当费时间的。由于在沙漠中走了很长的路，大家都已经累了，而重新找营地又势必使休息延迟。这影响了营队中那些比较容易激动的人的情绪。于是，我能干的克什米尔厨师拉姆赞和蒋师爷的仆人阿合买提发生了一连串的口角和争吵。更糟糕的是，奈克·拉姆·辛格也掺和了进去，直到半夜才平息。这期间，我们的骆驼领头人哈桑阿訇，却一直保持着警惕，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后来，他交给我两枚铜币，这是那天晚上当我们在那座巨大遗迹脚下寻找营地时，他在附近捡到的。这对我而言，可以算是对那些烦心琐事的一种补偿。后来，经证实，这两枚铜币属于汉朝早期，初步证明了此处遗迹所属的古老年代。

3月10日早晨，在刺骨的寒风中，我进一步考察了这座巨大的遗迹。我很快便确定了它的结构特点以及规模大小的各种主要数据，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这座建筑物的用途。在它附近根本没有其他遗迹，这使我更觉得疑惑了。这座建筑的正北面



⑮敦煌古长城中国仓库的遗迹

有一片宽阔的盐沼泽地，在那个地方，完全不必、也不能继续修建防御设施了。它的西面和东面都有一连串的烽火台，表明那些地方有长城守卫着。通过望远镜，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离我最近的几座烽火台，与沼泽盆地中间平地上的许多烽火台一样，都建在孤立的小黏土阶地上。显然，长城的修建者当初充分考虑了视野开阔的要求，又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有利地形。

我注意到这些黏土阶地和台地呈南北向成排排列，与我在拜什托格拉克干涸的东部盆地中发现的台地的外观很相像，这更激发了我的考察兴趣。对于这古老的湖床及可能更早以前形成的阿其克库都克附近古代罗布泊遗址处的湖床，我并不期望这两者外观很相像。从此处可以看见在宽阔的沼泽地内，潟湖和水渠边界上有成排的胡杨树，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可用来描述很久以前其他地方的自然条件。我想起在楼兰地区北边的沙漠中，经常看到成排枯死的胡杨树，曾对那个地方干旱前的自然条件进行过推测。所以看到此处的自然状况，我十分高兴，因为这为我的猜测提供了证据。

由于考察这些遗迹，我们被迫延误了行程。而向导告诉我，前面还有一段距离很远的路程，营队必须要尽快前进，所以我被迫放弃沿路所有的考察活动。继续走了几英里，穿过了一片茂密的丛林和灌木带，这些丛林和灌木生长在由沼泽盆地向南分散开的一些河湾处。从前天起，我们所走的路线上便有大量的车辙痕迹，有旧

的，也有新的，说明敦煌人仍在继续使用这条路。同时，这附近还有很不错的牧地。我对此感到疑惑，在这极端荒凉的地方居然还有这些痕迹，真让人好生奇怪。又继续向前走了9英里，这时，我看到在一个满是芦苇的小坡下，营队中的一些人正围着两个很奇怪的人。后来知道他们是敦煌的牧民，来此照看牛群和马群。他们的穿着很奇特，衣服里塞了不少破布，很沉重。

将近3个星期以来，他们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第一伙人。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奇特，但他们的出现，依然使我们精神振奋，这也是我第一次试着用我所会不多的汉语同这类人进行交流。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脑子也不太好使。在反反复复进行好几次努力后，我终于从他们嘴中得到了我那些简单的问题的答案。而他们的回答使我很高兴，我知道了我们遇到他们的地方叫做“树榆头”（Shu-yu-tou），而那些车辙是由运送木材和燃料去敦煌的马车形成的。

我们继续向东走着，穿过一连串横向的阶地。这些阶地上满是碎石，它们从我们右侧类似缓坡的戈壁中向北延伸出来，就像是手上的手指似的。在阶地间，长满芦苇的洼地连接着北边一处宽阔的盆地，这个盆地表面有一层盐，很明显此处曾经有一河道或是湖床。但由于盆地离我们太远，所以无法走近考察。我们从“树榆头”那儿又向前走了约6英里路后，走过连绵的狭窄阶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植物带中。这里有成排的黏土台地，有那些干涸或正在遭受干旱的湖水盆地附近地区的特点，我们也已经熟悉了这些台地的特点。所有的台地都为南北向。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台地与我们前面路上所碰到的那些台地一样，是以前延亘的阶地，在猛烈的东风和流沙的侵蚀作用下，慢慢地被破坏、崩塌后的残留部分而形成的。

这些现象强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地质作用仍在进行之中。显然，由于在降水多的时期，南边的山麓的水土流失形成了洼地，而在很久以前的湖床处则由于黏土的堆积而形成了这些阶地。我们又继续向前走了3英里，一路上净是类似的地貌。然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盆地，它一直向北延伸了约3英里或4英里，抵达一大片深蓝色湖水的湖岸边。终于我们看到了哈拉淖尔湖，我们曾在罗布罗夫斯基和洛兹夫为我们所提供的地图上见过它。但是哈拉淖尔湖显然比地图上所显示的要大得多，并且湖边宽阔的盐层说明湖的水位在某个时候更高。

在平整的湖岸周围，可以看见散布着许多孤立的小黏土台地。显然，这是原先的台地和阶地在很久以前被强烈的侵蚀作用破坏后所留下的遗迹。其中离现在湖岸不远的两个台地由烽火台监守着。而烽火台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很不错的指挥据点。由于天色已晚，所以我们无法接近那些台地，一处很长的阶地的南端伸入了平原内，在那有另一座烽火台。烽火台监察着这条路线，而这条路线也在此处转为东南方向。我们继续前进，又穿过了一片地区。这片地区有一连串遭受侵蚀后的黏土台地，比我们先前所经过的地区还要宽广。黄昏时，我们第一次遇见了一队商队，这是一队来自和田的商队及其护送者，商队中有许多的克里雅骆驼。在2月初的时候，我们曾在米兰碰到过他们，现在他们已经从敦煌安全地返回了，但我们并不羡慕他们的第二次沙漠旅程。我们又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个冲积扇的缓坡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这天走了将近26英里的路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个泉边扎营。我们的阿不旦向导把这个泉叫做“羊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意思是骆驼刺泉——译者）。

在这所饮用的水来自泉水，味道很是甘美，比以前我们饮用了很久的水要好得多，并且四周多汁的灌木丛也刚好能满足牲口的需要。从这到敦煌绿洲就只有一天的行程了，所以3月12日早晨，当我们又开始一天的行程时，整个队伍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活跃的气氛。在我们营地南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我看见一幕奇特的情景，在那有一个黏土垒成的小寺庙。显然这是由那些路过此处的中国人所修建的。在小寺庙的微型神坛上，有各种纸和树枝做成的供品。看到这些，使我记起来，在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佛教一直是当地中国人所信奉的宗教。

3月12日的路途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近一座城镇。我们在一条碎石路上走了足足有17英里，并且在这条路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如说植物什么的，这使得这片贫瘠的冲积扇平原的风景很单调。我们回头可以望见宽阔的哈拉淖尔，湖以外的小山也清晰可见。我们穿过了古老的河床两回，这些河床下切得很深，十分干燥，可能是以前党河三角洲地区的遗迹。第二处河床有芦苇生长过度的痕迹，显然这有地下水补给。在到达第二处河床前，我一眼便看见了一排树，这标志着敦煌绿洲就在我们前面了。又继续前进了约4英里，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穿过了贫瘠的沙砾戈壁，来到了敦煌绿洲耕作区的边缘。

同先前走过的荒漠对比起来，敦煌绿洲上这些精致的农舍和精耕细作的田地，即使它们现在被荒废了，看上去还是很不错，很有吸引力。我们又继续向前走了约半英里后，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小堡垒处，这座小堡垒现在被耕作者居住。蒋师爷和当地居民商讨了几次以后，他们允许我们在干燥的晒谷场上扎营。这个晒谷场就在小堡垒高高的黏土墙外。显而易见的是，当地人对我们这些外来者很好奇。在我们扎营过程中，以及扎好营后的几个小时内，几乎当地每一个强壮的男人和成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都跑来看我们。

这个地方洋溢着一种温和的、令人舒心的气氛，而我也竭力去谅解那些质朴的当地人给我造成的一些小麻烦。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在最初的欢迎过后，便有很多的疑惑等着我们解答。像以往一样，我自己的帐篷总是离总营地有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噪音打扰。在我的帐篷前有几棵榆树，而就在榆树下面，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佛寺，小佛寺里有着精致的木雕和一些壁画。这些壁画代表的是当地的保护神。此处所有的环境状况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种良好有序的文化氛围。天黑时，这些温和的当地人也结束了对我们的观察，纷纷散开，回家去了。这些善良的人们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休息住处，我心里很是感激。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一章

## 在敦煌的首次逗留

1907 年 3 月 12 日早晨，我们准备出发去敦煌镇。所有的人对即将到达的目的地都充满了期待。但很快周围的环境让我们打消了所有的预想，包括想找一个舒适住处的想法。这天刮着寒冷的东风，我们由衷地庆幸我们到达了有树林和房屋的地方可以避风，幸好不是在空旷的沙漠中遇到这阵狂风。在到达敦煌绿洲边缘时，蒋师爷便立即写了一封文笔优雅的拜见信，递交给了衙门。信中还有一张红纸，附有我重要的在中国的证件。这封信说明了我们来到此处是得到了官方允许的，并且还适当地表明了我的官衔和解释了我在此所要做的事情，希望当地官府能为我们安排适当的住处。尽管我们离敦煌镇只有 20 里左右，大约为 4~5 英里，然而糟糕的是，衙门却一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而在 12 月份时，我在阿克苏时收到过我的老朋友、本地的道台潘大人写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甘肃西部边界上的当地官府引荐了我。

由于已经来到了中国的一个省内，蒋师爷作为我出色的秘书，这时似乎才意识到了他的责任和重要性，于是要尽力满足我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他不再为缺乏官方注意而烦心了，并表现出了他的懊悔情绪。在新疆，理所当然的，官方会马上发出

一两个命令，而且甚至在命令传到村庄前，村里的头头也会表现出他们的热情。但是在这儿，我们显然得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做好准备。此处似乎没有只专心于自己事务的村民，他们对官府发生的事很留心。在上午时，蒋师爷才得到了消息，一个新到的知县刚刚来接管敦煌县。而这个时期，官差们正在衙门里焦急地等着新知县，当然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的事，至少他们部分忽略了我们。

于是，在徒劳地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自己开始向敦煌镇出发。在我们的地图上，这个小镇被称为沙州（Sha-chou），意为“沙漠中的城市”。但对当地局面而言，从汉朝以来，它一直被称作敦煌。此处寒冷的东风和尘雾也许更适合于罗布泊地区。去敦煌镇的途中，我被大量土地精心耕作的迹象所震动，而所经过的许多相互隔离的农场中的建筑物也相当不错。一路上，像新疆小镇里那种热闹的市场一样，当地也有一些独特的小市场。我们经过了好几处由坚固的长城圈起来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堡垒的遗迹。但实际上只是原来的一些村庄，一旦无力阻挡敌人的进攻时，便被遗弃了。这些地方是一种无情的标志，说明了敦煌这片地区，就像甘肃其他绿洲地区一样，在最近的东干（Tungan）人叛乱中人口损失严重。

沿着河，我们终于来到了敦煌镇，就正对着小镇正方形长城的西面。而在河床最浅的地方，有一个很危险的吊桥，可以由此穿过河流。随后，我们穿过了正在毁坏中的敦煌镇大门，来到了狭窄的街道上。这里没有什么可令人激动的事物。在县衙的外面大门前，我们遇到了一小群似乎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向我们指了路，于是我们继续前进，走过了几座很不错、但已经开始毁坏了的寺庙。这些寺庙内有大量古老精致的木刻装饰。萨拉依（Sarai）建议我们在这些寺庙中居住，但这个建议根本行不通。这些寺庙又脏又小，我宁可住在空地上，也不愿住在这种寺庙中。后来，在那些住在奇特的旅馆的人们中，我们找到了几个来自新疆的喀什噶尔和哈密的商人，我向他们打听，问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居住。最后，一个看上去衣衫褴褛的衙

役帮助了我们。这个衙役似乎刚抽了鸦片，正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在蒋师爷用鼓动性的话语激励了他以后，他答应帮我们同当地官府取得联系。

后来，我穿过小河，在那边的一些庭院中寻找适合扎营的地方。这时，我遇到了知县的随从。这个人衣着精美，骑着一匹不错的毛驴。他为知县刚刚上任对我的事情的疏忽做了诚挚的道歉。由于知县和他都是刚从甘肃省另外一个地方来到此处，对当地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他还无法帮我找到住处，我只好继续寻找。不久，我便发现在党河左岸的庭院不仅少，而且也很小，庭院内又有临时的建筑物，即夏天居住的房子，毁坏得也很严重。看来在这边是找不到合适的营地的，所以我便转到小镇的另一边去寻找住处。

最后，在离敦煌镇南门约半英里的地方，我找到了一处较大的果园。这个果园似乎以前非常繁荣，在果园的一头有一栋房子。走进果园后，我们才发现房子里还有人居住。还好的是，房子的主人乐意为我们这么一大群人提供住处。显然，这里是一个地主家，但已经开始没落了。房子里目前只住着一个寡妇和她的母亲及孩子们。房子内有一个大厅，房间却有好几层。但大部分房间并没有人住。整个家里有大量精致、但沉重的家具，就像以前那些有些地位的中国人家里所喜欢收集的那种家具类型。这栋房子多年没人修过了，墙上布满了裂缝，纸窗破破烂烂，这些与那些精美的雕刻上闪亮的金属片和金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

我知道在新疆，如果家里来了陌生的客人，那里人习惯的做法是：妇女们将最宝贵的财物锁好，把房子打扫干净，然后和她们的亲戚住在一起。我曾希望这个果园中的这家人也会这样做，但房东却没有任何这种表现。妇女们用那可怜的缠过的小脚四处奔跑忙碌着，尽她们所能，把所有的家具塞进一层房间中，这样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所剩下的空间。蒋师爷住在靠近房东的一间房内，那间房里满是家具。在这里，蒋师爷努力树立了一种良好形象，使他对这些人的影响很大。对比起我们

这些大胡子的外国人，蒋师爷的友善和礼貌的举止，使他受到了房东的热烈欢迎。并且，他立即便和孩子们交上了朋友。而这些孩子很喜欢家里这种不同寻常的改变。奈克·拉姆·辛格住在两间房屋内，虽然比较大，但却很破，有一半的屋顶都已经塌陷了，贾斯旺·辛格还是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在屋子里做饭了。

我本打算在宽绰的中央大厅中居住的，但是大厅中没有壁炉或是火炉，并且墙和房顶上都有不少的裂缝，可以推测大厅里必定很冷，所以我最后决定将大厅用来放置箱子以及有人来访时的接待处。后来，我又想在外面果园中光秃秃的果树中间搭帐篷，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安静，空气清新，并且当雾散的时候，我还可以有机会晒晒太阳。当我还在小果园中寻找合适的地方时，天开始暗下来了。于是我想到了如果我要住在这个地方，离大家所在的房子有点远，这样会造成很多麻烦，同时我想到我在敦煌还要解决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要保证民工和牲口的供给。

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大绿洲繁荣的中心地区。但是，除非直接付给现金，这儿没有人会听我们的命令，或卖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即使是衙役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要解决突发事件。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我们所带来的银锭兑换成当地所用的钱币，敦煌县内没有人愿意收银币以及我所带来的银锭。在敦煌的第一天，我们只好将一个银锭拿去找铁匠，让他将银锭切割成碎银，以便我们手上能有一些现钱可以使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后，一个新疆来的商人，以他所提出的兑换率同我们交换了几两银子。当然，那兑换率对他比较有利。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不少那种像腊肠似的铜钱串，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换得钱币后，我们本打算去市场上购买燃料、饲料等。但花了几个小时，才来到市场。到达市场时，当地每天的集市都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于是队员们，包括印度人在内，自然对这种无谓的拖延而心烦，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起来。他们诅咒

M. Aurel Stein

着这些不开化的人，因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然而，对这种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别而造成的问题，我却能冷静面对。虽然身处在这亚洲的正中心地区，但我同时联想到了这里同遥远的西方风俗的相似之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海德公园里，希望能立即得到补给，但我们却没有当地的钱币，将会出现怎么样的情景呢？想到这儿，我觉得放松了不少。

第二天早晨，寒冷的东风依然呼啸着，一点都没有减弱的样子。没有事可做的队员们则在四处寻找暖和的地方，全然忘记了昨天的不快，只想着能抱着他们的毛大衣好好地睡上一整天，但这天对我来说却是很忙碌的一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便和敦煌镇上的新疆商人的代表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很重要。由于我是他们民族的官方代表，所以他们是特意前来向我表示他们对我的敬意。这些商人说他们的商业利润很少，不久我便意识到这些商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哈密、若羌和吐鲁番生意失败后，为了躲避债权人或是官司而来到敦煌的。他们想在这里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并且敦煌镇里还有不少的骆驼，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向东或是向南逃跑。由于他们在此居住了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对甘肃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我便很急切，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尽量收集我的考察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从乌鲁木齐、兰州以及和田所运来的各种产品，比当地的产品更有竞争力，这可是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同时，我也知道位于高原和高地的蒙古地区，与西藏相对，有优良的牧地、所以那里的人一般用羊毛和兽皮来交换产品。

在和这些商人的交谈中，我一直向他们询问各种敦煌的情况。随后，我便被所了解到关于敦煌绿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的情况而震撼，因为亚洲最长的古路直接连接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它从拉萨穿过印度，一直延伸到蒙古以及西伯利亚(Siberia) 的南部，是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敦煌绿洲就位于这条古路的附近。在知道这个情况后，我迫不及待的就想去考察这片地区。同时，我还了解到，这片地区保

存着原始的市场交易形式，并且对各地的商品都同样接受，无论这些商品是由东面运来的具备中国特色的货物，还是从喀什噶尔或乌鲁木齐运来的俄国产品，或是从和田经由沙漠所运来的英国和印度的货物，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午的时候，我准备去县衙，而我的东干翻译阿合买提则提醒我，去县衙时要适当地带着些礼物，而且这些礼物要适合这些人的品位。我便细心地挑选了一些礼物，还有一匹精致的黄色锦缎。这匹锦缎已经是我最后的一匹了。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我知道这种锦缎是很受这些中国人欢迎的。随后，在大风狂沙中，我来到了县衙。而我穿着我最好的一套欧洲服装，披着黑色大衣，戴着礼帽，穿着特制的皮靴。县衙的大厅很冷，我本应喜欢这种状况，因为这样我可以使这首次的会面如我所想的尽快结束。但是，由于县官汪大老爷（Hsien-Kuan Wang Ta-lao-ye）要努力表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高兴我们的这次会面，而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我们在古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交谈。我便很快不太留意环境的不舒适了，并忘记了我原先的打算。

知县是一个瘦削的中年人，他的脸上透出一种机敏。他举止端庄，外表像是一个学者，很善于与人交流。这些都让我想起了道台潘大人。我了解到汪大老爷曾设法从他前任所留下的文书中了解我的事情，而我的保护人、道台大人的举荐信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显然受到了这封信的影响。于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对于我在这里的考古活动，这个刚上任的知县肯定会为我提供官方帮助的，这对我很有利。当然，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也不会忘记适当地提及那位对我的考察很有指导意义的玄奘和尚。于是我发现，知县还真是一个很博学的学者，曾读过这个圣僧的回忆录《西域记》（Hsi-yu-chi），这使我很兴奋。

知县为他没能为我们及时安排适当的住处而感到很抱歉，同时他也为他自己类似的经历而发出感叹。因为知县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财物也都还没有运到，并且他在

县衙的住所，除了墙上有一些精致的木刻和许多都已褪色的金箔外，整个大厅空空如也，看上去很糟糕。我环顾大厅四周，令我吃惊的是，发现敦煌本地人根本没有为新知县做好准备。他们让这位知县大人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并且大厅里还没有装备火炉或是帘子来抵御冷风。最后，让我感到安慰的便是，知县告诉我他在官袍下还加了很多衣服，这样便可以使他暖和一点。然而，我自己最好的这套行头却无法起到同样的作用，我感觉到了刺骨的冷。

大街上还在刮着狂风，几乎没有人在外面。城镇南面便十分的空旷。我赶忙回到住所，将我那快冻僵的脚换上了大毛靴，我的帐篷很严密，这样我可以让自己暖和起来。就在这时，汪大老爷来回访了我。不得已，我只好在空旷的大厅里接待他，这个大厅里没有一点家的感觉。虽然我很满意知县对我的招待，但是实在是太冷了，我还是继续穿着我的毛靴，就不管是否符合礼仪了。我坐在一块厚厚的和田地毯上，旁边还放有一大盆用来做饭的炭火，这样使我觉得条件还过得去。我还顺手拿出一些以前在尼雅和罗布泊发掘出来的文书，一些早期发现的古物复制品，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想知县会喜欢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安排得到了我所希望的效果，汪大老爷很喜欢我所拿出的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些方面很有兴趣，还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在他努力理解我那很糟糕的汉语所表达的各种考古学问题后，他便会说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交谈中，我发现他十分熟悉新疆东部的地理情况以及那发生的历史事件。同时，他对中国现行的管理模式也很熟悉，虽然他从未到过其他的地方。汪大老爷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并且他也坦白承认，他不清楚那些我在沙漠中见到的烽火台和长城的情况。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从敦煌当地人中了解那些遗迹的情况。在知县和蒋师爷平和的谈话中，知县对当地人个性的描述，说这里的人不可信，不好管理。尽管这样，他还是表示，我们的困难主要就是向导和民工的问题，无论什么情况，他会

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于是，在愉快地交谈了几个小时后，知县喝了几杯茶便告辞了。在知县走了以后，我和蒋师爷都相信，我们后面将要进行的工作，需要这位新朋友的热心帮忙。

尽管我很心急，想马上开始有关的新工作，但是还有许多的麻烦事，我不得不在敦煌逗留更长的时间。首先的问题是，民工和牲口都需要充足的休息，要等他们恢复体力后，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并且我自己也需要休息。而且，还是有各种事情让我一直忙碌个不停。我努力在到达敦煌镇后的36个小时内，将我所雇用的全部恰尔克里克护送人员的报酬付清，并且还要赔偿途中死掉的6头毛驴等。最后，我还要为那些途中很尽责的人写好复杂的突厥语文书，以使他们能在阿不旦和若羌换取奖金。这些护送人员对他们所得的报酬很满意，于是他们希望尽快开始他们漫长的回家路程。而当我看见他们带着我为毛驴准备的饲料满意地离开时，我也感到由衷地高兴。

不久以后，我便为骆驼群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牧地。在那儿，骆驼可以尽快恢复体力，这也是在得到官方支持后所得的一个益处。就在我和知县相互拜访的那一天，通过蒋师爷的努力，敦煌的军事长官林大人（Lin Ta-jen）便送来了一封正式回信。在信中，他告诉我，他可以派给我几个人，以作为营队的护卫，我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提议。在我们到敦煌后不久，蒋师爷便意识到了，与我们所习惯的新疆（Hsin-chiang）的管理制度相比，敦煌则是军队在管理中的影响更大。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由甘肃西部地区管理组织中的一些特征，让人立即想起那些边界上的军事防守区的某些特点。这里有许多的敦煌农户似乎每个月都会得到官方的补助，用来弥补被充军的家人或是其他东西。敦煌当地军队大约只有600个人，与当地人口相比所占比例很小。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那些似乎是无所事事的人实际是在轮班值日，这种情况就如同那些驻守在新疆的驻军一样，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是，敦煌当地人仍肯定觉得他们是在守卫着国家，因为此地是重要的边防线，在战略意义上很重要。同时，我们也渐渐清楚，由于当地管理行政组织的安排，敦煌的驻军不仅负责着警卫工作，并且只要他们乐意的话，也可插手当地的行政事务。

后来，我到衙门去拜访林大人。林大人的住所很大，也很舒适。他是一个豪爽的老兵，身体强壮，充满了活力，中等高度，方形脸，看上去挺和善。高兴的时候，他就像早期法兰德斯（Flemish）画中的人物。林大人言谈直率诚恳，当他回忆起他的仕途经历和考虑未来的前途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很奇怪的严肃。据他所说，他最早是在刘锦堂（Liu Chin-tang）的部队里当一个下士，曾在新疆待过一些年。许多年来，他一直都只是一个小官，直到1900年战乱时，他很幸运地得到了护送皇后的机会，并且在去新安府（Hsin-an-fu）的途中得到了上头的赏识。

自从那以后，林大人被迅速提升，他便觉得老天爷待他不薄。他所受的教育不多，对于那些发掘出来的古物也没有兴趣。他似乎很怀念先前在新疆的日子，而我和蒋师爷对于他曾经去过的地方也较熟悉，所以我们之间相谈甚欢。林大人听说了一些日本人在最近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本事，于是他对于给予日本人启蒙和帮助的西方人也很尊敬。因此，他很欢迎我们在当地延长逗留时间，还把这当成件好事。他告知我们敦煌人大都很懒散，以及偶尔还制造各种麻烦，因而给我们拨了一队人马及其随从保护我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林大人比汪大老爷更喜欢在他周围人中树立权威，而汪大老爷作为一个新官，同样也在努力建立他的权威。随后，在林大人随从的帮助下，我们很快便为骆驼找到了适合的牧地。比较幸运的是，这两个当地官员对我的态度都比较好，只是知县过分疑虑，我从当地军队那里受益不多。

后来，我从回民商人那里收集了敦煌绿洲附近以及它北面和东面遗迹的有关情况。其中从乌鲁木齐来的扎西德伯克（Zahid Beg）那里得知，他曾多次去过天山的

北面和南面，以及若羌等地。在这里，他能找到一处较好的庇护所，以便躲避新疆债权人讨债。扎西德伯克很机警，所以一直以来很关注每一个地方的阔纳沙尔(Koneshahrs，即古城——译者)，想寻找宝藏。他告诉我，他曾在敦煌东北面看到过遗迹，在南湖附近看到过一个被沙地半遮掩的小镇，还有敦煌西南面等多处遗迹的情况。尽管他所给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但是对于我安排进一步的计划还是很有帮助的。与那些对敦煌每次调查时粗心大意，调查结果又总是一成不变的报告对比起来，扎西德伯克所告诉我的这些情况真可算是一份天赐之物。

但是，那时我手上最紧急的事情是要准备过去几个月来的详细账目报告，以便交给印度财政部会计审查员（Compoller of India Treasuries）以及印度测量局(India Survey Department)。而且，我也很担心我最近发出的关于和田的文书是否能安全到达。前一阵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去处理账目，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难题，它的困难不仅在于必须根据相关事物制定衡量标准，尽管各种数目很小，而且还要将它们细分成各种条款。要将我手上的现金同每月的账目相符合，并且还要给出正式的文书记录，这样我就不仅要做一个会计，同时还要考虑交通及相关事情，根据政府或印度考察经费所允许的项目进行汇总。最终，从可以肯定的旅行费和宿膳费用，加上一些我自己的钱，终于可以使账目收支一致了。所以，这五六天以来，我感觉就像在一间印度的办公室里办公，尽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比印度要冷得多。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二章

## 前往“千佛洞”

对我而言，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一处名胜古迹就在敦煌附近，这对我有无比的诱惑力，很久以来，我一直期望能去那儿看看。早在1902年时，我的一个朋友洛克兹教授（L de Loczy），他是匈牙利地质勘察协会会长（Hungarian Geological Survey），同时也是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Hungary）。他向我提及过位于敦煌西南面的雄伟佛洞，即“千佛洞”。1879年，他曾作为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探险队的成员，对中国最西部进行地理考察，他是对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先驱。虽然他并不是东方文物专家，但仍被千佛洞里遗迹的艺术价值及其重要性所吸引。他对所见到的壁画和彩塑作了生动的描述，并将其中一部分与早期印度艺术紧密联系起来。他的这些描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也是我继续向东勘察、深入中国内部的一个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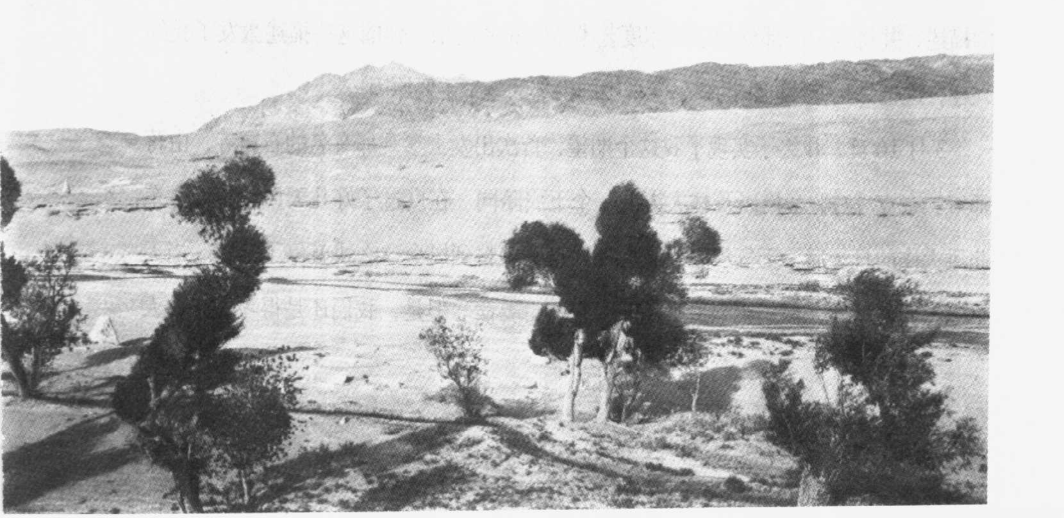
3月16日，我终于实现了我这个期望，首次出发去参观那有名的石窟寺，由蒋师爷、奈克·拉姆·辛格以及林大人的一个下属陪同。在度过了好几天风沙狂舞、东北风大作的日子后，天气放晴，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风会这么快就停了下来。当天早上，天气晴朗，但仍很寒冷，等起人来冻得要命。但是，我们还是得习惯敦煌人

的懒散作风，陪同我们一同前往的衙役平时都骑驴，但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这次骑马更为合适，于是他出去找马，大家都准备就绪了，可他还迟迟没有出现，他还要帮我们扛照相机呢。

早上八点半，我们这支小队伍终于出发了，向着敦煌东南面前进。在敦煌绿洲南部边缘上，有许多灰白的像沙丘似的小山，这就是为什么敦煌会被称为"沙州"(Sha-chou）的原因。一路上，两边是光秃秃的树木，小山越来越近。大部分路面深陷在平整的地块中，这颇像和田。看着一块块田地，我不禁回想起了新疆。这里的田地被有计划地开发，精心耕作，所以都很平整，看上去就像是桌面一样。在新疆，田地里有许多为了灌溉而修筑的不规则的田埂，与之不同的是，此处的田地中没有这种现象。

大约只走了一英里半的路，便遇见了一片碎石矮坡，同以前所遇到的很类似，

⑮千佛洞山谷东边贫瘠的山区



也是一片贫瘠。这个地方没有了沙丘，右侧只有一些山，像堵墙一般向东延伸。在受侵蚀的大地上，只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小建筑物，它并不是什么遗迹，而是一些信神者特别修建的一座寺庙。这座小寺庙内没有人，可能去镇里协助举行祈祷仪式了。据说，镇里举行的祈祷仪式是为了驱逐病魔，根据描述，我猜可能是流感。这些山南面的外观，使我想起昆仑山山脉的分支叶城面向平原的那些台地来，两者很类似，同样有贫瘠的缓坡。在这里，我们还碰到了两处炮台遗迹。毫无疑问，它们修建得较早，但在路上没有任何官方标记，所以它们应该不是很重要。实际上，在后面的路途中，我们没有再碰到这类遗迹。

总共前进了约9英里后，我们来到了通往石窟寺的小溪前面的洼地上。这个洼地很浅，一个小寺庙坐落在碎石嶙嶙的地面上。这个寺庙的砌砖和窗框雕刻的风格与敦煌镇上寺庙的风格类似，琉璃瓦看上去还很新，说明其并不古老。但是，整间寺庙都有被人毁坏的痕迹，不止一处的屋顶破裂，相近的小神台也塌了。寺庙中有一个佛陀彩色泥塑，其余的侍者泥塑则不易辨认。尽管这些泥塑残缺，但可看出它们仍是这里人们的崇拜物。在泥塑前有一些装满沙子的小盒子，用于上香。墙面上和地面上有许多写有字的红纸带，上面写着汉字，可能是篇幅较短的祈祷词或献词。

寺庙的门外挂着一个大钟，钟已经锈迹斑斑，有些地方裂了缝。蒋师爷解释了寺庙墙上那些汉字的含义，其中包含有佛教经文。但令我高兴的是，我们发现了一片写有日期的铭文。从而，我现在可以肯定小寺庙的确不是很古老，大约只有150年左右的历史。根据中国的传统，文书上都注明日期，这里的佛教徒也保持了这个传统。我多么希望印度的信徒中也有这种概念，准确记录下日期!

这个小寺庙中荒废的气氛，使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对要参观的石窟寺的状况有所预料。又向前走了不到1英里后，来到了小溪边幽静的山谷中，溪水没有结冰，在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千佛洞了。此处山谷的缓坡上没有耕作过的痕迹，而且缓坡受

到了侵蚀作用，显得灰白，低矮的阶地向东延伸到溪流末端处。我一直感到环境会越来越荒凉，不断经过荒山野岭。在右侧陡峭的悬崖上，我们见到了第一处石窟。

在悬崖上有许多阴暗的洞穴，大多数较小。悬崖底部有溪流经过，从悬崖下面到顶部，石壁上密密麻麻的洞穴像是蜂巢一般，洞穴呈不规则的层状排列。悬崖壁上到处有连接洞与洞之间的梯子，但是在大部分洞穴的前面，砾岩已经崩塌。从远处看去，要到达这些洞里只能用绳子牵引着，或如果不怕麻烦，可以搭起台架到达山洞。眼前石窟寺这幅奇特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所见过的意大利早期的绘画，像是某些重要人物的隐居之地。我不由得想到这些神秘的隐居者可能会把生活垃圾丢到洞穴里，我下意识地想到隐居在这里的和尚，不知道他们怎样相互拜访。

但是，这样的胡思乱想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再次穿过一层薄冰，冰面很宽，到达最低处，成排的洞穴并没有建在碎石河床之上，洞前有一片肥沃的冲积地区。我立即便注意到了所有洞里墙上的壁画，因为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千佛洞里并没有佛教信徒，而是佛祖的塑像。所有的洞都是寺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洞观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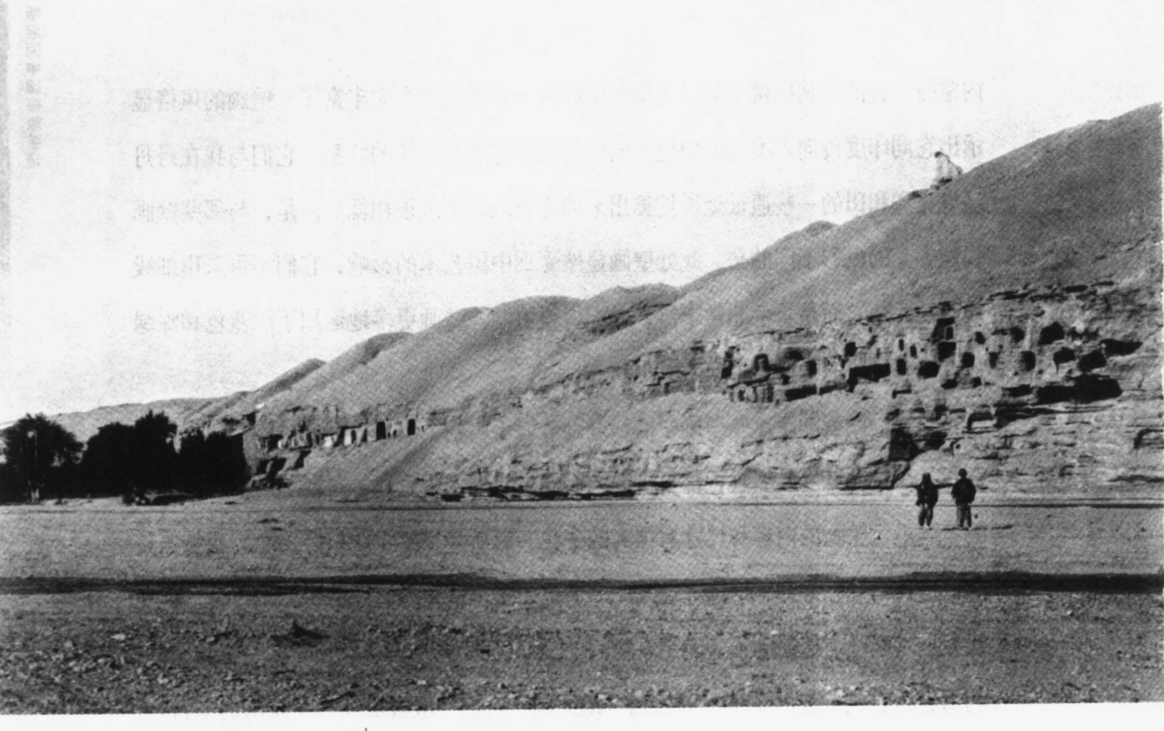
继续向前走着，路一直沿着悬崖向前延伸，路的两旁还有榆树。从远处看，溪流变宽的地方还有人烟，说明仍有人守着这些洞。但是我们到达时，并没有人来接待我们，也没有人能给我们指路。洞的数量之多，排列如此紧密，有的高，有的低，各层之间的洞与洞排列毫无次序。在许多洞前有类似走廊的通道，墙壁是用光滑的石头砌成，天花板上有褪色的壁画。在悬崖上，各洞之间有粗糙的梯子及木制的走道可以相通。这些梯子和走道似乎都已经破碎了，显而易见，最高一层的洞几乎无法接近。

由于没有什么指引物，我第一次的观察很快便结束了。我注意到石壁上最下面一层中有一些较大的洞，洞里有精制的木头通道，显然经过后代人修复。我很快发现这些洞十分古老，壁画和雕塑有着丰富的内涵。当我从一个内堂迅速走向另一个

内堂时，我的眼睛应接不暇，这里壁画的种类和泥塑实在太丰富了。壁画的风格显示出它同印度传向东突厥斯坦地区的佛教绘画艺术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与我在丹丹乌里克和和田的一些遗址处所挖掘出来的寺庙内的壁画很相像。但是，与那些壁画强烈丰富的色彩不同的是，此处壁画显然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它们不再采用细线条以及浅色，而是着色非常丰富，搭配得很协调。壁画更多地运用了深蓝色和深绿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藏艺术的影响。

很快，我就断定这些壁画中的最好部分属于唐朝。剩下的部分，不管是否保持原状，还是被修复改变过，都可看出它们仍忠实地保留着那个时期的风格。在不同的石洞里，壁画的内容和尺寸有很大的变化，但所涉及的主题是统一的。我从一处矩形的入口处，来到了一段又高又宽的通道，这个通道尽管毁坏得相当严重，但光线充足。这段走道通到了一间足有 45 平方尺大的正方形内堂。这个内堂的顶很高，利用岩石雕成。在内堂里，可找到一组绘画，它们一般被放在一个较高的平台处，或是面朝门口的小室内。内堂四周墙上都有壁画，走道的墙上有一排排的菩萨泥像，或站或坐。内堂的壁画无论是单独的一幅图，还是墙壁上一系列的画，一般都装饰有边框。泥像通常位于内堂中心，或是单独一个佛陀，或是一组佛陀，周围还围绕着佛陀的侍奉者和追随者。这些佛像的种类很多，姿势多变，主要来自想象中西天极乐世界中佛陀生活的情景。

无论这些壁画是否有这种宗教性质，还是代表佛教法事中各种各样的众生(sattva)和圣徒，当中的人物都具有印度艺术的特点，特别是佛像，忠实地保留着由希腊佛教艺术发展来的样貌、姿势和衣着，而雕塑和装饰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一些僧人和信徒的日常生活情景。只有在壁画边框复杂的花纹设计中，中国的艺术家似乎才得到了自由表现他们所喜爱风格的机会，大胆的设计花纹，雕刻都很精致。这些图像中没有受到当地的艺术影响，只需简单的姿势，充分表现了古代艺术的丰富



⑱千佛洞的中间组群和南面组群的开始处

细致之处，这种风格传到了印度河地区，在达塔迦坦（Tathagata）及其神灵图像里得到体现。

要对这些遗迹的类型和特点迅速进行概括是比较困难的。这些易碎的雕塑材料仅仅使用了黏土，所以已毁坏得很严重，这种由于材料腐坏而造成的破坏甚至比那些不信神者以及虔诚的信徒进行的修复而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得多。在我参观的大部分洞中，都有坐着的佛像，有的体积非常巨大，佛像旁边通常站着不少常见的菩萨和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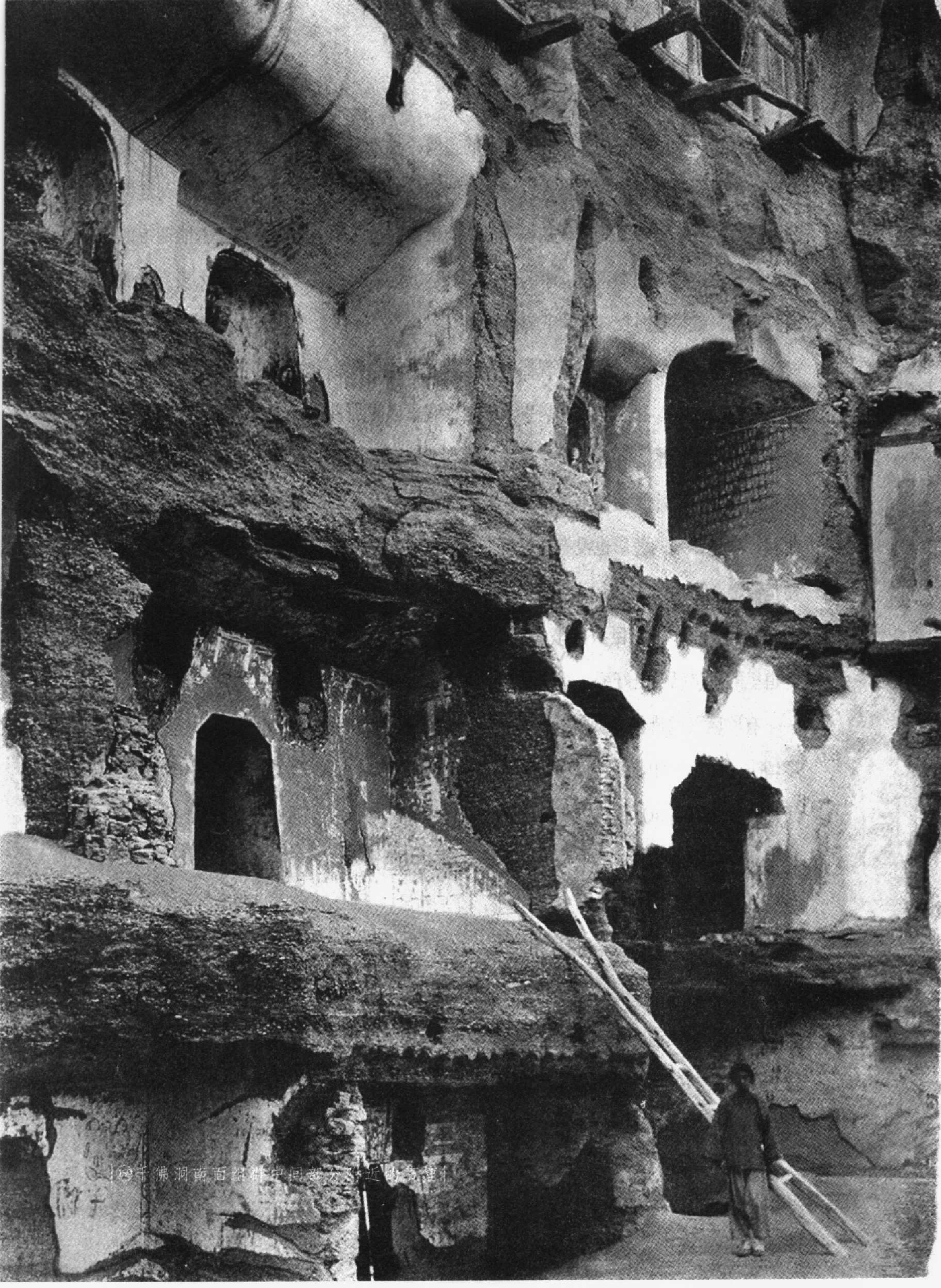
在这些佛像中，我能认出象征着守门神的佛像，即“神地的守护者”。守门神一般衣着精美，形象生动，通常位于马蹄形平台的侧面，而在较大的洞里多为塑像群，

同样也有那些大门神的塑像。对于剩下的塑像，我意识到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必须要有一个熟知佛教知识的人来进行指导。但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地方，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吗？况且，蒋师爷对佛教知识和复杂的佛像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又怎能期待他能理解和讲述其中的知识呢？事实上，在到达敦煌后，我就发现需要这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就很懊悔我对汉学了解得太少了。

在这些佛像中，并没有发现那些在远东大乘佛教及后来西藏和印度北部佛教中多头多臂的怪物，我心里很是高兴。于是，我可以更加肯定，这里的佛教艺术主要来自希腊佛教艺术。随后，我发现这里大多数雕塑的头和手都经过修复。但令人很难过的是，这些修复做得不是很好，还好的是一般塑像的身体及丰富的服饰没有被改动，并且原来的色彩也没有被重新上色。从此，我知道这些早期佛像的一个特点便是镀金，还会经常出现巨型佛像，姿势复杂多变，修复工作主要也针对这些方面。后来，我发现了几个巨大的坐着的佛像，足有好几层楼高，在佛像前新修了走道，走道里的木梁已经上好漆，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纸，上面写有汉字。

有些巨大的佛像高度将近100英尺，原来生动的表情依然可见，这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的《沙州》（Sa-chiu，即“敦煌”）一书中曾提到了唐古特（Tangut）很久以前的奇特的信仰风俗。他说：“这些信徒使用一种专门的语言，以农业为生，没有商人。他们修建了大量佛寺，风格各异，对佛教笃信不移，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从马可·波罗经过这里以来，敦煌一直保持着它传统的信仰。但是，在千佛洞里，有大量唐朝的文物和艺术遗迹，那时是中国佛教文化繁荣的时期。当时，敦煌是中国最西边的军事基地，在唐朝军队保护下抵挡北面突厥人和南面西藏人的袭击，这种状况持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唐朝以后、马可·波罗到访前，蒙古人占领了这里，于是这些地区便受到各种野蛮的破坏。可以肯定，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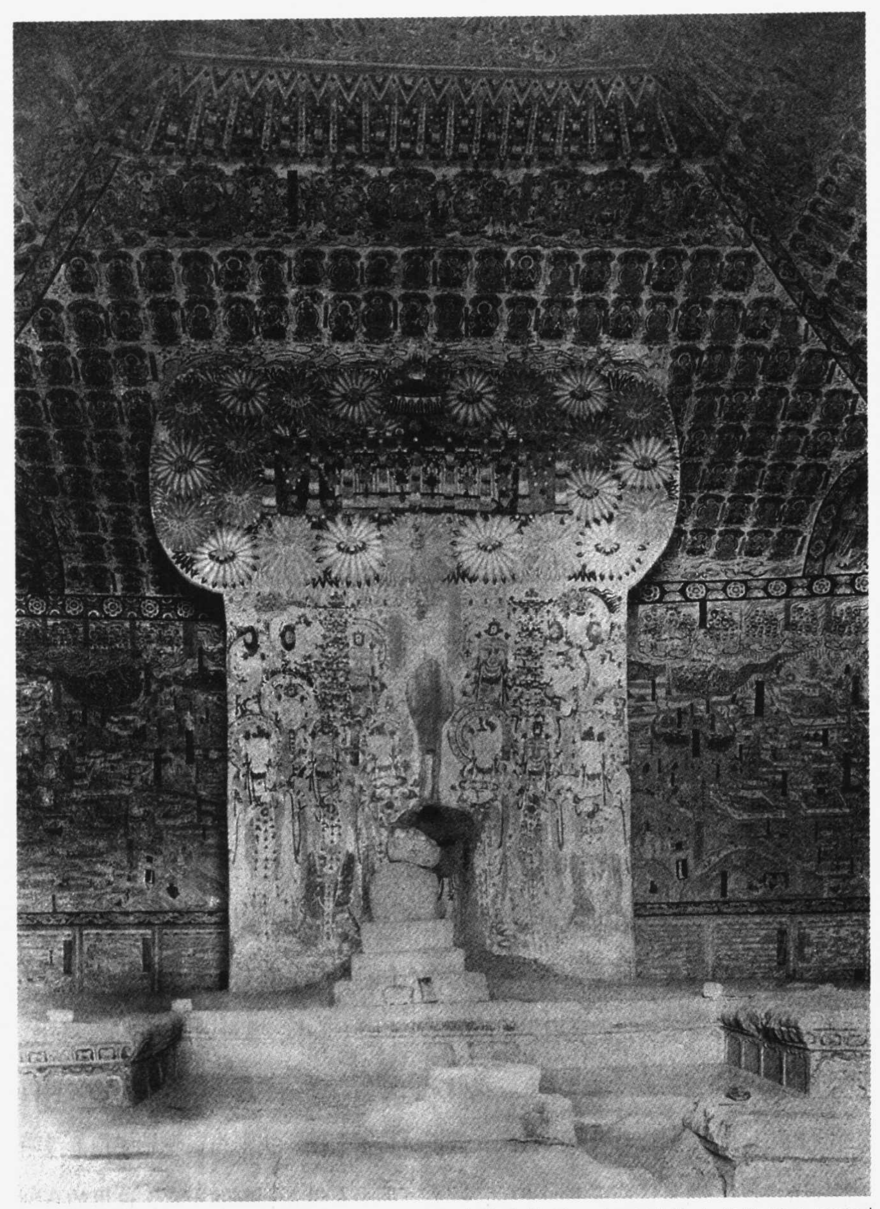
(四)千佛洞南面窟群中間部分附近的外貌

大量的寺庙被废弃，居住在寺庙附近的僧人和尼姑也都消失了。

我们匆匆忙忙在洞之间穿行，最后终于碰上了一个本地的僧人。他是一个年轻的和尚，留下来负责照看那些位于石窟寺南端的农舍以及寺院。这个和尚比较寡言，却很聪明，谦虚谨慎。他很快发现了我的兴趣所在，他正是我们所要找的那种向导。但是，这个和尚外貌几乎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特征，反而像我曾在和田见过的有印度血统的人。由于我已见过许多不同的敦煌人，这里是中国、西藏及塔里木盆地中的准亚利安人（quasi-Aryan）居民点交界地带，有许多各民族的混血儿。

这个和尚很快便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寺庙处。在这座寺庙里，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石刻，上面记录了唐朝时期在这里进行的敬神活动，寺庙里还保存着两个较小一点的石刻，上面的汉字雕刻得很是精美，分别属于宋朝和元朝时期，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不得不将研究这些石刻的工作全部交给蒋师爷，而他也乐于干这事，很快便专心研究这些古文字了。当我知道有一些已由伯宁先生（M. Bonin）带回了拓文，并且由沙畹（M. Chavannes）收集出版了，这才让我松了一口气。

在敦煌县城时，扎西德伯克曾告诉我一个当地的传说。据说前几年的时候，在石窟寺的一个洞中偶然发现了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有一部分书稿不是汉语。我很关注这些书稿是否存在，据说这些书稿由官府下令锁在了一个洞里了。不久前，我曾和蒋师爷秘密讨论过怎样能找到它，怎样才能突破宗教障碍而得到它。我对蒋师爷提到了我在印度的经验，即不管当地僧人如何贪婪，对其采取外交手段更容易取得成功，蒋师爷理解我的意思，我想在这片中国土地上，这种方法可能也会有效。可是负责看管书稿的道士现在不在，我们无法开始行动。不过，这个和尚恰好可以给我们带路，于是我让蒋师爷和他到一旁进行秘密交谈，我则去参观悬崖顶部最南端附近的洞穴，对其快速观察回来后，我去了那个有最新石刻的洞穴，这里的石刻约是 14 世纪中期。这时，蒋师爷满心欢喜地找到了我，由他脸上的神情，我知道我



⑯千佛洞一个石窟的内部墙壁和顶部的壁画装饰

们的计划成功了。

这批书稿是在较北边的大石窟里发现的，石窟的墙壁上有被人近期修葺过的痕迹，入口已经被落下的岩石碎片和流沙掩埋。在清理完入口后，进行石窟内堂和走道的修复工作时，工人们发现在通道的墙上有裂缝，从裂缝处，他们发现右墙后有一条通道，一直通向了一个嵌入岩石中的密室。

随后，经证实这些书稿虽是用汉字书写，但却不是汉语的措辞。书稿的数量之多，可能可以装满好几辆马车。甘肃总督（Viceroy）得知发现书稿后，下令将一些样品上交到兰州，随后又下令将全部的书稿放回原处保存起来。所以，在这个已被整修好的密室内，在它锁着的门后，就放着那些还未被破译的奇怪书稿。虽然石窟里都是有关佛教的壁画和塑像，但这里却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给我们带路的和尚和道士共同看守这个地方，二者相安无事。

由于那个道士带着他的随从去了远处的绿洲化缘，因此蒋师爷没有机会更进一步进行调查。但幸运的是，和尚的师父是西藏僧人室罗末拏（Sramana），为了自己私人的佛堂增加特别的装饰，他于是借出了一卷书稿。蒋师爷说服了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去参观这卷书稿。这卷书稿保存得很好，是一卷纸，大约有1英尺宽，15码长。我和蒋师爷小心地打开了它，发现书稿的确是用汉语书写的，尽管蒋师爷很博学，但他也坦白承认不知道这些文字到底表达什么意思。

那么，这是否就说明手稿不是汉语，还是仅仅因为它的内容是独特的中国佛教语言，以至于对生活在文化环境不同的当代中国人，即便是受过良好的正统教育，也无法读懂它呢？随之，我们立刻注意到了在书稿中反复出现的一段话语中包含有“菩萨”这个词，而这是相关梵文的汉语表达，这足以证明书稿中的内容是关于佛教的，也使我更想阅览全部的书稿。这卷书稿纸张相当结实，质地不错，很光滑，纹理清晰。但是，它被很细心地保存着，本地气候又很干燥，无法仅从书稿的外观来

判断它属于什么时代。除非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秘密的书稿存放处，否则我们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将会被推迟。

我发现尽管这些石窟都已开始毁坏，但仍不断有人来这里朝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即使不考虑由那些修复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单单因为这些实际情况，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活动就很困难。我不知道，即使这些僧人脾气好，很关心物质利益，那么在我们拿走一些佛教物品时，他们是否还会置之不理呢？如果这些僧人对我们的活动真是不管的话，能否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当地信教的人们，以消除他们的顾虑呢？可能只有找机会实践一下才能知道答案。

没想到付给点菲薄的报酬，这个和尚就心满意足，我心里更是感到高兴。其实，在有古代寺庙之类遗迹的地方，我一贯对当地僧人或寺庙出手都很大方，以为我所

⑯千佛洞石窟中的塑像群，代表着佛陀、门徒、菩萨和门神



M. Aurel Stein

用。这种态度与我对那些印度学者朋友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些印度学者，只要他们觉得他们能获得精神上的益处，则他们是很乐意提供帮助的，但是蒋师爷则很明智，建议我应该采取稳健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出手过于大方，会引起人们的疑虑。在我认识到这点后，我收了手，一般付给相当于3卢比或4先令的银子。小和尚得到报酬后，十分满意。敦煌人比较贫穷，不可能给这些僧人太多的钱财。根据蒋师爷提议的做法实行以后，从这个和尚的态度中，我也发现了他们既想保持纯真的宗教信仰，又对这种接受钱物的世俗行为感到不安，这也是本地僧人的一种特点。然而，在克什米尔，我们考古活动所到的地区，当地僧人和我的队员间是不允许有这种金钱关系的。

黄昏时，我终于离开了这些蜂巢似的石窟。从陡峭的铺满碎石的缓坡，爬上了河边的台地，然后穿过外面山脚下光秃秃的碎石地，返回了敦煌镇。路途中，刮起了西风，冰冷刺骨。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所以，一路上，没有什么东西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石窟寺中生动形象的壁画以及精美的雕塑。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三章

## 敦煌：困难的开端

这次来千佛洞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向我展现了令人神往的考察前景，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简直无法集中精力于案头工作。但是，要处理的事是如此的多，我仍然不得不从早到晚一直在忙于这样无聊的工作，即使这样，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一个和田商人打算3月21日要前往若羌，我想让他带信给邮差库尔班·尼亚孜(Kurban Niaz)。自从我最后一次寄信给喀什噶尔、印度和欧洲以来，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寄信了。里面装着近4个月以来的各种工作情况汇报，所以邮包特别沉重。

同时，我经过认真地思考，制定了近期计划。根据我在塔克拉玛干的经验，我推测一旦冬天过去，敦煌附近沙漠的气候条件将无法预料。所以，我决定把对古长城边防线的考察工作作为新计划的首项任务。但是，我无法计算清楚挖掘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在现在看来，对千佛洞的考察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此我必须返回古代长城边防线。只要有了向导、挖掘工人和给养，我就要立即返回古长城，尽量避免在敦煌无谓地拖延。

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准备工作将会面临多么大的困难。我的那些朋友，知县也好，当地军官也好，敦煌城里的其他有教养的人也好，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似

乎很感兴趣，也很乐意帮助我，但是对我所希望去考察的沙漠里的遗迹却是一无所知。另一方面，牧民和猎人有时去附近的丛林，应该对那里有所了解，但由于当地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他们中根本没有人愿意充当我们的向导。

但是，还有比找民工和运输更麻烦的事情。首先的问题便是我在当地的保护人，军官林大人以及博学的知县大人邀请我和蒋师爷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当然，他们还是很体谅我的，一直到得知我已经处理完了信件和账目的事情，终于有空的时候，他们才发出了邀请。这个聚会在县城北边一个地理位置不错的寺庙中举行，除了我和蒋师爷以外，这次聚会只有两个别的客人。聚会时，大家尽情享受，不久我们便开始讨论起了学术问题以及各种实际的“事务”。

坦率地说，这次聚会虽然人不多，但相当的成功，我非常欣赏聚会的种种安排。自从我在纳尔巴格（Nar-bagh）扎营以来，已经有很久我都没有见到过这么整洁的房间，况且房间内还洋溢着温暖、令人愉快的气氛。聚会的菜肴也非常丰富，种类繁多，有的我根本叫不出名字，一会儿我就顾不得数到底上了多少个菜。一直以来，我那难管教的克什米尔厨师总是做一种菜肴，我早已经吃腻了，所以对我来说，这次聚会算是改善了生活。同时，汪大老爷还很细心周到，为我准备了精神食粮。他为我拿来了一卷中文的敦煌地方志，地方志里记载了当地的历史事件。于是，在晚餐还在准备的时候，我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千佛洞在唐朝时的各种情况信息，我也从中了解到现在人们对通向西方的古路了解得并不多。

显而易见，本地的中国学者对于我们在敦煌沙漠中曾考察过的长城遗迹毫不关心。从聚会回来后，蒋师爷继续翻阅着那卷地方志，想再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当地那些古物学家只关注于书本上的东西，而不愿去野外寻找真正的古物。但是，想到沙漠中那无常的自然条件，我就感到不能责备这些当地的中国同仁为什么没有在我来这里之前就去沙漠里考察。在我向当地的主人们解释我所

要进行的遗迹考察工作时，我同样也不能抱怨他们对此问题的冷漠态度。早在我们第一次拜见这些人时，蒋师爷就已经告诉过他们许多事，提到过我的工作方法以及考察取得的成果。这些中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历史具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于是他们欣然同意我在当地进行考察工作。

在晚饭的交谈过程中，当讨论到我计划的挖掘工作可能需要的各种统筹安排时，我马上意识到了面前有很多的困难，与在新疆遇到的情况类似，连按办都没能给我提出建议。汪大老爷则很严肃地告诉我，他没法为我提供我所需要的挖掘工，可是我最初的计划中最少需要 12 个劳工。他告诉我，东干叛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自从那以后，敦煌绿洲的人口一直非常稀少，连农业所需的劳力都很缺乏，况且种田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尽管所拥有的土地还比较少，但要让他们到沙漠中去进行挖掘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沙漠中气候怎样，劳动报酬怎样，敦煌当地人都宁愿过着他们悠闲的生活，生计不愁，所以可以不去理会官府的压力，也不想得到什么高酬劳。

除此之外，很多敦煌人抽大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愿意面对野外艰苦的生活。对那些白天做雇工的少数人而言，尽管他们都是些懒散的流浪汉，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但他们同样也不愿意去那恐怖的戈壁沙漠中工作，而是更乐意就在敦煌镇以及附近的村庄中找一些比较容易的活路。如若愿意去，他们就要坐马车，根本不想劳动。我很清楚在缺水的沙漠中行走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些劳工要求乘马车去沙漠的主意，让我觉得就像是蜗牛背着壳慢慢地爬，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当然，同时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在我深入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体会到这里的人民和行政机构的作风与新疆那里是多么的不同。在中国，按办作为官府统治阶级的代表，只要能给予人们一个合理的回报时，他就可以指派任何劳工。征集劳力的任务主要依靠较小的官员，如伯克以及村里的头头，而这些人自有他们自己的办法完

成这些任务。而在此地，这种统治方式似乎已经改变了。当我越来越深入甘肃内地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这里的统治制度基本原则实质上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容忍，这又是由一种长久以来的模式形成的。

面对这些虽然懒惰却高度民主的人民，当地官员们必须用实际得来的经验对事务进行有限的干涉。像征税这种收钱的事情，必须要考虑够官府所需，以及当现任官员离任时还得预备下一定的贮备，同时还要考虑人们对此的容忍程度。当地人们为了保留这种传统，并考虑到安全保障，他们会容忍官府各种做法，同时也会小心翼翼，防备过分的要求。我认为与其说本地的小官是国家政府的代表，还不如说是同行保护协会以及地主团体的代表了。其实，因为甘肃最西部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在我以后进一步向东考察的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尤其是后来这位博学的汪大老爷成为了这种冲突中可怜的牺牲品，这个悲剧使我更加明白敦煌当地的上层统治阶级是不能信任的。

由于大家都很关心所谓的“背景”，或是公开，或是秘密，于是很自然，我们的谈话便转换了话题，谈到了统治阶级能真正掌权统治的地区，即新疆地区（New Dominion)。在那儿，任何一个能干的按办都可以不用顾忌当地人们对事情的反对意见。我注意到，当话题转变后，聚会的气氛也更加活跃起来，这让我觉得很好笑。谈话中，比较喜欢摆架子、但为人很友好的林大人则回忆了他在那个最近刚被征服的行省那里所度过的岁月。他说，在那个地方，每一个官员生活舒适，可以毫无顾虑地捞钱。听到这些，蒋师爷立刻暴露了他心里真正的意图，开始喋喋不休，以吸引这些官员对他的注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可以提拔他，而这些官员也比较喜欢他的为人谦逊，于是蒋师爷也竭尽所能，努力使自己能有资格被他们所提拔。我很明白，对汪大老爷以及在甘肃的新疆人来说，在中国这个所谓的“黄金国度”(Eldorado)，要投身仕途，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我不禁想起那些盎格鲁—印度（Anglo-Indian）朋友，他们有的在旁遮普负责管理大地区，有的在欧洲当官——那里贫民窟林立，充满了驯服的、满腹经纶的社会主义者，如果遇到类似敦煌这里的情况，那我的这些朋友们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根据这些情况，我可以推论出，在印度的英国统治与这种自古以来从中亚到新疆的中国世袭的统治体制之间一些明显的共同点。虽然这些上层阶级还没有开化，他们还是非常欣赏我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我们对体制上共同点都颇有感慨，觉得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于是，在小聚会结束了以后，我得到了这种印象，即除了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以外，我们之间也有了更好的相互理解。

3月22日，我在为返回沙漠进行考察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我特别需要补充新的劳工和牲口。这时，我现有的劳工和牲口都已经调整好了，奈克·拉姆·辛格也完成了我们冬天工作的总结，同时他还对我的照相机作了一些改进。我则设法抽空重新安排我们的行装，将一批供给贮备在敦煌镇内以作为一个补给据点，雇用了一个人来负责看管。但是，对于我所需要的劳工和骆驼，县衙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不能给我明确的回复。在这天，知县和林大人来拜访我，虽然这次拜访是私人性质的，但我还是借此机会，又提出了我的要求，告诉他们我非常需要劳工和骆驼，哪怕这些劳工只会走路都行，还有劳工和骆驼所需要的供给。他们答应全力帮助，却面有难色，对如何说服敦煌当地人能跟着我去沙漠没有把握。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他们，我明天就要开始沙漠之行了。我有许多事要解决，比如像结账，我要根据各种不同的尺度去称量银块，相当的麻烦，一直忙活到了半夜，但是劳工和骆驼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3月23日早上，我继续等待，心烦意乱。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怎样都要开始行动，让这些中国官方朋友明白我是当真的，可不是说着玩的。收好了我的帐篷，准备好了我们现有的骆驼所要带的行囊，这些骆驼花了哈桑阿訇（Hassan

Akhun）一个通宵才将它们从牧地安全地带了回来。虽然他对敦煌的所有东西都很挑剔，但他也还是承认那片牧地相当不错。这时，来了一个人，他并不是林大人所派遣与我们一同前往沙漠的官员。他不善言谈，但很乐观，说如果我能给他很高的报酬的话，他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衙役允诺送来已经谈好的劳工以及骆驼，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任何回音。我们反复去县衙打听这件事，除了歉意之外，劳工和骆驼依然没有结果。看来，当地人的懒散以及其他的阻碍因素，尽管知县意图很好，也难以办成事情。蒋师爷曾经在新疆工作过很多年，他已经习惯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办事过程，所以他对这种公然蔑视权威的作风感到愤慨。

我们在此地逗留过程中所接触的人们向我们表现出了他们的好意，这与以上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首先，我们的女房东派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祝我们旅途愉快，当然同时也收房租。骆驼等牲口的看守人也很感激我给他们的酬劳，尽管所给的钱并不是很多。虽然这些敦煌人曾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他们并不缺乏应有的礼貌。

然而，当我正坐在那些打好包的行李中时，有一个人来拜访我，还给我鼓劲。这种见面，让我觉得在中国这个遥远的地方，自己几乎就要被当成了一个乡下人。这个拜访者是一个名叫协尔·阿林汗（Sher Alin Khan）的喀布尔商人，他在和田做生意，很精明能干。刚刚从克什米尔和莎车购到一些英国进口来的衣料后回到敦煌，正打算让他的商队带着茶叶和丝绸经过若羌返回和田去。他对我在印度、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akhara）经常去的地方很熟悉。他个子很高、衣着不错，看上去像是一个南欧人。他在那条从古使用至今的商路上肯定已经走过很多回了，看到他，也就不难想象1800年前，马其顿人马埃斯（Maes），即提提亚纽斯（Tatianus）是如何从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到达遥远的赛里丝（即中国——译者）国度的。

最后，我意识到再等下去也是没有用的。蒋师爷用一张平整的粉红色纸，写了一封指责信递交给衙门，然后，我们在1点钟的时候出发。我计划首先从敦煌绿洲北面，寻找古长城，因为根据我的推测，古长城应该沿着疏勒河的岸边向东继续延伸。我们经过敦煌镇的内墙和外墙，走到脏兮兮的大街上，如猪窝一般，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们这次也是从东门出了敦煌镇。这个木门形状很是漂亮，虽说有些旧，毁坏也很严重，但对比起周围肮脏的环境，看上去还是不错，使人愉快了不少。

继续向前走，穿过了一片广阔的地区。这片地区开发得不错，有一些果园，还有一些零星分布却过得很殷实的农户。还没有走3英里，一个骑马的衙门信使追上了我们。然而，他带来的消息与那一直拖延的劳工和牲口的事情无关，而是从喀什噶尔以及北京发来的电报，我仍是非常高兴。在我刚到敦煌的时候，我便派依布拉音伯克（Ibrahim Beg）去了东北边距离敦煌有四站路程的安西镇（An-hsi），我知道由新疆到甘肃的大路通过那个小镇，电报线路也是沿着那条大路。我让依布拉音伯克给麦卡特尼先生和北京公使馆发了电报，通知他们我已经到了敦煌镇。不过，我也很清楚这条联系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电报线不太牢靠，主要是在沙漠中电报站很稀少，并且还时不时地中断一两个星期。而现在，我居然在十天内就收到了回电，这实在太让人兴奋了。

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别人翻译可能会扭曲电文原意，于是我便坐在路边上，开始解读电报。电报是由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发送过来的，电文则是东方公司所用的电码。读着电报，我十分激动。电报上说驻北京的公使馆以及喀什噶尔两方面都再一次保证他们支持我的考察工作。喀什噶尔的电文中还提到那里的一切工作进行顺利，而且已经经由和田寄出了一个大邮包。在北京公使馆的电文中，我知道我这次考察所有的事情都将全部由中国外务部负责（Chinese Foreign Office），并且还允许我可以向肃州道台提出请求，可以从国库中提取6000

两银子，相当于1000英镑。居然可以这么迅速地与遥远的喀什噶尔和北京取得了联系，这让我感觉舒心了不少。然而，让我最感欣慰的是，我感觉到了本地的生活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我而言，从喀什噶尔传递信件的路途还是要比从印度或是从欧洲寄信的路途远，花几个月都是很自然的，就像马可·波罗曾经的经历那样。而现在，在我已经很习惯了这种中世纪时代的生活后，这次的电报似乎又让我感受到了一丝现代生活的气息。

由于收到电报，使得我那天后来一直都很高兴。这天的路途虽然比较短，但我还是发现了不少值得考察的地方。一路上，经过了一些新近出现的大型棱堡，棱堡为土坯筑成，墙又高又厚，看上去是新近才建成的，里面的房屋或农舍不多。这些棱堡的建筑风格很像是中世纪的建筑，让我想起了印度西北边省的帕坦（Pathan）所修建的称为吉拉斯（Killas）的那种棱堡。我了解到，它们主要是由附近的村民在东干人叛乱的那段时期中修建或是修复的。这些不幸的居民们怀有一种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高墙便可以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建造并维护着这些棱堡。但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种防御措施都是不够的。当那些狂热的回教叛乱者发动攻击时，这些分散的棱堡一个接一个地被攻破，那些叛乱者甚至连妇女和小孩都不会放过。于是，在那段时期内，由于持续的长期围攻，许多人饿死了，只有逃到了敦煌镇上的那部分人得以幸存。

尽管那段恐怖的时期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到当年留下来的许多遗迹。一路上，离敦煌镇越远，房子以及寺庙的废墟便越多。废墟附近的农场已经开始有人又在里面居住，邻近的土地现在也开始有人耕作。但是，还是可以明显发现，由于那场叛乱，现在当地人口数量依然不足。不久，我还发现在沟渠的两旁，出现了一片没有耕作的地区，远处有成排的树木，显示出敦煌绿洲沿着那些沟渠，向四面八方扩展。此地茂盛的灌木丛则说明这片弃置的土地十分肥沃，正等

着重新开发。

在这些荒地中到处都有以前农场的痕迹，还有成群的小羚羊在吃草，样子很悠闲。显然，此地的村民不喜欢打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残存的佛教观念，还是由于当地独特的迷信观点，还是仅仅因为他们太懒了呢？我努力想找到答案，但没有结果。

此地人对外来人不信任，所以他们对各种情况都保持着沉默，这对于我们的考察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那时，我便意识到，同这些敦煌本地人对比起来，即使是新疆最保守和腼腆的塔格里克（Taghlik，即山里人——译者）人，都可算是健谈的了。当我向当地人询问导致这些肥沃的土地被荒废的原因时，他们要么闭口不答，即使好不容易让他们开了口，所得的答案也肯定是一致的回答："不知道。"这些土地之所以荒废，是因为叛乱发生那段时期造成供水减少，还是缺乏扩大灌溉所需要的劳动力造成的呢？在后面前进路上，当我看见漫溢的沟渠，以及后来到达更开阔的地区时，看到南面积雪覆盖下大面积的水域时，第一个原因没法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石枣（Shih-tsao）林小村庄旁的红柳林中扎营休息。最终，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前，县衙派来了一小队劳工和骆驼，使我觉得安心了一些。衙役所设法找到的这几个劳工，恐怕是我曾雇用的劳工中最无法想象的那种类型。这几个人长期吸食鸦片，身体都比较虚弱，反应也很迟钝。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是很欢迎他们加入队伍中。于是，我立即发给他们一些银子，将那辆运送他们来的马车也留了下来。只要路面还可以让马车通过，我就让他们一直乘这辆马车。沿着沟渠继续向北走了约3英里，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村落，自从被东干人袭击以来，它就被荒废了。在这里，我们却很意外地发现了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骆驼，母骆驼在野外吃草，把它们放在这已经毁坏了的堡垒中，以躲过刺骨的寒风。看着这些小动物，想想同样是这些堡垒的墙壁，曾目睹过了劫掠和死亡，那惨剧发生距今不到

M. Aurel Stein

40年，真是不同的一片天地了。

随后，我们转到西北方向继续前进，穿过了一片曾有着许多灌溉水渠的荒地，上面覆盖着茂盛的灌木丛。当然，从东干人叛乱以来，这些灌溉水渠便干涸了，但是保存得却还是很完好。继续向前走着，来到了一个叫做庄浪（Chuang-lang）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比较繁荣，附近的地区都已经重新被耕作。在东干人入侵时，村庄里的房屋都成了废墟，现在的房子就是在废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村庄中的路两旁以及果园中的树大部分都是新近种的，说明这里也是刚刚有人居住。然而，在这片地区，四处可见到树桩，当地没有多少人，这些树木应该主要是被敦煌镇里的人砍伐的。

继续向前走了约8英里，穿过了更多的荒地，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村庄，这儿也有人居住了。此地最新的开垦者仍然比较喜欢建筑泥屋和茅舍。向西望去，可以看到党河的河床。随后，我们向北继续前进，路上穿过一个较深的水渠，显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旧沟渠。接着，一处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灌木的大草原出现在我们面前，大草原上被许多浅浅的水渠分割。可以看出，要重新利用这片土地需要排水，而不是灌溉。继续前进时，我们碰到了一大群贫穷的种田人，他们正在这片荒地上春播，以便能重新利用土地。最后，涉水穿过了这片水泛滥的地区，我便看见了那个古镇，即阔纳沙尔，在敦煌镇时，扎西德伯克最早告诉了我这个古镇，队伍中的当地人则称它为石板礅（Shih-pan-tung）。它的确是一座城镇，而且应该是在最后的一次东干人叛乱时才被遗弃的。无论怎样，这个被遗弃的小镇为我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

这处废墟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小镇，每面黏土城墙约有375码长，组成一个正方形。大约在40年前，由于回族叛军的袭击，它便被遗弃了，变成了废墟，城墙的很多部分已经变成了土堆，小镇的内部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尽管这样，还是可以

判断出，这个小镇的主要街道十字形交叉，有些像古罗马兵营的建筑风格。穿过南面那已经毁坏的大门，走过大街，看到了一处寺庙的废墟，这处废墟正好是在一个垃圾堆上，并且刚好遮住了北门。

在大街西面，就在离南门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小县衙的遗迹，这个小县衙的大门还很显眼，县衙内一些房间的屋顶快要倒塌了，但是屋内的大梁还在。还可以发现，似乎在这个小镇被遗弃后，还有一些小官员回来过这里，有可能是想重新启用这个地方。在县衙的外墙和柱子上，还贴有一些写有吉祥语句的红纸以及一些官方布告。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中，看着这个小镇，仿佛就是一幅正在静静消失的画。整个小镇里，除了另外两座寺庙以外，其他建筑物的大梁很久以前就不见了，这些建筑要不都成了砖石堆，要不就仅仅剩下了光秃秃的墙壁。

那两座寺庙，较大的一座位于那座较小一点的寺庙后，建筑风格完全遵循了中国的传统，寺庙墙上有大量的壁画。大寺庙有两层，地基面积很大，由土坯砌成，由此构成了一座独立的庙宇，高约有 20 英尺，里面的彩绘已经被野蛮地破坏掉了。虽然东干人大肆破坏了这座寺庙，但寺庙内的供品以及一个精制的大铜钟仍然留在了原处。我猜可能是因为那些入侵者没有时间，或是觉得没有必要毁坏掉这个铜钟。在那座较小寺庙西墙的中心部位，还可以找到有人来此供奉的痕迹。尽管这些地方就快要变成了一堆黏土碎片，但当地的信仰却根深蒂固。当我走在这片废墟上，经过一处处垃圾堆时，我觉得 2000 年以来，这片有着丰富历史遗迹的地方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后来者去挖掘它。我想：只要这片废墟没有完全消失，那么在遥远的将来，这里仍然会有着丰富的考古遗迹等着考古学家去研究！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四章

## 敦煌北面的古长城

3月25日早晨，在冰冷刺骨的东风中，沿着北稍偏东方向前进，我看到了一座烽火台，它的高度大致与小镇城墙高度相齐。这时，一片像沼泽似的地区阻挡了我们继续前进。这片地区肯定曾经也是田地，被废弃以后，成了一片灌木茂密的荒地，现在又被耕作者用火将其清理干净，重新灌溉，准备着耕种。灌溉渠修建的方式比较奇特，它的某些部分就是被废弃的灌溉渠，现在又重新修葺，成了现在的灌溉渠。我们队伍中的劳工和牲口，无法涉过这片地区，只好被迫绕路，落在了队伍后面。

我带着另外一部分骑马的队员，设法穿过这片地区，走4英里路左右，直接到所看见的烽火台。到达这座烽火台附近时，我发现它的确是一座很古老的烽火台建筑，符合我最初的猜测。修建者利用烽火台所在的低矮阶地渗有盐的黏土作为原料，制成土坯，再用土坯垒砌成这座烽火台。关于这个烽火台修筑年代的疑惑，很快便在我观察到了它同样独特的建筑技术后消失了。这座烽火台的建筑技法与那些护卫着敦煌绿洲西部地区的古烽火台建筑特点相一致，都是有规律地分层夹入芦苇和红柳枝条，说明它们应属于同一时代。烽火台底部20英尺见方，高有18英尺多。可

能是因为由于盐渗入到建筑材料中而产生了类似水泥的效果，这座烽火台相当坚固。考虑到长期以来的风蚀作用以及地基四角下天然黏土的磨损，但这座烽火台仍然毫无损伤地屹立于此，这足以证明了这座烽火台是何等地牢固。

不过，这里找不到任何长城的遗迹，只有在东北面隐隐约约地有一座建筑物，有可能是烽火台的遗迹。于是，我们便沿着一道通向那个地方的车辙印向东北方向前进。我计划首先一直向北走，直到进入疏勒河谷地。到了疏勒河谷地后，如果能够穿过疏勒河，我就可以派奈克·拉姆·辛格勘测从疏勒河北岸到哈拉淖尔湖一路的情况，而我则在他安全穿过疏勒河以后，转向东走，去疏勒河左岸附近寻找古长城遗迹。走了约有 4 英里，穿过了一片茂密的灌木和红柳地带。就在车辙印旁边，我看到了两个围栏。这两个围栏是用坚硬的碱性黏土块简单垒成的，显然是羊圈，说明曾有人在这一带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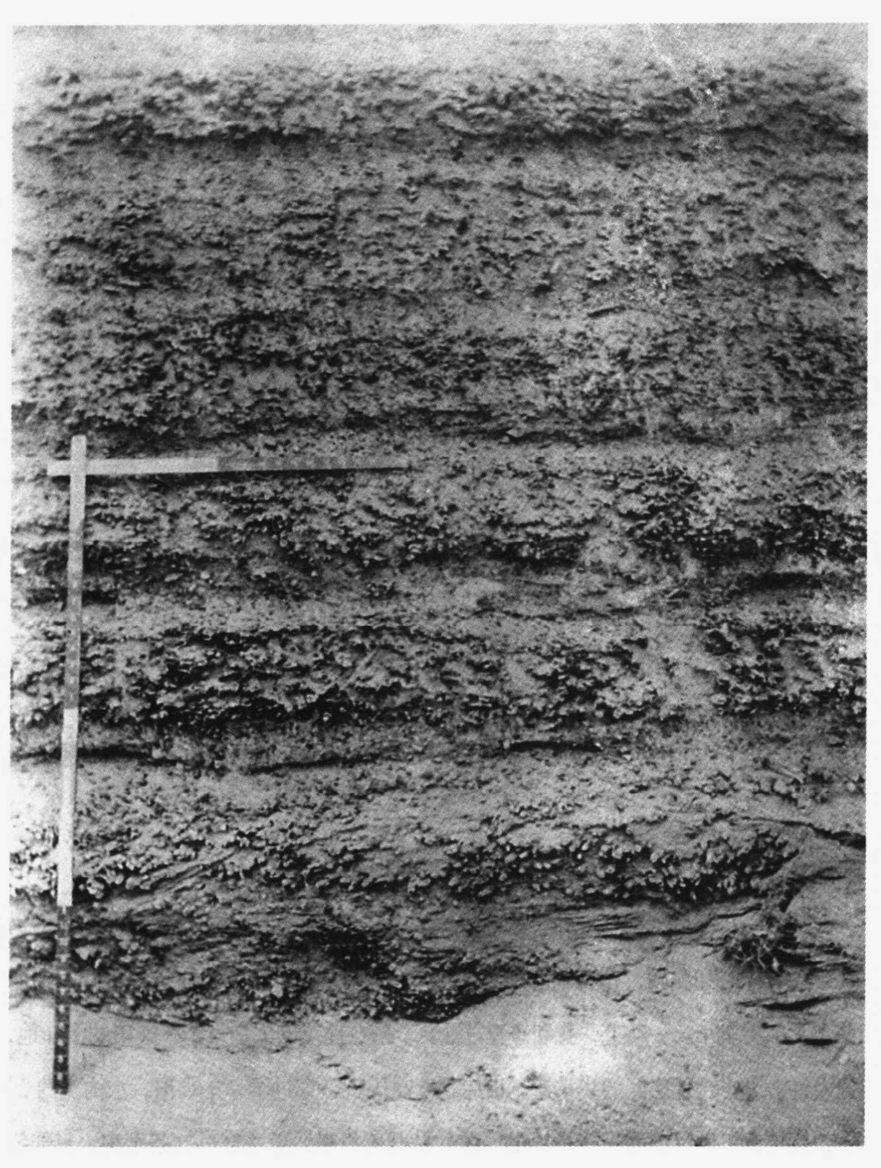
随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黏土阶地，这阶地又矮又窄，正好就横在我们前进路线的中间。站在黏土阶地上，第一次看到了一片向北延伸着的广阔沼泽地，表明我们正在接近疏勒河。在沼泽地中央有一连串的黏土台地，成排排列，由东向西延伸，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路过疏勒河终端盆地以及在哈喇湖附近所见过的与此相似的风化黏土台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1 英里左右，来到了第一个淡水潟湖处，接着，我们被迫涉水走过那一连串的浅水道，这些水道的水流方向都是向西。很明显，这些水道都起源于疏勒河。由此，我便可以清楚了解造成这些黏土台地成排排列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由于早期较宽的河床底部受到了水流冲积作用，使河床底部的走向与水流流向一致，从而形成了东西向的台地，且这些台地互相平行。后来，又因为东北风对这些台地的风蚀作用，原来连在一起的台地分割开来，并且这两种作用仍在继续。水蚀作用和风蚀作用两者共同作用，这也同样解释先前在干涸的湖床里及其附近那些奇特的台地。通过对这些地域上邻近、外貌上又很相像的现象的观察，我明



⑯敦煌绿洲北面的瞭望台遗迹，蒋师爷在瞭望台脚下

白此类台地是如何形成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很是高兴。

不久，车辙印消失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中。在这片沼泽地上，大部分的地面仍还覆盖着积雪和冰湖，积雪和冰湖已经开始融化。从第一个黏土阶地处，我们又向前走了两英里半。一路上，我和奈克·拉姆·辛格、提拉巴依走过了一连串的沼泽地，以及许多黏土台地之间的浅水道。最后，费尽周折，穿过了一条水沟，水沟宽约20码，深有四五英尺，水冰冷冰冷的。骆驼驮载着行李，无法穿过这条水沟，只能绕行。在旁边最近的黏土阶地北面有一大片开阔的冰面，说明疏勒河的主河道还没到。无论冰面能不能支撑我们的重量，我们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只好返回。我们在最



⑯敦煌古长城上瞭望台附近的古边防城墙表面，可看出城墙由夯土层和芦苇束层交替筑成

早遇到的潟湖岸边扎营，天黑以后，落在后面的劳工及骆驼也安全抵达了。

第二天早上，沿着前一天的路线，我们折回到第一个黏土阶地处。我想在那里转向东前进，继续寻找我们之前曾见到过的烽火台。于是，穿过那片满是芦苇的草原，草原上留下以前的农田以及干涸的灌溉水渠的遗迹。走了约3英里后，终于到了那座烽火台。这座烽火台也是建在一个黏土阶地上，黏土阶地位于北面的洼地边缘处，高约16英尺。烽火台非常雄伟壮观，保存也比较完好。它高约20英尺，地基约26英尺见方。在烽火台顶部有一围栏，由土坯砌成。在围栏里面有一座面朝南的无顶神坛，在神坛前还有一段类似中国寺庙或宅第前常见的影壁。神坛的墙约有7英尺高，上面还有许多残余的灰泥。

在烽火台西面的墙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梁椽留下的小洞，可能是类似楼梯的台阶的遗迹，据此判断，人们可能是通过西墙爬上烽火台顶部。然而，现在要想对这座神坛进行近距离的测量是很困难的。后来，我们发现这座烽火台上的神坛以及围栏，是用砖一横一竖交替而砌成的。这一点很特别，因为除了一些当代和中世纪的建筑以外，我还从未在中国其他建筑上看到过这种建筑方法。而且，这座烽火台建造所用的砖，与那些我在古长城考察过的烽火台所用的土坯相比，尺寸也不同，要小得多，只有2英寸厚。在这座烽火台的墙里，也找不到那种独特的芦苇束层。后来，在这座烽火台的南边，我发现了一个毁坏严重的泥屋，约100英尺见方，周围还有一圈围墙。这以前会不会是一处遮阳避风的地方呢？它又是什么时候荒废的呢？

没有在附近找到另外的烽火台，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寻找到长城遗迹。但是，不管情况怎样，我依然决定继续向东前进，直到找到车辙印为止，这条车辙印应该在穿过疏勒河后，应该会继续向北通到哈密。1893—1894年的时候，罗布罗夫斯基和洛兹夫曾两次走过这条路线，在他们的地图上，标注在疏勒河南面附近有一些废墟。无论这些废墟是什么年代建造的，我一定要找到它们。于是，我们继续向东走，

穿过了一片茂盛灌木地，有一两处长着高大的胡杨树。

这里到处都有一块块相互独立的黏土阶地。走了约4英里后，我在一个阶地上把平板仪架好，开始寻找烽火台遗迹，但没有找到。还好的是，凭着敏锐的眼光，奈克·拉姆·辛格发现在远处有牧群。于是，我们赶快奔向那里。向东走了约2~3英里后，我们看到了一大群的羊、牛、骆驼，马，还有许多很凶猛的狗，连达什(Dash，斯坦因的爱犬——译者）都很害怕这些狗，这个曾经很好动的家伙，现在却躲在提拉巴依的马鞍上。在牧群旁，有两个很健壮的牧人，看上去很粗野，骑着高大的蒙古马，还带着枪。

这两个人是东干牧民，对疏勒河、敦煌县城南面山谷里和高地附近的牧地都很熟悉。他俩长相粗野，举止粗犷，难怪路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然而，凭我的直觉，我意识到，与那些温和、不愿走出家门、沉默的中国人对比起来，这些粗犷的游牧民族更值得我尊敬。尽管以前叛乱时，东干人作为土匪和叛军，做过很多凶残的事情。但是，我更欣赏他们坦率无忌，口无遮拦，勇猛剽悍，对本地的情况很了解。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我向他们询问这附近古“炮台”的情况，还给了他们一点钱。其中稍年长、自称是这群牛羊的主人的那个人，和另一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后，告诉我他愿意做我们的向导。他可以带我们到一个四周有水既可扎营又可看到烽火台的地方去。

于是，在这个东干人带路下，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又走了约3英里，来到一个孤立的黏土台地。这个台地位于一片宽阔的沼泽地带边缘，约有40英尺高。我爬上台地上面，发现南面和西南面至少有10座烽火台，烽火台沿东西向大致排成一线。尽管距离很远，但是在落日余晖下，它们仍泛着黄色。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长城，我终于成功地找到了它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当然，这个就站在我身边的牧民也应该高兴，因为我给了他不少银子。当他看到我一直用望远镜盯着那些

M. Aurel Stein

烽火台时，他肯定地告诉我，说这些烽火台是“安西到罗布淖尔的汉朝古道”的标志。

他的话似乎证明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推测。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东干人所说的话是真是假，是他自己的主观猜测，还是一种传说，我不得而知。他也说不出这条“汉朝古道”向西延伸有多远，他告诉我说，大概17年前，他的一个兄弟沿着这条路，带领一位“特别”官员去罗布淖尔，他的这位兄弟目前在西宁府做买卖。根据他所说的日期，我想那个所谓很“特别”的官员没准就是倒霉的探险家马丁（Matin）。格厄纳（Grenard）先生关于杜特雷依探险队（Dutreuil de Rhims）探险的记载，马丁是现代第一个从敦煌出发，穿越沙漠到达阿不旦与和田的欧洲人。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写下自己的经历，就死掉了。

过后，东干人带着我沿着河流，向东北偏北的方向走了很远，来到了建筑物的废墟群，根据东干人的说法，这些建筑物原来是寺庙。由于河水泛滥，我们无法穿过河到达废墟处。后来根据所得的各种情况，我确信那片废墟是近期的，是往哈密路上一个已经废弃的驿站。

在这个地方，能找到这个东干人做我的向导，我很高兴。但是，营队中的中国人不欢迎这个人；况且，他的牧群现在只有一个人照看，他很不放心，尽管我再三挽留他，出多高的报酬，他还是坚持要走。他可以为别人工作，但他更愿意坚持他的独立，而且，在队里，他难免会经常接触到他蔑视的“汉人”，所以他很快便辞别了我们。不过，他还是答应第二天早上给我们带一只羊过来，到时我将再给他出个好价钱。但是，他并没有来，派去取羊的人也没有找到他，我连一张照片也没给他拍。这样，唯一可以并且也愿意告诉我长城所在的人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有时会想，下一次东干人叛乱时，也许在叛乱队伍中可以找到他。

对我来说，当天结束考察时，我感觉未来考察工作的前景一片灿烂，心里非常

兴奋。队员们找到了不错的休息地，是以前这儿的居民在黏土阶地下所挖出的洞穴，虽然洞穴比较狭窄，但很温暖，很适于居住，尤其是在刮着凛冽的东风、早上温度低至华氏霜点25度的时候，洞穴更不愧为休息的好地方。整个队伍中，只有我和奈克·拉姆·辛格比较喜欢整洁，所以我们更愿意住在帐篷里。中国劳工们在找到了一个能挡风的洞后，兴高采烈。但是，因为附近就有东干人，我的新疆随从和哈桑阿訇则比较担心，他们把所有的马和骆驼拴在了一起，而且还放了一夜哨。

3月27日早晨，营地留在原处，我带着助手和6个中国劳工向着东北偏东的方向出发。我希望能在路上碰到昨天望见的烽火台。走了将近3英里，穿越了一片满是芦苇的地区，来到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黏土阶地。在这个黏土阶地上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中国伐木人。他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也很谨慎，说他对古代烽火台及与之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走，又穿过了一片茂盛的芦苇和低矮的红柳地带，疏勒河流出的河水漫溢了水渠。队里来自敦煌贫民区的劳工根本不愿意涉水走过水渠。他们一个一个轮流上马，穿过水渠，这使得行程比我所希望的要慢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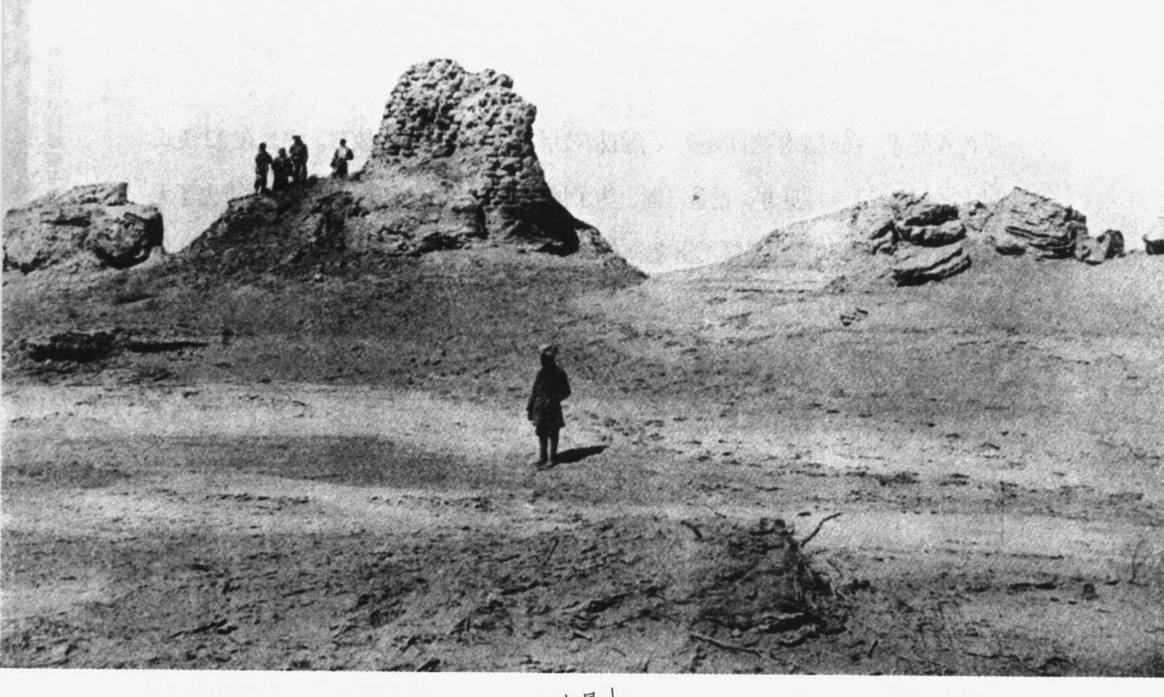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荒凉的沙砾戈壁，气候十分干燥，地面有大量的枯树，以及少量还活着的胡杨树，但现在还不是对这里正式考察的时候。随后，我发现就在我的正前面有一座烽火台的尖顶，烽火台的形状和结构与我以前在西边沙漠中最开始看到过的那些烽火台非常相似。我骑着马，以“巴达赫商”(Badakbshi) 马一样快的速度，向烽火台奔过去。就在要到达之前，我注意到有一个低矮的护堤顺着光秃秃的沙砾地面向东延伸，延伸到离最近的一座烽火台时，又拐弯向西南，继续延伸，护堤也是由常见的柴笼和黏土层筑成的。现在，我可以肯定又回到了长城之上。

这座烽火台也是由坚硬的黏土一层层地向上夯筑而成，每层黏土都很有规则，

M. Aurel Stein

厚约4英寸。在黏土层之间还夹入了红柳枝层，但红柳枝层比较薄。它高在22英尺以上，地基20英尺见方，很是坚固，为了加固地基，在夯土中还垂直地插进去了无数的木柱，木柱的顶端暴露了出来。在烽火台北面约6码的城墙之上，有一个棱堡凸出来。城墙的底部完全由红柳枝筑成，城墙底部以上的部分长期以来都受到风和流沙的侵蚀作用，受到了破坏。从远处，光用肉眼便可以直接看到低层的红柳枝条从黏土和沙砾层中伸了出来。此处的城墙相当笔直，很容易看出东面的下一座烽火台，它离这儿只有1.125英里远。在远处，我还可以看见3座烽火台，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等到以后再去考察它们了。

对这些烽火台编好号并做好记录以后，我便专注于勘察烽火台附近的地面。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从开始对在这里的勘察更有信心。在离烽火台东南面约4码的地方，我发现在沙砾上有些垃圾。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小屋，大约8英尺见方，现在只剩下一些墙的遗迹，可以看出这些墙由泥石砌成，夹有芦苇，表面抹过灰泥。在屋内，我们在地面上找到了一枚木简，长约1英尺，宽1英寸多，上面刻有整齐的5列汉字。我很想马上确定它所属的年代，便让蒋师爷马上辨认这些汉字。但是，蒋师爷认为这枚木简是古代账目的一部分，没有日期记录。后来，找到了另外一枚木简，上面汉字虽然不完全，但字迹很清晰，不过还是没能找到所属年代的证据，但显然是军队所用的木简。蒋师爷觉得这些汉字很奇怪，看上去相当古老。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现了木简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那么我们完全有希望在别处会有更多的发现。劳工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因为一有发现，我便立即赏给他们钱，他们现在变得相当勤快。然而，在这座烽火台附近，再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唯一的收获便是找到了两枚汉朝时候的铜钱。但是，考虑到一直以来敦煌人还经常来到这，而且这种类型的钱币一直到中世纪早期都还在使用，那么这两枚钱币无法证明废弃小屋的年代。



⑯敦煌古长城上瞭望台遗迹，图的右边显示出这座瞭望台以一处天然的黏土台地为地基，图前面为奈克·拉姆·辛格

考虑到这些劳工体力不是很好，为了节省体力，我决定转向西南，去那边的第一座烽火台。从那里返回营地，距离更近一点。走了约0.75英里，我可以轻易地找到长城的遗迹，有的城墙高出地面3英尺多。在后来的一段路上，红柳丛与流动沙丘相间，长城的遗迹不见了。又向前走了约1.5英里，来到了一座烽火台，尽管一些部分毁坏得很严重，但仍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先前的烽火台差不多。它在一个狭窄的黏土台地之上，台地高出南面遭受风化作用的地面约有17英尺。烽火台的西面有一大堆松散的堆积物，堆积物长约15英尺，其实是一个小建筑的废墟，这个小建筑修建得相当粗糙，高度只有3~4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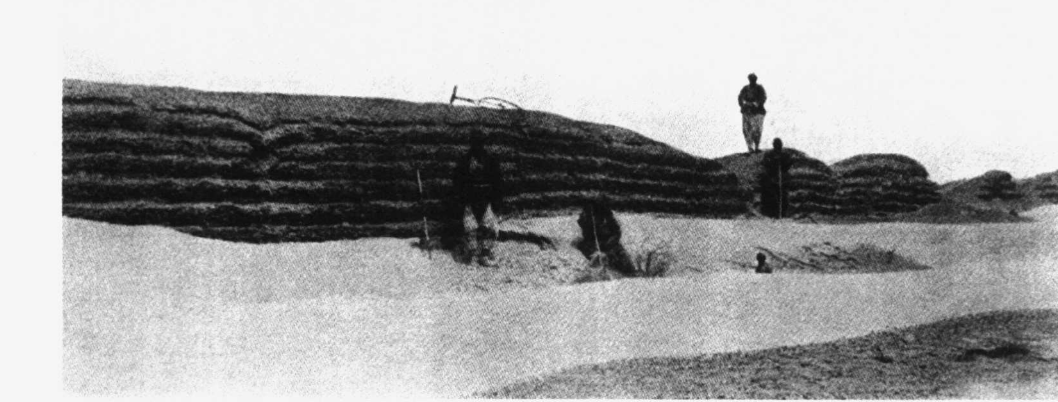
在劳工刚开始此处的清理工作时，就在烽火台西南面的地面上发现了3枚字迹

M. Aurel Stein

清晰的汉代木简。这些木简保存得非常完整，大小和常见的木简差不多，长约95英寸，宽0.5英寸。蒋师爷一眼便发现其中的两枚木简有完整的纪年，这个发现太令人兴奋了。不久，挖了不到0.5英尺，又发现了3枚有字的木简，其中的1枚也有纪年。很显然，此地是一处藏宝之地。但是，在天黑之前，我们已没有时间再做更仔细的清理工作了，蒋师爷也不能确定这些木简所标志的年号，所以只好结束当天的工作，开始返回，争取在日落之前返回营地。一旦明确这些木简上纪年所代表的年代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长城和烽火台修建的年代。劳工由于今天的发现得到了不少奖赏，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很兴奋。

夜幕降临时，我们回到了营地，我来不及清洗一下，便匆匆地吃了晚饭，然后便和蒋师爷坐下来，开始在梅耶（Mayer）的《汉语读本手册》（Chinese Reader's Manual）所附的年代表中查找这些神秘的“年号”。这个搜索的工作量十分庞大，因为我们没有确定的线索，所以从汉朝到宋朝期间数百个皇帝的年号都得查一遍。蒋师爷核对其中的“永平”（Yung P'ing）年号。但是糟糕的是，从公元3世纪和6

⑯⁵烽火台以东、低矮沙丘间的古长城遗迹



世纪，这个年号便反复出现了好多次，我几乎都没有勇气再往下查了。另外一个年号为“建 □”（Chien···），尽管两枚木简上这个年号都写得很清楚，但是蒋师爷还是无法确定第二个字是什么。只要是对中国古汉字有所了解，人们就会知道它是如何的复杂，有数以万计的表意文字，并且这些汉字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所以，蒋师爷不能确定这个字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永平”前后不远的年号中，我们查找有关“建 □”的年号，以便为蒋师爷确定第二个字提供一点线索，但是毫无收获。最后我孤注一掷，再查之前的几个世纪，发现有一个始于公元58年的年号为“永平”，在此年号前不久有一个年号为“建武”，蒋师爷立即认出了这正是困扰了他很久的第二个字。“建武”是东汉王朝建立者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这两枚木简上所记录的便是建武26年，即公元50年。这样，我们可以肯定，所考察的长城遗迹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我手上的这些木简则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木简。

这个发现让我们俩十分激动，就连本来静静地躺在我帐篷床底毛毯下睡觉的“达什”（Dash）都被我们吵醒了，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明白它的主人以及那个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兴奋。这样，在以后更进一步的调查时，我们就有正确的年代根据。这时，蒋师爷对历史的嗅觉好像变得更加敏锐，我自己也是十分兴高采烈。我本来就对这次考察长城古迹很有信心，现在更是信心百倍，坚信我这次的考察一定会获得巨大成功。

# 第五十五章

## 汉代文书的发现

3月28日早晨，又刮起了凛冽的北风，后来转成了西北风，风力一直很厉害。起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派了一个衙门邮差，给知县送去一封信，要求知县帮我找到更多的劳工，以便开展挖掘工作。随后，我便带了所有能进行工作的人去了营地正南的废墟处，它紧挨着我们昨天晚上挖掘的废墟。为了保证水的供应，我们干脆带着水箱一起出发。这是很必要的，对于人数不多的挖掘工人来说，这样做可以节约来回路上不必要的体力浪费。这些劳工都抽大烟，又很狡诈，用有发现便给奖励以刺激他们工作，但我很怀疑这种刺激作用可能维持不了多久。我想他们更愿意待在温暖的洞里，这样他们可以更舒服地抽大烟，躲在里面睡大觉。

今天所到的这座烽火台风化得很严重，就在烽火台所在的低矮黏土阶地的南坡上有一层厚厚的垃圾，有10多码长。利用黏土阶地所在的位置，可以俯瞰周围，我想这也是在此修建烽火台的原因。在斜坡脚下，有一处厚达3~4英尺的垃圾堆，主要是芦苇束、红柳枝、树皮以及马粪等，毫无疑问是守卫烽火台士兵丢下的生活垃圾。在垃圾堆顶部，一枚汉字木简裸露了出来，接着又发现了更多的木简。于是，我立即决定就在这里开始挖掘。

挖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没到半天的工夫，我们就找到了大约24枚木简，而到这时，这处垃圾堆还没有清理完毕。看到蒋师爷毫无疲倦地督促着劳工们工作，同时还认真地清理木简上的灰尘，我便放心地让他和奈克·拉姆·辛格留在这儿，负责这里的工作。我自己则去西南面那两座烽火台进行前期的考察。当我完成考察工作返回时，发现堆积处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次总共发掘出了70多枚木简。

但是，在这些木简中，却只有两枚有完整的年号，对应为公元75年，所以可以肯定这个烽火台是在东汉时候修建的。我心里明白对这些木简做出全部的解释，肯定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即使是那个有名的汉学家沙畹，他研究这些木简也需要更深的语言学上的洞察力，但我打开始就觉得只有沙畹先生才能阐述其中的意义。蒋师爷很谦虚，说辨认这些木简上的汉字以及理解木简上的措辞很困难，于是放弃解读这些木简的工作，更何况，这些木简大部分都是残缺的。在他匆匆查看过这些木简后，可以肯定木简上所记录的内容牵涉到很多方面：一些是长城沿线的军队管理事务简短的报告；一些是收到装备等各种物品后的回复信；一些是私人信件；一些是文学作品的片段；甚至还有一些是书法练习。更准确的内容分析只能等待沙畹先生来进行，有关沙畹先生对这些长城沿线废墟中各种物品的研究分析结果，我会随后专门整理为一章。

根据我们上面对有关木简确定的年代，很容易认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文书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汉字记录。木简一般常见的形式为：长9~9.5英寸，宽0.25~0.5英寸。一枚完整的木简上通常一竖排，有30多个汉字，说明那时人们书写得相当整齐。有时，在木简上也会有好几排汉字，或者用木简的背面接着写。白杨木是制作木简最常见的材料，这与我在塔里木盆地考察的情况一致。但是，这里的木简材料中也有一些是纹理清晰的软木，奈克·拉姆·辛格立即认出它是某种针叶树。可是，这里自

古以来就很干燥，疏勒河盆地附近不可能生长这种树木。我推测这种树木可能从西边的南湖的斜坡上运过来的。事实上，不久后，我们便看到了冷杉林的遗迹。后来，在其他烽火台废墟中还发现了整洁的竹简，它只可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

从烽火台附近的垃圾堆里所找到的木简中，大部分是用当地盛产的红柳来制作的。用红柳制作的木简长度不同，刻得很粗糙，有的则是多边形，每个边上都刻上了文字；有的木简较宽，顶端或尖或圆，等等。这些木简中，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明显没有公文那么严格，驻扎在这里以及其他烽火台的守卒似乎经常"摹写"，以此来打发时间。这种用途的木简尽管是用红柳枝制成的，但削制得还相当不错。我们还发现有许多从木简上削下来的"碎屑"，许多木简都比较薄，说明这些木简肯定是被削过多次，反复使用，这样做便可以节省贵重的木简。

在烽火台的垃圾中，还找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木制品，比如说，有用来赌博或是占卦的小骰子、木杖、断梳。我最感兴趣的是两枚木印，显然是用于给包扎好的口袋或其他容器盖上印。在木印的下面有三道扎绳的槽，其排列方式与我在尼雅首次发现的佉卢文木牍上的封泥相类似。由此，可以推断新疆的古代木器也属于中国早期类型。

在这个地方，没有发现长城的任何痕迹，就连烽火台旁边的哨所也找不到。但是，从这的大量堆积物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当时守卒的生活条件。在这片沙漠上，烽火台所守卫的长城肯定早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便存在了。从那时以来，当地的风蚀作用就一直没有停过。烽火台地基下约10英尺的地方，有未受风蚀作用的水平垃圾层，可以发现当初烽火台就站在黏土阶地上，这是烽火台建筑的一个特征。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大量制作得很粗糙的深灰色陶器碎片，这间接地说明了这个地方离居民区相当遥远。这些陶器相当坚硬，数量很多，分散在地面上，而且经常发现这些陶器的边上有规则的穿孔。在垃圾堆中，还发现了好几个有麻绳捆在

一起的陶器，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陶片上会有那些穿孔。这表明此处的守卒很珍惜这些陶器，不管它们毁坏得有多么严重，还依然使用。虽然这些陶器都比较便宜，但想想要将这些大件陶器从绿洲运送到这里会有很大困难，就能理解为什么陶器破碎以后，守卒会尽量修补它们，以便能继续使用。

3月29日，我们出发去西南面的第二座烽火台，这个地方我之前已经来勘察过了。走了约有1.125英里，这个烽火台也是夯筑而成，残存部分高度有20多英尺。在它顶部，有一道用土坯砌成的辅助城墙，在这道辅助城墙下有水平方向的椽子突出了出来。此处没有阶梯的痕迹，只在南面墙上有一些洞，可能用作脚蹬。这座烽火台同样也是建在一个小黏土阶地上，显而易见，长城的修建者是不会忽略这种地理优势的。这座烽火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圈围墙，保存得还比较完好，约有107英尺见方。烽火台就在围墙内的西北角上。这圈围墙也是用土坯和坚硬的黏土筑成，间插有红柳枝层，围墙的某些部分约有8英尺高。

这围墙和这座烽火台是不是同时修建？修建围墙是不是为了守卫烽火台呢？这些问题暂时还不能找出答案。在围墙东面一些小屋内和地面上的堆积物中，我们只找到了大量的芦苇束、劈好的柴、马粪和骆驼粪。在围墙南面外约10码处，还有一处很大的堆积物，但也没有发现太多的东西，找到了一个很大的陶缸，这个陶缸自缸口以下保存都很完好，外形类似双耳长颈酒瓶。陶缸将近1尺高，很坚固，虽然有些褪色，还是可以看出它原来是暗棕色的，陶缸内还有一些油的痕迹。在围墙里面和外面，还找到了许多比较精致的陶器碎片，有点像是瓷器，表面还上了釉。这些碎片上的釉色很丰富，有灰绿色、象牙白、深棕色、黑色以及青蓝混合的花纹。

这些发现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还从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过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精致陶器碎片是怎么运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我们又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在围墙西面外约50码的地方，发现有一座小型建筑的遗迹，这处遗迹的围墙长约

M. Aurel Stein

13英尺、宽约11英尺。入口朝南，入口所在的墙比较窄。墙约有2英尺厚，由坚硬的土坯砌成，高约四五英尺。在此遗迹内，堆满了碎砖、芦苇篱笆以及半烧焦了的木料。等清理完各种垃圾后，我们发现在此遗迹内实际上是一个用砖砌成的神坛，神坛在遗迹的入口处开了个缺口。在神坛上北墙一边，堆满了大量塑像碎片，碎片表面都还有灰泥，由此可以确定这其实是一座小佛寺的废墟。

塑像虽然都已经破碎了，但从每一个细节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这里的塑像艺术与中亚希腊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塑像碎片中有佛的胳膊残段，比实际人物胳膊的尺寸要小。胳膊的制作方法很聪明，是绕着木芯而做成的。在这些碎片中，还有各种装饰品碎片，以及制作精良的手掌和手指碎片。塑像表面呈黑色，但不是因为制作时烘烤造成，因为还发现许多半烧焦的木芯，这说明这座小寺庙可能是毁于一场火灾中。在这些碎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它有两个上下连在一起的小头像，虽然每个头像只有3英寸高，但塑造得十分形象，上面的头像显示出一种正在安详沉思的表情，而下面的头像则张着大嘴，怒目圆睁，很巧妙地表达出一种生气或激动的表情。很明显，这个碎片应该还有第三个头像，但已经脱落了。由此可以判断出，这个塑像是一个用来表现佛的神性的“三相神”，塑像中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可能是试图表现出神也有凶恶的一面。

很明显，这座小寺庙里的各种物品很有可能与附近的烽火台有某种关联。塑像风格比较古老，与现在的寺庙建筑风格不一样。我推测，这座小寺庙可能是由于当地佛教信仰的根深蒂固（关于这点，我曾在其他地方举例说明过，最新的例子是石板礅遗迹），使得在长城废弃了几个世纪后，小佛寺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并被后人重新修复过。不久，我发现由敦煌绿洲直通哈密以及新疆北部其他绿洲的通道，直到现在仍然经过古烽火台附近。由此，我们可以假设，古代时这条路就已经从这里通过长城，那么在入口处烽火台附近的这座小寺庙就被那些虔诚的路人保存了下来，

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路人还对小寺庙进行了维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座小寺庙得以保存下来。随后，在这古老的交通要道西面，我们还发现了一座残存的宗教建筑，与这座小寺庙很相似，这也证明了我的假设。

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信仰的起源，但就在烽火台附近地区的考察也可以找到支持这种推测的依据。在前一天对西南面的下一座、也是西南方向上视线内的最后一座烽火台进行考察时，我发现，在经过一处开阔的盐碱地后有几处围墙。这些围墙用盐碱黏土简单建成，就在其中的一处围墙内，有一座小寺庙，同样也是用盐碱黏土垒成，也已被废弃了。回头想想所有的迹象，我相信这座小寺庙是一个后来修建的替代品，表示那些曾经往返于中国长城边防上的中国人很怀念那座入口旁边的小寺庙，于是最后修建了这么一座小寺庙，以兹纪念。

最西面的烽火台是一个正方形的土台，也是夯筑而成，建在一个风蚀过的小台地上，烽火台在这片荒凉的盐碱地上十分显眼。然而，除了前面所提到过的那种陶片外，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东西。此处风蚀作用十分严重，没有留下任何长城遗迹供我们挖掘。后来，当返回敦煌时，我们再一次经过这个烽火台，发现了这里有很深的车辙印，说明从敦煌绿洲到哈密的路线实际上是从两座烽火台中间穿过去的。直到这时，我才相信我已经站在了长城的入口处。站在烽火台之下的台地上，放眼望去，视野很是开阔。在错综的台地之间，我们只能看见一座烽火台的顶部，除此之外，西面没有其他烽火台。于是，到这时，我在西南面的考察结束了。

3月30日，气温下降了很多，达华氏霜点30度，风向也变了，成了西风。这天，我们返回了找到第一个纪年证据的烽火台。我们发现与烽火台相连的废弃物实质上是一个小屋，长14英尺，宽11英尺，部分建在烽火台所处的狭窄台地之外。清理完台地上以及台地南面走道的垃圾后，找到了20多个木简，一半左右的木简都很完整，且保存良好。其中一个木简，我们当场便认出上面有清楚的纪年，对应公

元35年，这使我们很高兴。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古物的年代更加久远了。蒋师爷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木简与哨所中的某位军官有关，但他没有弄清所有的细节。于是，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驻守在这段长城的部队中某位军官或文书员可能就住在旁边的小屋内。

现在，沙畹对这些木简的解读已经证明了我的推断。有片木简字迹清晰，上面还有一根丝带，显然是属于一位士兵。根据沙畹的解读，这枚木简提到了这个士兵是在杨威燧（Hsien-wei）部队中，他们所驻守的地方叫做“湾水”（Wan-sui）。还有10多个空白木简，显然贮存在这个小屋内。在小屋内和门口的缓坡上，找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小物品碎片，有上釉的陶碗、木勺、扫帚、木印，还有一个拨火棍。拨火棍上有一些小洞，通过摩擦，便可以从这些小洞中产生火苗，这些小洞的形状和排列与在尼雅、安迪尔（Endere）所发现的很相像。

3月30日晚上，一个衙役又带来了8个劳工，我十分高兴，因为第一批劳工已经筋疲力尽，开始抱怨了。即使是找到有价值的发现便会给奖赏，这种方式都不能再刺激他们。当然最初的时候，对这些铁杆的赌徒，奖赏还是挺具诱惑力的。我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心里诅咒这些懒散的劳工。那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最低气温降到华氏零下7度，西风依然呼啸着。幸好营地里的燃料还比较充足。

这天晚上，我的克什米尔厨师再也受不了了，他产生“罢工”的想法，第二天早上偷了一匹马，然后逃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受不了沙漠的“春天”，还是因为那些烧火的中国劳工无法忍受他所做的千篇一律的“菜肴”。我并不担心他，他肯定能够找到返回敦煌的路，别人会看得出来他是从沙漠中逃出来的，把他拦截下来。然而，这个意外让我这个复活节过得很不舒服。

复活节那天，我开始考察东面的长城遗迹以及烽火台遗迹。我们也将营地迁回

到发现第一批木简的烽火台那里。沿着以前看见的那 4 个烽火台所显示的长城遗迹前进，烽火台所在的地面都是沙砾地，彼此间距变化很大，从 1.125~0.75英里不等。长城的轮廓看得很清楚，从一座烽火台径直地向另一座烽火台延伸，在半月形棱堡处，长城向北绕过棱堡而过。大部分现存的城墙约有 3 英尺高，系夯筑而成，树枝层和黏土层相间。即使是在长城完全坍塌在地，从两侧低矮的隆起处仍可以看到厚厚的用作地基的红柳枝层。可以肯定，这段长城的走向基本上是东西向，但并不是绝对的直线。长城的走向与此地盛行的风向相平行，这样比较有利于长城的保存，所以这段长城比较完整，长约有 5 英里多。

这些烽火台的修建方法基本上都一样，都是夯筑而成，地基一般 20 英尺见方，原来的高度应该都在 20 英尺以上。越往东走，烽火台受的侵蚀就越严重。在第五座烽火台所处的位置，只发现一个低矮的垃圾堆，以及从城墙上突出出来的棱堡模样的建筑。从这最后一座烽火台往东走半英里，长城的遗迹便消失在绵延的沙丘之中。这些沙丘高约 15 英尺，从南向北移。

继续向前走，不久，长城的遗迹又出现了。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沙砾地，沙砾地南北是沙丘。在这里，发现了一段保存得相当好的长城，长达 256 码，在某些部分高达 7 英尺，可以断定这段长城之所以保存良好，应该归功于沙丘的保护作用。虽然城墙下的流沙高只有 3~5英尺，但起到的保护作用仍不可小视。这段长城的中段很坚固，顺墙水平砌起来的外层柴笼不见了，除此之外，城墙的两侧看上去像是几乎都没有遭受什么侵蚀。

在这段长城，比较容易研究修建长城的独特方法。它由树枝层和沙石层交替筑建而成，树枝层由红柳枝和芦苇混合组成，厚约 6 英寸，粗土层则由粗沙和碎石组成，厚约 3~4英寸。我给它拍摄了照片，我数了数，发现树枝层和粗土层各有 8 层。我还注意到，在红柳枝的上面通常铺着一薄层的芦苇，这说明芦苇是特意夹入的，

以铺出一个较平坦的平面，然后再铺上沙石层，这样沙石层就可以很规则地向上夯筑。修建时所需要的水最大可能是来自离这最近的潟湖。

这段长城不仅修建方法奇特，并且由于土壤里、水里都含有盐碱，因而被石化，使得城墙相当坚固。事实上，长期以来，城墙一直受到各种人力、自然力量的破坏，破坏虽然比较小，但却从未停止过。到了现在，城墙依然存在，这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的坚固性。现存的城墙顶部厚约7英尺，但考虑城墙最上层的植物层肯定因为受到风蚀作用而变窄了，城墙的底部应该比顶部厚出1英尺左右。

看着面前这段坚固的长城，我不禁深深佩服中国古代工匠修建长城的技术。在这片广阔的沙漠里，没有任何的修建资源，尤其是缺乏水源，修建如此坚固的长城极其艰巨，而且，这段长城是那么的坚固，恐怕即使现代的野战炮也不能损它分毫。修建长城所用的材料本身并不很坚固，也不结实，但它充分地适应了本地的自然条件。在承受了2000多年的外力破坏以及各种不断的侵蚀作用，长城却依然矗立到今天，我想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够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

我们间或顺着低矮的沙丘，间或在沙丘中穿行，就这样继续向前走了1.5英里。一路上视野开阔，但并没有见到长城的遗迹，也没有见到别的烽火台。后来，顾及到牲口需要饮水、喂饲料，我们只好折向北，向河流的方向走去。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沙砾地，那儿还有一处干涸了的河床，河床上生长着胡杨树。接着，穿过了一片枯死的红柳丛林地。最后，在走了7英里后，来到了一处灌木和野白杨丛林地，这片丛林就在疏勒河床的边缘。

在我们扎营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疏勒河及其支流，河面约有50多码宽，看样子肯定很深，不可能涉水走过去。河面上浮着大块大块的冰，水并不清澈，像泥浆一样，以每秒约2码的速度流淌着。那天晚上并不是很冷，没有头天晚上那么恐怖，但风一点都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大了，以至于第二天早上，感觉就像是西伯利亚

寒流。薄雾肯定还要持续好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去东面寻找长城和烽火台遗迹。至于安西镇，不管怎样，我都已经下定决心将来去考察。到现在为止，我们考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跟我最初推测的一样，我们已经发现了古代长城遗迹的确是一直向东延伸到敦煌，而且证明了长城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修建。

所以，在4月1日，我便决定让奈克·拉姆·辛格带领着一部分队员返回，他们将从我们在大沙丘所找到的那个伐木人隐居的地方返回敦煌去，我则带着余下的人沿着长城回去。结果，狂风造成了浓浓的沙雾，这条路线比我预想的还难走得多。还好的是，地面上还有残留的脚印给我们指路。顺着脚印，穿过了沙砾戈壁，来到了流动的沙丘带，但是还可以找到古长城的遗迹，确保不会迷失方向。在路过每一座烽火台时，我们继续在小屋或堆积物中寻找遗迹。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烽火台是在开阔的戈壁上，受到的侵蚀特别严重，或是其他原因，地面就像桌面一样平整，我们所获的成果极少。一路上，所找到的木简都残碎不齐，数量也不多，不到6枚。另外，我们也找到了几个很精致的三角青铜箭镞，以及汉朝钱币。

这一天的工作十分劳累，晚上大风开始减弱，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样，我们便可以回到约定好的比较舒适一点的营地。最后，来到了烽火台处，我们在3月27日留在这里沙砾地上的脚印还依然很完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从那以后，我们经常遇到这类现象，沙砾的运动对地面似乎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最后，我们看到了营地的火堆，晚上肯定会有地方住，有食物吃，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这时，风已转成了西北风。从半夜开始一直到天亮，狂风一直呼啸着，帐篷在风中摇摇晃晃。早上我走出帐篷的时候，下了一会儿小雪，沙雾还没消散，所以天一直灰蒙蒙的，弄得喉咙、眼睛和鼻子感觉很难受，这是离开罗布淖尔以来最冷的一天。在到达敦煌绿洲之前，风暴一直都没有减弱，即使是穿着最厚的毛衣，仍觉得很冷，路上的景色让人感到忧郁。沿着一条深深的车辙印继续走着，后来知道这

条车辙印是从哈密过来的。走了约摸6英里后，终于到达了前面提到过的最西面的烽火台。

再继续往前，是一片光秃秃的沙地。随后，穿过一片光秃秃的盐碱地带，发现在很久以前，敦煌绿洲的人们已经清理完了地上所有的干红柳枝，用作柴火烧。在这些红柳还存活着的时候，形成了圆锥形沙丘，现在沙丘的高度仍有8~10英尺。最后，在类似沙丘的地面上，重新出现了低矮的灌木林。在散落的农田和树木中间，第一个破破烂烂的边防站出现在了视野中。这个时候，已经走了将近30英里，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在石枣（Shih-tsao）村的老营地，但沙尘也几乎把喉咙给噎住了，身体也快给冻僵了。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六章

## 到达南湖绿洲

4月3日，我们从石枣村出发，返回敦煌县城，这段行程很短。因为要回到敦煌，大家都感到很是高兴。在狂风中沿着长城遗迹走一个星期，大家都很期待回去。不知是敦煌绿洲中树木的保护作用，还是春天正在来临，虽然没有刮北风，仍觉得空气比较温暖。我和蒋师爷先出发，其他人带着行李跟在后面，这样我可以利用安置营地前的一点时间去参观那座大寺庙，就是我在敦煌镇西门附近所看到的那座寺庙。这座寺庙是座类似亭结构的建筑，很高，像我见过的第一个传统结构的宝塔。在这人情冷漠的地方，这座寺庙似乎还被特意重修过。根据寺庙外面大门上的壁画，可以知道寺庙其实是个道观。这些壁画看起来很新，所以我对将要看见蹩脚的内部装饰有了心理准备。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在敦煌地区还是比较重要的，弥补了上面的遗憾。

我们一走进大院，便被一群小男孩包围住了。这些小男孩大部分都比较胖，穿的衣服也不错。这一天，学校的老师回镇上去翻修他的房子去了，对这个意外的假期，这大约20个学生很是高兴。大院两边的大厅很具有学术气氛，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来视察这所学校的督察一样。窗子附近摆放着笨重的黑色课桌，每张课桌上放有

摹写纸和三四个学生的练习本。在教室的墙上还特意挂着书法条幅，是由老师或是知名学者所写的名言警句，条幅很长，写在红纸上。整个学校井然有序，显得朴素质朴。我不由将其与旁遮普的中学相对比，在这里既没有人监督，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应用最新的教学设备，但却井井有条。教室里摆着初级古文书本，已翻阅过很多次，但仍很整洁，拿起书本，我感到自己的汉语知识是多么的贫乏！学校里这些小男孩，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很有礼貌，也很好奇，显得机灵敏捷。我很佩服这里的老师，他在学校里营造了良好的风气，后来，我将这件事记入了我的笔记中。

我想尽力避免在敦煌逗留，决定只停留一天（4月4日）。这样的话，我需要迅速处理完很多事，难得休息的时间。但在返回果园后不久，我便发现一天的时间足够处理所有的事情，尽管事情比我原先想的还要多。我在第一次到达敦煌时所见过的那个阿富汗商人协尔·阿林汗（Sher Ali Khan），已经从甘州（Kan-chou）返回了敦煌，他本来计划远在我们返回敦煌前派一个有40头骆驼的商队运送茶叶去若羌及和田。但直到我回到敦煌时，他的这个商队还没有出发。东方人的确不太在意时间，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很紧急的事件，东方人办起来却泰然处之，不慌不忙。这个阿富汗商人跑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商队本打算在4月4日那天早上出发，但后来听说我就要回来了，于是他便又拖延了一天，看看能不能帮我忙，比如帮我带信去喀什噶尔以及我欧洲的朋友。这令我感到意外，但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虽然我一封信还没写，但第二天早上可以派一个信使追上商队，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趁傍晚甚至花上一夜来写信。

当然对我来说，要抓住这次意外的机会并不容易。我还没来得及洗掉脸上的尘土，林大人和汪大老爷就出人意料地来拜访我。毫无疑问，他们对我回到敦煌感到高兴，很想知道这次考察的经历以及所发现的各种东西。其实，在经过小镇时，我

就得到消息，知道官府为什么会越来越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行动。我给兰州总督的电报已经发送到了甘肃边界，总督用电报通知了这几个地区的道台以及官员们，再经由他们传达到知县，因此我和我的考察活动越发引起本地官府的关注。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汪大老爷和林大人急匆匆地来拜访我。尽管我并不乐意接待他们，因为这样会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但我趁这段时间清理了一遍发掘出来的古物。汪大老爷十分热心，由于他在这些方面有所涉足，他倒很乐意解读那些汉朝木简。有些问题我自己无法弄明白，他于是显得更加热心。他快速地看了一枚又一枚木简，读起来显得轻松自如，尽管我对汉学不是很懂，但是我能看出这个人的确很博学。汪大老爷的军队同僚林大人则很老于世故，让汪大老爷尽情地表现学术才能，自己则好像对此不太了解。当读到涉及古代边防前线上军事活动的木简时，他兴趣盎然。于是，我也抓住这个机会，激发他们对此的兴趣，加深对我考察活动的印象，以赢得更多官府的支持，特别在我所需要的劳工和运输方面，希望他们能提供有效的帮助。

气温变暖了，天气不再那么寒冷，我倍加高兴。在我写完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时间已经到凌晨3点。外面刮着大风，我写信写了很长时间，所以帐篷里的暖气慢慢地消散了，变得越来越冷，也没时间去补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还特意比平常早起了1个小时，以便安排供给、运输和处理劳工报酬，等等。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我来处理，我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况且，还要兑换银锭，支付费用，这总是件最烦人的事情，慢得让人心焦。这个过程既需要耐心，还要做到公平，让大家都满意，天知道有多麻烦。有人告诉我，敦煌的商人有三种兑换银锭的尺度，以利用它们之间的差价，在交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我一点都不乐意在这种原始的货币系统中去区别这些细微的差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听取当地商人的意见，但这样会使我从若羌带来的银锭损失4%。这里实

在是太奇怪了，居然没有中国人愿意接受金币或银币！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收各种不规则的小银块。不久，我知道这主要是因为金币或银币可以被灌入铅，他们对此保持着戒心。我想以后的考古学家肯定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在这样一个都已经进步到有了纸币的国家内，这里的人们竟然顽固拒绝使用通用的银币！

用银子付清所有的账目，即使是一些小东西的账，都很费劲儿，我为了避免麻烦，没有参考每天都在变化的铜钱和银子之间的兑换率。把盎司按照十进制来分，又要切割的银子恰好与应付的账目相符，这自然是很困难的。幸运的是，在这种原始的交易中，我发现蒋师爷很善于处理这类账目问题。他把各种应付的账目读给我听，让我计算出总计要支出的银两，根据西方换算单位与敦煌本地换算单位的差异，称出所需的碎银块，摆成一堆。接着，他便坐在我帐篷前的垫子上，让商人分成小组坐下，他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调整账目，直到每个小组得到恰好应得的银块。当然，我给了蒋师爷一些小钱，以利于他调整账目。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处理完这件事情。终于，我可以去处理其他事情了，估计再没有人像我这样在意时间了。好不容易才让每个商人满意地离开了，不知道他们之间如何才能分清那些银块。

4月4日，在敦煌逗留的这一天，我一直忙于去西面沙漠考察古长城遗迹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买到够一个月用的给养，找到了12个劳工，添了些骆驼。我开出高价，说尽了好话，终于从敦煌当地的回民中买到了坎土曼。因为经验告诉我，在挖掘遗迹时，和绿洲上中国人所用的铲子对比起来，这种维吾尔人使用的工具要好用多了。

这天早上，我那个不忠诚的厨师拉姆赞也回来了，表示无条件地屈服。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当他独自一人突然返回时，他的行踪激起了敦煌人的怀疑，他被衙门抓了起来，后来扎西德伯克将他保释出来，并负责监视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为止。这个意志动摇的、不能让人信任的克什米尔家伙终于意识到即使是到了大路的附近，

他都没有办法逃脱。然而他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不适应沙漠气候，引起了精神失常，所以请求我原谅他。在1901年冬天，这一幕曾发生在我的厨师萨迪克阿訇（Sadak Akhum）以及与之相关的塔克拉玛干“精”（Jins，意思是鬼神或精灵——译者）身上。在下午的时候，我抽出时间，回访汪大老爷和林大人。一路上，看到老朽的房门上精美的木刻以及各种装饰，我又一次为敦煌没有遭到残忍的东干人的破坏而感到庆幸，但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计划从扎西德伯克所提到过的一个小绿洲，即南湖（Nan-hu）绿洲出发，向西南方向前进，在罗布罗夫斯基和洛兹夫的地图上就标注有这个小绿洲。从南湖绿洲向正北而行，便可以到达古长城的中段。4月5日，我们启动了这次考察。骆驼和劳工还没有来，所以一直拖到中午前，我们才出发。沿党河的第一段行军注定走不了多远，耽误点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出小镇的西门，穿过小河，水道宽约40码，深3~4英尺，每秒流速约为2码。再往外走，其他的水渠也满盈盈的。毫无疑问，在早春的灌溉季节，敦煌的水是绝对可以满足现在的耕作区的需要。

沿着河左岸，首先绕过敦煌老城四周坍塌的城墙，据说在唐朝时曾有人居住，但现在这些黏土城墙已经破碎，被人遗弃，变成了田地和园林。随后，我们测量了一下，发现它南北长约为1500码，东西宽约为650码，而现在敦煌镇面积约为1100码见方，这说明这个老城仅仅比现在的敦煌镇小一点点而已。在这里，我们折向西南前进，路过了几个保存完好的寺庙。走了3英里多以后，到了耕作区的边缘。在此处，又见到一处小城的废墟，这再一次证明最近一次东干人叛乱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沿着早期河床的岸边继续前进，河床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两岸是风化的黏土阶地。走了5英里左右，发现了废弃的城墙，城墙沿着碎石萨依向西延伸，离此不远有一座看上去较为现代的炮台。道路附近有一条宽阔的水道，这条水道向敦煌绿洲

的西部输送水源。穿过水道，我们向城墙走去，不久就发现它是四方形围墙的入口，围墙几乎完全倾颓倒下了，但入口处的城墙看上去却很坚固，有几个地方高约20英尺，厚度达8英尺。入口处较宽，两侧的墙却仅有五六码长，围墙的内外都是些低矮的碎石堆。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碎石堆依稀可见。

入口处的砖块非常大，也很坚固，我想在围墙上寻找遗留下来的砖块抑或芦苇柴笼。这种奇特四边形建筑物的其中一座长75码，宽70码，出口在南墙（这里的建筑出口一般都朝南），其他墙则大致为东西走向。四方形建筑物内有一些低矮的坟头，最大的一个面向北墙的入口，其他的坟头则排列得杂乱无章。坟头的直径在7~15码之间，高不足5英尺。不久，我和蒋师爷都认为这是埋葬古人的地方，但它与中国的传统以及我所了解的中亚地区的佛教等宗教习俗都无相似之处。如果它真是埋葬人的坟墓，那么我如何才能让敦煌人开启这些坟墓呢？因为敦煌人对坟墓怀有极端的敬畏感，甚至可以说是迷信。毕竟这里距离敦煌绿洲不远，再在这里耽搁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河左岸有一处叫墩尾渠（Tung-wei-chu，音译——译者）的平地，上面长满了草，我们就在此地扎营。温度计显示晚上最低气温霜点12度。第二天，我们又行程近30英里，到达南湖。头一半路程沿着南面碎石高地之上的山脊，壁立的山脊之下是党河陡峭的河床，就像沟渠的内岸，河岸的斜坡向北延伸。河右岸的小山丘一片荒凉，大都覆盖着沙丘，风光一览无余。有几座倾颓不堪的炮台，看上去并不太老。两座砖砌的佛塔外层的灰泥保存得不错，显然仍有人来朝拜。除了炮台和佛塔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

党河山谷突然转向东南的山区，道路就在转弯处不远与河床分开，绕山峦而行，山峦越远越高。这时，我第一次发现了西边有一条石块堆积的矮堤。矮堤高出萨依（Sai，即砾石戈壁——译者）仅四五英尺，沿直线向南延伸，若不是那么直，人们

还可能以为矮堤是自然形成的呢。道路就在矮堤附近，向上行了约5英里。矮堤很宽，基部宽约24英尺，顶部很坚固，适于走马车，可原来究竟用作何用，我们不得而知。矮堤两边净是沙漠戈壁，没有水塔和其他建筑的痕迹，很难设想这里能有什么防御围墙。最后，道路转向西南，矮堤则继续向南面远处的一座塔延伸。

我在思考人们为什么在这样的荒凉之地，建立这么一条矮堤。这时，又发现平坦的碎石地之上有许多奇怪的石头堆，尺寸大小差别很大，形状皆为圆形，有的石堆一侧延伸出一条直线形排列的石头，看上去就像个把手，有的石堆前面是矩形排列的大鹅卵石。这些圆锥形最高的石堆只有三四英尺，但数量很多，在傍晚斜阳的照耀下，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这片墓地是中国占领这里以前的居民墓地，还是本

⑯⑥南湖以北甘州废弃的民居，大约在60年前废弃



地区部落宗教的原始遗迹呢？然而，我并没有论据支持上述猜想，也不能停下来挖掘这些墓地。

趁着落日的余光，我们在一块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发现了通向南湖的道路。在离砖砌的出入不远处，是一处四方形的建筑物，周围是低矮的碎石山地，这种建筑物与我前天在敦煌绿洲边境见到的一样。在建筑物之内，我发现了两个圆锥形坟墓，与我前面在矮堤见到的大量圆锥形石堆的形状完全一样。所以，四方形建筑物和圆锥形石堆应为同一时期的人们所建。天色越来越黑，我骑着马在低矮的沙丘和红柳圆锥物间穿行，任思想的野马到处奔驰。最后，我们听见了泉水的声音，一条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表明离绿洲已经不远了。天色已晚，来不及再去寻找住处。于是，我们在溪水旁安营扎寨，附近的村子里一片沉寂，也不见有人来。直到午夜时分，我们才吃上晚饭。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寻找另一块宿营地，以供长期逗留之用。不久，我便发现南湖绿洲是多么的漂亮。南湖绿洲东西长 2 英里多，南北宽也将近 2 英里，绿洲到处都流淌着清澈的湖水，水来自一个靠泉水供给的大湖泊，即“南湖”（汉语中意为“南面的湖泊”之意），昨夜，我们绕道而行的那个湖就是南湖。南湖是一条宽阔深水道的源头，为人工挖掘而成，两岸是陡峭的黄土层，湖底泥质松软，这让人想起和田和新疆其他绿洲地区的亚尔（Yar，即悬崖——译者）。这里水源充足，除了从南湖流出的水渠外，亚尔中心地带还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溪，把水送到北部的废地。低矮的山丘呈一条线排列，山丘的沙石呈红色和淡黄色，那条小溪经山丘流入峡谷中，阻隔了沙漠风光。尽管如此，这里仍是风光宜人，而绿洲则给人以远离尘世之感。

每个小村里有 25~30 户人家，村子里种着茂密的榆树和秦皮，村子周围是精耕细作的农田，灌溉水渠旁长着一排排大树。绿洲的每一块土地都被充分利用，我



⑯南湖里的村庄寺庙，右边是学校教室

不情愿在犁好的田地中扎营。最后，我在一家的园林里搭下帐篷。园林里净是些坟墓，虽然主人对我的举动感到惊异，但并不反对我住在这里。园林里寂静无声，树林繁茂，宛如一片“世外桃源”，只有在这样土地丰腴、水源充分的绿洲才能有这样的环境。

我住的这一小户人家有8个小庙，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小庙，废墟之中仍有许多小寺庙（上一次东干人袭击的结果），本地人的宗教热情从中可见一斑。南湖一片平静安谧，看不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曾袭击过这里。据我们所知，那时的居民几乎无一幸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地的人口才较为稀少，现在的人才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M. Aurel Stein

与其说“世外桃源”的乡村美景吸引了我，倒不如说是古代的遗迹留住了我，使我又在这里停留了4天。林大人手下的一名小官给我们觅了一位年老的村民，充当向导，我们第一次考察就发现大量古迹。离绿洲边缘以东不到1英里，我们发现一座古代小城镇遗址，黏土质的城墙断断续续，小城呈长方形，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曾是一片可耕地。北面的城墙长约400码，大部分至今仍保存了下来，下半部掩埋在高高的沙丘之中，这也有利于城墙的保护。东边城墙大部分仍保存了下来，由于风化，城墙断裂。城墙为夯实结构，每层较薄，排列规则，结构非常坚固，属较早时期的建筑。城墙位于宽阔的堡垒之上，堡垒高出地面至少15英尺，有几段城墙则高出堡垒达18英尺。

我并没有在小城内发现什么古迹，仅有几个土堆，尘沙覆盖了部分土堆。我从村里带了很多村民，挖了壕沟，但仅找到了一些黏土烧制的大砖块，非常坚固，显然是很早以前从某个建筑取下来的。表面上看，这些黑色的砖块很古老。后来，我对堡垒露出沙尘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发现了汉朝的铸币，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小城是如何之古老。

小城的北部和东北部，是片开阔的空地，属于典型的塔提（Tati，即塔克拉玛干地区专指散布古代物品残片的地方——译者），大大小小的沙丘之间是一块块赤裸的黏土，上面覆盖着很多陶器碎片、石头等物品。南湖人称其为“发现古物的宝地”，他们也像和田的寻宝人那样，在龙卷风之后来塔提寻宝。以后，我和蒋师爷又来这里考察，收集了很多铜制品、弓箭头、小的石制装饰品等此类东西。在这里发现的铜币最晚的属于唐朝，虽然有不少陶器，但没有发现任何瓷器。因此，有理由得出下面的结论：公元8世纪末，时局大乱，唐朝失去了在本地区的统治地位，就在那时小城被人废弃，因为当时直到宋朝，瓷器才得到普遍使用。

我对这块废弃了的绿洲原来的灌溉水源和自然条件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

这里就无法详细描述给大家了。不过有一点清楚无疑，现在的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气候干燥；另外，我还认为偶尔发生的大洪水也起了破坏作用。我断定，塔提以前的水源肯定来自于绿洲东部和东北部的一条河，这条河绕着绿洲边缘的灌木丛流沙带，但它现在已经完全干涸。由于南面的小山丘大量的降水形成了洪水，逐渐把这条河床变成了像卡农（canon）状的深沟亚尔，村民们记得近些年还发过洪水。这条河流经小城遗址的东边，塔提地表以下约50英尺，几条泉水在松软的河床底部聚集了起来。

14年以前，这条河的河水又涨了起来，曾经被离这里3英里的山谷里的小村落利用，它是继唐朝的较大村落废弃以后的又一居民区。然而，不幸的是1893年夏天又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毁坏了灌溉沟渠，流沙掩埋了农田，房屋被摧毁。至今我仍能见到当年坍塌的房屋和连根拔起的树木，河床变成了亚尔，比先前的地平面层低了约20英尺，两岸很是陡峭。幸存下的树木或已经死亡、或正在枯死，被人们砍伐用作烧料，剩下的树木愈来愈少。

这场大洪水还解开了我心头的疑团。前面说过在来南湖途中，我们曾碰见一条奇怪的碎石矮堤，矮堤向碎石高地的边缘延伸，站在高地之上，可以俯瞰风化的古代遗址，即塔提，在矮堤的远处有一座塔。上文提到的亚尔（即洪水冲刷成的河床）就位于塔提和这座塔之间。塔的基座约36平方英尺，其坚固的黏土部分无疑十分古老，多处用小砖块修理过，说明直到近些年，仍有人来护理这座塔。塔的旁边是小的圆顶建筑，我们的南湖向导说直到70年前，还有一位士兵居住在这里，看守通往敦煌的道路。根据老向导的回忆，这名士兵对过往行人非常友好，行人沿矮堤走到这座塔，再从这里穿过河床和塔提，走向南湖绿洲。

1893年的洪水使河床变成了卡农，切断了从塔通向南湖的直接通道，结果大车不得不向南拐，绕道而行。从塔往下行，车辙清晰可见，在亚尔的边缘突然不见了，

这进一步证明了上面的结论。南湖人称矮堤为“风墙”（wind-wall），诚如向导所说的那样，建“风墙”的初衷是作为人们穿越沙漠地带的路标，让人们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摸清方向，并可阻挡北风和东北风。矮堤深入沙漠8英里，工程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显然工程建设时南湖的人口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在第一次来南湖时，我就对这里奇特的坟墓状东西感到迷惑不解，于是这一天，我还去了坟墓地进行了考察。从塔向东南走了大约1英里，我们遇到了一处长方形建筑及其入口。大门两侧的墙有5英尺厚，长度更长，至今保存的仍有14英尺高左右，系用大块的土坯砌成。虽然时间尚早，但周围低矮的碎石已经看不见了。院子内部最大的坟墓正对着大门，为环状，直径约8码，高约3英尺。我们对大坟及几个小坟进行了挖掘，发现除了石头和碎石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材料，在碎石空地上只是一些小坟堆。

毫无疑问，长方形建筑和坟墓建于同一时期，但究竟是谁建造的、建造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肯定不是汉族人所建，也不可能是先前的文明建造。这些奇怪的宗教遗迹莫非与山区部落有关？例如，婼羌(Jo Ch'iang）和小月氏（Little Yueh-chih)。汉朝以来的中国史书都曾简要提到这些部落居住在敦煌西部阿尔金山的斜坡之上，他们曾在那些荒凉的山区和高地放牧，现在则归由蒙古游牧牧民。

有关本地的历史和地理我只能谈这么多，尽管这几天搜集了这方面的不少资料。我在这里也不能讨论一个重要的地形问题——《汉书》（Han Annals）屡次提及的敦煌西部的哨站“阳关”（Yang-Kuan）是否真的就坐落在南湖。一些对考古有兴趣的敦煌官员在废弃小城镇南面和湖泊之间的一座小庙里，立了一块碑，声称阳关就在南湖。在我个人看来，有很多地形学上的证据证明上述观点。

不管南湖在过去以什么驰名，但我们所有人在南湖住的很舒服。这几天风和日

丽，晚上的最低温度也在凝固点以上，给人以春天的气息，虽然现在树木还没有长出嫩叶，花也没有开。劳累了多天的牲畜这几天也终得休息一下，可我的小狗依然是精力旺盛，在我去南湖河流经峡谷里的一座小庙期间，它和一群粗野的牧羊犬混在了一起，被咬得遍体鳞伤。我们找它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最后它自己回来了。从此，我总把它带在身边，或拴在帐篷边或驮在马背上，直到伤口愈合。经过这番折腾，恐怕它也会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而感到遗憾呢。这条狗勇猛果敢，十分好动，在广袤无垠的沙漠里，它会更加安全，那里可没有牧羊狗了！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七章

## 留给后人探索的遗迹

南湖有许多古代的遗迹，人们恬适地生活着，倾颓不堪的寺庙也十分好看，尤其是清澈可口的泉水，我对南湖绿洲恋恋不舍。然而，我要去沙漠北部的古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况且炎热的夏季马上就要到来，所以我必须利用剩下的这几天或几周时间去那里考察。我决定在4月11日动身出发。现在正值绿洲的春耕时期，最多能腾出10个劳力跟我前往。这10个人的家就在营地附近，喊话声都能听见，我们提前两天就把动身的时间和注意事项告诉了他们，结果直到中午时分，村里的一位恹恹欲睡的老者才把他们召集了起来，结果他们既没带口粮，也没带铁铲，新雇的骆驼也没有配备捆东西的绳子，我们不得不推迟出发的时间。从这里出发，穿越沙漠到达罗布淖尔路线附近的古长城的路程较远，一次行军走不完。因此，一俟泉水流出来，我们就在原定的日期出发。

然而，即使是现在，事情也没发展到非走不可的份儿上。南湖在经历了几天风和日丽的天气之后，很快要刮一场暴风。当篷车队刚一离开绿洲，狂风就刮了起来。在绿洲北部黄沙覆盖的陡峭山峦之间，大风肆虐呼啸。我向峡谷西部一座山脊之上的废塔走去（从南湖流出的水横穿峡谷），在那里用经纬仪测定我们的方位。刚一到

废塔，漫天的沙尘就把我们包围了起来，我们只能看到眼前二三十码的距离，有时眼睛都无法睁开。这是一场搏浪（Buran，意思是沙尘暴——译者）风，1901年春天我在新疆地区就领教了它的厉害，但由于地面的条件不一样，现在的沙尘更加严重。

如果和田和克里雅沙漠里的土质以细细的黄土为主，那么我们周围将是一团黑暗，因为风力太大，足以卷起大量的黄土。但所幸敦煌周围都是些沙丘，沙粒的比重较大，上面的情况没有发生。向太阳望去，空气中只有一些黄尘，地上是一层小石子和沙粒。但与1901年经受的暴风相比，这对皮肤的刺激更让人难受。为了找到避风的地方，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即使戴了护目镜，头上裹了披肩，我也难以跟上前面的向导，即使他只在我前面几步远。

我正在发愁晚上在哪里宿营时，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树，原来飞扬的沙粒变成了尘土。在狂暴的沙尘里走了2英里，我们终于到达一块平原，即南湖绿洲外围的一个名叫水伊（Shui-I，音译——译者）的小村庄，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人和牲畜都累了，再也无法忍受弥漫的尘土，在村里等了1个小时，仍不见风有停的迹象，于是我不得不下令在村里停留下来。真要谢谢水伊村，我们总算有了个避风的地方，可它的3个农场污秽不堪，让我至今难以忘记。

我们在较大的农场找地方安歇，粗略一看，我就发现它已经快要成为废墟了，只要沙尘再继续刮下去，它就会全部掩埋在沙尘之中。房子按照传统的中国风格建成，长方形院子，大门朝南，房子建在其他三边，房屋比较宽敞，现有几户种田人在这里居住。几处墙严重倾斜，暂时由几根粗糙的椽子支撑，以防墙壁倾倒。有一半房屋的屋顶出现了洞，漏着天，墙角里堆满了木头和灰泥的碎片。院子里堆积着极端肮脏的垃圾，连我的突厥随从都嫌脏，还不情愿把马匹牵进来。房屋仍保留了大量绘有图案的碎片，窗棂贴着深红的纸，纸上整齐地写着文字，表明以前这儿还

挺舒适安逸。把这么多的人马都安顿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外面依旧是寒风吼叫，风尘滚滚，大家都挤在一起凑合凑合，皆无怨言。

院墙与一间完全坍塌的房屋相对，我正要让人在院墙后搭下帐篷，机警的莎车随从发现一间小屋里住着人，房屋的屋顶还没被风吹走。屋里住着年龄最大的种田人和他半疯半傻的儿子，老人头发苍白，儿子的生活主要由他料理。老人看上去很热情，当他瞧见队员狐疑地望着墙角里堆积的烂衣服等东西时，他立即进行了清理，又整理了头发，看来是盛情难却，我就在这间房里住下。打扫房屋激起厚厚的灰尘，比起屋外弥漫的沙尘也不逊色。我相信，经过这一次清扫以后，直到沙漠侵袭以后，这间小屋再也不会打扫了。夜里，我觉得倒还舒适。

然而，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时间太长，因为这里距目的地还有长约 35 英里的沙漠地带，我急切地想早点出发。凌晨 4 点，我把队员叫醒，但都快到了早上 7 点了，南湖人和马夫照管的篷车队仍未出发。不过，我却能利用这段时间到周围看看。夜里风暴已经停止，南面还剩下淡淡的尘烟，沙漠留下沙尘经过的痕迹。后来，我多次发现敦煌沙漠的沙尘暴发生以后便很快沉淀下来，这比塔克拉玛干的沙尘暴影响持续的时间短。

现在，我能较清楚地看一看房屋及其周围的田野和树木，一切都表明这里将要被废弃了。昨晚我们居住的那户人家附近的田地已经被细沙掩盖，这些田地现在仍有人耕种。灌溉渠没能阻挡住从西边滚过来的沙丘，沙丘比原来向东延伸了约 300 码，掩埋了树干底部，因为水渠较浅，危及到水的流淌。离大农场附近有一小的废庙，至今仍保存着油漆过的大门，但屋顶的横梁已经坍塌下来，尘沙把屋内残余的黏土塑像掩埋了。

在别的地方，田里长满了带刺的灌木，田边是低矮的沙丘或排列整齐的果树，流沙沿篱笆形成几英尺的沙堆，但可惜人们却忽略了开凿水渠。一切表明这里即将

废弃，我不禁想象起当沙漠最终侵袭的那一天，这里又将是什么样子。在过去的10年里，丹丹乌里克或尼雅废弃以前也许也是这个样子。2000年以后，当考古学家挖掘我们脚下的这片“遗址”时，他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今晚丢在水伊的英语和印度斯坦语写的残片。想象2000年后的同行们来此发掘，我特别注意不让燃烧任何纸片。

在描写水伊受风沙侵蚀的同时，我不失时机去走访村民，问他们有关的原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村民们也承认本地的废弃状况由来已久，但他们抱怨的不是缺水或水的供应不稳定，而是流沙的破坏作用和东干人叛乱带来的麻烦。白天，我没时间思考上面的问题，但考察在考古学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先前，南湖人坚持说他们对向北的路线及我们要寻找的废墟一无所知。我们沿一条欢快的小河而行，小河约有1英里宽、1英尺深。小河源于南湖的泉水，流入沙漠，流速约每秒1.5码。行了1.5英里后，在河的东岸不远，我们遇见了一片废弃的屋子，屋子周围是沙丘。流沙深6~8英尺，树干被砍，房子七零八落，表明已不再有人居住。

蒋欢（Chiang-huan，音译——译者）是南湖富裕的人家，由他负责劳工。他现在承认，距离此地1.5英里的上盐卡（Upper Yen-chia）和下盐卡（Lower Yen-chia）也有废弃的田地，他对那里非常熟悉。他说，由于1866年东干人入侵，那里的田地被人废弃，南湖也遭劫掠，绝大多数南湖人被杀。从那以后，南湖人拆掉盐卡（Yen-chia）房屋的横梁，砍伐树木，用来盖房或用作燃料。但是，河水依旧流淌着，似乎足以够这些狭长的旧耕地灌溉之用。积累的细沙覆盖了旧耕地，细沙显然是风化的黏土或黄土，也许因为树木、篱笆和其他障碍物的阻挡，我们的左边是绵延的碎石萨依，肥沃的土壤全盖在碎石之下。

在下盐卡（Hsia Yen-chia），一条狭窄的浅水渠与废墟并行，水源自南湖，绵延将近1英里后，消失在沙漠之中，但不久我们发现这条水渠不止1英里，而是向

北延伸得更远。离开水伊。向北走了7英里，我们又碰到一座废弃的小村落，向导将之称为关左（Kuan-tsou），说村子大约在6年前废弃，因此我可以较为准确地考察本地的传统。在第一片农场周围，我发现了几块田地仍没被黄沙覆盖，队员在散落的碎石岩屑中间很快找到了看上去挺现代的陶器碎片和瓷器碎片，以及乾隆时代（Ch'ien-lung，1736—1796年在位）的铸币。孤零零的农舍里积满了沙土，上达6~8英尺，由于此地据南湖比较远，所以农舍的梁和椽子还未被拆走。

耕地已经被废弃，运河和灌溉两边的树木也已被砍伐，但仍能看到两行树干，可以推测两行树干之间就是当时的大沟渠了，也可以看出大沟渠的水来自东南方，即我们曾经经过的那片塔提（旧南湖绿洲的一部分）上的那条干涸的河床。低矮的沙丘吞没了村子的田地，到处都有圆锥形的红柳，高达12英尺。这一切都说明了敦煌在19世纪早期典型的生活状况。我找了一家最坚固的农房，拍了张照片，以吸引未来考古学家（比方说公元4000年的考古学家）的注意力。于是，我把一份印有日期的报纸放在一个不易受到损坏的角落，期望它能对未来的考古学家起到启发和引导作用。

继续北行2英里，不时碰到废弃的房屋，它们相互隔离一段距离，根据从中发现的铸币，可以推断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时期，其中最后的一个院落很大，院子里一层厚厚的废物。紧挨着院子的北面，有一大沙丘，高足足20英尺，院子恰好坐落在沙丘的凹陷部分，有些房屋已经被沙丘掩埋。农场呈一条线排列，无疑是由唯一的一条运河供水，这如同敦煌绿洲最后一条笔直的分支。可以看出，近来这里气候日益干燥，即使把目前从南湖流向这里的所有水源集中到一条水渠中，恐怕流不到这儿就干涸不见了。

在赤裸裸的平原之上，人类居住的痕迹全都消失了，只有洼地处长着稀少的红柳，洼地显然是山区罕见的洪水形成的。当行至离水伊约12英里的地方，平原上出

现一座塔，系黏土夯实建筑，通过双目望远镜观察，我发现北方很远的地方有另一座塔。在建筑结构上，这座炮台（敦煌人称其为“墩”）与我在古长城见到的炮台没有什么不同。起初，我对炮台所处的位置感到迷惑，后来发现古长城从玉门关（Yu-men）向东南偏南的方向延伸，炮台正处在这条防线上。

我们继续向偏西北方向行走，库鲁克塔格东部低矮的锯齿状山峦越来越清晰。在那次罗布泊的行程中，一连几天都能看见这些山峦，现在离古长城不太远了。但是，想到要在无水的沙漠中扎营，又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样状况的地面，中国劳工显得焦虑不安，越来越无斗志。于是，我让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断后，督促中国劳工前进。经过24英里的路程，到了一条宽阔的灌木带，长着红柳和其他种类的灌木。根据地图，我们现在离哈拉淖尔湖以下湿地周围的道路至少有 12英里。人困驼乏，今天晚上不可能到达那里。现在能做的也只有找一块芦苇地，以便牲畜能吃些草料。又在迷宫般的灌木丛中走了三四英里，但天色太黑，我们只能在第一块托格拉克丛林里扎营休息。

一条条小水沟穿过茂密的丛林，水沟看起来形成的时间不长。通常情况下，地面以下不深就有水或芦苇，但这里却找不到。对人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骆驼驮了足够的给养，但可苦了马匹，经过了漫长的行军，它们口渴难忍。晚上9点钟，奈克·拉姆·辛格赶上来了，报告说把落在最后的一个人带来了，这个人赶着3头倔强的绵羊。队员们点燃了一大堆篝火，在我的帐篷附近挖掘出腐朽的小屋，上面覆盖着粗糙的树干。毫无疑问，曾有牧羊人在这里居住，水干涸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呢？这缺少任何确定年代的线索，这将是古物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问题。

午夜以后，我才得以休息，但天还没有亮，我又被吵醒，说两个劳工不见了。蒋师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失踪的那两个人就是抽鸦片的烟鬼，这两个家

伙可能在黑暗中迷了路，或是故意偷偷落在后面抽大烟，蒋师爷害怕他们迷路后瞎撞，最后会被渴死。我向蒋师爷解释，像他们俩这样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在白天应该比较容易发现晚上燃烧的篝火的遗留物和追寻我们的足迹，但我的解释也无济于事。我认为可能因为拿到了提前支付的钱后，他们恐惧即将面对的困难而逃之夭夭，正返回南湖呢，可蒋师爷却想象这两个倒霉蛋已经死在了灌木丛之中。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查清失踪的原因，如果他们迷了路，必须给他们提供帮助。于是，我让所谓的向导蒋欢带上一大葫芦水，饮好马，去寻找两个倒霉蛋，如果可能，再把他们俩带回来。不能责备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因为他们确信没有人在行程中落下。我已派蒋欢回去寻找他们，并不顾天还没亮，就徒步在沙漠和灌木丛中展开了搜寻工作，我也心安理得，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了。

4月13日，我们走的路程不远，但也遇到了令人兴奋的事情。根据从离开罗布泊以来所做的勘测，我们距要寻找的道路的直线距离仅有7英里左右。在茂密的红柳丛中，我们又走了4英里，红柳丛中从此夹杂着芦苇地，并发现大量野骆驼和野鹿的踪迹。让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一些地方还发现了以前的车辙印，吸收过大量水分的黏土经过太阳的炙烤，裂开了缝。穿过狭长的赤裸裸碎石地后，到了一片盐碱洼地（向东南延伸)。以前遇见过一座塔，这还不足以准确测出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湿地边缘的地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路标，而这块湿地与我第一次去敦煌途中见到的完全未被人注意的地面的构造有某些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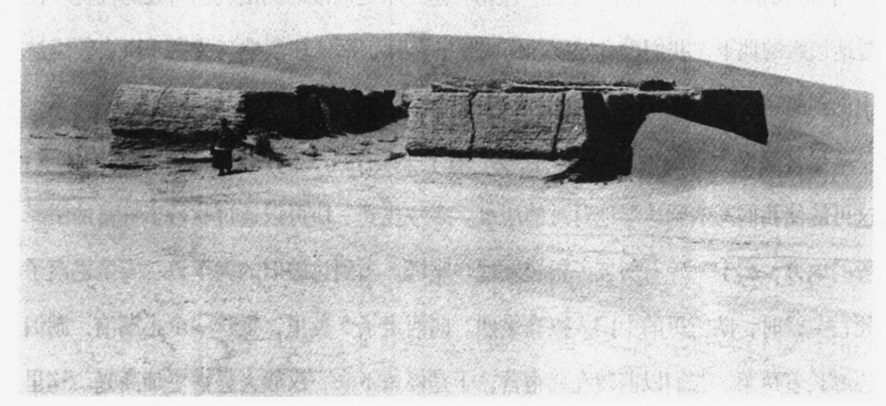
尽管湿地大部分地方干了一层皮，看上去很结实，但仍无法支撑牲畜的体重，这可能使我们无法到达湿地对过的淡水。多亏找到一块可以通过驮行李牲畜的沼泽般的地方，爬上一碎石斜坡，很快发现一座塔。当到达破旧的大车道、安全逃离了死亡戈壁时，队伍里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向西走了5英里，抵达一个小湖泊，湖泊边缘长着芦苇。我们以前曾在此宿营，于是停留下来，汉族人显得更加高兴。这里

水流充足，泉水清冽。

在湿地背风的斜坡上，幼小的芦苇发出了嫩芽，这是这片沙漠地带春天到来的第一丝迹象。下午早些时候，东风刮了起来，我觉得帐篷里十分沉闷，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把帐篷扎到别处。为什么呢？蒋师爷为那两个失踪的劳工牵肠挂肚，竟然在湿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希望产生的烟和光能为失踪的家伙引路。结果大火随风蔓延，我被迫下令将营地移至最近的碎石地上，队里的印度人和穆罕默德人对蒋师爷造成的麻烦感到很气愤，即使为了走失的那俩倒霉蛋，况且又没发挥什么作用，那两人没有出现。第二天，蒋欢归队，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尽管上面发生的事情有点让人扫兴，但最终我们再次来到古代的边防城墙，在离开罗布泊迅速行军途中曾多次发现过这些城墙。遗留下来的塔标志出城墙的走向，

⑯南湖北部沙漠里面上个世纪废弃的农庄



M. Aurel Stein



⑯⑨敦煌西北古长城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仅有其中的几座塔留有人来过的痕迹，大部分塔都在几英里以外。各座塔之间肯定有城墙连接，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算找到了。如今终于有机会考察古长城，心中异常地高兴。在这段城墙上的发现以及以后在敦煌绿洲东北部的考察，证明这条边防线的确非常古老。在这条古老的边防线上（据我所知长度至少有 50 英里）应该有很多古迹有待发掘考察，但取得丰硕成果的可能性，我看不大。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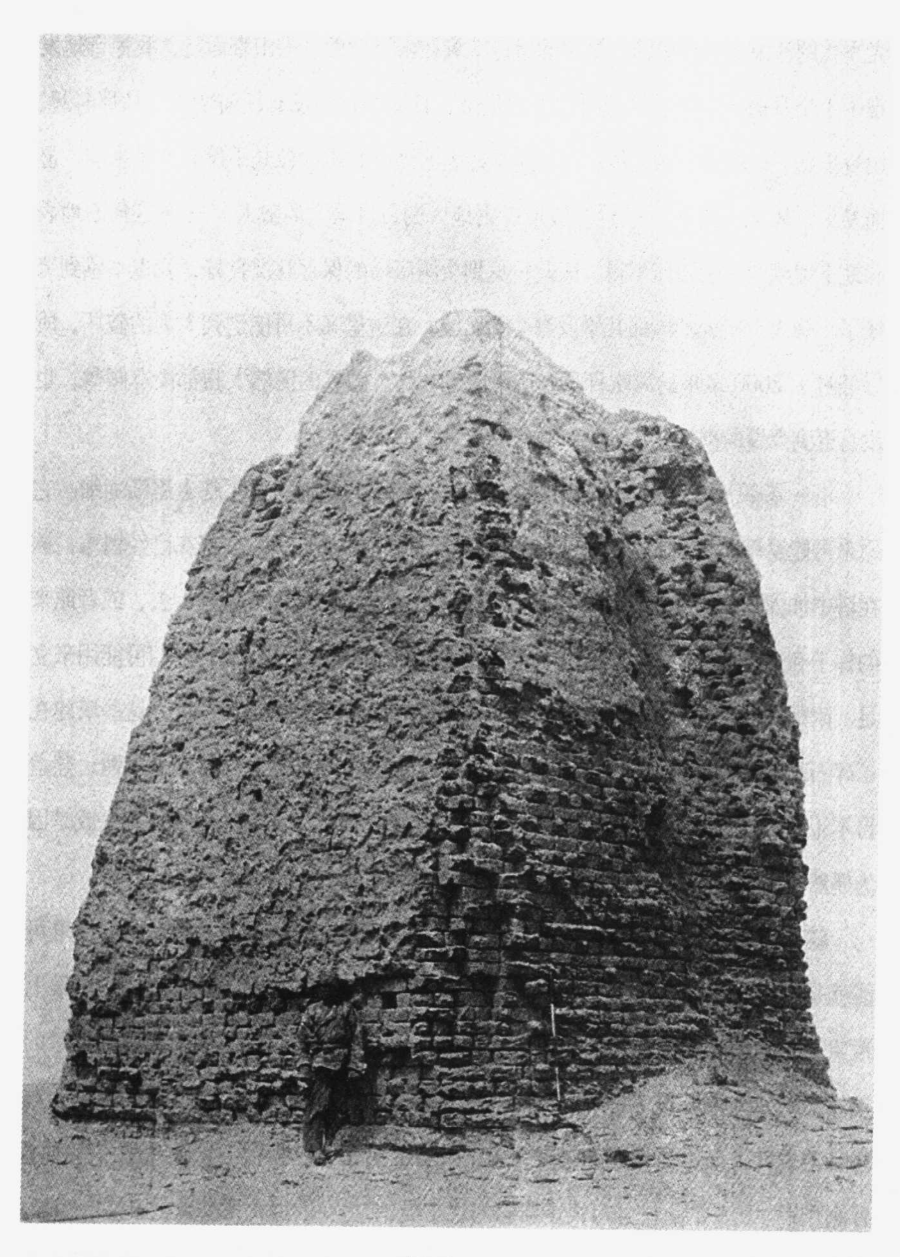
# 第五十八章

## 古长城西段的首次发掘

开始，我们不知道要考察的边防线究竟有多长，但我带的劳工和在南湖临时雇来的劳工好像根本不够用，又走失了两个劳工，无异于雪上加霜。前几天正午已很炎热，眼下的考察工作可能更加艰辛，我必须节约时间，抓紧进行，而且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资源。我过去曾注意到古长城在托格拉克—布拉克附近拐了个弯，于是派奈克·拉姆·辛格向西行，从转弯处沿塔的走向而行，直到城墙的尽头；与此同时，我让敦煌的税官曹大老爷（Ts'ao Ta-lao-ye，林大人让他随队跟着我）火速前往总部，带来更多劳工和给养。

由于拐弯处古长城较近的地方都不适合宿营，所以从那里开始的发掘可能引起诸多的麻烦。从托格拉克—布拉克到第一个扎在湖边的营地，路程有 16 英里，路上全是碎石高地，没有水和燃料，路上可见到古代军营外连绵不断的土堆。走了一半路，发现了突出在小圆石斜坡之上的哨位，现在看上去就像小土堆，与周围地面浑然一体。哨所在城墙内侧附近，我们急忙动手挖掘，发现埋在地下的部分。4 月 14 日，正是从这里，我带领一小队人马向西行进。

前几天炎热的天气导致了强劲的东风，空气里弥漫着沙尘。低矮的碎石山脊在



|⑰敦煌西北古长城线上的另一座烽火台废墟|

光秃秃的沙漠上直线延伸，城墙的遗迹就藏在山脊后面。沿山脊而行，我惊奇地发现了1个月前我们经过这里时留下的足迹，且跟当初的没有任何变化。从那时起，山谷里刮了一场又一场大风，但对这里地表的碎石和粗沙粒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显而易见，风化、腐蚀——这些极度少雨地区的古迹最大的敌人——对这样的地表和地下埋藏的古物奈何不得。因此，见到头两座塔的保存状况良好，我也不感到奇怪了。烽火台所处的地面几乎没有受到腐蚀，在这里又不可能遭到人为的破坏，所以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这些由砖和黏土砌成的庞然大物都没有倾颓，也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坏。

塔的基座面积超过20平方英尺，塔高达30英尺左右，从下往上逐渐变细。它原来可能是烽火台或平台，建了一堵起防护作用的胸墙，但胸墙现在已经坍塌，插在塔中加固顶部的托格拉克木裸露了出来。塔没有阶梯，无法攀登上去，或者原来的梯子和绳子消失不见了。其中一座塔的东墙面，我发现一些洞，它们可能用来立足。附近没有发现营房或丢失的垃圾。也许为了更好地观察地面情况，这些塔建在了碎石高地岬角的边缘之上，周围是小峡谷。如果与塔相连还建了别的东西，建造得不很坚固，那么它们肯定已经被冲到了陡峭的山坡之下，或是因为风吹，或是因为偶然的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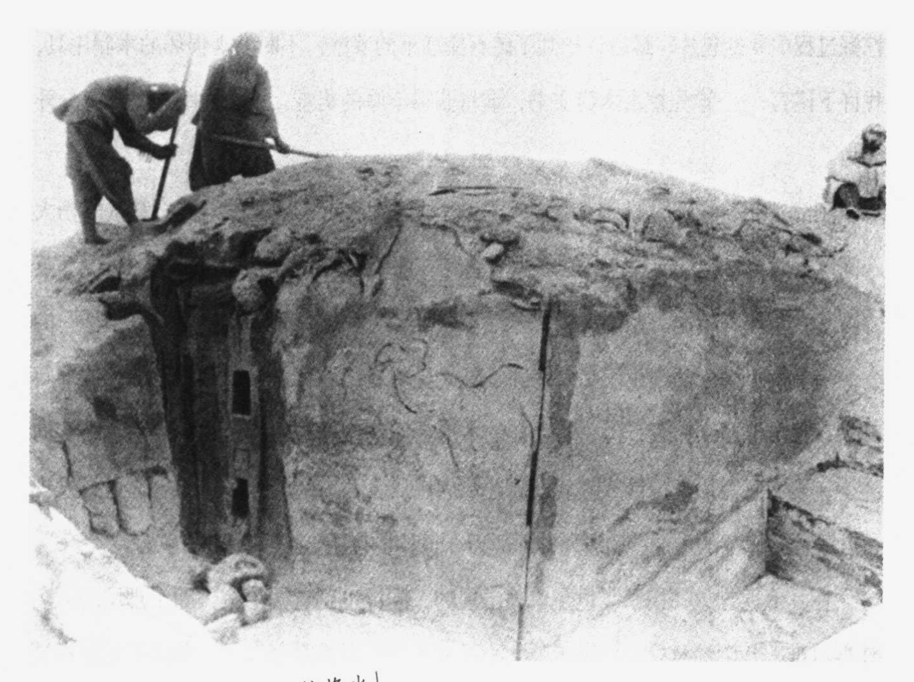
就是在这座完全废弃的古塔下，我头脑里闪出一个念头，即塔附近的土堆可能就是当年守军的营房。土堆基座直径约48英尺，高出地面约10英尺。土堆上覆盖着粗糙的碎石使得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个天然的小丘，我们从中挖掘出大量的土坯，中间夹杂着很多芦苇。塔的倒塌压塌了与塔毗邻的营房的墙壁和屋顶，并将其掩盖在下面。清理工作是件很重的任务，劳工自己携带的铁铲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幸的是已经习惯了新疆的坎土曼,加之在敦煌获得的来之不易的经验，我带上了理想的挖掘工具——坎土曼。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人——大多数南湖人在

挖掘过程中要抽鸦片。最后，挖到了砖石掩埋下的墙壁，不断发现损坏的木制用具，我许下诺言——谁先挖出木简文书，谁将获得丰厚的奖赏，于是这些家伙干得分外卖力。

刚清理完北侧外围的一间小屋，正当开始发掘靠近古塔坚固的砖石结构的稍大一间屋子时，发现了寻觅已久的木简。它是一块坚固的木头，大约12英寸长、5英寸宽，一端厚一端薄，像个楔子，全部漆成了黑色，这令我非常困惑。“楔子”的一面写着两个大大的红色汉字。蒋师爷轻而易举地识别出这两个字，但却无法理解其义，很可能是个人名，但这块奇怪的木简是做何用处的呢？厚的一端系着结实的绳子，表明它是用来携带或挂起来的。几周以后，在沿边防线的其他烽火台里发现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木简，蒋师爷终于解开了其中的谜底。

在其他地方，“楔子”也是单独出现的，同样也刻着两个字，除了理解为人名外再也难解其中的意思。“楔子”大小尺寸不一，但都系着绳子。蒋师爷记得在楼兰及其他哨所，不值勤的士兵去巴扎时，身上挂着醒目的腰牌（在印度称“通行证”），上面刻着长官的名字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腰牌较大，容易被人识别，别人就不再去问佩戴的士兵出来是否经过了批准。如果一个小队只有一张腰牌，那就避免一次出去的人太多的情况，就好比在学校，一次只允许一个学生离开教室。

不久，我们发现真正的木简：长方形，面积较大，上面写着账目，盖了一个印章，几个断裂的碎片写着一列汉字（木简一般都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烽火台很久以前曾有人把守，这段防线可追溯到汉朝（东面的塔也是如此)。第二天上午，又发现了具有结论性的证据，在继续清理这间房屋和这座塔东侧面的入口通道时，找到了传统形状的木简，其中一片写着日期初始（chu-she）3年，即公元8年。随着木简的出土，挖掘出了这里最后一批守军的用具，其中有大量雕刻着奇怪图案的木钩，像是某种动物的头和颈，仍留有鲜艳的黄色和红色的遗迹，可能用来挂士兵的



⑰敦煌古长城的哨所，连接烽火台废墟（发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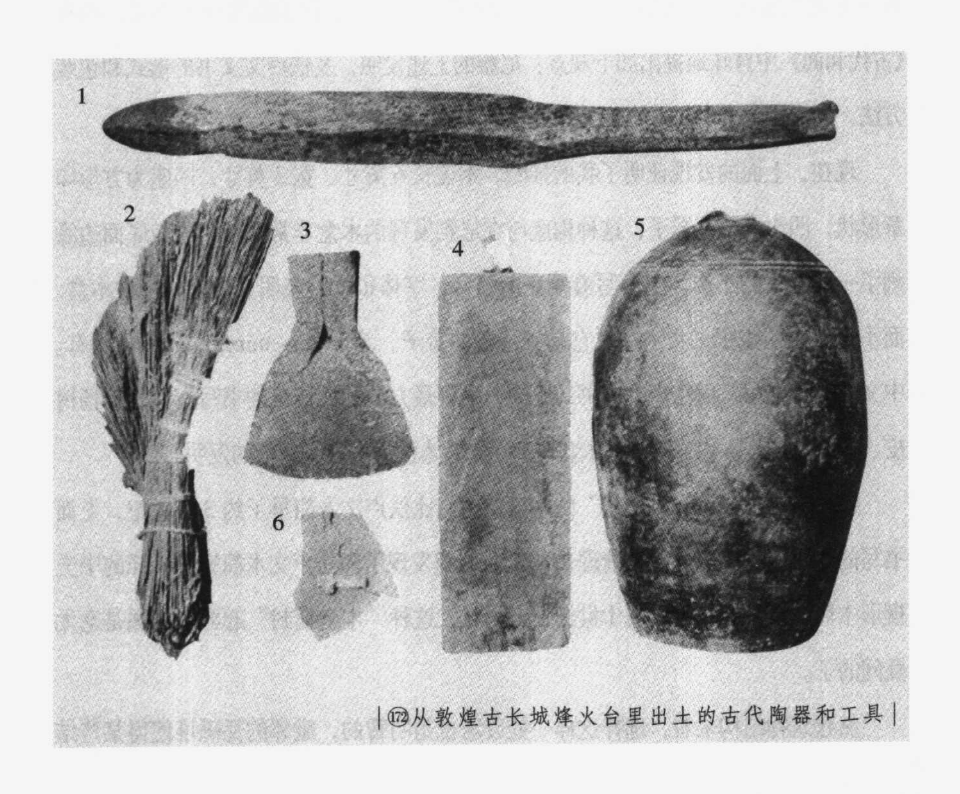
衣服和装备或者是箱子的把手。还有粘蜡烛的木块，折断的箭杆，以及可能用来制作十字弓或弹弓的木头，上面刻着守军的番号。

守军保持了中国人良好的传统，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一些家用器具，比如木梳(现在仍在搓绳中使用)，木头锭子样的东西。在墙上发现了一只鞋，用鞋带挂在墙上，外表看上去很龌龊，却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其形状符合一名鞋匠的标准。鞋的尺码可以以10英寸为单位丈量，或按十进制进一步细分，从中可以看出汉朝脚码测量的准确程度，而且我们可以采用同样的测量单位，对汉朝的其他遗物进行测量。我曾检验这种脚码单位，具体情况将在后面介绍。

我还发现了几片羊毛粗布和亮丽的丝织品，前者可能是士兵穿的，后者则可能

属于军官或高级的访问者。奢侈品几乎没有，仅有几个破碎的坛子，为灰色陶器制成，打破后用皮条把洞给补上，似乎表明是文明人在这里生活过。

周围的一切都很简陋，可见当初那些戍守边界的人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劳工挖掘木简后，交给蒋师爷解读，这是1900年以前的士兵做梦都想不到的。在第一批发现的物品中有一标签，标签显然曾贴在一个箱子上，标签上提及100只铜箭头和玉门军队的番号，我总算发现了“玉门”这个著名的名字，我一开始就认为它应坐落在古长城最西边部分的某个地方。在后来的发掘过程中，我愈加对“书写者阿摩尔”（amor scribendi）充满感激，他促使古代的军士们利用闲暇时光，给后世留下诸多记录、报告、贮藏记录及其他大部地区士兵所熟知的文书，这种情形犹如我们



⑰从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里出土的古代陶器和工具

沿印度西北边省的哨所里奇异的角落里所进行的发掘那样。

但是，在这里的烽火台，我们发现了不少有关当时实况和个人兴趣的记录。有一个雕饰粗糙的木棍四面都写有文字，讲述3个有名有姓的人看望他们驻扎在这里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可能是位小军官。发现朋友外出，因手头没有木简，于是3个人从燃料堆里取出一根棍子，凌乱地写上文字，表达没能相见一叙之遗憾。他们肯定把棍子留给了值勤的士兵，所以没注明具体日期。

蒋师爷仔细欣赏着"书法"，发现有些字字体端庄优雅，有些则龙飞凤舞，即所谓的"草体"，我本人对古文字学十分感兴趣，得到这样的"书法"，心中自然格外高兴。在尼雅遗址，我首次发现了佉卢文木简，那些木简外面用长方形盒子包装，我一直觉得那是个极其精巧的发明。没有确凿的证据，仅根据笼统的思考，我在《古代和阗》中冒昧地提出如下观点：尼雅的上述发明，及佉卢文文书的形式和包装方法，可能皆源于中文木简。

现在，上面的发现证明了我的推断。木盖长6英寸、宽3英寸，凹座为方形印章形状，凹沟上缚有绳子，这种构造与在尼雅发现的木盒非常相似。木盖底面边缘刻了一圈窄窄的小沟，上面写着端庄的汉字，字体很大，表明当初是用来做木盒，而不是木简的盖子，文字中说它是一药盒的盖子，为 Hsien-ming company 所有。中文系竖行书写，而佉卢文文书却不同，不管最方便的、传统的书写材料是赤杨树皮、棕榈叶还是木片，能够把木盒改造用来装木简本身就是精巧的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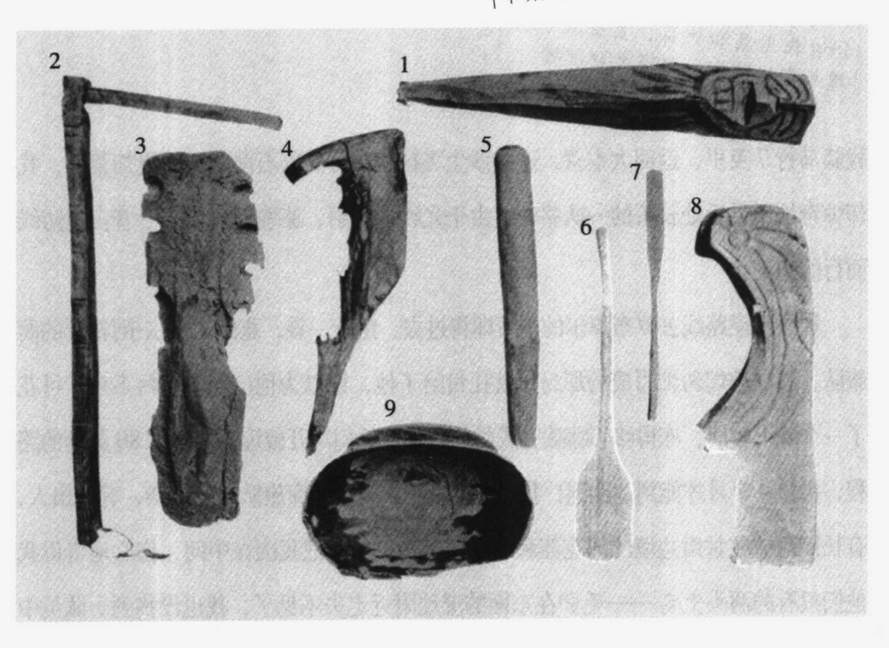
我发现了古代用作"信封"的木盒，但它比佉卢文木简早了约3个世纪，上面书写的全是中文。后来，在清理废物堆时，我发现了和佉卢文木简完全一样的中文楔形木简，很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因此，这种"木盒信封"起源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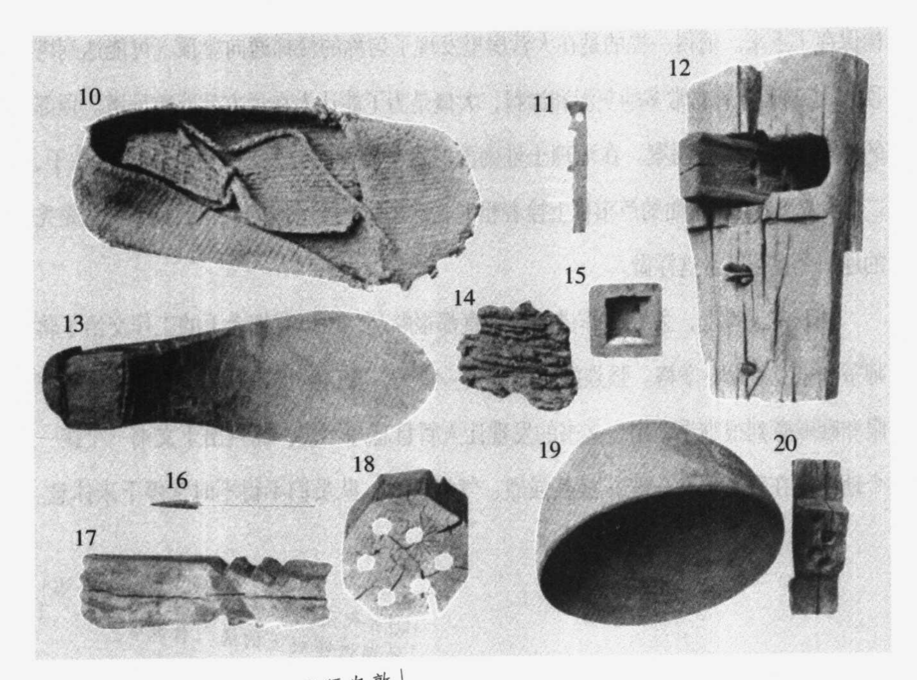
从建筑物结构来看，选择这样一处废塔也是明智的，毗邻的瓦砾堆使得某些结

构保存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营房里发现了匀称的楼梯通向屋顶（可能达到塔顶）。塔的表面有非常多的灰泥和涂料，大概是为了能让人在远方就能望见塔。顶部的外墙上有一骆驼图案。在清理土堆南面的水平地面时，发现了两个坚固的柱子，二者相距20码，扭曲的芦苇杆上拴着粗绳，这显然是拴马用的，我的队员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宿营就常这样做。

到第二天晚上，发掘工作进展得一直都很顺利，所以我把余下的工作交给了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强烈的东风刮了一整天，吹得挖掘出来的尘土满天飞，使眼和咽喉感到很难受，出土文书的发现让人暂且忘却不快，而且出土文书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光线极其强烈，气温很高，队员们不得不时常停下来休息。

⑰古代用具和物品，主要源自敦煌早期边防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⑰④古代用具和物品，主要源自敦煌早期边防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我骑马行7英里，返回大本营，途中沙尘飞扬，黄昏的碎石萨依显得更加荒凉，我却惊奇地望见远处长长的一队骆驼。由于光线的折射，骆驼队好像是沿着古边防线而行的幽灵。

通过沙漠路线去罗布淖尔的季节即将过去。走近一看，竟然是协尔·阿林汗的商旅队，我在敦煌匆忙写成的那封信就托付给了他，原以为他已经快到阿不旦，可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冻得哆哆嗦嗦完成的信到现在他们离开敦煌，才行了80英里的路程，再过4个月才能到达欧洲！我心里不禁感到失望。商旅队成员很杂，有和田人，有长期流放在甘肃边境的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人，他们把我围在中间，伤心地告诉我他们仅有的两头坐骑——毛驴在东面的湿地附近走失不见了，找也没找到。队员中

M. Aurel Stein

只有向导一人走过这条沙漠路线，曾在我去敦煌的队伍中担任马夫，笨头笨脑，可商旅队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很自然，骆驼的主人对即将面临的凶险感到焦虑不安。在疏勒河湖地和拜什托格拉克湖地之间，净是黏土阶地和沙丘，十分容易迷路，我暗自庆幸自己不是商旅队的队员。尘土仍在飞扬，所有队员都哭丧着脸，我对他们因邮件耽搁时间表示歉意，并给所谓的向导提些建议，教他如何才能沿正确的路线走。他们说要在托格拉克—布拉克停留一两天，我一听更觉得后悔，真不该把邮件托付给这帮家伙。

为了弥补因邮件延误造成的损失，我于是劝说商旅队中的年纪较轻的人留下，帮我挖掘废墟，让这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黑大爷"（Khitai，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之贬称——译者）看看穆斯林是如何使用坎土曼的。7个小伙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哪怕我付出的报酬再高，说有机会掘出宝物，他们也不愿留下来。于是，我只有祝他们一路顺风。半个月后，我在托格拉克—布拉克发现一头骆驼的尸体(商旅队共有40头骆驼)，尸体七零八落，一半已经被狼吃掉，不知道抵达婼羌绿洲以前他们的骆驼还会死去多少。最后，他们终于走出了沙漠地带，我的信件终于在9月末送抵英国。

M. Aurel Stein

# 第五十九章

## 踏勘古长城

由于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负责起发掘工作，我便抽出时间沿古长城进行踏勘。通过踏勘，我可以提前计划如何开展工作，并选定最为合适的扎营地点，后者非常重要，因为劳工不足，废墟间相互距离很远，扎营地地点选择不当，每天一个来回会消耗队员不少体力。

就这样，一连几天我行程几十英里，穿过碎石沙漠地带和盐碱沼泽地，追寻着古长城及其烽火台的遗迹，切身感受到了古代边防线的迷人风采。然而，从我们第一次扎在湖边的营地往东，特殊的地形特征使踏勘工作变得复杂，古长城像是故意躲避我。过去沿罗布淖尔路线而行时，我曾注意在路线以北的洼地里有湖泊和湿地，一马平川的碎石地上耸立着古长城和烽火台。但当这次亲眼去那里踏勘时，却发现地面异常凹凸不平，体会到汉朝的工匠建造这样的边防线是多么的不易。

以前，我以为到库鲁克塔格山光秃秃的山脚，全是平原地带，现在发现实际上不过是一块块碎石高地，高地被弯弯曲曲的洼地分开。这里的地形构造像海岸线，海湾和海口之间的岬角伸入海中，只有大比例的地图才能描绘其复杂的构造。较大的洼地部分是泉水沼泽，有些地方宽度超过 1 英里，开阔的水面周围是浓密的芦苇，

湿地上结了一层盐碱，向西北延伸很远。在其他地方，地表上没有水，到处都是盐碱，长着红柳之类的灌木，说明这些奴拉合下土屋富含水分。马无法通过沼泽和湿地，我们不得不绕着边缘迂回而行几英里，或走不太危险的地方，我们就这样从一座废塔或土堆走到另一座废塔或土堆。

沼泽地就像障碍赛中的壕沟，安全越过以后，我们更加兴奋地去寻找古长城遗迹。不久，我发现城墙都建在易受攻击的地方，沼泽地上则不建城墙。所以，我认为中国工匠建设城墙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天然防御的不足，并且节约了劳动。

在沼泽地附近，土壤松软，上面长满灌木，不仔细观察就难发现土堆的痕迹，因为从地面渗透出水分，相互交错的泥土层和芦苇层严重腐烂。土壤里含有很多盐分，滋生了残枝稗草，映衬之下更难发现土堆遗迹。但是，一旦走上光秃秃的碎石高地，便很快发现了熟悉的古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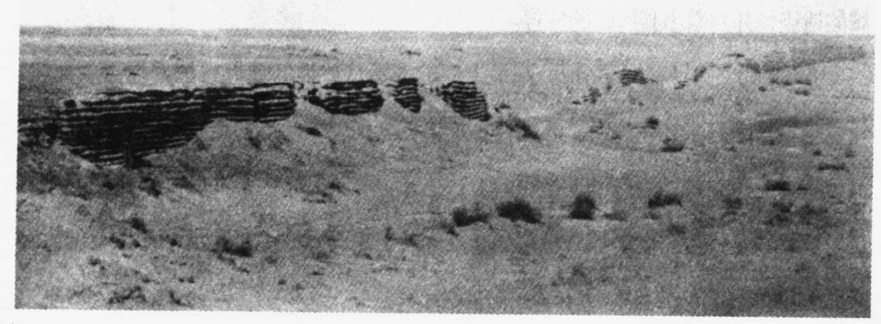
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望见了古长城，至今保存的仍很高，绵延很长。碎石层和芦苇层相间，结构很坚固；城墙走向与风向相同，底部被土层掩埋，减轻了风蚀作用。2000多年以来，强烈的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对古迹造成了严重损坏，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沿城墙一线低矮的、持续不断的隆起物。假使看不见城墙，但一挖碎石，就能发现排列整齐的芦苇层，一挥坎土曼，就能挖出匀称的砖石结构。在勘察过程中，提拉巴依经常伴我左右，他目光十分敏锐，在远处就能辨别出古长城的遗迹，并判断出其所在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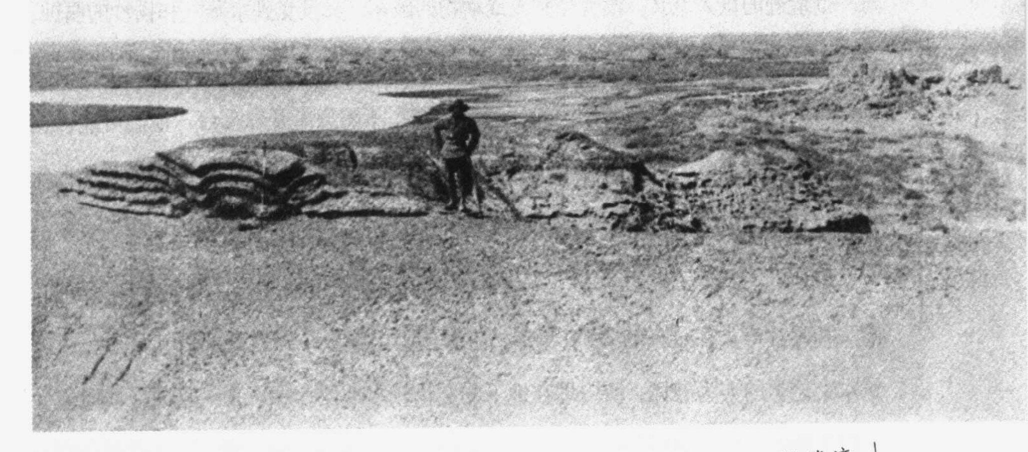
我们到了一处特殊的高地，高地上面的城墙从最近的烽火台呈直线向东延伸，所以沿城墙走起来比较容易。烽火台总是建在监视周围洼地的最佳地点，因此确定其位置并不难，这一点有利于当年的士兵把守，对我们今天确立废塔位置亦很有帮助。有些废塔倾颓不堪，城墙被沼泽洼地隔开，但高地之上总有破碎的砖石堆，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在需要防护的战线较大，天然地形不足以防御敌人进攻的地方，烽火台建得较大，原来的高度达25英尺，甚至更高。砖石和黏土规则分层，建造得非常坚固，经历了沧海桑田而保存了下来。靠近塔的底部建了营房，营房保护了厚厚的灰泥层，而其他地方的灰泥脱落了下来。由于风化的作用，塔顶起加固作用的胡杨木裸露了出来。但建在黏土阶梯或黏土墩上的烽火台则比较低。究其原因，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这是所有中国建筑物的典型特征。通过规则的楼梯，爬上塔顶，我发现顶部通常不是烽火台，而是一间小房子，以为守卫士兵遮阳避风。

顶部的小房子不可避免地比塔的其他部分倾颓得厉害，可它脱落下来的瓦砾堆为我们登上塔顶提供了通路。站在顶部，放眼望去，净是荒芜的沼泽地和碎石萨依，偶尔出现一条狭长的胡杨灌木带或波光粼粼的水面（盐碱水），可以想象士兵们当年

⑰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城墙，用芦苇层和黏土层砌成





⑰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城墙遗迹，与盐碱沼泽相连

的艰辛生活。这里的生存环境发生的变化很小，有据为证：汉朝的戍边军队用来建城墙和烽火台所用的材料都源自沙漠、沼泽、芦苇丛或灌木地，这些东西可以从盐水、碱水中汲取养分。

与此形成对比，北面的地平线上是绵延不断的棕色山丘，景色令人感到愉快，但也无任何生气。宽阔的沙漠峡谷两侧是碎石斜坡，山丘是紧紧相连的沟壑，好像是雨水冲刷的结果，那里几千年来都没有植物生长的痕迹。至今为止，我还没听说库鲁克塔格这里的山谷里有任何水井或泉眼。然而，我们却望见了参差交错的山峦和高耸的岩石山峰，各种各样的颜色，从浅棕色到深紫色应有尽有，双眼得到了慰藉，不再去看那单调乏味的碎石和刺眼的沼泽地。我思考着过去的历史，眼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没有声音，没有移动的物体，只有热辣辣的空气在流动，原来是海市蜃楼。

由于地处偏僻，古物可以得到永久的保存，人们不难意识到这具有悠久历史的每一处遗迹的重大意义。没有受到人或动物的破坏，又没受到水蒸气和扬沙的腐蚀，古代士兵营房的瓦砾堆保存至今，城墙经常会有更多更大的垃圾堆。这里半年时间刮刺骨的寒风，半年酷热难耐，难怪当年的守军不愿意离开烽火台。他们可能躲在杂乱的墙角里休息，抑或躲在烽火台和城墙的一侧避风，我也趁机体会了一下古代士兵的“悠闲”生活，这可是我在以前考古过程中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最薄的一层碎石足以保存下来易坏的物品，并保持其原貌，例如布片、木简、箭头和碎片等。在过去的2000年中，这里的降雨量极小，地处偏僻，又避免了修筑水渠之类的人为破坏，所以埋在地下的文物较多地保存了下来，表面受损但免受了风化腐蚀。只要我用马靴鞋跟在地上一刮，或用马鞭末端一擦，就会有废弃物出现，好像古代的守军习惯随手丢掉垃圾。

烽火台之间需要传递报告、命令、质询等，这项工作由骑马信使完成。那时，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十分发达，持续了200多年之久。瞧，这些写于公元前后的文书有的甚至就散落在地面上，唾手可得，对于我这位考古学家不愧是件美事。队员们相继发掘了余下的废塔，文书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源源不断地送到蒋师爷手里，师爷轻而易举地破解出了其中的含义，文书的内容涉及敌人的进攻，调动军队加强力量，高级官员的视察，更多的是关于士兵的日常生活，如军粮分配、武器装备以及服装穿戴。在人烟稀少的印度边境，孤立的哨所之间通过有线电报来交换情报，而在古代中国的边防线上，则大都采用骑马送信的方式传达上级命令，从总部一级一级传下去，直到送至守卫烽火台的将士们。

经过蒋师爷不懈的努力，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肯定这城墙建于公元前2世纪末，即中国在汉武帝（Emperor Wu-ti）统治之下第一次向中亚扩张时期。后来发现的文书的年代更加久远，其中有T'ien-han时（建于公元前100年）的文

书，这里的城墙和烽火台与酒泉（Chiu-ch'uan），或肃州（Su-chou）和玉门关之间的哨所属于同一时期。据《汉书》记载，它们大约建于公元前110年，那时匈奴人经常攻击中国西行的使团和商旅队，汉武帝被迫发兵，征服楼兰，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中国的军事政权。

毫无疑问，建立这条防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疏勒河以南的中国领土，并作为加强和扩大在塔里木盆地及盆地以北地区的统治而派遣的军队和政治使团的基地和通道。同时，为了防止北部和西北部匈奴人的进攻，这条防线又发挥着防御的作用。而在几个世纪以后，匈奴兵攻到了多瑙河和其他地区。

这条防线建立以后，中国的防御外敌入侵能力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赢得了先机！这条防线的修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地理上的事实，现在由于缺水而无法逾越的疏勒河以北的沙漠丘陵地带，以前小股的骑兵可以穿越过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长城的最西端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防御目的（人们常常以为长城仅是为了防御），而且像古罗马帝国的防线一样，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战略进攻。时间过了不到1个世纪，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以后得到多次证明。

任思想的野马驰骋在古罗马帝国的边疆，我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沧桑，2000多年过去了，曾经生活在这里戍边将士的生存环境好像没有丝毫的改变。守城的士兵和攻城的士兵都已逝去，但环境一如过去，作为人类劳动结晶的古代城墙依然存在。

在勘察过程中，每当我在晚上独自置身于烽火台的瓦砾之中时，我都深切地感受到若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环境经历2000多年也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一座废塔挨一座废塔地勘察，时值夕阳西下，行程10英里之多。古长城表面的灰泥好像原封未动，在淡黄色光线的照耀下，长城显得引人注目。从远处看，在灰色的荒凉碎石沙漠之上升起绵延的城墙，仿佛一条棕色的线条，人们还误以为城墙和废塔上仍有兵把守呢！想当年，进犯这片高地和北面奴拉合的敌人看见长城和烽火

台，也会为其艺术性所折服。

在城墙和废塔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铜箭头，证明这里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我漫无目的地望着沼泽地两岸的灌木丛，当时匈奴骑兵在黄昏攻击长城以前，就是在灌木丛里集结。这种情形宛如我在印度西北边省时，总想找到方便的路线，穿越边境，设法靠近瓦济里（Wazir），或阿夫里迪（Afridi）。一旦匈奴兵越过这道防线，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敦煌绿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实际上，防线以北的沙漠比防线本身所起的防御作用更大。在他们打到多瑙河平原、动摇业已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以前，骁勇的匈奴人是否真正征服了大沙漠？汉朝几代皇帝一直都在和匈奴兵作战，花费多年心血才拒之于国门之外，根据时代背景和路程距离，这些匈奴人注定要在几个世纪以后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军队短兵相接。

斜阳落日，历史仿佛更加真实。绵延几十英里的城墙清晰可见，哪怕它倾颓成了土堆，只有芦苇捆显露出来，我依然能够辨别出它是长城。后来，我发现离每一段保存较少的城墙不远（约 30 英寸），总会有车辙般的道路与城墙平行。经过仔细观察，认定它是古代巡逻兵踏成的小路，路轮廓清晰，上面覆盖了一层沙粒。在以后勘察的几英里，除了商旅队行走的道路以外，这种神秘的小道不断出现，只要保存下来的城墙足够高，能阻挡住北风或西北风吹起的沙粒和碎石，就会有这样的小道。而且，我还多次发现车辙的痕迹和脚印，我对小道的来历更加深信不疑。

以后，我又在洼地里屡次见到车辙印和脚印，可能是古代士兵到洼地喂马或寻找燃料留下来的；但是，凡是有喜爱赶大车的敦煌牧民活动过的地方，古人留下的车辙印和脚印肯定已经消失多年。不过，萨依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只要在萨依上留下痕迹，哪怕是仅有一辆车通过留下的两行车辙，那么通常都会清晰可见，且连续不断。在别的地方，我发现我们第一次沿城墙一线去敦煌途中留下的脚印和马蹄印仍如当初一样清晰，虽然中间隔了 2 个月的时间，而且依我的经验判断，这 2 个月

期间应该几乎每天都刮大风。据多次报道，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旅行家在撒哈拉的碎石地带也有同样的发现。

有关沙漠的土质和气候对古物的保护作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为证。在我第一次勘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很多烽火台旁边都有奇怪的“小土堆”，皆按规则的梅花形建成，只要城墙内侧有足够的平地，就建有这种“小土堆”。经进一步细致的观察，“小土堆”面积大约有七八平方英尺，高有7英尺，完全由芦苇建成。芦苇秆分层交叉地排列在一起，中间夹杂着少量的沙粒和碎石子。至于是建设者故意夹杂沙粒和碎石，还是强风把沙粒和碎石吹进了芦苇秆层之中，我也说不清。当初扎芦苇秆的时候，建造者在中间立了垂直的胡杨树干，无疑起到了加固作用。

然而，现在胡杨树干已经失去这种加固作用，因为芦苇秆中和土壤里的盐分逐渐渗透了出来，芦苇的表面被石化，故而芦苇层变得非常坚固，尽管每根芦苇仍易弯曲。这些古老的芦苇堆都是建在烽火台附近，芦苇堆之间的距离经常为十六七英尺，我觉得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就像防御栅。这个假设恰与另外一个事实相符，即有些芦苇堆留下了燃烧的痕迹，这可能因为有人纵火。但是，当我在狭窄的山脊上发现了非常类似、但排列不规则的建筑物之后，上述假设就被排除了，因为这里烽火台周围或是山涧、或是空间异常局促，具有了天然的防御作用。

在西南方向的城墙那边，我又发现一捆捆胡杨枝，很大一部分胡杨枝用来做围墙，但其大小与前面发现的胡杨树干不同。我想起，屋内排放整齐的芦苇秆和树枝与用来扎围墙的芦苇秆和树枝的长、宽、高完全一致。于是，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些奇怪的“小土堆”不过是堆积起来的尺寸一样的芦苇秆和树枝而已，以备城墙损坏时修补之用。一旦城墙出现缺口，便可能使用储备的材料修好，而不必再跑很远的路程去寻找。这使我想起了火车站堆砌整齐的枕木。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芦苇秆之类的东西当中又几乎没有夹杂其他材料，却保存至今天，敦煌沙漠

的气候等自然条件对古物的保护作用从中可见一斑。基于上述推理，古代士兵修补城墙时，会用完一堆芦苇秆和胡杨木再用另一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烽火台下的芦苇秆堆的高度不同，从1~7英尺不等。

接下来，还有待于解释芦苇堆里缘何留有燃烧的痕迹。当然，人们很易猜想到是敌人故意纵火，或者类似的原因。但直到看见沙畹先生有关烽火的解释后，我才算找到了更为合理可信的答案。古时，士兵常在烽火台塔顶点燃烽火，但遇到事情紧急，或夜里烟雾弥漫，能见度低，点燃一堆芦苇秆等之类的东西则显得更为简单易行。燃烧留下的遗物总是处在梅花形最安全、不易引起别的芦苇堆燃烧的地方，这为上面的推理提供了论据。




# 第六十章

## 玉门关的发现

我不想一天天地描述整整一个月来我在这古老的城墙上所忙的事情。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烽火台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考古学上的破坏，因为它们大多都已被修葺一新。即使是在我沿着荒漠和沼泽之间的古长城走一走的地方，也观察到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们记录着这些地方自开始划定疆线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如果曾经历过变迁的话)。如果地理学研究者们想考究汉朝时盛行于此的风貌的话，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随着经历一天天地增加，不久我便对研究如何解读昔时水位的印迹、当时植被的多少和特征以及风向等问题有了兴趣。

这古老的长城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但激起了考古学家们的兴趣，同时它也激起了地理学家们的兴趣。最后考察的这百余里边境，一片荒凉，但体现出来与众不同的特征，我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并且，在这荒凉的地区考究年代久远的古迹时，所发生的许许多多令人惊讶的小事和事故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限于篇幅，我在此不能一一将它们（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为了让大家对我所做的工作及其结果有一定的了解，我在此只能简短扼要地描述一下一些最为重要的发现。

为了更接近帮助我的工作人员，同时也为了方便获取我在敦煌征订的新的给养，我在4月17日将营地搬到了一个很小、却保存得很好的城堡附近。城堡位于我原先在湖边的营地东约12英里之处，此前我曾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城堡扼守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站在这一城堡上可以轻而易举地监控很多烽火台。但这个城堡并不是建在城墙上，也没有什么准确的证据能够表明它建于何时，为何而建。沿西北方向，有一条宽阔、布满沼泽的奴拉合，河里有许多泉流，我们就是在这取的水。哇！它还是蚊子和其他昆虫繁殖的“宝地”。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这里的天空将会有更加美丽的云彩，使我们的夜晚更加趣味盎然。

自我扎营此地以来，第一个使我非常高兴的重要发现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烽火台，这个烽火台守护着西边4英里的一段城墙。这里有很多用汉字书写的木简，其中两个还准确地记载着“耶稣诞生年”和“公元20年”这两个年份。这些汉文木简是我刚要离开此地、欲往东边搜寻时，从这个烽火台旁边的一些房间的瓦砾堆中挖掘出来的。像往常一样，我把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留在了后面，独自一人去探察最后一处遗迹。这一天通过探察我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废墟和遗迹。但是，最令我满意的还是当天晚上我们都回到营地时，我的助手们所带回来的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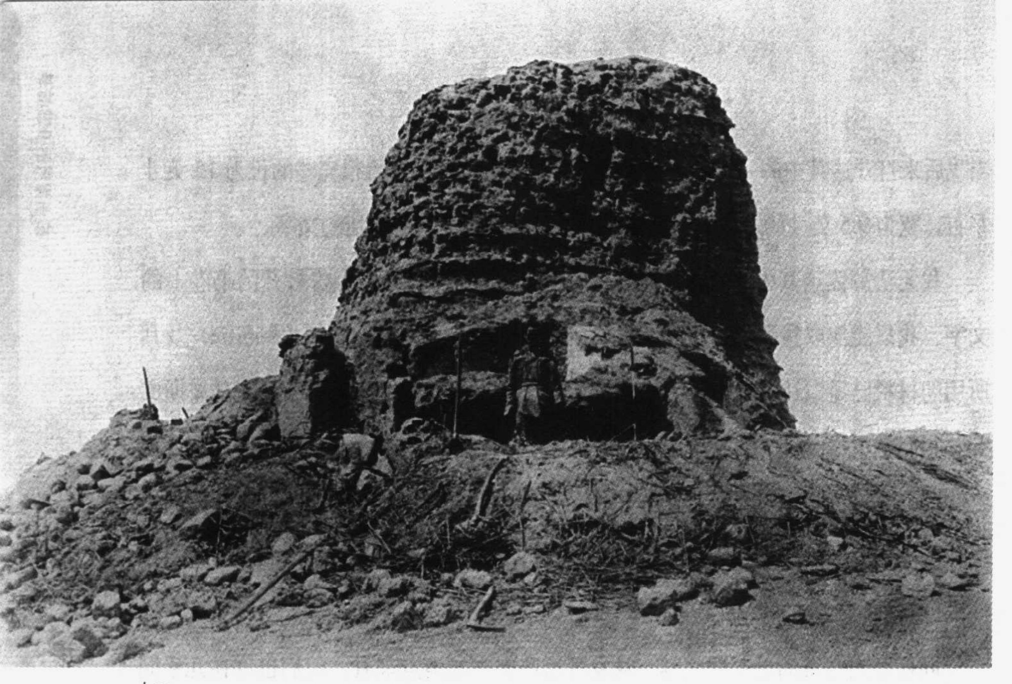
在一条长而窄不足2英尺宽的甬道上，有一个很大的烽火台基地和一段毁坏的城墙，以前负责瞭望的士兵就宿营于此。另外，甬道上还有厚厚的一层垃圾，其中大多都是马厩的垃圾。从这垃圾堆中，我发现了一卷卷的书卷，里面明显是一些西方的文字。这其中有些书卷裹以丝带，其他一些则只是用一般的小绳子加以捆绑，正因为这样，尽管这些书卷都被折叠和捆绑了起来，但仍很容易辨认出来。当然，没有一卷书卷是打开的，但第一眼看到这些书卷表面一些还算可以辨认的文字时，我就感觉这跟我原先在罗布淖尔所发现的一些古阿拉米（Aramaic）文字相似，至今还没有人把它们解读。这些书卷的纸张都特别的薄，因此也特别容易受损。然而，

当我后来打开这其中的一卷时，映入我眼帘的竟是一卷保存得很完整的长为15英寸左右、宽为9.5英寸的木简，上面是用黑色的粗字体书写的整洁的文字。

我无法解读这其中的意思，因此对于此书卷和其他10卷未曾打开的书卷上的文字，我只能加以猜测了。然而，出现在中国边界上的闪米特文字（Semitic）及其所用的材料已足以让我思索好一阵子的了。这些文书上的文字是否有可能是波斯文呢？它们是不是古时中国与药杀水（Jaxartes）和阿姆河（Oxus）地区开辟直接通商之路时，远涉万里欲购买“赛里丝”的丝绸的粟特（Sogdiana）商人，或者更西边一些国家的商人们留下来的呢？这些商人又是如何找到路，来到这远离罗布淖尔路线的偏僻的烽火台的呢？

同样令人好奇的是年代之谜。从发现这些文书的地点来看，他们也许在几乎同一时期找到了通往这一废墟的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跟中国木简所记载的差不多。还有，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这12卷多的文书当中，有2卷标有准确的日期，分别是公元1年和公元20年。在余下的文书中，根据某个军队编制的番号便可以推测出其朝代。有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些文书中有几卷是属于篡权者王莽专政时期（公元9—23年）。

这些文书所记载的一些早期的阿拉姆文字资料，也正好和这个推断相吻合。但是，据一些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第一次发现纸是在公元102年，那么又如何解释书写这些文书所用的材料呢？我想，或许我们能够从沙畹先生在一些早期的中国的文献中所揭示的有关“丝纸”（silk paper）的参考资料中得出答案。早在以破衣服和树皮为原料造真纸之前，“丝纸”便开始使用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似乎是为了以一种让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显示这些文书对使用丝织品作为早先书写材料所做的一些记载，这个废墟堆中才有一小条乳白色的绸缎，上面写着断断续续的佉卢文。看起来好像分别是东方、西方和南方的3个文明古国说好了一样，他们一起在



⑰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以及与之相连的营房和梯子

这荒凉之地的偏僻烽火台上留下他们的书卷，而通过这些书卷，便可以看出他们最早使用的书写材料。

我回到欧洲后，一些与我做同样研究的博学之士所做的研究证实了我的推测。研究造纸史的植物生理学权威魏斯纳（J. von Wiesner）教授通过对纸进行细微的分析，从而证明了这些文书所用的材料反映了至今我们所知的用破衣服造纸的最早历史。我的一位非常博学的朋友科伍雷（A. Cowley）博士将这其中的一份文书出版，年轻博学的伊朗学者高提欧特（M. R. Gauthiot）随后对之进行分析之后，我对此甚感愉悦。这些都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文字实际上都源于阿拉姆语，这些语言是古代粟特（现在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区）人所说的波斯方言的一种早期形式。无疑，这些文书现在可视为文学研究作品，在进一步进行研究之后，完全解读这些文书是可能的，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M. Aurel Stein

在描述我第一次穿越这条路线的情形的同时，我也曾对营地附近的这个古堡进行过简短的描述。沾满泥土的厚厚的城墙使古堡看起来非常的雄伟壮观，但当我试图在堡内和城墙上找寻一些能够表明其确切年代的证据时，却一无所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里面甚至连一点废物和垃圾都没有。当途经这里的人在躲避刺骨寒风的时候，他们将是何等的高兴。我的助手们避开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它会招来一大群蜇人疼得要命的小虫子，中国人把这些人见人怕的虫子戏称为“曹丕”（Tsao-p'i)。事实上，即使是在露天的地方，我们也无法避开这些虫子的攻击，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烦恼。在通往罗布淖尔的大路上，占据着这么一个便利的地方，却没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古时曾有人居住于此，这让我感到很迷惑。一俟我在更远的地方的勘察工作完成以后，我再着手对这个地方进行系统的考察。

不久，我便在古堡以北不足100码的一座小山丘的脚下发现了一些灰黑色陶器碎片，质地坚硬，在其他一些烽火台也发现过此类的碎片。当蒋师爷和奈克勘探西边最近的一个烽火台时，我把我最勤奋的一位助手留在身边，跟我一起去做勘探工作。当我让他在山坡的不同地方进行发掘勘探时，他发现石砾堆下面覆盖着一层层的稻草和其他一些马厩的废料。其时，我正在西边坡顶附近做第一次试验性探察工作，而他则用铁锹挖掘山丘上的硬土。

结果，我们发现这是一条小隧道的隧道口，这条隧道一直通向山丘，约有两英尺半宽和两英尺半高，里面积满了沙丘和垃圾。我没有弄清这个隧道是干什么用的时候，24个身材瘦削的中国人便发现了一些上面没有任何文字的书写材料、编席、骨头和一些垃圾。接着，在清理隧道的时候，我的铁锹不见了。在我的助手又往前挖了10英尺左右后，他说他发现了一个房间，里面全是沙子。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好勘探的了，只好等其他人回来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在山坡上的发现显然激起

了我这位助手的兴奋之情，他很快又开始到别的地方勘探去了。他勘探的地方离隧道并不远，在沿山坡向下挖的时候，他发掘出一个嵌于一块软石中的平台。另外，他还发现了许多保存得很好的文书。当然，我把这些消息告知了蒋师爷。他勘探完2英里之外的烽火台回来后，便急切地开始对此前的一些发现作详细的勘察。

有小木片上写着一些字体很小却很清楚的文字。当得知从平台上发掘出来的一些木简（记有年代）是属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5年这一时期时，我感到非常的欣喜。在这奇异的隧道中，所发现的所有载有日期的简牍都是耶稣诞生后的20年，这正好是篡权者王莽统治时期。其中，有两套木简好像是下级官员写给他们的上级官员的。我们推测，我们所在这段长城原先应该是一个总指挥所的分部。当确定了这其中至少有一卷简牍肯定是来自位于敦煌的指挥总部，而其他一些简牍则是给镇守玉门关的将军所下的命令或是所呈递给他的一些报告时，终于可以确定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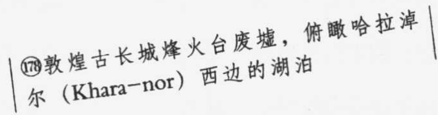
此前，我一直在猜测这个古老的边防哨所在汉朝时应该位于我们正在勘察的路线的某一点上。但它准确的地点在哪呢？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迁过呢？现在想要得出什么确切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但眼前的这些简牍使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方给扼守通往西边这条古路的主要哨岗提供了多么有利的条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怀疑位于此地的这个已被毁坏的城堡的古老年代及其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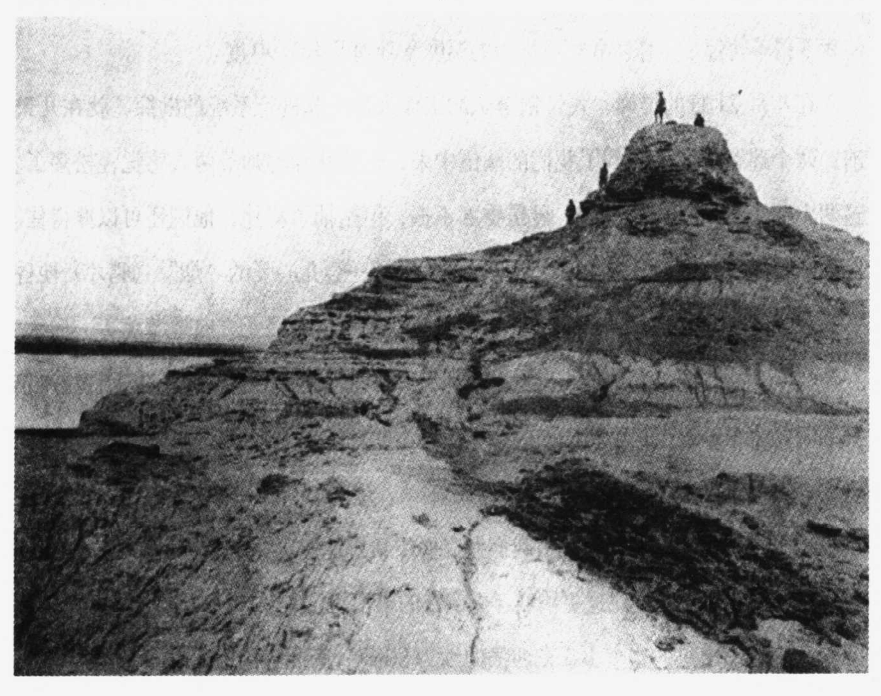
前有城墙和烽火台予以保护，西北和东南边又有难以逾越的沼泽作为屏障，它的位置非常的优越和有利，既可把这段长城各个岗哨连接在一起，又可充当控制这条大路交通的枢纽。直到前天，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堡正位于从南湖向正南延伸的一段辅助城墙之上。尽管它已遭严重毁坏，但在萨依上仍可辨认出来。这段辅助城墙明确地显示出了同样的建筑样式——砾石层和柴笼层相互隔开，但只有在将近5英尺处以下地方的城墙才砌得比较厚。明眼人一眼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后来才

补建的一段城墙，因为如果没有主城墙挡住，从北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越过去。

然而，这一段横向的城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原先以为这是一段内城墙，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监察之用，这样边防守兵能够阻止未经许可的外国人进入中国的边界。但是，随后证据越来越多，我们从中了解到非常重要的年代史实。在这段横向的城墙东边发现的一些简牍表明，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这些烽火台里一直住着人。在城墙西边发现的文字也表明它早已不是王莽统治时期了。还有，一些载有更早的日期、更远一些地方的哨岗也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便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后的前几十年，也就是王莽统治


⑰⑧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俯瞰哈拉淖尔（Khara-nor）西边的湖泊



时期或此后不久的动荡年代，西边的边防线曾向内收缩，放弃了外部的一段城墙，这无疑表明当时的粮草供应有困难，特别是远在这荒凉之地。同时，边防守卫线的后撤，完全反映了中国当时政策的变化。当时，中华帝国已无心向西扩张，直到公元1世纪的最后25年仍主要重于防守。我认为，正是为了弥补原先长城西端的防守被撤掉以后所留下的防守漏洞，在王莽统治时期或此后不久才修建了这段横向的城墙。

不管怎样，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作为这条古商旅之路通过城墙的唯一通道，这个烽火台当时必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基于上述已说明的原因以及一些为其作补充的证据（恕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说明），我相信东汉时期（公元一二世纪）的玉门肯定是位于这个地方。因而，我迫不及待地要对这个不显眼的山丘上的遗迹进行彻底仔细的勘察。但这天天气出奇的热，下午一阵刮自东北方向的狂风又使我不得不暂停了工作。我帐篷里面的温度竟升到了华氏90度。

在4月21日的早晨，我带领全队的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在几天前，两个迷路的劳工回到了我们的队伍中来，这使我和蒋师爷两人感觉轻松多了。这两个劳工是从东边过来的，显得委靡不振，但是抽了鸦片，他们还可以撑得住。在蒋师爷问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之后，他们抽了一会儿心爱的“烟”（鸦片）便昏昏睡过去了。醒来之后，他们迷失了路，只能在荒漠中漫无方向地游荡着。后来，在没有水喝的情况下游荡了两天之后，他们终于循着牧民（我们第一次来哈拉淖尔湖的时候也正好碰上这些牧民）的篝火所冒出的烟找到了路。再过几个月、甚至是现在，如果没有鸦片来延续着他们的生命的话，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肯定会一命呜呼。所以，当牧民们以为他们俩是被我们抛弃而重新要他们跟我们一块工作时，对于这两个劳工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更倒霉的事了。

我们必须通过的这个山丘东西横向约为80码，南北纵向也差不多是这个宽度。

⑰⑨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小丘，以及标志着古代玉门关的遗迹

我们在碎石遍布的山坡上不知该去哪里搜寻废弃的东西和古时的遗迹。因此，为了不错过这个地方的任何一件重要的东西，我们沿山坡往下挖，直到天然的硬土石挖了两道对称的土沟。在这里，我的队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尽管一开始时林大人的助手曹大老爷及时带了12个劳工和一个月的给养从敦煌赶过来帮忙，还是整整花了3天的时间才终于完成了工作。后来，我们发现了大量出乎意料之外的新东西。

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西北山坡上的狭窄的隧道里发现的。就在这隧道里，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一批王莽统治时期的木简。正如我原先猜测的一样，这条隧道不是充当某个地下室的通风口。事实上，它是进入一口井的唯一通道。这口井有5~6英尺宽，我们下井探察了一番，但只下到12英尺多一点便停了下来，没有到达井底。这口井的井盖是用一些木条加一些泥土做成的。井盖掉了下来，但好在没有人

受到什么伤害。我们把沙子扒掉以后，发现了很多木简。天哪！几乎全在这里！因地方潮湿，很多木简已遭到严重的损坏，但有一些还可以认得出是属于公元后的前几十年这一段时期。由此，我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后不久，一些废弃的东西便被扔进了这口奇异的古井。对于这口井原来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开始不太清楚。后来，蒋师爷和一些回族人肯定地说它原来一定被用作地牢。现在中国的新疆依然采用这种方法，原来把这种井作为囚禁犯人的地牢是为了囚禁和关押那些极度危险的囚犯。

基于这一点，我确定直到俄国征服前，中亚的哈纳特（Khanat）也一直在使用这样的方法处理囚犯。井顶旁边一个窄小的开缝无疑就是一个通气孔。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象这个地牢可能发生的种种恐怖情景。根据沙畹所做的阐释，这里所发掘出的其中一个简牍里面就有一个命令，命令将被打致死的人埋掉，这更使人回想起当时这种处置犯人的方法。足够令人诧异的是，古时施刑通常所用的棍棒居然正好出现在这个山丘上，而且还保存得很好。

在山顶上所有的建筑物当中，我们所发现的不是别的，而是最为罕见的地基。暴露在山坡不同地方的古遗迹堆中有大量的木简。在山坡中心附近的一个遗迹堆里，我们发现了60卷木简。因为几乎所有载有日期的木简都是属于公元前96—公元前94年这一时期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长城建成之时就有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和驻扎。

当时，玉门关的守城将军所书写的几根木简证明了这一烽火台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之地。其他一些文书也有不同的历史价值，比如，其中有一卷文书就说到87个人护送钦差大臣到莎车（So-ch’e），或莎车（Yarkand）的事情，另外有一个木简说到乌孙（Wu-sun）大部落的酋长派使节出使朝廷的事情。这个乌孙部落在中亚早期历史上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居住于现在的费尔干纳山上。对于这些木简的内容，我在整理沙畹解读的结果时将会有所说明。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使我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从地形学的角度来说，它

M. Aurel Stein

解释了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大量的碎纸片，上面都书写着优雅的汉文字。这是我们在山丘西边一个约10英尺宽的地窖底发现的（我稍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是个地窖）。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我认定这些纸片上面的文字资料是佛教经文的汉译文，其中有一张纸片上写的是佛像的献词。根据当时已使用纸张以及书写的风格这两点来判断，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某个寺庙遗留下来的，而且直到唐代，这个寺庙一直在这个久已被废弃的地方保存了下来。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一些用丝和绸缎做成的小旗似的还愿物，这跟我第一次来勘探时在一些古废墟所发现的差不多。

第二天早上，这个推测便得到了充分有力的证实，因为我们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个小木碗，里面有80枚铜币。其中除了2枚年代较久远之外，其他的都是公元713—742王朝统治时期发行的，没有因流通使用而发生多大的耗损，因而可以把纸片上的佛教经文定为是公元8世纪的(当时通往罗布淖尔路线已经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什么错误的。经沙畹证实，这其中一张纸片上的佛教经文据说是唐玄奘在公元645—664年间亲手翻译的。要想纪念唐玄奘这位虔诚至极的取经者，这是一件非常合适的礼物。现在我非常地肯定，玄奘在取经回东土的途中，一定曾经过这瓦砾遍地的山丘．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还会有人在这已被废弃了长达几百年的地方祭拜呢？我们马上便可以找到合适的解释。基于上文已述的理由，我得出了结论——在公元之后的前200年的时间里，这个要塞和砾石遍布的山丘就是玉门所处之地，由于匈奴人西迁，危险得以解除，又加上后来几百年中国失去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敦煌以西的整段长城已废弃不用，变为荒野。但我们从法显的旅游记中可以了解到，偶尔也有一些商队仍然走这条已被废弃的路。另外，当然也有一些牧民和猎人仍旧到疏勒河尽头的湖泊和沼泽地一带的牧场去。

本地人宗教信仰非常虔诚，这也解释了上面那个问题。那些从长城的玉门出发踏上艰难的沙漠之旅的人们，都有在这边境上奉上还愿物祈求平安归来的传统，而且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朝拜。现在嘉峪关（相当于当时的玉门关）的人们出门之前也都这样做。除了我们所勘探的山丘以西100多码远的废墟上的一个很小的现代的寺庙之外，我多么希望还能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一直延续至今的传统啊！做工粗糙的泥像都已被毁（有可能是野蛮的东干人所为），屋顶早已塌掉，所有的木工艺品也已踪影全无，不知在何处。但还有些证据表明，有些牧民仍然在此祭拜。我雇来的劳工都很迷信，他们都不敢走近来挖这个破寺庙。我对此也不作责怪，因为在此发掘出有意义的古遗迹的可能性看来已不大，而且不断有人在祭拜这件事本身就是考古学上一项非常珍贵的资产。

# 第六十一章

## 古长城最大的仓库

在此，我无法停下来去描述此地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古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曾被玉门关所占据的这个山丘上花费很大力气、挖掘古物时的遗迹发现的。这当中有做工很好的麻鞋，和一些用坚固耐磨的材料做成的鞋子，还有一些破碎了的瓷漆碗，碗面上的花纹有黑色的也有红色的，花纹设计和装饰都非常独特新颖。尽管所发现的这些东西本身价值并不高，但它们却能使我想象起当时这个重要的边防岗哨所经历的生活。我们继续挖掘，并在这个地方开始进行勘探。后来，我们在离长城主城墙不远的一个地方及其北边两英里半的一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一层一层的古代遗迹所留下的东西。在4月24日的早晨，我将营地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一眼看过去，这个地方似乎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不是提拉巴依眼尖，注意到光秃的高原边有一小块突起的地方的话，我可能早已把它给忽略过去了。这座小山布满了砾石，只有两三英尺高，宽度不足40英尺。后来，发现山上有一些砖房的瓦砾，这些东西已受到严重损坏，而且稀散零落，因此很难辨认出其原来的真面目。我们在瓦砾堆中发现的18片木简，日期分属公元65—137年不等，这表明这个地方到了相对较晚的时候才有人居住。如果这处遗迹继续从南向北延伸，那么它

正好位于上述辅助城墙和主城墙相接的拐角之处。

早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一定就曾经是重要的岗哨。在后来不久，这点我在布满石砾的山坡上和在更远的几个山上做勘探时发现了很多废弃物之后便得到了证实。由于在后者（较远的几座山上）所发现的一些木简，都是属于公元前61年以前，所以这些废弃物不太可能是从很早以前曾存在但现在已消失的建筑物里扔出来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废物堆中居然有如此多的汉文简牍，这使我一开始就深信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个重要的岗哨，有可能还是某个部将驻扎地所在。沙畹对在这个岗哨所发现的总共160多片简牍进行分析和翻译后，这一推测完全得到了证实。另外，还有许多特别有趣的简牍，我在这里也忍不住至少要提及其中的几片。

从文献学家的角度来看，最有价值的当然是约为14英寸长的、书写优美、保存完好的三角形纸片。这纸片上写有《急就章》（Chi-chiu-chang）的第一章。《急就章》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辞典编纂著作，经常成为许多学术评论的对象。众所周知，它是在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这一段时间里完成编纂的，而我所发现的这块纸片则书写于此后的一二百年，所以，即使不是汉学家，也很容易理解它在传统文献的历史中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在传送给“碑铭学会”(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的一份初步通告中，沙畹称这纸簿是中国文献中最早的一份真迹。中国一直以来有许多学生都在使用这一编著。不单是在这里，在古长城其他一些哨岗发现的该著作的一些片断也表明，即使是在被流放于这个荒凉边陲之地的士兵中间，也有着勤勉的习惯和传统。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11片书写得很整洁的竹简。尽管凌乱散落，但同样的样本和书写字样使人明显可以看出，这原来是一种医学札记。其中一些竹简上面记录了一些病例，和一些对特殊病人的特殊疗法。其他的竹简则记录了一些对人和动物的通用疗法，并且大部分都特别提到提出该疗法的大夫。比方说，我可以提到安

国大夫（An-kuo）所留下的关于他第20次诊断“安乾辉”（Mr. An Tien-hui）的疑难之症的札记：安乾辉曾患有内伤，后又被冻得发僵，最后从他的车子里摔了出来，在进行了40天的治疗之后，他仍然感觉胸部和四肢发痛。

在这许许多多的简牍中，大部分都是一些报告、命令以及各种各样关于古长城军事管理的备忘录。在这里，我也只能提到这么多了。在一份下发给玉门关各个岗哨的通函中，守关的部将说有些士兵缺勤检阅，并对此深以为憾，而且提出警告，要对这样的缺勤事件进行惩罚。这里具体地来说，“I-tsou Company”似乎正好在这些简牍所记载的时期负责这个岗哨的守卫。我们在别的地方还得知，当时通过打信号来有效地传达命令、在各个岗哨的士兵中分配职责等等都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还发现了一小块织工很细的乳白色丝绸缎子，上面有一行用墨水书写的汉文字。后来经过沙畹的解读，我们才意识到这竟然是考古学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且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些汉字注明了一匹绸缎的长度、重量和价格（这一小块缎子是从一匹完整的绸缎边撕落下来的）。制造这些丝绸的地方是山东（Shan-tung）一个名字叫兖城（Yan-cheng）的，根据这个名字，可以把制造这些丝绸的日期定为公元100年左右或是公元2世纪的早期。但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关于这一小块丝绸缎子的长度（折合2英尺2英寸）的说明。我们知道，中国的尺采用的是十进制的分法，即1尺等于10寸。但是，中国的“尺”在不同的朝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用在烽火台发现的鞋匠用的量尺测量了一下这一小块缎子，根据汉朝时的标准尺度，它原本的宽度正好折合2英尺2英寸。

接着，我又用英国古老的方法分别测量了我分别在罗布淖尔和米兰废墟发现的两段丝绸。测量的结果与那些丝织品原来记录的尺寸基本吻合，它们可是有1700年的历史，肯定免不了要有所收缩。另一方面，如果是用在罗布淖尔这个地方发掘出的量尺（明显可以看出它属于公元3~4世纪的秦朝时期）来测量的话，所有这些

绸缎子都大概折合为1英尺9英寸左右。这样，以在3个遥远的地方所发现的古时遗留下来的真绸缎为证，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在公元前后几百年的这--段时间，中国出口到中亚国家并转售到古代西方的丝绸都有一个统一的宽度（大约相当于英国测量制的1英尺10英寸），但是中国的度量标准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在哨岗的废物堆中，我所发现的具有考古价值的丝绸缎子并不只是这一小块缎子。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做成的信封。信封里面一定曾装着用丝绸书写的一封书信。沙畹解读出了信上所写的地址。另一方面，同样有兴趣的是另一小块丝绸，上面有一行长长的有关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和贵霜（Kushana）列位皇帝统治的印度婆罗谜文字（Brahmi），但现在还没有将这文书解读出来，因此我们无法推测这个真正的印度文书向东边传的这么远，以至到了长城。在这里，我可以简短地提一下一片简牍，在它上面有一些汉文字，汉文字旁边还有一些不认识的文字。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地了解到有可能是各国的或说各种语言的商旅经古丝绸之路而带到长城来的。

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废弃的衣服、破废的器皿和破旧的靴子等古物。自被废置于此地以来在这个废墟保存了下来，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和变化。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在这里只能特地提到一件，也就是一个很小但捆得很紧的包裹。包里有一些折断了的羽毛箭，带刺的铜箭头则用一个更小的包裹包住，跟羽毛箭一起放在这个捆紧的包裹里。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有个制度规定：破损的羽箭必须收回储存，直到铸造出新的羽箭。现在，为了制止贪污公物行为，这一制度在军事部门仍然很受欢迎。

在4月25日，终于完成了在这个哨所长时间的勘探工作。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在炎炎烈日下劳累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可以在夜晚好好地欣赏一下壮观夜景，雪白的大地连绵不断，向南延伸。跟北边砾石遍地、盐地沼泽遍布、山峰秃

平、荒凉萧瑟的情景相比，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营地搬迁到了往东5英里左右的一个大废墟。以前，在去敦煌的路上，第一次经过此地时，它那宫殿般的外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做了很多勘察工作，发现这座巨大的建筑正好位于古长城和古丝绸之路上，它的南边紧靠着一个位于高原边的、已遭严重破损的烽火台，北边则是一大片大约4英里长、2英里宽的小湖泊和难以逾越的沼泽地。另外，还有一堵墙作防守，但实际上毫无必要。尽管我对古长城的总规划和具体的安排很了解，我对这座壮观的废墟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勘察，但是我找不到有关它的特征和用途的任何线索。

这座建筑的围墙长达550多英尺，非常壮观宏伟，因此乍一看就以为是个兵营或衙门。但是，根据它的体积和规模，这一想法就可以被否定。它主要由3个大厅构成，每个大厅都是139英尺长、48.5英尺宽。这3个大厅纵长相接，面向正南方。3个大厅的墙壁有5英尺半厚，是用大约3英寸厚的一块块坚固的泥砖搭建起来的，并且这些墙壁都是搭在用坚固泥土做成的台基之上。台基和外围墙面断开大约10英尺左右，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地基。由于大厅的墙壁的地基比外围墙的地基要高出整整15英尺，并且大厅墙壁在受到一定的破损之后，在某些地方仍然高达25英尺甚至更高，因此整个建筑物就显得非常的高大。

围墙用土坯砌成，围墙的四面正好与房子的各面相对称，只是长度比例不等而已。北边的围墙距离地基不足15码，而南边的围墙则距地基约106码，中间正好留下一个宽敞的庭院可以通行。由于地基比较潮湿，因而很多处的围墙已经坍塌成堆，但在围墙的东西南北四个点（分别斜对着大厅的四个角落）至今耸立着几个高达20多英尺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建于围墙之内，可见建塔的目的不是防御，而是为了让放哨的士兵站得高，可以望得更远。

由于地基的腐损，大厅的南墙已倒塌了一大片。下雨的时候，雨水从这边排出，

使得地板和地基出现了很多深洞，这就使得很难确定3个大厅的大门口和楼梯原先在哪儿。如此宽阔的大厅肯定需要有很大的窗户，这样才能保证白天光线充足，但现今尚存的墙壁上却一个也没有。非常奇怪的是，北边和南边的墙壁上戳了几个3米高的三角形的破洞，而且是极不规则地分布在墙壁上。很清楚，在墙壁上戳这些洞，更多的是为了通风而不是照明。本来从室内的一些设备和布局上，或许可以找到某些线索，从而推断出整座建筑的目的和用途，但我没有发现任何遗留下来的东西。大厅墙底下8英寸高的狭窄台基也没有能够提供任何线索。

看来要解开这座建筑之谜，只能寄希望于进行挖掘工作了，或许能挖掘出一些木简或其他别的东西。于是，我便抓紧时间开始进行挖掘，但起初收获甚少。我们在地板尚存的大厅里进行发掘勘察，除了中间大厅北面的墙之外，我们没发现什么东西。在北面的墙底下，找到了一些木简的碎片。其中有些提到了一些士兵本人，这些士兵都来自于遥远的河南（Ho-nan）或别的地方。但这些木简的碎片上都没有载有日期，上面也没有有关这个废墟的任何线索。

接着，我又将北面保存完好的狭窄庭院整个勘察了一番。但勘探了好半天，也没发现任何遗迹堆，我对此开始感到非常的奇怪。到了最后，在挖掘西北角烽火台下面的地面时，我们终于发现了许多零落于草堆、灰烬堆中的木简和竹简。但相对来说，更多的是一些空白的竹简。所有这些竹简都刮损严重，它们明显就是所谓的“废纸”（用过之后，把原先上面的文字刮掉，以便第二次使用。）。这里发掘出来的简牍也因气候潮湿而遭受了更严重的破损，并且直到发掘出最后一片简牍，蒋师爷才得以辨认出确切的日期。由于这一日期正好是公元前52年，因此可以肯定，这一废墟可以回溯到长城建成以来的早些时候。

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无法弄清这座废墟的性质。蒋师爷像任何一位西方的古文字学家一样，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审慎地研读了这些简牍之后，我们才在最后

得以肯定其中的两片简牍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储存粮食的谷仓。在这些天的工作当中，我和蒋师爷以及奈克·拉姆·辛格都认为，这座巨形的建筑物一定是驻扎和防守这段城墙的守城士兵的给养储存仓库。这座建筑物的这些特点，加之狭小的通风口，大厅非常的宽敞却不适宜居住，选择将建筑物建在这样一个出入方便却比相邻地方高出一截的地点，还有建筑物等各种保护措施，不是为了防范敌人的进攻，主要是防范盗窃，所有这些都显而易见、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这座废墟原来就是某个部队的储给养的仓库。

但是，直到沙畹对一些还能辨认的简牍进行仔细详尽的分析之后，我们才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份专门负责这个仓库的3个官员所签署的关于仓库里的粮食的命令。还有一片更重要的简牍，上面写的是一份致谢辞，感谢从敦煌绿洲的某个生产粮食的地方运送过来一大批粮食，这显然大大解决了边境地区对粮食这一需求的大难题。此外，我们在别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份命令，这份命令要求购置20套特殊衣料做成的服装，以供兵营仓库储存备用。

在这样一个荒凉边境之地，建立一个如此先进的贮存基地可以提供莫大的优势和便利，这一点无论是镇守此地的官兵还是对外征战的官兵，无论是出访的使团还是过往此地的商旅，只要他们了解在此地移动大批人马的种种困难，他们就一定会熟知这其中的困难。当我从高原边的这条路线（在2000年以前，这是中国向西进行政治扩张和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干道）来看这座已成为废墟的仓库时，我不由得又回想起了古时任何商旅如果想进入白沙瓦，就必须经过这些巨大的建筑物和“代理仓库”的情景。在这条大路的最西北一角，印度和喀布尔相接并进，可以和中亚实现沟通。就在这条大道上，有一些军用仓库，如果需要的话，可为过往的商旅提供粮食供给，以便继续前行。

和古时中国移师罗布泊所通过的沙漠相比，即使是最贫瘠的地方也没有比它带

有更多的生气和生机。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巨大的仓库肯定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而守城士兵和管理人员无疑都驻扎在这个仓库的附近。由于风蚀和天气潮湿的缘故，很多这样不是很持久的建筑物的遗迹都已消失掉，但建在东边围墙旁边一个台基上的一座建筑例外。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垃圾堆，在这遗迹堆下面一间房屋，房屋的一个部分是就坚硬黏土地上而挖出的。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唯一一片简牍也是属于公元前52年的。

当我们扎营于这个废墟时，我感到很高兴的不单是考古学成果。在对西北边的两个古老的哨所进行勘探时，我从这座建筑高耸的、但相互隔开的地基顶部上注意到，再次出现的城墙右翼正好建在一个2英里长的湖泊上，并且有一条明渠从哈拉淖尔这边注入湖泊，在西边又再次分流而去。我在北边勘察了一会儿后发现，这原来是条河，大概有20码宽，在北边根本无法越过，水的流速约为每秒钟1码。同时，我自己在心里觉得，在东边的湖泊和上面已经提过的向这个仓库的北边延伸的沼泽地之间，肯定横亘着一块尖形突出的坚硬之地，就在这块地上有几个彼此独立的黏土阶地。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这条天然防守线上的漏洞。

很明显，这面墙一直向东延伸直到湖边的沼泽地，沼泽地面只比墙根底低了5英尺，这个地方很明显地仍定期地发生涨潮。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它和在墙壁与湖泊以及沼泽地相连的地方所观察的结果相吻合，并且证明了现在这个地方的水位和古代并无太大的差别。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出本地土壤和气候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两个岗哨之间以及延伸至湖岸的整个地方，覆盖着一大片野生胡杨树的茂密丛林，估计它该有2000年的历史了，因为这面墙壁不是用普通的芦苇柴笼，而是用胡杨的枝干一层一层地搭建起来的，这种材料在这里仍很多。

两个星期前，我曾派拉依·拉姆·辛格到城墙的最西端进行了长时间的勘探工作。

当两个星期之后的这个晚上，当他再次回到我身边时，我们才意识到观察湖泊外流的状况在地理上的重要意义。沿着西南边一条烽火台线及其前面的布满盐沼泽地和湖泊的一个盆地进行勘探之后，为了补充水源，他又回到了丝绸之路上一个我们称作托格拉克—布拉克的地方。希望能在那个地方找到有源泉的沼泽，就像我们第一次到敦煌一样。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发现了一条河向西流去，很深而且流得很快。他马上意识到，水量这么多，它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疏勒河的流水。就像第一次从罗布淖尔过来的时候，我所意识到的一样，疏勒河曾流到我们在抵达托格拉克—布拉克前一天所经过的干涸盆地。我曾特地要求他对干涸河床再次进行仔细勘察。在趟过了这条流淌于托格拉克—布拉克河床的河流之后，他接着顺流而下，最后发现它经一个小三角洲，流进我们在3月初发现的那个非常干涸的盆地的东南端。在那里，这条河流已经干涸。

到长城考察以来，我便亲自对这古老的河床进行了不止一次勘察。正如我想象的一样干涸，它位于北边的防线上，并向哈拉淖尔的西边延展。有那么一两次，我都越过了哈拉淖尔，继续向前走，到了一条尚未开冻的石冰川的脚底下，这条石冰川（glacis of gravel）缓缓地走向Kuruk-tagh。因为还有许多考古工作要做，我就不能继续向前走了。因此我只能暂时做出这样一个推断——干涸的河床一直延伸至哈拉淖尔，但中间是一片断断续续的洼地，有的已干涸，有的还是一片盐碱沼泽地。我们以前在有城墙的地方见过这样的情况，在没有城墙的地方也见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河床在历史上根本不可能直接跟哈拉淖尔相连。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哈拉淖尔西边真有一条河流出来，并且这条河肯定和哈拉淖尔相连。而且，拉依·拉姆·辛格也发现了一条流经托格拉克—布拉克河床的河流，这就使得有关令人迷惑的排水问题解决了。很明显，托格拉克—布拉克河是从哈拉淖尔流出来的，并且疏勒河也不是流到哈拉淖尔盆地就停止不流了，这跟到目前为止所推测的一样。不

过，现在还无法下结论，到底是托格拉克—布拉克和哈拉淖尔之间有很多小湖泊和沼泽地（我在哈拉淖尔西侧所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形），还是或许有一条水渠直接把疏勒河的水源从哈拉淖尔注入到托格拉克—布拉克？

4月29日早晨，我开始对二者的相连处进行跟踪勘探，上述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我们从位于这个大仓库的废墟附近的营地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沿长满芦苇的沼泽大盆地和咸水湖的边缘而行，直到我们突然间发现了一条狭而深的奴拉合河，它的水可能来自托格拉克布拉克的支流。奴拉合河是一条普通的河，约有25码多宽，流速有差不多1码/秒。在河流中间，河水深度达到6英尺多。尽管河水也可以饮用，但因为水流从河床边冲积过来大量的盐沉淀物，所以河水的味道特别的咸。循着疏勒河顺流而下，我终于完全理解我们之所以很难发现这条河，是因为这条河所流经之处都被看上去尚未开冻的石冰川覆盖住了，蛮有隐蔽性。此前，我们一定在另外一个地点（离这里约有0.25英里）碰到过这条河流，只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而已，并且在乘坐小船的时候，很快就划过去了。

就在这同一天，我又将营地搬回到了那个玉门关古城堡，以便对长城最西边的一部分进行勘察，而拉依·拉姆·辛格则被派到东边去勘察哈拉淖尔。接着，在4月30日这天，行走了28多英里的路程之后，我带着零乱不整的骆驼队和手下的人马，终于来到了一个城墙转向东南方的拐角处。在这砾石遍布、光秃秃的高原之上，刺眼的阳光和炙人的炎热让人感觉特别难受。晚上，当我们从高原下来回到向西望去一望无际、布满沼泽的大盆地边时，黑压压的一大群蚊子和其他别的虫类就围着我们，叮个不停。为了躲开这些烦人的虫子，同时也为了尽量离测量员所发现的泉水以及牧场近一点，我催促大家从这个盆地边动身，把营地搬到别的地方。走了差不多2英里的路，最后来到了一个长满树木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陡而宽的碎石台地，这样便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干燥的宿营地，而且空气很好。我们很快便认识到，就

像我们经常见到沙漠中的骆驼通常都是栖息独立的山脊或高原上一样，只有找到一个通风的高处，我们才能躲开那些令人厌烦的蚊虫的叮咬。

我认识到选择一个好的宿营地，可使我们远离更加严重的危险，从此以后，我们便很少在黑暗的地方扎营。劳工一边坐在地上抽着烟，一边等着拿他们的包裹。不一会儿，他们在丛林中燃起了篝火。他们不注意时，篝火蔓延了开来，把其他的东西给点着了。黑暗之中，突然刮起一阵强劲的北风，火势因而愈来愈猛，而且火借风势蔓延得出奇的快，终于把矮小的灌木丛和芦苇地也卷入了火海。在冬天叶子尽落的宽阔的丛林中，火苗到处乱窜，看起来非常的壮观。大火在我们三面熊熊燃烧，并且每在有大量胡杨的小丛林被燃着的地方都燃放起像爆竹一样的东西。坐在光秃的梯形般泥石的山坡上，我们毫不担忧地观看着这壮观的夜景。当我们从泉水带过来的第一批水源用完之时，哈桑阿訇便发现要把这些骆驼带回到原来的泉水处饮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那要经过一条非常迂回曲折的路。结果，大多数骆驼都是直到拂晓的时候才喝上了第一口水。

# 第六十二章

## 城墙的西段

5月1日早上，我出发去寻访附近的遗迹，并勘探这片新地。在这个过程中，有水中着火的奇怪现象，但我并不感到迷惑。在营地和3个烽火台之间主要是沼泽地，为了不被陷到泥淖里面，我们不得不迂回前行。虽然泥淖的边缘变得坚固一些，但我们仍然得在选择途径的时候非常仔细和谨慎。低地的风化状况是非常严重的，它与黑糊糊的红柳和被烤焦了的芦苇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看到这些沼泽植物，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与土壤环境下都生存了下来，却不料在准备迎接短暂的春天前被大火给吞噬了，我的心情也变得不太平静起来。

但是，对于这个地方古迹的兴趣很快让我忘却了刚才的郁闷。在仔细地考察过后，我现在已经能够下这么一个结论了，即这里就是古长城的最西端。通过历史上中国人不断使用的地形学原理实例，汉武帝的工匠们把城墙巧妙地建在紧靠湿地的位置。毫无疑问，这里原来是一个大的湖泊盆地，也就是一个大部分是无法穿越的泥淖的地区。这段城墙的建造者们让它向西顺着一条窄的高原地带，自然地一直延伸到最高点，而不是把墙建在托格拉克—布拉克的方向上。

有一座塔是用砖块搭建起来的，足足有23英尺高，耸立在高达120英尺的黏

土峭壁上。站在上面，就可以向西观测到很远的地方，北方的视野也非常开阔。对于这条前沿防线来说，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观测地点了。但是这堵城墙又向西延伸了大概一英里半，到达了从盆地边缘凸起的露台，这里的海拔要略低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高地。这个露台的顶部是用黏土建起来的一座枯朽不堪的塔，从那里可以俯瞰周围的低地。在这个地方，城墙急转南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土墩朝着我们的营地所在的位置绵延而去。在这么一段路上，土壤逐渐地变得湿润，这导致先前的一些地理特征迅速地彻底消失。显而易见，西部土地的湿润性质，其实已经代替了城墙所能发挥的防御外敌的功能。但是可以看得见的西南方向的烽火台，它们在高原上间隔出现，充分证明了那里的城墙的确是曾经存在的。

在与塔相连的残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中国木器和丝绸。在这里面，蒋师爷甚至把其中的一件认定为是公元前94年的文物。所以，我的思绪也被他带到了把这座城墙作为中国政治西扩的标志的遥远年代。当我站在上面观察这里可以监视的范围时，我就有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建造者没有满足于就在此结束城墙的建造？之后，我的注意力又被碎石地面上两条直线排列的土墩所吸引，它们朝向于西边的最后一座塔，看上去像城墙就在这里交叉，而且它们的位置就在长城拐角的内侧、靠近长城的最西端，这显示了这里曾有一个壕沟防护的营地存在。

奈克·拉姆·辛格在我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察觉了这些奇特土墩的存在。结果，在我行进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有很多盐碱风化现象，灌木和芦苇也是非常之多，所以难以一直沿着这条线路前进。但是，一列列的8~10尺高的小土墩，却能在我们到达之前就非常明显地被辨析出来，因为它的顶部都覆盖有许多枯树桩和枝叶。在攀爬一个向北的露台的过程中，我们又能够看见一段城墙，它形成一个长方形状，大概有500英尺长，宽则为长的一半左右。通过它在北部的一边，这个长方形的城墙似乎非常靠近连接西部2座烽火台的那条古长城。

这些壕沟防护营地的遗迹可能就位于从塔里木盆地延伸过来的古道、经过长城内侧城墙的那一点上吗？这难道不可能就是原先的玉门关的位置吗？在这个高地的底部，原先是存在一些庇护处的，而且在那里开掘泉水也并不困难。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大的兵站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样，它们的存在也为城墙延伸到一座烽火台之外，以及建造第三座塔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理由。这里所说的第三座塔位于东南方向约 1.5 英里之外，可以俯瞰附近的大片地区。由于城墙完全风化消损，相关建筑遗迹也都消失了，我只能通过附近充足的地下水来做出判断。实际上，8 个月之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依据，就是来自巴格拉什（Baghrash）湖的地下咸水对地上建筑的消损有直接作用。

在 5 月 2 日，对于这些塔的开凿和发掘继续在蒋师爷和奈克的领导下进行着，我则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朝着西北方向做了一整天的勘测。这些勘测提供了这样一个确凿的证据，就是尽管在这个方向没有城墙，但是我在 3 月份去托格拉克—布拉克河的路上所遇见的烽火台和长城是同一个时期建造的。很明显，建造这些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些烽火台服务的，通过这些烽火台，一些信号就可以提前送达到守卫城墙的据点那里。它们的位置也可以证明，那条现在已完全干涸的老河床，那时候还可以从疏勒河得到水源，也曾经是一个洪水常常泛滥的地区。现在，那条河就仅限于在托格拉克—布拉克周围，但水还比较深，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水比较浅可以徒步通过的地方的话，就不得不走相当一段距离。它的宽度大概是 40 码多，深度有近 3 英尺，流速达到约 2 码/秒。

之后的几天，我们都是在勘测从沼泽盆地出发的那一系列通向西南方向的烽火台。它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4~6英里，这就充分显示了这些烽火台的功能主要是来传递信号，而不是来防御外敌的入侵。这条城墙所想达到的目的，其实根据这个大湿地的天然属性，已经被完全地实现了。如果不是这里的地形为信号传递站的建设

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各个哨所的距离不会这么遥远，那么建设所需的开销会更多，随之而来也会引起其他的麻烦。

这个标志着缓冲地区边缘的光秃秃的高地，也延伸出了一系列的如手指状的黏土山脊。它们就像海岸线一般，伸进了那片巨大的湿地。这些山脊突兀地上升到120~200英尺的高度，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些山脊为建造观测塔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而中国的工匠也把这些条件使用得淋漓尽致。站在这些烽火台上，我们总是可以看到非常远的地方。非常让人惊奇的是，在向西南勘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是非常用心和仔细，相邻两个观测塔的直线距离超过了24英里，但它们几乎排列成一条直线，似乎他们有精确的光学勘测设备一般。如果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就需要一张大比例的地图。

除了这些早先军事工程技术之外，这个被遗忘地区的地理特征也能够让我们兴趣盎然。在从一个塔向下一个塔跋涉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干涸了的古代湖泊盆地的湖岸行进。在穿过这个原先湖泊的海湾和小港的时候，我发现它们都被茂密的胡杨小树林和芦苇地所覆盖，此外，还有非常多轮廓粗糙的山脊，我同时注意到这些山脊的走向全部都是从东南朝向西北的。在比较宽阔的河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这些山脊平行的黏土阶地。在其他的地方，这些山脊也都是由类似的阶地构成的，走向也相同，一直延伸到沼泽盆地。

这些河湾和其间的山脊走向非常清楚，这都是由于原先流水的方向所形成的。这些流水都是从远处的大山上流淌下来的，然后穿过沙砾的缓冲地带，而这些缓冲地带现在都变得非常干旱。在一个高约200英尺的山脊顶上，建有一个烽火台，站在这里，我还偶然发现了一个干涸的河床，于是这个地区变干旱的推论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这条河床源自于东南方向，那里展示的清晰地理特征明白无误地证明在一个比较近期的年代里，这个地区曾经被不时发生的洪水所冲刷。河岸十分陡峭，

骆驼在穿行时都显得非常费力。在其他地方，在考察者自己探询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干枯的沟壑和峡谷，它们是被冲进缓冲地带的洪水形成的。我们在湿地中发现的泉水也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同时，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在形成这些神奇的地貌特征的过程中，另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它就是风蚀作用。我一次次发现，这些狭长和连续的山脊表层，不断地被主要来自东北方向的大风逐渐剥落和侵蚀。来自这个方向的风，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主要就是冬天刮的狂风。这些山脊都是面朝着这些狂风的，所以被逐渐地风化为小山丘。但当我观察这些烽火台时，在这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所受到的侵蚀作用却相对要小得多。从这里，我可以判断出，如果要把坚硬的黏土风化为这样的山丘，并最终变成一个平原，这所需要的时间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的面前，呈现的是这样一些地理状况，它们证明了水和风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分离的黏土阶地这个奇特现象。在古罗布淖尔湖床的东北端，在疏勒河的湖泊盆地末梢，以及在哈拉淖尔的周围，我们在前面就曾经遇到这样的阶地。在以上所阐述的证据的支持下，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风蚀在形成这一地区地表特征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显著作用了，它对于人造建筑物的侵蚀作用也一样的明显。在对古长城一次次的考察中，我发现和风向平行的建筑受到的损坏就相对轻一些，而那些面朝风向的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风化侵蚀。

这些情况使得我坚信，如今从这些沙漠地区吹过的狂风也主要是从东部及东北部刮过来的。我和蒋师爷一次次地寻思，吹过疏勒河这么猛烈的风一定是从蒙古戈壁吹来的。蒋师爷对我说，在新疆地区来回跋涉的汉族人都对于这种“安西风”（An-his）非常的害怕。那里整个地区看来就是北风之神的老家。古长城在不同的地段所受到的侵蚀不同，完全证实了上面提出的观点，这里的主要证据就是古河床、

参差不齐的山脊和割断开来的山丘。

这个观点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即使在更加遥远的塔里木盆地，同样的风也能产生显著的效应。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罗布淖尔附近仔细观察过当地的气候状况和地表特征。我认为，要过很多年，才能在那个令人愉快和有吸引力的敦煌地区建起气象站，来提供精确数据。但即使没有这样的数据，我也要大胆推测一次，也就是这些狂风是由“吸入作用”（aspiration）形成的。具体说，就是较低海拔的沙漠和罗布泊以西地区温度相对高，它和疏勒河以北的高原地区的石头和沙砾之间产生的温度差异所导致的。

在我看来，这个砾石和沼泽遍布的荒漠之地的更大一些本质特点，和我们沿着西北方向对一个个烽火台进行勘探时的不断延展的平地中，有一些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在这个遍布沼泽的大盆地上，有一些盐结晶体闪闪发亮，这通常使人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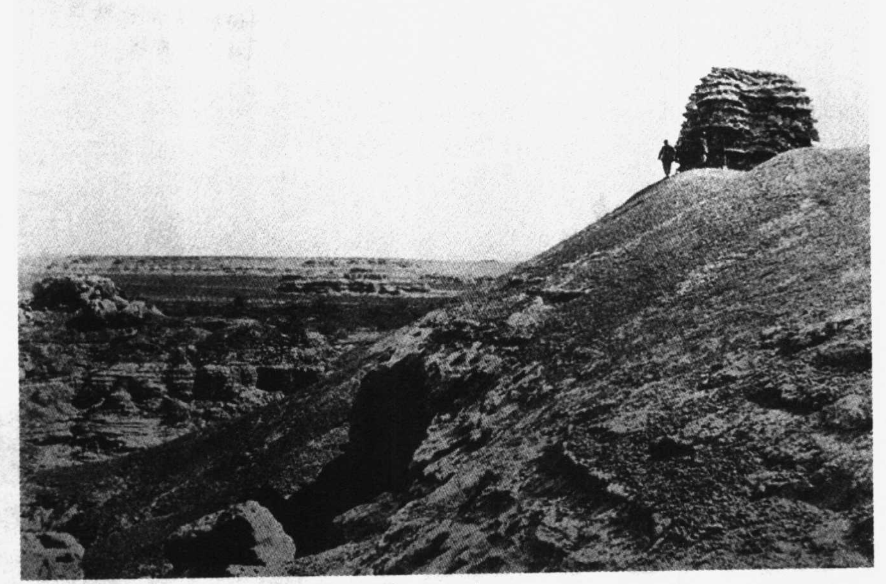
⑱ 敦煌古长城西侧烽火台废墟



来就以为这仍然是一个大湖。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们现在便有几个天气像这样晴朗的日子——我想我能分辨清大盆地上高高的沙丘和我们沿罗布淖尔行走时所发现的库木塔格西北边和最东边的积沙堆。从这个大盆地的南边来看，光秃秃的石冰川（glacis of gravel）延伸到了完全被许多大沙丘所覆盖的山脉脚下，看起来令人生畏。一定因为这一大片石冰川在东端堵住了长城的去路，城墙不得不在这里拐了弯。在这石冰川，通常都耸立着一片壮观的雪山，那正是萨依达木的西藏高原南北分水岭。

在荒漠中，骆驼明显地也感觉到了大地静寂的孤僻与荒凉。现在，经常可以看到骆驼从沙漠上跑下来，跑到像河湾一样的洼地中的泉水旁和牧场来，或者飞快地跑向它们在砾石遍布的光秃秃高原上的栖息地，以躲避成群虫子要命的叮咬。只有

⑱敦煌古长城西侧烽火台废墟



我们这些人，仍然坚守在有很多水泉的沼泽地旁边的营地，并继续对这些废墟进行勘察，可也因此而受到这些虫子的折磨。尽管我们燃起了一堆堆的大火，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甚至是我日夜戴着驾驶汽车用的面纱也不管用。并且，这里炙人的炎热和刺眼的阳光也让人越来越感到难受。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越来越难以留住这些非常困倦的劳工，对于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古丝绸之路离这不是很远，这总算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他们置身于荒漠当中的忧虑和不安。蒋师爷对他们给予了父爱般的百般照顾，我也经常自己掏钱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的东西，才总算稍稍稳住了这些狠心善变的劳工。但现在，他们对自己越来越深入“大戈壁”（“Great Gobi”）明显地感到非常的恐惧。现在，有些人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其他一些人也趁此机会和这些生病的人回到绿洲去了，这使得我们的人员急剧地减少。也没有什么痕迹和其他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表明有牧民和其他人最近还经常到这个地方来，这使得留下来的人也感到非常沮丧和不安。我告诉这些人，我们在丛林中盐碱地所发现的一些被砍下来的树桩大部分都是枯死的，但这对他们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因为这些人会说，这些树桩都是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被砍伐下来了。

5月4日晚上，我到了一个山脊，像通常一样，这个山脊也是慢慢地缩小，尽头和一排相互独立的阶地相连，在山脊的尽头和最后一块梯形地上都建有烽火台，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由于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2英里左右，因此位于东边和长城内侧的烽火台不可能只是用来传达信号。因此，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它应该是一个中枢烽火台。这烽火台边有许多瓦砾碎石，从这点看来，古时这个地方应该驻扎有一个比其他地方都要大的营地。并且，零散于附近山坡上的废迹堆也证明了这个营地驻扎于此地的时间非常长。

尽管这一地点位于这个盆地上不到100英尺高的地方，但它看起来却像一个经

过精心挑选的侧翼支撑点。站在这上面，可以俯瞰位于被高高的沙丘所覆盖的山脉脚下的湖泊盆地的南岸和东南岸的全貌。而这些沙丘都是从南湖方向吹过来的，并且都向西北方向拐去。很清楚，敌人如果想从西边和罗布淖尔路线发起攻击，就必须通过沼泽盆地和大沙丘中间的地方。从大山丘上，便可以看到这一排哨岗，并且可以从这个营地实施对这些哨岗的控制，这样一来便可以防范敌人从侧翼对古长城的主干线发起攻击。

这天晚上，在烽火台北面约20码的地方有几个木亭子哨所，我们对这个砾石山坡进行试验性的搜寻和勘探。不久，我们便发现了20片汉文字简牍，其大小与一般的简牍一致。尽管因长期暴露在外，很多片简牍表面受损，但这个发现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第二天早上，我让蒋师爷从营地动身去继续勘探，而我则去勘察一口沉落的古井。1个小时之后，当我重新和他碰头时，他跟我说他发现了将近100片汉语木简，这些木简我们以前都没见过，并且几乎都保存得很完整，尽管有些因天气潮湿而稍稍受损，但绝大多数都非常容易辨认,我对这个意外的发现感到非常的欣喜。当我确定这么多载有日期的木简都属于公元前65—公元前57年这一段时期时，我感到更兴奋了。所有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木简都是在一个两三平方英尺的地方发现的。

很清楚，以前曾有人将一些官方的文书档案扔在这到处是垃圾的山坡上。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现在已经把山坡给清理完了。一直沿山坡而下，继续清理一些比较薄的一层层垃圾，直到触到满是石头的坚硬地面为止。接着，我们又在原先发现这些废迹堆的地方旁边对这些废弃物进行发掘和筛选。后来，数一数，我们所发现的写有文字的木简总数已达到300片。另外，因长期暴露在外，原先写在上面的文字磨损消失掉的木简也有200多片。可以看到所发掘出来的大量的东西，并且也可以看到砾石和废迹的表面只有一层很薄的覆盖物。

在这一排烽火台下面别的山坡上的、其他一些废迹堆中，只发现了一打多木简。



⑱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和营房（发掘前）

蒋师爷极富激情，又非常耐心地督促大家继续进行挖掘，后来又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大批的汉文木简、碎片。上面的文字明显出于同一个人的手迹，并且上面所写的一些用语措辞反复地出现，根据这两点，蒋师爷马上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些都是某个武官或文员从一些木简上削落下来的碎片。这个官员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不断地在木简上进行书法练习。并且他每写完一次就用小刀把已写过的木简削掉一层，这样，他便可以继续在这些木简上练习书法。这些木简所用的材料非常的便宜，都是从红柳和胡杨的枝条上随便砍落下来的，并且附近的丛林中便有许多这样的红柳和胡杨。

在这个哨所废墟里，我们发现的载有确切日期的木简非常多，而且它们的日期离得很近。因而，就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依烽火台而建的这个营房的废墟，今天仍然保持着公元前57年左右最后一次驻扎时的原貌。尽管这些营房的房间

简单明了，但它们所有的构筑细节都非常有趣。体现了这些房间的布局，这跟在古长城沿线的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建筑样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厚厚的外围墙和狭窄的入口处用来把守大门的一列木亭子哨所都明显地表明了，当初第一个建造这个小哨所的人曾被告知要考虑防守的需要。

最后一批驻扎于此地的人，把屋子里面的这些配置和设备当作废弃无用的东西废置于此。所有这些东西简易朴实、整齐划一的特点，都跟这个遥远的边疆之地非常相称。这屋子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雕刻过的把手和木钩，也许它们是用来作为武器的支撑架，或者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已。还有一些质地很硬的木块，木块上面有一些为皮革绳索做成的槽，看起来这些东西应该是一些弩弓。此外，还有一些顶端印有粗略的人头图像的帐篷木桩，以及一些上漆的木碗。最后，我们还发现

|⑱烽火台废墟之下的垃圾坡（发掘中）|



了一些经过多次修补的用丝绸做成的破衣服，还有更多的用粗绳来纳鞋底、做工很粗糙的鞋子。在我们所发现的12片左右的木简当中，有一片是在外面的一个房间的废物堆里发现的。它至今仍然保存得很好，上面记载的日期是公元前68年。但有过以前那么多次的经历和经验，即使没有这片木简，我也能猜测出，在这样一个近2000年来雨水极缺，人迹罕至的地方，唯一会对这些易受破损的遗迹造成毁损就是风蚀。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三章

## 古烽火台里的简牍

在这块非常荒凉孤寂的边境之地进行勘察和对这些城墙、烽火台、营房和武器的古遗迹进行考究，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需要一些书面的资料档案，来把古时此地的生活以及生活在这里的那些人的情况记录下来，以留后世。在这个古朴的烽火台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木简，这都是公元前半世纪的时候守城的将士扔弃的东西。我觉得若把这些木简公布于众，可以让世人更好地了解这里当时的生活。所有这些木简，差不多都属于同一时期，并且都是在大路边一个哨所里发现的，这就使得它们成为了有关当时戍兵的军事管理措施的非常有用和典型的证据。沙畹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他人无可比拟的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我非常感谢他对我们在长城沿线所发现的、还能解读的各种简牍所做的阐释和注解工作。于是，我提议利用现在我手头上关于他的工作成果，来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烽火台所发现的具有考古意义的简牍文书中所包含的一些主要内容，并在合适的地方，用一些在其他简牍中所收集的概括性资料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充。

自从蒋师爷做了第一次非常迅速的考察之后，我便一直满怀信心地期望，我们所发现的这些木简能够提供一些关于镇守边疆军队的规模、编排以及他们的生活、

后勤、装备等等的详细资料。现在，我这个希望终于完全实现了。沙畹在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提到，镇守这个边界的军队的基本编制是“队”（tui，此处沙畹和斯坦因均搞错了，汉代长城沿线驻军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燧”，以下均译作燧——译者），而且这些军队是皇帝下敕令组建的，它们都是固定地镇守某个地方。现在，在其中一座烽火台所发现的大量木简，我们也提到了“凌胡（Ling-hu）燧”。这就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支军队曾镇守这个烽火台，并且它的指挥所就位于此地。这些木简提到总共有20燧的士兵驻守在这些地方。至于具体是哪个燧负责镇守哪一段城墙，木简中大多都有说明。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座烽火台里，发现的一片木简还清楚地引用了一份有关建立凌胡燧和驻扎于此地附近的其他2个燧的皇帝敕令，并且把敕令所派任的职务安排在“一个非常适宜获取信息的地方”。

每一个燧都有一名燧长，燧长负责接收指挥所发布的命令，每个燧所驻扎的哨岗叫“丁”（T'ing)。有一片木简明确指出，驻扎于这个特别哨所里的士兵有145人。沙畹估计，每个燧的士兵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在燧长后面，这些木简也经常提到负责烽火台守卫的长官叫侯长（hou-chang）和每一位长官的副手。在负责烽火台的长官和他的助手后面，我们所发现的简牍也经常提到驻扎在这些地方的士兵。对于士兵的具体人数，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都是轮流站岗，轮流负责传送烟火信号，巡逻城墙，给疲乏的守城士兵提供燃料和物质供应，等等。因为有些烽火台比较小，所以几个这样的烽火台便由一个小组来负责防守。这样的话，这“燧”就由一些高级的将官带领，分成一个个小组。长城城墙的最西段由玉门的将军亲自带兵镇守,玉门的将军由不同的人来轮流担任,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命于敦煌兵部的长官。

从在凌胡燧的驻扎地所发现的文档中，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例证来说明这个边境地区是如何采取行政程序，来对这个多层次军燧编制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比如说，有任命新的部将或燧长的委任状；有关于人、牲畜和车通过该关口必须严

格遵守的规章条例的训令，其中某些训令还写有具体的日期，以及关于为过往印度门（Gate of India）、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商旅的安排护送燧；关于命令传达的指示，等等。各燧的燧长被召集到总指挥所来商议某些特定的问题，或者详细具体到如何监管兵营仓库等类似这样问题。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类似病假条和准假条这样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某些将官的行为以及对他们进行检举上报的准机密（quasi-confidential）材料。

上级长官要对关口进行巡查之前（有一次是敦煌地区的将军亲自来巡查），一般都提前宣布。这样的话，下面镇守的官兵便可以有时间采取某些预防措施，来暂时地掩盖人员不足的窘况，这样的情况在另外一个烽火台所发现的一片木简中也有提到。上级频繁地向内部官吏下发命令，也就是委派镇守城墙的职责，它跟现在中国在招募本地的人员参与防守边境岗哨而实行的政策依然非常吻合。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信函上都非常清楚地注明发函人和受函人的官职，以及负责传送该命令的人和该信函的日期，但一般都是由传令官口头传达该信函中的具体命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些命令中所提到的实际情况将会了解得更多。考虑到汉字和古时中国官府办事作风的复杂性，以及为这些彼此分开的小哨所提供大量文员所存在的困难，这种传达命令的程序无疑还要进行很大的改进才能够使命令更迅捷地送达到接受命令的将官手中。

在这些处理日常管理事务的大量信函，以及关于这些彼此分开的哨所内部结构的为数更多的简牍当中，如果考究一下其中的少数简牍文书，你就会发觉非常有意思，因为从中你可以概略地了解到创造和保护长城的不少情况。至于这些简牍文书是怎么传到这个塞外的军事哨所来的，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解答。沙畹在进行了认真的学术考究和分析之后，确定我们在废迹堆中所发现的其中一片木简就是一份皇帝所颁发的要求建立军事管理区的敕令，但可惜的是，这片木简上面没有载有日

期，而且现在保存得也不完整了。尽管这军事管理区很明显地是建立在敦煌的地域范围内，但皇帝还是责令由酒泉（Chiu-Chuan），现在的肃州（Su-Chou）的总督（governor）来全权负责执行这一敕令。这一军事重地自公元前115年有人驻守以来，便一直是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5年）中国不断向西扩大政治影响的主要基地。从敦煌地区指挥所的守备燧调配过来的2000名士兵和从酒泉调拨过来的为数更多的兵员，协同本地的一些官吏组成一个完整的编制，“在这个地方驻扎，并建立起一个农业区”。总督本人则负责“考察该地布局，选择一个恰当的地点，利用天然屏障建立要塞，以实施对该地的控制”。

这卷简牍记录着中国在这些沼泽地扩张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确切日期，也无法断定这一新的军事群体位于什么地方。既然这卷简牍上面提到“天然屏障”，并且考虑到发现这一片简牍的地点，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它应位于设防的边界线上的某个地方。我多次提到过古时中国的工匠充分利用咸水湖和沼泽地所提供的天然屏障的非凡技巧。但在这里，要注意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汉朝时，这一带地方的自然环境使得根本不可能在此建立任何的农业区。如果古时此地有沼泽洼地的话，那它的范围一定比现在要广阔得多，光秃秃的砾石高地也根本不可能进行灌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为农业区提供其所必需的农田。

如果这份皇帝敕令实际上是指驻扎在长城的某个地方（我们已经考察了在敦煌西边的长城），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现今的大片绿洲为驻扎在这里的军燧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城墙上相互分离的各个哨所所需的给养也正是依靠这片绿洲所出产的粮食。我们所发现的这些简牍确实不止一次地指出，对这片“神圣之地”进行划界和开垦，是驻守在这些哨所的士兵所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这句话似乎应该这样说才显得更为恰当——他们（这些士兵）必须清除这些

芦苇地和丛林，因为这些东西严重影响了他们有效地瞭望和守卫边界。相比较而言，这样说比说他们要把沙漠之地开垦成耕地恰当得多，因为不先进行灌溉，这些沙漠之地就根本无法开垦。在这里，我也可以简短地提一下，在同一废迹堆所发掘出来的简牍中另外还有两片也包含有皇帝所下的敕令。敕令中所说的具体意思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但敕令上皇帝表示钦准的意思所使用的表达方法及其文风都严格符合当时官方文书礼仪的规范。

我们从当地的一个小将官的驻处发现了一些简牍。这些简牍所能提供的关于这位将官手下的士兵、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职责，比关于招募他们驻守沙漠中这条路线的政策和组织的情况要多得多，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简牍要么具体指定哪一个士兵接收哪些装备和物件，要么就确切地标明这些士兵的籍贯，比如说他们分别是从哪个省，哪个州和哪个郡来的。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驻守边疆的这些士兵大多数都是从遥远的省份如山西（Shan-hsi）和河南（Ho-nan）征募过来的，只有极少数是在甘肃、四川和敦煌本地征募的。

这些士兵当中大多数都是步兵，但也有一些骑兵和负责骑马送信的士兵。有很多收条和发放证都表明，每个士兵每“天”（diem，用“天”可能并不准确，但是又没能找到更好的对应译词，请读者阅读时加以注意——译者）发 6/10 蒲式耳（bushel）口粮。此外，每名士兵都有一定的饷银，饷银的多少依服役时间的长短而定。他们还用一个精确的计算制度来记录领取饷银的总时间，规定每逢农历的小月要减去多算的数额，但允许在边境上服役两天算为三天，可见在这边境地区服兵役是多么艰苦。至于士兵中职位较高的，他们每日的饷银则用银子来计算。某个哨所后勤军需处的一片简牍还提到为喂养军犬提供物质供应，这证明这些军犬也被正式视为一个正规军燧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多存货单都表明军燧里面的有关部门给普通士兵提供的武器，有刀、弓箭和

盾牌。说到士兵使用的十字弓，一般都用需要多大力气来拉弯它，来表示这张弓的实际效力。这样说来，一般是3~6“石”（Shih）的弓是好弓。这里的“石”(Shih）相当于120磅（pound)。我们发现箭头的重量有很多级别，这就区分了发射这些箭的十字弓的型号大小和力量的大小。每一个士兵都配备有150支弓箭。这里提到有两种弓箭，并且这两种弓箭铸的都是铜头，弓箭一般都是保存在箭囊里。至于盾牌的问题，这些存货单上都反复地提到河南（Ho-nan）制造这些盾牌的工厂的名字以及制造的日期。存货单和发放证上也都提到了这些武器的不足之处。

除了武器之外，衣服也是免费地提供给士兵。存货单上反复地提到用黑色的亚麻布做成的衣服。每个燧的燧长为这些衣服付了多少钱也都有正式记载。简牍上面所提到的某个士兵所脱下来的用白色丝料做成的服装，与我们在各个边防哨所的垃圾堆中所发现的大量的用丝料做成的破衣服正好相符合，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在同一张存货单中还提到一顶帐篷，这也许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烽火台的废墟中有迹可寻的住房，根本不足以为我们推理出的驻守边界的所有士兵提供住宿。当时政府的存货单中，还通常包含有制作十字弓所需的储备丝料和麻料，斧子、锤子和其他工具。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一把搭帐篷用的大木槌，这是我们在离最近的一个哨所废墟里发现的。这把木槌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完好，并且仍然很有用处。所以，当随员要把它带在身边，以便在以后的勘探途中像古时一样用来搭帐篷时，我便欣然同意了。

毫无疑问，分守长城各段的各个燧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各个烽火台提供守卫，而后者则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通过信号向城墙的其他各个部分及时发出警告。我们所发现的这些木简准确地记载了接收烟火信号的日期和其他细节，或者提到了燃放这些烟火信号的各种安全措施。单就这一点便足以证明，这一边界沿线经常使用这种用眼睛（肉眼）来辨别信号、接收信号的方式和方法。沙畹所收集的中国更

早一些时候的简牍文书中有大量的信息表明，早在汉朝时期之前，中国的边界地区便懂得和使用了这种燃放烟火信号的方法。这些文书中指出晚上燃放的信号烟火和白天燃放的烟火信号有所区别和不同，这在我们发现的木简中有一卷也有提到。换句话来说，在接收到从城墙的某一处发送出来的信号之后，又马上反过来点火发出意思不一样的信号，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

从这些木简当中，并没有发现如何运用不同的燃放烟火信号的方法在这段防守的城墙上表达更为准确或确切的信息。既然沙畹所引用的文书中也提到用相应重复燃放烟火信号的办法，来区分每次敌人进攻力量的不同，那么，汉朝时这个地方也很可能使用类似这样的方法。从别的地方，我们了解到马臣（Ma Cheng，音译——译者）将军在公元38—43年重新组织北部边界的防守军燧时，在每隔十里（约2.5英里）的地方就设置一个烽火台。这正好和早期敦煌长城上的各个烽火台之间的平均距离相吻合。

毫无疑问，这种依靠肉眼来接收信号的方法根本不足以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迅速地收发警报，同时它也无法保证在有特定的重要事务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因此，就需要有骑马的士兵来传递和通报有关的信息，这在这些简牍中反复地提到过。城墙上各个岗哨都提前备好了马匹，以便送信的骑兵能够及时换马，这样便可以保证这些骑兵能够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到达送信的地点。在每个烽火台上都发现有马粪，这就证明了当时这些地方确实有马骑。但这样一来，因为要养马，每个烽火台旁的住宿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沙畹翻译了一首中国古诗，尽管这首古诗说的是远在东边的一段边界，但它所描绘的情景非常生动和形象，我也想在这里引用一下：“十里一马，五里一鞭；边境守将军令至，忽闻匈奴困酒泉（肃州）；雄关万里长漫漫，雪花纷飞漫群山；烟火频起欲传报，怎奈长空无云烟。”

在烽火台和城墙上进行警戒和防守，或者像一句中国古俗语所说的“戍关”

(to mount the barrier)，这只是驻守在这些地方官兵的诸多职责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木简告诉我们，除此之外，这些士兵还要负担许许多多令人劳累的工作，比如说，受命去修筑防御工事。在长城最西段，这项任务肯定要包括准备构成主要材料的柴笼，而且还要负责收集燃放烟火信号所需的燃料，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长有大量矮灌木的洼地正好远在这些烽火台的数里之外。另外，考虑到当时也需要人手来造砖，根据这些砖块的大小，这些人需要每天（diem）造成70~150块砖。当然，也需要人手去负责运送砖块和砌围墙，以及给营房的墙壁涂抹灰泥，这一工作的进度都是用平方英尺来准确地衡量和计算的。同时，运送各个哨所所需的物资和各种材料也需要占用大量的人手。我们从中知道，在这些情况下，需有一种很精确的方法，来计算这些工作所花的天数，每天所砌的墙壁的长度，以及每个人所搬运的重量，等等。关于给这些苦工偿付多少钱，这点从来没有提到过。但对于这些工作都有确切的记录，这明显是为了保证分工的公平。

驻守在这些小哨所里的士兵们不仅生活单调，而且肯定也不时地受到严重事故和警报的纷扰。尽管我们在哨所所发现的一些主要的简牍只记录了公元前65—公元前57年这一段较短的时期，但它们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点的不少证据。我们在一卷简牍中发现了一份报告，但可惜的是它大部分都已受损。这份报告说，“一个粗野的人骑着马冲向一个烽火台，手上拿着一张拉开的弓。但他拉弓发射之后，便向后撤去。”守卫长城的军队明显已经事先获知敌人将对他们发动猛烈的进攻，因为当时“所有的战车和骑兵都已整装待发、严阵以待”，并且“驻守在城墙上的士兵都严密注视着烟火信号，整个边界都已严守以待”。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了解到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进犯的敌人焚烧和劫掠了一个大燧的营房，杀死了200名士兵”。

从通缉这些犯罪者的告示中，我们了解到边防线有时也负责防范逃犯和其他受缉捕的人逃离边境。事实上，我们从一直到唐代的许多中国的简牍中也了解到，必

须经过特许才能越过此边境。同时，在一些私人的信件当中，也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点。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由于它们写得非常简短，又大量使用中国人写书信爱用的委婉措辞，它们的考古价值并不大。然而，尽管它们都写得非常简短和正式，我们还是要揣摩这些信件中的言辞用语以及它所表达的因长期待在这贫瘠且令人难受的边界上而必定使士兵感到像是被流放一样。实际上，如果跟荒漠中的这些哨所相比，印度西北边省偏僻的前哨基地也应该算是真正的天堂之地了，可那里已成为困苦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们原本对在这些地方能够发现文书简牍没抱太大的期望。但有证据表明，这里士兵仍会抽出时间来学习。我们发现了一些有关占卜预言之类的文书碎片，但为数更多、也更为有趣的是一些字典的文本碎片。在不同的烽火台上，我们总共发现了一部叫《急就章》中的8个篇章，这一出名的巨著是在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完成编纂的，并且它在汉朝时期曾在很多小学（primary school）里广泛使用，这些篇章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古老的原稿，其中包含有一大卷保存得很完好的内容完整的第一章的木简。此外，这些篇章里面也表现出了某些文字的变化。所以，沙畹认为，它们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将肯定会吸引中国许多学者的注意。这些文书的碎片频繁出现在不同的烽火台上，这充分反映了这一教材在当时是多么受人们的欢迎。这同时也证明了，当时驻守在城墙的各个哨所上的士兵都非常渴望能够提高自己的学问。非常有特点的是，有一卷木简提到了《列女传》（Biographies of Eminent Women）。作为一部道德教材，《列女传》这部古代的著作一直都享有很大的名气。

这些文书碎片本身并不具有太大的历史价值。我们必须对在凌胡燧驻扎的哨所的主要垃圾堆中所发现的古时各种日历进行分类。日历记载在一些尺寸很特别（14英寸多长）的简牍上，标明了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每个特定日期的名称。在对简

牍中所记载的名称和中国的一些编年史中所记录的名称进行了仔细比较之后，沙畹证明了这些简牍所标的日历相对应的日期应该大概是公元前63年、59年和57年。要准确地确定当地的指挥所所发出的信函、报告等类似这样东西的日期，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日历进行适当的归类。无需对这种复杂的循环计算制度进行太多的专业技术细节的研究，我们也可以证明简牍上的这些日历相当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整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修正汉朝传统的年代记事方法。

直到5月7日，我一直都忙于勘察这个哨所和西边仍然有迹可寻的最后一些烽火台，对于在这个哨所里出土的简牍我也只能粗略地浏览一下。位于它大约2英里之外的一个烽火台非同一般，它占据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而这个地点就位于一块体积很小但高达整整150英尺的阶地之上，与其他地方完全隔绝开来。陡峭如墙壁般的山坡使得几乎不可能登上这已被废弃的烽火台，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从东边登上去。但东边也横亘着一个非常陡峭的峡谷，这就意味着即使要从东边登上烽火台也只能一步步地往上爬行。这块阶地长约80码，宽约40码，不失为一个天然的巨大岗哨之地。我登上平台之顶，放眼远望西边的大盆地，发现大盆地上到底都是盐沼泽地以及一条条的明渠。这时，我感觉就像是站在蒸汽轮船的最高甲板上，尽情地瞭望无边无际的大湖。

守城士兵的这个营房的废墟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遗迹。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一片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木简，约为16英寸长。简牍的顶部有4行很短的文字，无法确定这是一些什么文字，跟几个星期前在其中一座的烽火台中所发现的纸文书上的阿拉姆文字（Arammaic）有点类似。这简牍就像是故意把一卷完整的简牍分为两半后的右面那一半。现在，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文字和西突厥斯坦有联系。发现这卷简牍的地方离古丝绸之路非常远，这使我当时感到很迷惑，是不是那个地区（西突厥斯坦）的人也曾经在防守这段边界的中国士兵中服过役。

另一方面，在紧挨着古时曾重兵把守的营房门口的小房间或通道的瓦砾堆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痕迹还很新的马粪和用作草料的青色芦苇秆子。小房间面积大约只有7平方英尺宽，骑马在这里转头似乎很困难。这里的营房跟小船舱一般窄，这充分表明，在严寒的天气里，就是牲畜也需要用帐篷来驱除寒冷。

酷热炙人，阳光刺眼，蚊子和其他虫类不断地叮咬，水又是咸的，这使得我们就算在春天也承受着这荒漠之地的恶劣的环境气候的百般折磨。尽管我尝试了各种可能奏效的办法，蒋师爷也百般示好，但想留住这些中国劳工继续为我们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只要想一想这里异常恶劣的环境和气候，就不难想象这一点。最后，在5月8日，我们的给养开始急剧减少，而同时新的补给又跟不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大多数劳工离开了。所幸，我们这时对长城最西段的勘探工作已宣告结束。

此前，我曾派奈克·拉姆·辛格以及其他一些骑马的人到东南边，勘察那里的情况。我要求他们，如果可能的话，越过黄沙覆盖的山脉，直达通向南湖西边的那条路线。现在，测量员已做完哈拉淖尔的测量工作，提前3天回来，跟我会合。在通向南湖西边的路线上，或是在山脚下附近的一个叫索莫托（So-mo-to）的小村子里，可以找到一些草料来喂养马匹。在靠近黄沙覆盖的大山脉，拉依·拉姆·辛格曾试图越过贫瘠的荒废之地的沼泽地，结果被一堆堆紧挨着的沙丘给死死地挡住了去路，因为马在这个季节根本无法爬过这些沙丘。拉依·拉姆·辛格没有办法，于是只好在5月8日晚上回到了营地。我很高兴他及时地适可而止，并且把马队和人都安全地带了回来。

对于自己不得不再一次沿着长城城墙回到敦煌，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以前在东边见到的许多小烽火台的废墟，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尽管在勘探当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木简，印有图案的绸缎以及别的东西，但我想没必要在这里停下来对它们描述一番。在这里，我也只能提一下发现的从哈拉淖尔湖流出来的一

M. Aurel Stein

条河，以及能够解释哈拉淖尔湖成因的天然堰坝。

此前，我已事先将我的印度随员和所有不能进行挖掘工作的人遣回了敦煌。这几天，先是酷热难耐，接着又是暴风肆虐，这使得我备受折磨。在这痛苦难耐的几天过去之后，我至少可以心安理得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向前走，现在确实是该回到绿洲的时候了。我们不得不一路沿着沼泽地寻找所需的水源。不管在哪里扎营，天空中总是飞舞着一群群的蚊虫，地上一群群嗜血残忍的动物也同样令人感到心里发憷。5月14日的晚上，当我看见哈拉淖尔湖就像一大片绿玉一样，在我身后渐渐远去，而对岸却大雾笼罩时，我心里不由得一下松了下来。那天早晨，我在路旁的沼泽地里摘了这个季节里我的第一朵花，这是一种像蝴蝶花一般的植物，很小但很耐寒。以前，在克什米尔河岸边的时候，我就见过这种花，非常喜欢它。在这荒凉抑郁的沙漠之地，这朵花使得我们有机会一饱眼福。

第二天，天气仍然十分炎热，气温高达华氏150度左右。在这砾石遍布的荒地，除了几次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景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让人提神的东西。骑着骆驼或马走了一段很漫长的路程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绿洲。一回到绿洲，我就在绿洲边榆木的树阴下稍作片刻休息。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有空在树阴下休息，这一刻的欢愉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而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蓝色的野鸢尾交杂在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幼秆当中。在我布满尘土、久已干涩的眼里，这景色是多么的美丽啊！这时，我想象一旦盛夏真的来临，荒漠的边境地区将是如何一番景象啊。同时，一想到从这些久已被遗忘的废墟所带回来的考古成果如此之多，我心里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一天晚上，在敦煌熟悉的老果园里，我再一次搭起了我的小帐篷。果园里，桃树和梨树相互交错，花团锦簇。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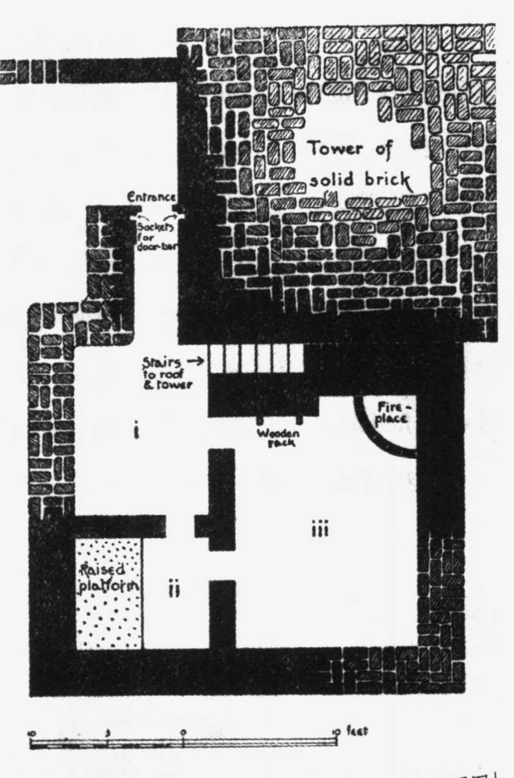
## 返回千佛洞

东南方沙丘覆盖的山脉脚下的“千佛洞”深深地吸引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回到敦煌地区了。对于千佛洞的岩洞寺庙和古代沙漠边缘上的遗址，我都非常感兴趣。一开始，我所注意到的是那里的壁画和雕塑。自从我3月份首次探访那里后，那里大量的古代手抄书卷和神秘的古洞就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兴趣。我当时的念头就是马上开始探询，而不再有任何的迟疑。

我刚刚回到敦煌，寺庙里一年一度的朝圣就开始了。不用当地人提醒，我也非常清楚，这不是到千佛洞的最好时机。这种类似于宗教的大型祭祀，据说召集了本地上万名虔诚的百姓。这种估算并不夸张，几天过后，我看到了大队回乡的人群，足以证明这次活动的规模了。我知道，印度圣地人（Indian Tirthas）认为这样的仪式更加适合于学习现代的敬神活动，而不适合追寻往昔。

所以，出发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5天。这几天，我也没有能够闲下来，我一直处理账目，这要用那种极其原始的碎银来结算，通常不用纯银，还要修一修帐篷和工具，在过去几周的沙漠挖掘中受到了破坏。我阅读了一封邀请信，它是一个小商人从和田出发，翻过重重山峦，才送到了我的手中。这几天，我也有时间恢复体力，

所以耽误这几天时间绝无遗憾。在这个时节，绿洲的风景是最好的，田地非常平滑，好似整齐修理过的草坪，路边可以随处见到朵朵绽开的野花。这里的树大都是榆树，它们都吐出了嫩绿的新芽，营造出了一片片的绿阴。尽管中国人生活逍遥，懒散成性，但在这样的春天，散布于各处的房屋比其他时候看上去更让人觉得殷实。




⑱④一座烽火台的平面图

如果说这些居住在沙漠地带的人不是非常勤奋于工作的话，那么当他们在自己的田地和农场边时，和这些人交谈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了，这时他们也显得非常有礼貌。博学的汪大老爷是本地的行政长官，我回来后，他来拜访了我，对我发掘出的大量古物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虽然一开始都感到我行为非常古怪，但敦煌人已经开始慢慢地喜欢我做的事情了。奇怪的是，我们雇用的临时小工们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好逸恶劳，不愿意进入沙漠，这让我感到不满，但是一旦从营地安全返回后，他们的表现还是显得非常乖巧的，到处给我们说好话，说什么我给了他们父亲般的关怀，非常慷慨，给他们不少赏钱，还给他们药吃。我很清楚，他们之所以夸奖我，这不是因为我做得特别好，而是由于蒋师爷的仁慈和无比的耐心。

在我去“月牙泉” (Crescent Lake)，安静地写作了一天之后，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这个沉睡的古中国前线和边疆的魅力。这个湖距离市镇约 3 英里，处在绿洲南端之外，隐藏在了一座座的沙丘之间。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在沙漠中踯躅的人来说，没有比这里更加适宜休息的地方了。这里四周都被高约 250 英尺的小沙丘所包围，显得非常静谧。它是个清澈的小湖泊，大概有 0.25 英里长，形状像个月牙，故而得名，成为纯洁的象征。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如果是在印度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代表春天的神灵休息的地方。毫无疑问，如果是一个印度的佛教徒 (Indian Buddhist) 经过这里的话，一定会很惊诧。

在这个湖泊的东端，有一个出口，旁边有一些小块草地，我们的马匹在这里品

⑱敦煌“月牙泉”旁的寺庙院落



M. Aurel Stein

尝着它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肥草。湖的南岸是一些非常美丽的寺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佛教和道教的雕塑和壁画。在寺庙前面，就是那些在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常常提到的著名“鸣沙山”（sand-hill）。若是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在亨利·玉尔（Henry Yule）爵士所译的马可·波罗著作中这里被称作唐古特省（the Province of Tangut）。

所以，我就常常独自到这里，来尽情享受这不受外界干扰的安逸，就如熟知的盎格鲁—印度（Anglo-Indian）谚语所描述的普尔达赫（Purdah）。我唯一的伙伴，也就是蒋师爷，也抵挡不住诱惑，穿着他的绒布鞋，不断地往大沙丘的顶部攀登，他登下来的沙子发出了阵阵悦耳的奇妙声响，这和他一贯追求“真理”的作风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听得见远处的声音，像是马车发出的声响，而蒋师爷洋洋得意地把这些细节写人他的行记。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噪音来干扰我了。在这段时间里，“千佛寺”举行祭祀，敦煌人不仅写各种献词来表达崇敬之情，而且要亲自去那里拜谒，可谓万人空巷，所以这里显得非常安静。只有一个神态古怪但脾气很好的老僧人在四处游走，他还清晰地记得我在3月份首次造访这里时送给他的那个小礼物。当我坐在空荡的大堂里时，他不时看看我，然后，我轻轻地迈着步伐，四处参观那里的印度神龛和古墓，这些都让我回忆起了遥远的古代。

当天晚上，我和蒋师爷坐在一起喝茶和就餐的时候，告诉他我这几天过得非常愉快，在开始“千佛洞”的繁重工作之前，我在这里僻静的角落养神待发。他也是非常喜欢这次短暂的出行。他用那些离奇的幽默、迷信和民间传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次出行是何等之英明。他说，在祭祀之后，神灵们会在圣餐之后，要用一次大的沙暴来清扫信徒们丢在这块圣地上的垃圾。所以，我们最好是等到这个沙暴结束后再出发。考虑到顺疏勒河刮来的狂风隔几天就袭来一次，所以没有人会对这

样的一个预测表示怀疑。

5月21日，我们朝千佛洞进发，空气中弥漫着前夜沙暴而引起的阴霾。幸运的是，在很久以前，从“安西”（An-hsi）顺着北山（Pei-shan）沙脊向西刮的狂风就经常发生，所以，到现在地上实在是没有多少沙子可以再被吹起到空中了。相反，这样的阴霾反而可以当作是抵挡太阳光的有效方法，而在和田就与这里不一样了，那里的风卷着沙尘，吹得让人感到窒息。当然，我们不得不等到中午，因为到那时，马车才能装好一袋袋沉重的行李。在向绿洲的边缘行进的几英里路上，到处都是让人舒服的绿色，谷物幼苗覆盖着大片土地，鸢尾植物则长满在道路的两旁。参加完祭祀活动之后，农夫们似乎不再愿意回到劳动中去，女人们则悠闲快乐，身上仍旧穿着节日盛装。我每次看到这些女人那几乎是残疾的脚时，心中总是感到惊奇，即使最卑贱的女人，也要包小脚，这对那些生活在城镇上的女人影响可能不大，但却严重影响下地劳作的农家妇女的生活。没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强大力量，这种对双脚的自残行为是难以保证实施下来的。

出了绿洲的边缘，人的踪迹就马上少了下来了，虽然这里近来还有人经过。当进入到让人难忘的沙漠谷地，接近大小洞穴林立的崖壁时，我们发现它们仍保持原来的样子。很久以前，一条小河造就了这个峡谷，那时候，这里的气候还比较湿润，但是现在的干旱气候已经早把这条河给蒸发干了。在去大岩洞寺庙的路上，是狭长的灌溉田地，长着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和榆树，阴凉蔽日。不过，这里的景致和我在3月份首次探访时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和原来一样地荒凉和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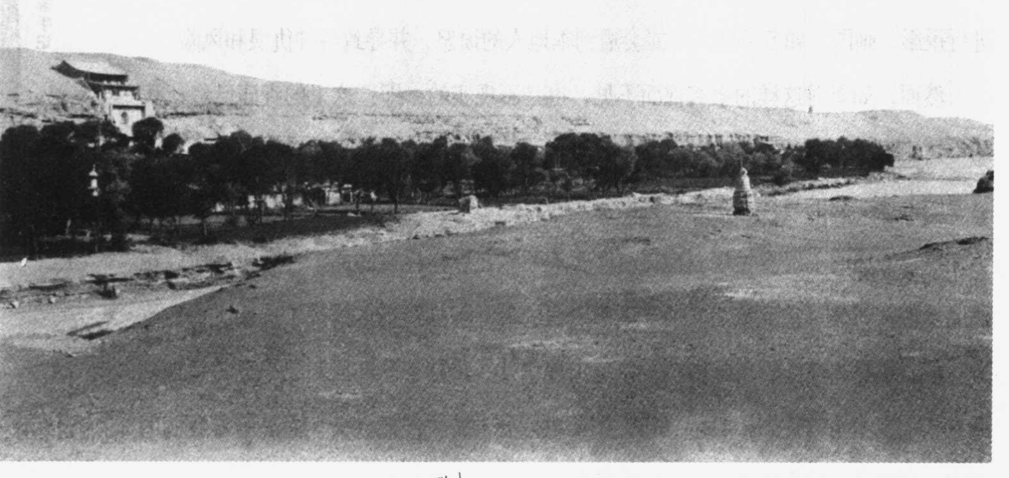
对我而言，这种荒凉和沉寂具有特别的意义。根据我到达后几个月的观察来看，这里的人对宗教信仰非常热情执著，在敦煌这个人口密集、人员混杂的地区，虽经历了历史的巨大变化，百姓都虔诚地信着佛，这并不需要我亲眼看见这里年度的祭祀仪式就可以知道。虽然这里的寺庙都朽损了，但人们还是来这里敬神。我非常清

楚，我的考古活动涉及了壁画和雕塑，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只能对这些古代艺术品进行摄影、画图，如若不然，可能会遭到本地人的愤怒，并导致各种仇恨和风险。

然而，如果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也是不现实的，即：这里的寺庙已经让我的心情愉悦了几个月了，现在它就像一块大的磁铁一样，吸引我回去探询更多、更重要的古迹。我的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更多的古代手稿，这个宝藏是两年前由一个道士在重建寺庙时不经意发现，现在被严实地贮藏在原先存放的那个寺庙中，所以在试图发掘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聪明的蒋师爷已经基本摸清了这些文物的位置，但我还是得小心翼翼地探路，以免出现意外。蒋师爷已经说服那个最先发现这些文物的王道士（Wang Tao-shih）不要再四处云游去传播教义，而是等着我们的到来，帮助我们收集这些弥足珍贵的书卷。

当天晚上，我就为随员找到了不错的住处，也为从敦煌一路带过来的沉甸甸行李找到了存放的地方，我对此感到很满意。千佛洞仅仅两个住所，有个房间被一个肥胖的路经此地的西藏喇嘛占了，他在蒙古部落居住的山区已经行走多日，所幸除那间房屋外，其他的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的印度仆人也有了个房间来舒展一下四肢了，奈克也找到了一间可以做暗室的房子。那些信伊斯兰教的随从也在外屋找到了歇息的地方，虽然那里的屋顶已经破损了。还有一个大厅虽然也很旧了，但还有一扇门和窗子是完好的，所以就成为了存放我的古董收藏的好地方。当然，如果我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宝贝，也要放在这里。

更好的是，在我们的洞穴前，有一块狭长的耕地，长约0.5英里，这样，我就可以在果树的阴凉下面支起帐篷来了。官府里的朋友坚持让我随身带上一个小官和几个敦煌当地的护卫，他们住在我们营地对面的宽敞厅堂里。蒋师爷本人也有了一个非常阴凉的房间，这个房间就位于一个有3层楼那么高的大佛像脚下。后来，天气变热了之后，我改住在另一个曾经修葺过的洞穴的前厅里，那里本是为Daftar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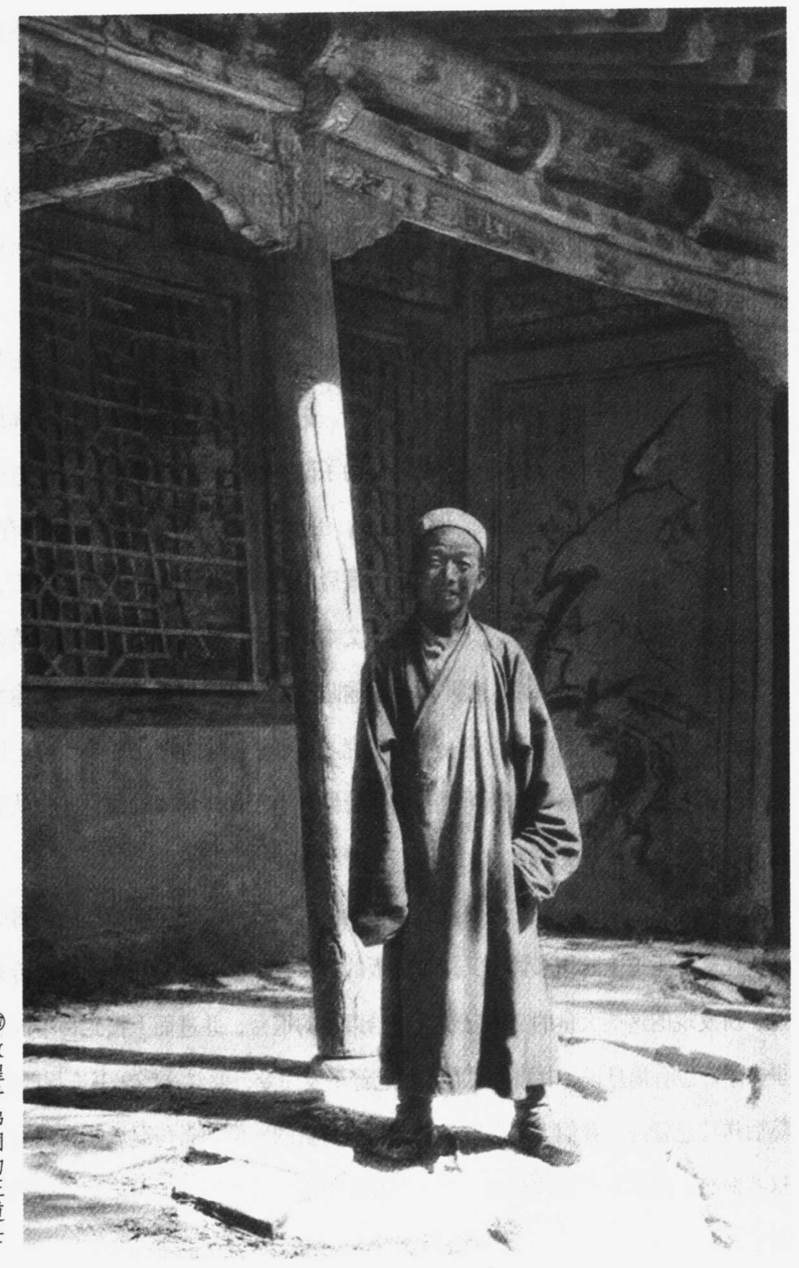
⑱悬崖峭壁和千佛洞主石窟群

造的。与沙漠里的夏天和冬天相比，现在的条件远远比在沙漠好多了，虽然这里的饮水有点咸，奈克·拉姆·辛格还抱怨这里使他的风湿病复发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了实现此行主要目的的行动，也就是考察这些人工开凿的洞室和为古代的壁画拍摄照片。我有意识地避免和老道士长时间地攀谈，他为迎接我的到来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毕竟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看上去很奇怪，非常紧张，很害羞，不时露出老奸巨猾的神情，不太惹人喜欢。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非常难以对付。

后来，我为他所修复的大神殿附近的一个洞穴拍照，那些宝贵的手稿就是在这个神殿里面找到的。在拍照过程中，我忍不住地查看了通往这个大殿的那条通道。在我上次来这里探询的时候，这条通道被一扇木头门封住，但这次已经被一堵砖头墙给糊得严严实实了，这让我感到很沮丧。难道这是为了阻止野蛮的外来者得到这些书卷吗？哪怕是看一眼这些宝贝文物吗？我想到了耶萨米尔（Jesalmir）的和尚，他们也在寺庙里面采用了类似的装置，来防止布勒尔（Buhler）教授进入到他们那

M. Aurel Stein



⑱⑺ 敦煌千佛洞的王道士

藏有古代文书的储藏室。想到这儿，我就为摆在面前一次耗时和费力的考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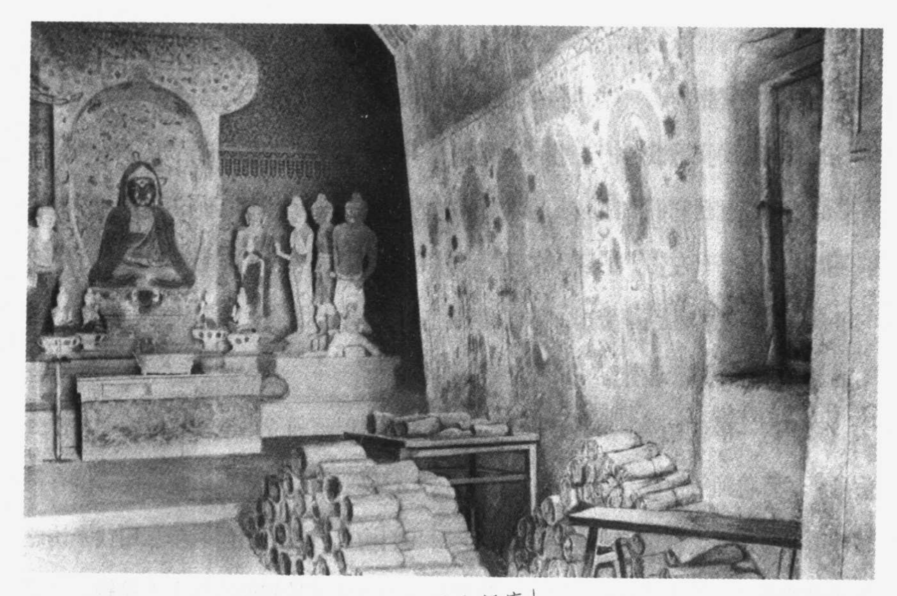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保证我能够看到全部的文本，并且是在原先存放这些文本的地方。只有这样，我才有望能够确定这些原先埋藏在城墙后面的文本的真实面目，以及它们的大致日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早晨便委托蒋师爷到王道士所居住的另一个修葺过的寺庙去。并且，我让他偷偷地探察一下我们所要获取的文本。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件很难办、很费时的事情。在答应为主寺庙捐资之后，蒋师爷施以巧妙手段，似乎一开始就超出我原来的期望。护守着这些瑰宝的王道士解释说，最近有数千名香客涌到这个地方来做朝拜。为了防止这些好奇的朝拜者可能造成的毁坏，寺庙就把这扇门给封住了。但很明显，王道士非常谨慎，而且心里仍存疑虑，他怎么也不肯答应让我们看所有的文本。最后，在做了种种谨慎的保留之后，他只同意让我们观看一些对他来说比较方便的文本。这时，明显是出于激动，蒋师爷暂时忘记了要保持沉默的要求。他不时地偷偷暗示我，要是可能的话，就偷偷拿走一个或几个文本，以便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蒋师爷似乎觉察出王道士脸上所显现出来的不安，害怕我这样做有可能会引起公愤。出于这样那样的顾忌，他认为我们最好暂时不要打这些文本的主意。

这样秘密地交涉了几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获取到任何重要的信息，蒋师爷还是不愿离开王道士既用来诵经又用来烧饭的房屋，里面被烟熏黑。从敦煌传来消息说，所发现的这些大量的文本已经上报给肃州的道台，并进而上报到甘肃的总督那里去了。也有消息说，甘肃的总督大人已经下发命令，要对这些文书进行严密保护，然后送往总督府。我们无法确定这消息是不是真的。但如果情况属实，确实下发了这些命令，或者要求对这些文本列一个存单的话，对我们来说，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棘手了。

幸运的是，蒋师爷由此而产生的忧虑因王道士在谈话中所泄露的消息而告消除。王道士跟许多紧张的人一样，不时地话就多了起来。有几卷汉文字的文本（显然是佛教的文本）确实已被送往兰州的总督衙门，但这些文本的内容在兰州总督衙门没有弄清楚，或者是它们没能够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官方粗略地听说全部的文本能够装满大概7马车左右，感到非常满意，但考虑到运送这些文本或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审查所需要耗费的巨额费用，他们又感到非常头疼。因此，他们让守护这个寺庙的道士负责保存和管理所留下来的全部文本。

除了这一消息之外，虽然经过了漫长的谈话，但蒋师爷再也没有得到别的什么信息。尽管蒋师爷性情一向开朗，他对自己此行要取得的成果抱乐观态度，但有很多理由值得担心，这位道士乖僻的性格会对我们构成严重的阻碍。单靠用钱来诱惑他明显地无法消除他的疑忌。因此，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进行个人接触，以便研究和了解他的情况。于是，在当天下午，由蒋师爷陪同，我正式造访了王道士，并请求他带领我游览这座重建的道观。这座道观是他在敦煌的骄傲之本和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当他带我通过置有全新的、装饰很漂亮、涂过漆的牢固木制品的高耸的西厅堂以及作为大地窖的通道口和通光处高高的门廊时，我忍不住向右望去，这时，我发现有一堵难看、未抹灰泥的砖墙将隐蔽的礼拜堂门口给遮挡住了。我想这时的时机尚未成熟，我还不便向这位虔诚的向导问及这神秘的隐蔽处里面保存着什么宝贵的东西等类似的问题。所以，当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我观看这个大地窖及其神圣的装饰物时，我还是尽量装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这座道观重建得非常全面和彻底。在这个约为46平方英尺的大地窖里，有一个很古老但经过重新粉刷的蹄铁形讲坛，还有一系列新做的大泥塑像，这些泥像比我以前在别洞穴里所见过的任何塑像都要丑陋。中间有一尊蹲坐着的佛像，佛像两边对称地排列着许多弟子、圣人和护卫的塑像。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时敦



⑱敦煌千佛洞王道士居住的石窟寺庙内堂和门廊

煌的雕塑艺术的水平是如何之低。但这位可敬的道士之所以能被委派主持这座道观，既不是因为这一点，也不是因为这些丑陋的塑像和地窖的墙壁以及天花板上保存得异常完好的雅致的壁画装饰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他对这座道观无比的虔诚是无可怀疑的，而他为重建这座道观所建下的宗教上的功绩也是难以埋没的。在我来访的8年之前，王道士便从他的家乡山西省（Shan-hsi）来到这里。自从安居在这座废弃的道观以来，8年来尽管很清苦，但他仍然一心虔诚，矢志不渝，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想象，将这座原已变成废墟的道观加以重建，使它再度重现昔日的荣耀。

那时，走廊的门口已被从溪流的淤泥堆中冲积过来的积沙堆堵塞住。原来的西厅堂也已完全遭到毁坏。现在，除了重建西厅堂以外，悬崖顶上也用坚固的砖头和质地坚硬的木材建造了一座好几层的厅堂。当我思及这位远道而来的卑微的道士，为了求筹款项，清除道观的沙堆，重建道观而所付出的艰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坚



⑱⑨王道士居住的石窟寺前廊现代人绘制的壁画，描述玄奘西天取经的情形

忍不拔和积极热心时，我就不由得从心里升起一股对这位性情乖僻的小人物的同情之心和崇敬之情。从他和他的两个道童的生活情形，以及蒋师爷在敦煌听说的关于他的种种事情来看，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肯定，他几乎很少为自己个人及其私事着想。后来，他极其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了他所保存的义捐名单和账目。名单众多，账目巨大，这表明在这些年里他为了替道观求募捐款不辞辛劳，其情至诚。

不出多长时间，蒋师爷便了解到王道士对学问知之甚少，并且他知识面也非常狭窄。以前，我习惯跟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有学问的中国官吏接触和打交道，因而，我觉得我要跟他谈论考古的事情，谈论我对考古莫大的兴趣，跟他说我要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以便对中国的历史和古物进行研究，这一切都只能是白费工夫。王道士怪癖十足，虔诚热忱，坚忍不拔而又幼稚无知，这让我联想起古时中国早期的佛教朝圣者。这些佛教徒头脑简单，却心性坚一。迷信促使他们不顾千辛万苦、远涉万里到印度求佛取经。

以前，我曾追寻过最伟大的朝圣者——玄奘的取经足迹，这一点广为人知。同时，人们，无论是学识丰富的人，还是学问浅薄的人，都对我表示了赞誉。王道士也许曾听说过有关我的事迹。尽管我确实一直对佛教很崇拜，但我的本意已被许多人曲解，所以我觉得，尽管我的汉语说得不好，我还是向王道士表明我对玄奘的尊敬比较合适。于是，我便跟他说起我是如何从印度出发，不远万里跨越深山和荒漠，追寻玄奘的足迹；如何在漫长的跋涉途中追寻玄奘昔日曾虔诚地拜访过和描述过的寺庙的遗迹，如此等等。

我承认，我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可以做到在有关中国这位圣人的话题上滔滔不绝，因为这一点曾在以前给我自己的工作带来了莫大好处。现在，从王道士的眼睛里，我捕捉到他神采奕奕而又有点腼腆的眼神，我觉得这一次我更不用费什么吹灰之力了。我熟读了玄奘留下的记录，对他漫长的取经路途也很熟悉，蒋师爷充

M. Aurel Stein



⑲⓪千佛洞王道士居住寺庙前廊里的藏族和尚

分利用了这一点，来回答王道士在谈话中间提出的问题，我能看出王道士脸上所表露出来的迷惑神情。很快我就确定，尽管王道士对佛教知之甚少，也不太感兴趣，但他也跟我一样是唐僧的崇拜者，只是他的方式跟我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不久，我便亲眼见证了这一点。王道士把我们带进道观前一个新建的宽阔凉廊，并非常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请敦煌当地的一个艺术家来装饰凉廊的墙壁的。墙壁上装饰的这一系列壁画内容离奇生动，他跟我们说，那代表着唐僧取经冒险历程中各种极具特色的不同场面。正是这些离奇古怪的传奇故事，把玄奘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人人都崇敬的圣僧。但事情的真相是，在他自己所写的回忆录和传记中，玄奘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些传奇故事。我们各自对这位英雄的观念有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我很乐于让这位傻得有点可爱的向导给我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述墙壁上每一幅壁画所描述的精彩故事。现在，王道士讲到，圣僧被会妖法的魔怪卷到了天空上，但一会儿就通过念咒或念经，让他虔诚的徒弟们把他给救了回来。两个长相奇怪的人（一个长着马脸，另一个长着牛脸）是紧随在他身边的徒弟。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条猛龙把他的马吞吃掉了,唐僧又把它变成了马,如此等等。

我非常感兴趣的一幅图画，表现了一个与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非常符合的主题，尽管直到后来，我才真正对它所宣扬的道德真义感兴趣。在这幅图画中，唐僧站在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岸边，他那虔诚的马驮着几大箱经文站在他旁边。这时，有一只大乌龟向唐僧游过来，准备帮他把这些宝贵的经文运到河对岸去，它清楚地提到玄奘从印度成功地带回来的70马车经文和其他物品。这位道观的虔诚的守卫者能够明白这里面所说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吗？他是否会大发慈悲，同意把这些凑巧由他保管的古代文本的其中一部分交由我，让我带回佛教的发源地吗？我看暂时还是不要提及这个问题为好。当我离开王道士那一刻，我本能地发觉我和他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更加可以信赖的关系。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五章

## 揭开藏经洞的面纱

我把蒋师爷留在了后面，以取得王道士信任，希望能够促使他早日把手稿样本借给我们。在这之前，他曾答应要借给我们，但道士又变得紧张起来，含糊地说“等以后吧”，显然是想拖下去，但我已经等不及了。

然而，最后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蒋师爷在深夜摸到我的帐篷里，手里拿着一卷文稿，显得异常兴奋。手稿是王道士刚刚藏在黑袍子里偷偷地带来给他的，说这是第一批样本。稿卷的字迹和纸张看起来很旧，可能是佛经的范文，但蒋师爷说还要花些时间来确认一下。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就来了，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说这些卷宗里记载的是佛教正经的中文译文，在最后一页还指明，这些佛经是从印度带过来并由玄奘本人翻译的。这真是个天赐良机，使我们在考察一开始就见到了这个中国圣人的名字，还有他那让人敬畏的翻译副本，我们俩都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王道士显得很无知，所以当他发现了他所说的“样本”时，一点也不知道玄奘就是这些样本的作者。蒋师爷立即意识到要获得这些发现物，首先一定得稳住这个轻信的道士，让他觉得这只是为了我这次意义非常的旅行之中的一段特殊插曲而已。

于是，他很快捎信给道士，再次请求参观藏经窟，显然那位神圣的道士同意了他的要求。后来的结果最让人振奋。不久蒋师爷就回来了，说我们的预兆看起来还在发挥作用。几个小时后，他发现一个壁龛模样的入口被一堵墙堵住了，当道士一打开门，他就看见了塞了满满一屋子的书卷写卷。整个上午，我都有意不去道士的庙里，但是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再也忍不住了，要亲自去看一看。早上天气炎热，万里无云，一直跟在我周围的那些护卫，在美美地吸了鸦片之后现在已沉沉地睡了，我拿着相机并由蒋师爷陪着我去神庙。

道士看起来还在犹豫不决，显得紧张又忧虑。但神圣的职责和要求影响了他，现在他终于又鼓起了勇气，为我打开了那扇粗糙的门，门内是沿着宽敞的前厅通道，通向石凿壁龛的狭窄入口，壁龛要比通道地面高出 4 英尺左右。看到里面的小屋时，我不禁惊呆了。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过去，大量的写卷一卷卷层层堆积却又凌乱不堪，足足有 10 英尺高，据后来的测量的数据，体积大概有 500 立方英尺。屋里空余的地方只够两个人站，显然是不可能在这个“黑洞”里仔细查看这些文卷的，而且要把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得花很多人力。

如果把写卷全部移到寺庙的一个大内殿里，查看起来要容易得多，但这个要求现在提出来还显太早，因为当时王道士很害怕有人撞见，然后散布不利的谣言，这样他就保不住他的位置，那些信徒和赞助者也将会离他而去。所以，当前我只能要求他一次只拿一两卷，让我们在不是太狭窄的地方快速翻阅一遍。幸运的是，王道士之前重新修葺了一些地方，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个精致的凉厅和一种大门厅，每边都有个小屋，带门和纸糊的窗户，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奇特的古老书库的阅览室一样。我们坐在里面看书，即使偶尔有信徒登门到庙里磕头拜佛，也不会感到异样，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我们。

在道士专注于藏经洞写卷时，我仔细地查看了通道的墙壁，墙壁后面就是大量

写卷的储藏地。道士告诉我们，当他8年前开始在千佛洞住下的时候，这个洞穴一样的寺庙几乎完全被流沙堵住了入口，而且从附近其他的石窟和这个庙本身相对较低的位置来看，门口的积沙可能达到10英尺或者更高。没有太多的钱，只能靠着供奉和捐赠请了几个人手，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显得很不快，干活慢腾腾的。王道士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高40英尺的宽敞通道修理平整。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又忙着换掉内殿台子上立着的又老又破的泥灰塑像，立一些新的雕像上去。那时，他注意到，在靠通道右边刻有壁画的墙壁上有一条细长的裂缝，看来在泥灰粉刷的墙后面是凹进去的，而不是结实的平面，内殿从这个坳口这里被断开。当把坳口加宽以后，就立刻发现了这个装满写卷的小屋，就跟我现在看到的一样。

屋子朝西的墙壁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面整齐地刻着长长的汉字碑文。这块碑后来被移到通道左边的墙边，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碑文记载着（Hung Pien）这个中国圣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他曾经到过印度，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文物和经文，在这庙里安定下来之后，用他的余生从事经文的翻译工作和其他圣职。标明日期对应的年份是公元851年，那么这个藏经地肯定在9世纪中期以后就有了。

但除非我们可以在写卷中找到有日期的记录，不然，就无法证明还有比通道墙上的壁画所显示的风格更早的年代了。道士明确断言，壁画是刻在墙壁表面的灰泥上的，从入口周围的墙的表面可以看出来。这些画描绘得是菩萨云集，仙袂飘飘，周围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供品，画得惟妙惟肖，在其他很多石窟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壁画，画面画好后再没有修复过，所以看起来显得极其古老。多种证据都可以证明，他们不可能晚于宋朝，也就是说比13世纪的大蒙古征服统一还要早。

有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我相信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写卷。但藏书量之大，又肯定会增加发现的难度，不免让人感到担忧和怀疑。难道我们还有时间，慢慢地一口一口把山一样高的写卷吃透？况且，如果为世俗的恐惧和踌躇不决所动摇，胆

小的道士也可能会在我能够把书卷取出来以前，就把藏书卷的寺庙给锁上了。所以，这就促使我们投入最大的精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工作，而其他人则故意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显得很平静。不管怎样，我们遇到了这种两难的处境。但我承认，忙碌之后的疲劳和渴望同样都是巨大的。

最先，从那个“黑洞”里找出来的一捆是很厚的几卷写卷，1英尺来高，很显然是部分佛经的中文译本，保存得相当完好，从纸张、排版和其他细节地方可以看出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微黄色的纸张制作得结实又坚硬，也很光滑，用一根约10码长的细带缝合起来，整齐地卷在一起，和希腊的羊皮纸一样，有一根结实的细木棍镌刻或者镶嵌在手柄的末端。所有这些都表明写卷曾经被读过很多遍；书脊上有一根丝带，是用来系书卷的，现在这个起保护作用的书脊也破开了。而对于那些还完好的写卷，蒋师爷很容易就能读出上面经文的标题和章节等等。

现在，在中国整个文学界，很少有人研究和熟知佛教文学，蒋师爷也是如此。虽然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一些印度的佛教经文，但却不懂中国文学，这个致命的弱点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所以蒋师爷辨认出来的标题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启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第一捆写卷的标题都各不相同。我原先还以为会发现西藏和其他地方流行的现代佛教经文内容相同而又空洞重复，现在这种忧虑因此而逐渐消失了。我让蒋师爷列一个粗略的标题目录；但不久以后，当虔诚的护卫们鼓足干劲儿，一捆接着一捆把这些精神财富挖出来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工作甚至是最粗略的目录工作也不得不放弃，因为这需要所有有学问的人充当抄写员才能处理如此一个庞大的工作量。

还有一些藏文文本和汉字译本混在一起，也是卷起来的。但是，这些部分被清楚地标出来了，而且是水平书写的，所以读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不是像汉字那样竖着排下来的。我不怀疑这里面有些可能像现在的甘珠尔（Kanjur）和丹珠尔

(Tanjur) 一样，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蒋师爷快速地把中文写卷翻看了一遍，但并没有发现有哪卷末尾标明了具体日期，而且由于篇幅太长，完全读完要花很多时间。在和田河地区发现的古佛经使我对印度婆罗门教草写的经文熟悉起来并开始理解，我没有理由不兴奋和激动。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大量的藏经曾经一度处于印度字体和梵文文化在中亚佛教界盛行的时期。也可以证明在宗教发源地和传入塔里木盆地的佛学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对研究印度和西方佛学有重大的意义，我对找到相关的资料充满了希望。

所有的写卷经文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保存的，只是有的只用一根很结实的绳子捆着，一不小心就系得很紧，有的外面没有用布包着，但即便是这样，写卷却没有受到损伤，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潮湿。事实上，还能想出比石窟更好的地方来保存像这样的文物吗，那些在极度贫瘠的山头上开凿的，密封又隔潮的石窟?把写卷放在这些精心选择的石窟里，有砖墙作阻挡，有堆积的流沙作保护，可以完好无缺地保存几个世纪，即使在最干燥的土壤也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当我们打开一个深颜色帆布裹着的大包裹时，我不禁为这种特殊的保存方式而动容。包裹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图画，有画在薄如细纱的丝绸上的，有画在亚麻织品上的，还有的画在各种各样为了还愿的丝绸和织锦上，还有大量的染了色的布料和纸片。最先发现的画幅中，大多是比较狭窄的，长度达到两三英尺，它们飘扬的彩带和带有细线的三角形的顶端表明，它们以前在寺庙里被当作经幡使用。这些附加物使这些画幅在挂起来时看上去更为辉煌。它们中有许多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且它们都是经过或长或短的使用之后被埋藏起来的。

这些丝绸经幡往往是卷着的，在展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佛祖和菩萨们绘画优美的身形，其中大多是以印度风格画成的，或者画的是佛教传奇中的景象。当时，没有时间仔细地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是，很快我就确定了一些外在的特征。所有的

经幡仍然有、或者原本在下端附有三四条狭长的丝绸彩带，在这些彩带的底端有上了漆的木制横杆用来起固定作用。三角形的顶端往往是由一片织锦或者丝绸构成，边缘有刺绣，从顶端的一边垂下来一条较宽的彩带。在长方形图画的顶部和底部，有一小片木制或者竹制的紧绷竿，用以保持经幡的形状。

这些图画所用的丝绸几乎全部是精美的透明薄纱。当这些经幡在空中飘扬时，它们可以让许多光线穿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为了被看得清楚一些，这些图画必须穿过门廊挂起来，或者挂在门廊附近，这样洞穴寺庙的内殿就可以接收到许多光线。正是因为其透明性，这些经幡大都看上去就像两面都被着了画一样。有一些过去已经遭到损坏。这不是由于被埋葬了几百年的原因，而是因为在寺庙中被使用过的缘故。这一点可以从对小屋的悉心修缮可以看出来，也可以通过对整个图画用布或纸进行的裱褙来证明。

不管在使用这些精美材料时采用了多么优越的技术，但随之而来的危险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发现长达6英尺多的巨幅丝绸画卷时，我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在埋藏时，它们被很细心地折叠起来，但任何试图打开它们的努力都意味着冒险，因为在干燥的空气中几百年的积压，使这些薄薄的材料变得特别脆，极容易损坏。掀起一点点边角，我可以看出画中所显示的场景几乎与古老洞穴墙壁上的壁画一样精美。尽管我特别想找到可能写有日期的还愿刻画，但由于害怕损坏它们，我还是不得不晚些时候再将它们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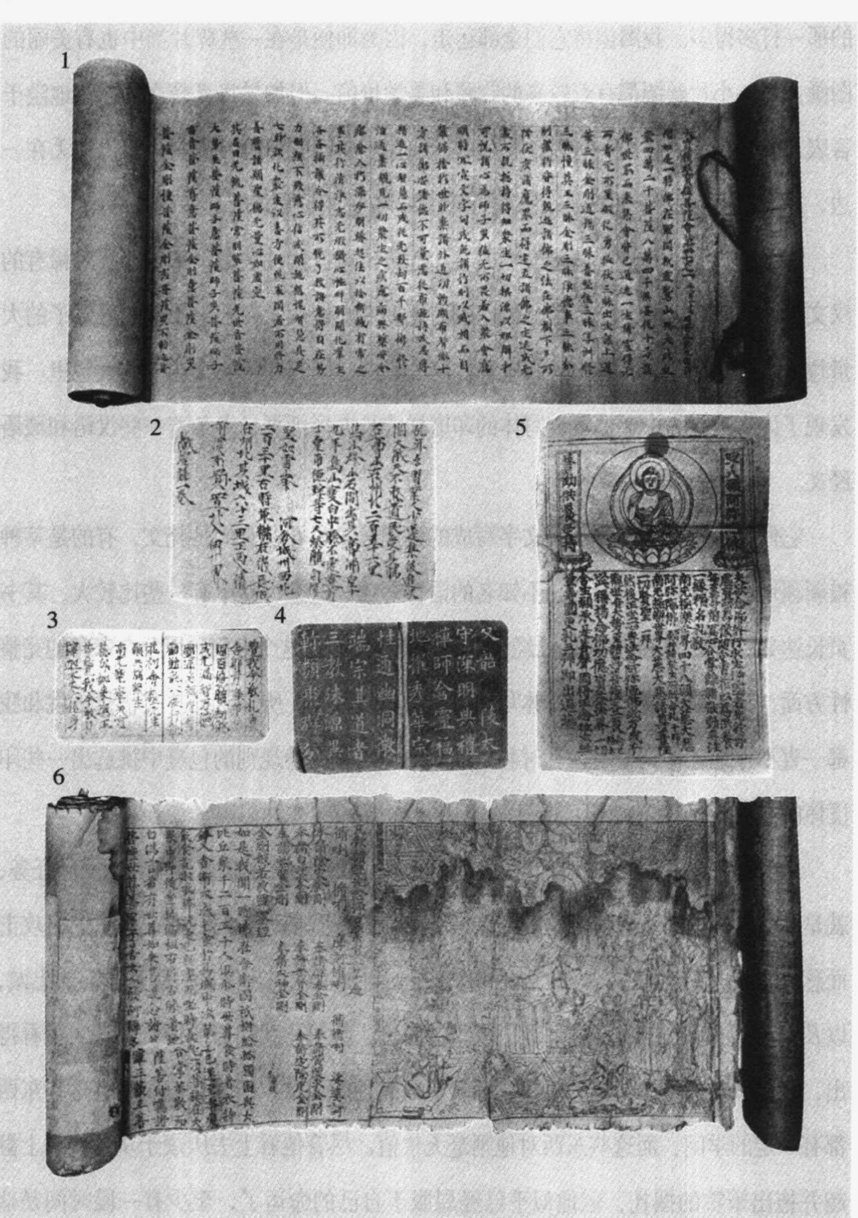
在此时此地，我也没有时间对这些精美雅致的图画进行进一步研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能从这阴沉的地牢中解救多少这样的画幅，以及它们现在的看护人粗心的处理方式会使它们遭受到多么大的危险。让我吃惊也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很显然他对这些唐代的图画艺术古迹并不十分重视。这样，我就可以尽快收起最好的图片，不管是画在丝绸、亚麻，还是纸上的，“以备进一步研究”，这些可要比第一捆

的那一打多得多。我渴望将它们全部运走，因为即便是在一些碎片当中也有美丽的图画，每一小片丝绸都有着较高的收藏和美学价值。但如果将喜爱之情过多地溢于言表，却是很不明智的。所以，我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剩余的仍然丢在一边，并下定决心一等到时机成熟，准备就绪，立即返回以取得更多的东西。

这个道士似乎对这些遗迹漠不关心。他希望通过牺牲它们，来转移我对稀有的汉文教规文卷的注意力。于是，他比以前更加专心地探索，并给予我他分好了的大量垃圾捆扎。我完全有理由感激这种仁慈的意图，因为在第一个这样的大包里，我发现了许多被称为中亚婆罗谜写体的印度样式长方形纸页，夹杂着一些汉语和藏语经文。

它们被证明是以 6 种不同文字写成的婆提形式写卷，有的是梵文，有的是某种被新疆地区的佛教使用过的、不知名的语言写成。这些写卷中有一些比较大，其书页长达 21 英寸，并且有一些已经被证明是完整的。在这个方面，以及在保存的完整性方面，我以前发现的婆罗谜体写卷都无法与之媲美。所以，第一天蒋师爷就和我都一直不停地工作到很晚，有时甚至能从中文或藏文卷规则的包裹中挑选出一些印度体的散页。

看着这些超乎预料的发现，我欣喜若狂，但我不会忽视眼前最主要的实际任务，就是要让我们的道士保持可塑的情绪，防止他们受到捐助者的打搅或恶意谣言攻击而感到恐慌。在蒋师爷友好的劝说和帮助下，再加上我一再保证对佛教学问的忠诚，以及我对我的保护神的记忆，我们取得了胜利，甚至比我期望的还要成功。我看得出，我们诚实的道士羞怯的表情逐渐转变成满足的表情，因为我们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学问，而这些东西对他则毫无价值。尽管他看上去厌烦于从这些书上翻越并拖出笨重的捆扎，但他似乎已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了，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191)千佛洞藏经洞里的中文手稿和木版印刷|

天越来越暗，当我们被迫结束当天的工作时，一大捆包扎妥当的写卷和染色的织物躺在我们的“阅览室”，等待我们将它运走，进行“仔细研究”——用我们外交风格的语言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王道士是否愿意冒险让我们运走它，而后在于是否接受我们的解释。如果跟他谈买和卖这样不圣洁的话题，我们就不可能运走它；同样明显的是，运输必须以极为保密的方式进行。所以，走出寺庙时，我们两手空空，身上也什么都没带，以免引起任何怀疑。

尽管我们都很疲惫，但我还是抽出时间与道士进行了一次长谈，是关于我们共同仰慕的英雄和守护神玄奘。我得到允许，到这位“唐僧”的崇拜者所看守的洞穴寺庙，观看属于他那个时代奇妙的神圣古迹和一些可能是唐僧游历印度时遗留的古迹。无疑，这是道士能够给予我的最高礼遇。当我们站在凉廊里的时候，我再一次让王道士有机会夸大唐僧不寻常的历险，就像寺庙墙上的稀有壁画所描述的那样。壁画显示的是玄奘从印度归来的情景，他的马背上载满了沉重的宗教写卷。这是我为了得到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古迹，而能够利用的、也是最有效的故事。这些古迹在被王道士发现以后，还没有能够得以重见天日。

道士多疑的神情暴露出，把这些神圣古迹埋藏在黑暗洞穴里并不是那位学者圣徒的原意，他应该让这些珍贵的遗迹大放光彩，但实际上他却没有研究它们、并实现它们价值的能力。于是，蒋师爷竭尽全力恳求道士，要他允许我这样一个玄奘的忠实信徒向西方学者介绍这些文学及其他方面的古迹，这样他的发现就可以为后人做出贡献，而他的这种行为不也正是一项真正的宗教功绩吗？作出这个让步，也要归功于慷慨的捐助，以帮助他恢复他所供职的石窟寺往日的辉煌，在受到暗示的情况下，他把这也当作一个次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不管这次以及类似的谈话给这位好心的道士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一直在犹豫，既担心他圣洁的名誉受到损害，又不愿失去这样一个类似交易的机会，而抓住




⑲千佛洞藏经洞里的梵文，中亚婆罗谜字体、粟特文、突厥摩尼教、突厥如尼文、回鹘文、吐蕃文（古藏文）文书

这样一个机会只需要他允许我研究这些无用的旧东西就可以了。待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我们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根据他自己的建议，我留下蒋师爷一个人，与他谈论如何保证秘密地对这些写卷进行挑选的问题。晚上很晚了，我听到谨慎的脚步声，是蒋师爷在查看是否有人来打搅我的帐篷。过了一会儿，他肩上扛了一个大捆回来了，里面装的是当天白天我所挑选的那些东西。

那个道士已经鼓起勇气，来满足我的期望，条件是除了我们3个人之外，不许任何人知道一点有关我们交易的风声，并且只要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发现物”的来源就不能向任何一个活物透露。他担心在夜间被别人在其寺庙范围以外发现了自己。所以，蒋师爷一如既往地热情而又精力充沛，独自一人承担了搬运的任务。又有7个夜晚，他在旁人都去睡觉了的时候来到我的小帐篷，轻盈的身形小心翼翼地扛回一次重似一次的捆扎，终于这样一次次地运完了所有挑选出来的书卷。由于我的双手只适合于使用笔和纸，这对我而言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得力的助手所表现出来的善良随和与乐于奉献的品质。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六章

## 被封闭的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

我没有必要费力去详细描述我们是如何日复一日，毫不懈怠地进行研究的，也没有必要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些我们满怀好奇所挖掘出来的发现物进行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就是：这个小礼拜堂里的东西存放得乱七八糟没有条理，并且就像那个道士所承认的那样，在清理这个密室寻找珍宝，以及后来在将有雕刻的厚板从西墙移到外面通道的时候，密室里面物品的原有摆放顺序完全被打乱了，一点也寻不见刚发现此洞时洞内情景的影子。同样，那个道士把某些捆包交给我们，也只不过是一个偶然。

现在也不是品味经由我手的那些物品意义的时候。要想对我所急于得到的那些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一定需要数年的专业劳作，并且我会尽力在以后的章节里简要介绍在研究过程中所分辨出来的这些古董的主要种类。尽管这些发现曾一度让我非常心动，并且帮我就这些古物珍宝的历史下结论，但在这里，我却只能仅仅满足于对其进行一个迅速的回顾。

经过第一天的努力之后，已经比较容易地了解这些捆包的特殊价值，它们里面全是些种类繁多的文章，写了字的织物、还愿物，以及各式纸张，并且显然是贮藏

起来，不再供使用了的。通过它们不规则的形状和捆扎方式，可以很容易将它们与包扎得很整齐的以中文或藏文写成的佛教经文区别开来。幸运的是，正是由于它们这种不规则的形状，那个道士在堆筑被我称为“书库堆”的时候，将它们放在最上层；并且也正是因此，他后来很容易就接二连三地找到了它们，并将它们搬了出来。

那些以印度语体和传统的婆提样式写成的原稿和散页，大多数就是从那些“混合”捆包中找到的。到目前为止，这类发现物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写在棕榈叶子上的梵文资料，它们竟然被保存得很好，大约有70份，一般都有20英尺长。棕榈叶上的字非常小，但写得工整漂亮，体现了古代文书的特征，并毫无疑问地告诉人们，这些原稿最晚也可以追溯到公元3~4世纪。这样的高龄，比任何那时已知的梵语原稿都要高，使得该文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它已被证明在北方佛教经文中很普遍。从材料上看，原稿无疑是用印度语写成的。然而，到底是哪一个朝圣者把它带进中国疆域的呢?

就像用印度字体以婆提风格写成的原稿一样，用印度婆罗谜写成的文卷也是装饰精美的杰作。这是一大卷的写卷，超过70英尺长，大约1英尺宽，封里全部是笈多体手写的婆罗谜文，封面的顶部画着两只大雁，它们相对而立，站在莲花上。匆匆地看了一下它的一部分，我只能发现用类似于北方佛教的不规范梵文写成的祷文，还有一长条佛陀的名单等等。但是我的博学的合作者霍恩雷博士以前做过的研究表明，以从和田周围地区发现的文物所展现的未知语言写成的文章数以百计，并由这些祷文点缀着，可惜这种语言现在已不为人知。霍恩雷博士是如何利用我从“千佛洞”带回的两篇双语文章，找到答案的，这在后面会提到的。

除了文学价值以外，这些以印度体写成的文章还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们有力地证明，在敦煌建立起以汉人为主体的僧侣群体，他们直到晚些时期，都一直与塔里木盆地的教友们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佛教最先就是从塔里木盆地传到中国的。

除了这个与“西域”的古老联系之外，许多藏文文章已经证明，在某一段时期，敦煌也曾经受到过来自南方的强烈影响。在种类繁多的捆扎当中，我曾看见过数以百计的西藏婆提经卷书页，显而易见它们是佛教经典作品中的某一部分。这些书页经常被混乱地搅在一起，但由于其尺寸大小与其他的差异很大——大约2英尺，甚至更长——这有利于以后将它们的顺序还原。

这些散页的书都带有线孔，但没有线将它们穿在一起。除了这些书之外，我不久又发现，在这个大书库堆里，相当大一部分藏文文卷仍然被丢在小礼拜堂里。由于不是一个藏文学者，我没有办法确信这些文卷到底是包括了圣典集的不同部分——这些圣典集通常被称为丹珠尔和甘珠尔——还是主要是西藏虔诚教徒所依然珍视的某些重要经文和祷告词。但我很容易就注意到，藏文婆提的纸看上去截然要比那些文卷的纸旧得多，并且其质地也与汉语文章的质地截然不同。所以得出结论是，婆提样式写本主要是从西藏输入的，而文卷则是由当地西藏和尚写成的。

但幸运的是，很容易解释藏文原稿为什么会在堵住的书库里；我也丝毫不怀疑它所提供的时间上的证据。从沙畹先生所解析的中国历史记录，也包括从在小佛洞最南端留下的公元1894年所刻的一个中文铭文当中，我了解到，敦煌的领土，以及甘肃的相当大一部分在公元759年曾一度被藏人征服过。但1个世纪以后，在公元850年，敦煌的世袭首领张义潮（Chang I-ch’ao），打破了藏人的统治，投向汉族皇帝，汉族重新建立起对这些最西端地区的某种宗主权。在公元10世纪初，随着唐朝的衰落，这种宗主权也就终止了。公元938年，当一个汉族派往和田的使团经过“安西”（An-his）和敦煌这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地方依然在藏人统治之下，尽管这里的人口主要都是汉人，并且他们是由当地一个曹姓的大家族的首领管理的。

西藏在敦煌的这种控制在公元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正处于顶峰。在这段时

期，西藏的确是亚洲的一个霸主，控制着甘肃的广大地区，甚至包括中国中部。正是通过敦煌，藏族从大约公元766年起逐渐侵占了东突厥的领土，并最终在公元790年，夺取了汉族的一些边远的要塞，这些要塞一直都是帝国用来保护天山南部和北部边远土地。藏族在公元9世纪后半期花了很大的精力以维持它在这里的统治，它在敦煌地区的影响的确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这种政治联系，能够有证据证明这种联系持续了2个世纪左右，这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堵住的山洞书库中竟有那么大一部分藏文原稿。

但是，这个古老的寺庙书库的外文图书并非仅仅来自于西藏南部。考虑到在公元860年以后，哈密（Hami）和塔里木盆地的东北地区建立的回鹘王国，在公元10世纪又扩张至甘肃，盛极一时，佛教在此也是非常盛行，我发现回鹘文写卷也在各种捆扎中出现时就不再感到吃惊了。有一些像是小四开本，从头至尾一页不缺，是以汉语书籍的方式写在薄薄的纸张上，纸张被折叠了，装订起来。我们发现它们中有一些有中文的注解和标题，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内容是佛教方面的，这个结论已经被我的朋友丹尼森·罗斯（E. Denison. Ross）博士——一个博学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这种维吾尔体是古叙利亚语书写方式的引申物。据说，伊斯兰教义在中亚的突厥人中传播之前，它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突厥语写作。我们在许多中文文卷的背面也发现了这种字体。一开始，我注意到，在这些字体当中，汉字并非很明显的行体，但比我所知道的维吾尔文的样本和原稿具有更固定的形状。直到我回到欧洲之后，我才明白这些文卷中的语言。它是伊朗的一种方言粟特，F.W.K米勒教授对从吐鲁番找到的原稿进行的研究显示，这种方言在现在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佛教文学的早期译本已经用过了。在佛教沿着古老的北方路线，以其特殊的语言传入中国边境的传播过程当中，这种伊朗因素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

在我遇见以早期的突厥体写成的文章片段时，我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佛教在这些方面必定显示出多国语言这一个特点。直到一些年以前，人们才从南西伯利亚鄂尔浑（Orkhon）河岸上发现的一个突厥王子的碑文中了解到这一点，这些著名的碑文是由汤穆森（V. Thomsen）教授解读的。很奇怪，在这繁多的捆扎当中，竟然出现了较窄的文卷，大约有15英尺长。它们是以古代叙利亚体的特殊形式精美地书写出来的，而最近在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古物揭示出，这种文体经常被用在摩尼教（Manichaean）写作当中。几个世纪以来，摩尼教寺院一直是佛教和基督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这种书写工整的文体果真包含了摩尼教的某些经文，可它在佛教的小礼拜堂里，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乍一看，这些用汉文写成的各种记录似乎并不吸引人，但实际上，这些写在废纸上的信件、和尚证书和记录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有了纸和书写方式的特别提示，我得以很快将它们从众多宗教经文中挑选出来。它们可能不仅会告诉我这些僧侣组织的细节问题——在这个山洞未被堵塞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僧侣组织在此地一直非常盛行——而且还可以说明当时政治环境和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在此时能从它们当中获取时间方面的信息。

汉族是一个有着文化和商业习惯的民族，它总是知道确切日期的重要性。所以，我很快就得以收集大量的有时间记载的类似官方的文件，从中得出明确的结论，知道这些贮藏的稿件和神圣的古物是何时被最终关闭和忘却的。由于大部分是9~10世纪的，并且往往是10世纪中期的，而只有一部分是10世纪末的，几乎没有是宋真宗（公元998—1022年）以后的，从中我就可以确定，这个房间是在公元11世纪早期被堵塞的。毫无疑问，之所以将它堵住，是由于担心它遭到破坏性的侵入；鉴于以上所说的时间的暗示，人们自然就联想到敦煌在公元1034—1037年被崛起的霸主西夏所征服的历史。在这些书籍当中，没有任何以西夏王朝在公元1036年

M. Aurel Stein

采用的文字写成的稿件，这更加有力地支持这种假设。

但是，这个狭小的被掩藏得很好的山洞，以前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充当了这些神圣的但又不需再用的物品的贮藏之地。我发现了许多很小但包裹得很仔细的袋子，里面装满经文的小片断和丝织字画的残片，这又为之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些不太重要的古物不可能在忙乱之中迅速地被系统化收集和整理起来。显而易见，在这些古物被最终堵塞起来的那一刻，这些被埋在小礼拜堂里的东西已经就是很有价值的古董了。然而，让我感到满意和确信的是，在1年以后，我们研究这些汉字作品集部分的时候，蒋师爷发现，有一系列的文卷稿件的确切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但即便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要想弄清楚其最早的时期，我们还需要回欧洲后，付诸相当长时间的专业劳作。

在我急切地对这些“混合”的捆扎的内容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道士到底会允许我们享受其这种恩惠多长时间——我为这些新鲜的材料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而感到兴高采烈，但同时又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们没有机会对那些艺术古迹和写卷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些稿件既不是用汉文写的，也不是用藏文写的，但我心中明白它们的巨大价值。我所能做的就是确信将它们分离出来，“以备进一步研究”，这是我们对运走这些卷宗的礼貌说法。但在当时，最让我困扰的是我缺乏汉学的训练。如果能将我对印度语一半的知识换取汉语的1/10，我会是多么开心啊！即便有蒋师爷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也不能保证没有遗漏什么有历史价值或文学价值的文件，因为这里的佛教圣典文学之类的东西太多了，多得让人感到窒息。

虽然如此，在这种难熬的困境当中，我还是可以窥见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一系列盖有住持方丈印章的和尚记录当中，我偶遇到千佛洞的古老名字，在记录当中被称为“三界寺”。随后，我发现即便是现在，这些洞穴寺庙也可以看出被分为3个部分，尽管这个地方以前的名称已为人们所忘却。后来，我又发现





⑲千佛洞藏经洞里的巨幅书卷，上有梵文经文和婆罗谜字体的“未知语言”经文

一些印有“三界寺”印模的完整的文书，并且它们很明显是大僧侣书库的一个部分。

我异常高兴地发现，作为卷首的文卷，有一个图片印着设计精美的楷书，保存得非常好，整篇都是印刷而成，上面显示出其制作日期是公元860年，这就有力地证明，木版印刷术的使用，并非是在宋朝开始的，而是比通常所猜测的发明时间要早得多。在公元9世纪，印刷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接着，在一些汉文书卷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精神饱满的图画和木雕，即使是没有什么专业经验的人，也知道它们都是美学的奇迹。

经过5天艰辛的劳作，我们迅速地对这些装满特殊价值的捆扎、图画和别的古物进行了研究和精选，这些都是我急于首先拯救的。幸运的是，当那个道士后来将他的这些珍宝重新塞进那个“黑洞”的时候，这些东西大多被放在最上层，或者是放在别的可以拿到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它们比起那些捆扎整齐的汉语和藏语文卷，没有那么方便堆码起来的缘故。但在靠房间墙壁堆起这样一堵由稿件堆搭起的堡垒时，我的任务并没有终结。这些写卷亟须整理出来，细细研究。尽管我们谨慎地款待这个道士，审慎地控制银子的“剂量”，这在目前已经成功地抵消了道士的胆怯与矛盾心理，但要想实现这一任务，的确还会遇到很多方面的困难。

清理整个小礼拜堂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可能早已使我们这位神职的“图书馆长”心灰意冷；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由于暴露这一小礼拜堂的风险增大了，王道士现在变得很倔强。然而，他已经逐渐做过一个又一个让步，我们注意不要给他留太多的时间来思考。

最后，带着叹息、悲伤和抗议，他在寺庙紧锁的外门后面，开始了这项艰辛的工作，并得到了其神职助手可以信赖的帮助。以前，我有时曾担心这位矮小的道士会对稿件堆起的墙感到闷烦。现在我却在想，不知这项整理工作是否会将他瘦弱的身躯累垮。但这项工作一如既往地进行，并且到5月28日晚上，有规则的汉语文卷

（总量超过1050卷）和藏文文卷，已被整理出来，摆在宽敞的寺庙的大地下室里。

几乎所有的捆扎都被紧密地缝在一起，并加以粗糙的亚麻封面。但其末端大都是开放的，当王道士一捆一捆地将它们从门里递出来的时候，蒋师爷和我只能匆忙地看其中的汉语文卷，瞧瞧是否有来自婆罗谜稿件的婆提书页，折叠的图画或者是别的特别的古物。如果有，我们就马上捡出来，把它们放在一边。但没有时间去具体地读每一卷，看它们在什么地方是否含有印度语或中亚语写成的文字。

考虑到道士越来越不情愿，这种做法不得不马虎一点，但尽管如此，我在坚持清理这些发现的繁杂的捆扎时，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报 王道士把低矮的黏土平台变成稿件墙的水平地基。尽管这些捆扎经受过重压，我从它们中间发现了大量大小各异精美的丝织画卷，还有一些漂亮的刺绣。刺绣中有一个在设计、色彩和质地方面都相当让人注目，画的是在菩萨之间的佛陀，有实物大小，在以后我会谈到它。

或许，王道士已经经受并且急于结束这种辛勤劳作，或者是他担心我们去碰那些珍贵的汉语经文。无论如何，此时此刻这个道士开始了他的生意，也就是说，他可以以此为其寺庙求得物质捐助。与此同时，他严正声明不可能在神圣的经文或“经”（Ching）上作出转让。我自己很高兴抓住了主题；因为我很久以前就认识到，我有责任尽自己所能进行研究，拯救所有的这些写卷，使它们免于被这种保存方式所散布和丢失。

但与此同时，我又不能对困难和反对视而不见。我不能明确估计这个“书库”中的汉文圣典经文的文学价值。毫无疑问，它们的内容会在佛教三藏（Tripitaka）经文的完整版本中被发现，这些完整版本在几个世纪前的中国、朝鲜和日本都印刷过。我更不能挑选这些经文，由于某种原因，它们是属于古物研究家或文学家感兴趣的东西。运走这汗牛充栋的写卷，必定会让整个事情曝光，并且这可能会在敦煌引起宗教徒的愤怒，即便这不会立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也会使我在甘肃的进一

M. Aurel Stein

步研究工作受到阻碍。

尽管如此，我做好准备，要面对这些风险，而不是放弃拯救这些所有贮藏品的努力。蒋师爷尽管因为自己对当地环境比较了解而生疑虑，他还是竭尽全力劝道士说，将洞里的收藏运到大英国去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会得到佛祖和阿罗汉们的赞许。他也催促说，我准备付大量的金钱（我暗示会出40个马蹄银，大约5000卢比，并且如果需要的话，我决定付两倍这个价钱，只要不超出我认可的数量即可），这些钱足够王道士回到他的家乡——遥远的山西省过上宁静的生活，如果敦煌变得太热的话。或者，还可以把这笔钱用在寺庙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增建和装修那座寺庙。

但是，一切都是白费。想到要丧失他心爱的“经文”，不管是全部地还是部分地，这个忠诚的信徒就感到害怕。在此之前，他还是听之任之，对我收集这些特别



⑲千佛洞藏经洞里的古代书卷，主要用中文写成，盖有原始封套

的艺术或古物珍宝视而不见。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有些紧张了，我需要谨慎地处理这件事，以平和的方式来排除“绝交”的可能性。那个道士所担心的是，他的资助者会发现这些经文变少，而这些资助者曾经公开捐资给他，用以清理和修葺寺庙；这样的话，他8年来辛辛苦苦在这个地区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位就会随即永远消失，他终生的事业也就被毁掉了。他甚至含含糊糊地责备自己，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一些神圣的东西，而他的外行的资助者们对这些东西同样拥有支配权，并且他坚持声称，在以后再移动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先与他们商量一下。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不怨恨他的种种顾忌和反诉，更不会去反驳。

在我对这繁多的书捆包进行研究的时候，为了争取时间，这种讨论时断时续竟持续了两天。直到第二天夜晚，我才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但在第二天一大早，我回到寺庙打算对装着中亚和其他外国文卷的包裹进行深入研究，却抑郁地发现，道士由于感到心绪不宁，已经连夜把几乎所有的文卷包捆全部运回阴暗的“监狱”中去。他闷闷不乐的情绪使我们感到更为紧张和焦急。我们也有优势，就是知道他攥住这么多价值非凡的写卷和古物就是为了获得大笔的金钱，所以我最终仍有理由说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掌握了物质性的胜利。

除了我从众多捆包中挑选的那些宝物以外，他还同意让我再搬走50包保存很好的汉文经文卷和5包藏文卷。所有这些古物换4个马蹄银，大约值500卢比，由这位道士收取；估算了一下我能运走的这些古物的价值之后，我觉得自己这笔交易很划算。当然，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之后，我争分夺秒地把这沉重的中文和藏文卷运离了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无私的蒋师爷都一直每夜往小帐篷里运送这些“精选”；但以他的体力要完成这样一项工作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向可靠的随从依布拉音伯克和提拉伯克寻求帮助。在陡峭河岸的遮蔽下，我们通过两夜的来回，终于将这满袋满袋的写卷全部运到了我的贮藏室，我们做得很隐秘，就连自己人都不知道这

件事。

道士的赞助人很长时间没从绿洲来这里了，这增添了他的不安和焦躁。现在，他赶快到敦煌地区去化缘。一个星期以后，他回来了，确信他的秘密没有被人发觉，他的精神状态恢复如初。所以，我们得以让他做出进一步让步，允许我再多挑选 20 捆的写卷。后来，到了要装运时，这批写卷占了 7 只箱子，而图画、刺绣和别的许多古物又装满了 5 只箱子。包装这些东西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我整日忙忙碌碌，根本不可能在山洞里进行详细准确的研究。要想在敦煌找到足够的箱子，又不能引起怀疑，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事情。幸亏我以前料到有这一点，已事先准备了一些空箱子，剩下的一些通过欺骗和安装也都弄到了。所以，一切事情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现在，那个善良的道士终于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他几乎也相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西方学术的需要，是要挽救那古代佛教文学和艺术的遗迹，而这些古玩由于得不到当地的重视最终可能会损坏和丢失。在我最终要跟千佛洞说再见的时候，他快活而消瘦的脸庞上露出害羞的表情，却又满足安详，我们友好地分手了。我相信他的内心真的非常平静，因为在我回到“安西”的 4 个月之后，他同意为远在西方的“博学寺庙”再送来 200 捆中汉文和藏文写卷。但我真正感到宽慰的，却是在这从奇怪的贮藏之地拯救出来的 24 箱写卷和 5 箱画卷及别的艺术古玩被安全地运送到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七章

## 藏经洞的佛教画卷

在“千佛洞”匆匆地挖掘和收集的那段时间里，以及在后来的探察过程中，不可能抽出时间来对我最新的发现作出细致的研究。当我知道它们已经非常安全地包裹了起来，并且运离了沙漠和大山时，我就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自从这些宝贵的箱子在大英博物馆打开以来，这一年半的时间还不足以对里边的东西进行基本的分类和鉴定。在材料方面有巨大的麻烦，并且我的各个研究领域的同事们要合理地安排和研究这些材料很可能需要付出长期的劳动。所以在目前，我们只能尽力简明地解释一下这些遗迹的主要种类，即便只是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道士的山洞里精美的佛教图画艺术遗迹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自从它们重见天日以来，并且考虑到其艺术趣味和重要性，我要首先对它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它们大多被画在丝织品上，而其他的则画在亚麻织品和纸制材料上。精美的丝织薄纱应用广泛，这事实本身就颇令人满意，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猜测作画所用的材料越好，就越会重视和珍惜它，并且画技也就越高，这种期望也的确没有被辜负。但是，在我意识到这种精美的材料为迅速研究和安全运输带来的困难有多么大之前，我没有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事实上，我偶然得到的大捆资料当中，有相当多狭长的画卷被发现整齐地捆扎在一起，这些丝织材料仍然柔顺软和，所以将它们一层层拆开时不会受到损伤。这些丝织品夹在大量的破布和废纸里，正好有利于保护这些精致的织物免遭重压和硬化。然而，在其他捆扎中的图画就惨了，尤其是我从沉重的中国图书“捆”卷中拿出的那些图画，很清楚地显示出它们曾经遭受过多大的重压。它们被挤成紧紧的小捆，那么坚硬，那么脆，以至于不可能立即就把它们打开，我也不打算把它打开。

丝织品上的巨幅图卷面积达到6平方英尺，很自然，在900多年的重压下，受到的损伤会更大。我甚至不能冒险去打开那些看上去或多或少比较规则地折叠的画卷，担心加重了折痕处的破损程度。这些巨幅画卷中，大多数是毫无规则地糅杂在大件的包裹当中，对此，我们不可能立即判断它里边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大量的证据，如外层裹着厚厚的灰尘，用纸衬背，以及其他的修补，显示出它们当中有许多被用过很长时间，并且被薰香熏过，或许它们被粗心大意地放在黑暗的角落中已经很长时间了。

要想将这些极易碎的丝纱安全地包在一起，是很困难的一项任务。尽管它们运送途中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但在经过大英博物馆专家之手进行特殊的药物处理之前，我们还是不能妥善地打开和检查这些画卷，不管画卷是大是小。实际上，这项工作需要特别的细心，经过赛迪尼·科尔文（Sidney Colvin）爵士领导的印刷和美术部为期一年多的工作，这些包裹当中已有2/3处理过了。

这项工作已经表现出了诸多的惊人之处。从一些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卷轴当中，在这些皱巴巴的、易碎的丝织物恢复其柔顺时，竟然全部是精美的画卷，有完整的，也有残缺的。一些较大的卷中，遗失的部分已经在别的卷中找到了。至于这些画卷的总体数量，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准确估算，可能会超过300幅。要想估算出永久保存这些画卷所需要付出的劳动量，就更加困难了。目前，我们却只能满足于把它们

装裱在有大网眼的精美薄纱上，然后再把它们固定在玻璃片下，以这种方式保护这些丝织画卷，而那些大宗的则暂时用日本纸裱褙起来，然后再以远东的传统方式将它们卷起来。

基本的恢复和保护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已得的材料足够我们对这些画卷的总特征和艺术价值形成一个总体的概念。这些细致的研究和解释一定会引起疑惑，而不仅仅是引起兴趣。很明显，这些从敦煌千佛洞收集来的遗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至今所知道的佛教图画艺术的代表作品有很大的差距。山洞里的图画和壁画中，绝大多数都毫无疑问是唐代（公元7~9世纪）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几乎没有佛教图画的真正样本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还有一些明显的地方影响，长久存在于这些绘画艺术当中，尽管它们对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原型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当我得知，我的老朋友，佛教插图的重要权威人物福彻先生（M. A. Foucher）与我合作共同研究这些遗迹，我更感觉如此。我非常感激他，以及我的艺术助手安得鲁斯先生（F. H. Andrews），在以后讲到的观察活动中，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在知道这些需要多么简洁的手法时，我愈加高兴，因为我可以通过其颜色，真实地再现其样本制作的方法，解说各种各样的图片。

所用材料的不同，并不反映主题或处理方式的不同。更加细致地观察这些图片，不管其质地如何，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外在的区别。这些小片如果完整地保存下来，几乎都是长方形的，有着三角形的章首，两端都有彩带，下面粘着木片或者竹片。

底部的彩带由一片上了漆的木片保护着。这种安排，以及对丝织品和亚麻织品两端图画的重现程度，表明这小旗本来就都是用来挂在内殿和门廊的圆顶上，在空中飘扬的。一些较大的经幡，只有一端上了涂料，并且往往被装裱过，但都没有彩带或者别的装饰物，它们显然是打算用以挂在寺庙墙壁上，或者入口处的。这些经

幡里所表达的主题往往与成群的神仙或者佛教中天堂的景色相关；但经幡上只绘有单个的神灵，或者是佛陀生活中一系列景象。佛陀生活中的景象要少一些，但在主题和美学旨趣上同样地受到了第一位的重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那些印度佛教艺术所挑选的最喜爱的话题。它们通常来自于菩提或最后大彻大悟之前佛陀的那段生活。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在乔达摩王子诞生的全部内容：他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的奇迹；王子后宫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触发其事业的4次悲惨邂逅和他逃离王宫的经过；放弃世俗生活以后发生的事件，以及6年的禁欲生活；还有最终大彻大悟之前在尼连禅河（Nairanjana）河岸上的情景。就像福彻先生所说的那样，“简而言之，我们几乎又遇见了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学派之后古典情节的全部目录”。最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对待这些传统主题坦率的中国方式。在当地艺术家的手中，这些画像发生了变形，就如同在意大利和法兰德斯的画家手中，基督的传说经历了改变是一样的道理。

在其中一幅插图中重现的两卷画幅，可以用作解释这一组有趣的图画。它们都没有彩带之类的东西，但看上去却是完整的，只是有一点轻微的破损。右边的这幅，原画大约2英尺长，在底部有一片捆扎得很笨拙的竹片，粗糙地用一条红线缝住，用以拉紧画幅。再往上一点，是一处陈旧的撕口的痕迹。在上面的画板上，我们可以看见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王后所做的梦，这出现在释迦牟尼被怀孕的传说当中。在下面我们看见王后被放在担架上送往蓝毗尼花园，她的儿子注定要在这个花园里诞生。抬送她的几个人快速前进的步伐中融入了画家相当高的绘画技巧。

接下来是乔达摩王子在他母亲生他时的传奇场面。这个场面一丝不苟地遵照着传统的细节而描绘出来，但我们看得出来，其中利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技巧——这是干得哈拉（Gandhara）模式所没有的——它巧妙地运用摩耶宽大的衣袖遮挡住了这个圣洁婴孩的面貌。这种画法在这个场景的其他画卷中反复出现过多次，并且在当

地传统中已经成为固定的画法。在画幅的底部，我们可以看见乔达摩向他母亲迈出第一步的奇迹，在这个小孩走过之后，地面上迅速长出莲花来标记他走过的每一个具体位置。最后3个画板上的情景在其环境设置上彻底展露出中国风格，距离上作了修改和平衡。在底段的画板上，椭圆形装饰物上布满了这个中国传奇的具体情节，然而上边对应的椭圆装饰却是空白的。

插图左边的画幅，边缘是狭长的华丽的装饰，在山洞壁画中，我也经常见到过这种华丽的装饰。上面的部分展现的是有关乔达摩王子希望从尘世束缚和利诱当中解脱自己的著名传说，这是他大彻大悟的一个基本前提。它还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黑夜里趁其后宫所有的女人和诗人以及大门外边的士兵沉睡的时候逃离宫殿的。我们看见后来的“佛陀”骑着他最喜爱的骏马在城墙上空向自由飞奔的情景。他最忠诚的信徒阐陀迦（Chandaka）跟在他的身旁。骑士身影下的群山和森林上空是深蓝色的，高超地表现出逃离王宫的时间。在图画的下半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净饭（Suddhodana）国王，即乔达摩的父亲和他派遣的4个密使。这些密使被派往追回王子，但他们没有发现他，于是他们被带到国王和大臣们面前接受审判。他们的胳膊被绑在背后，在他们背后站着两个身穿紫色袍子的行刑官，两人手里握着行刑棍，就像我在敦煌长城的一个驻地发掘出来的那个一样。

尽管佛陀生活故事的场面让人着迷不已，但由于这些对原始的印度传奇中所有人物形象的忠实再现以及中国背景的美学奇迹，我还必须继续研究在佛教万人庙中发现的单个神灵的画幅，这些画幅在数量上又较之前者更多。它们种类繁多，但由于这些人物旁边只有些描述性的椭圆装饰，即便是具有特色的徽章也没有，所以这些人物的准确身份对佛教肖像画的专家而言是一个难题。但即使是在努力分析这些细节之前，我们也很容易分辨出他们代表的3大类神明人物：佛陀、菩萨和世界守护神（Lokapalas）。

M. Aurel Stein



⑲千佛洞藏经洞里唐朝着色丝绸幡画，上有菩萨（Bodhisattvas）像

很少一部分图画画的是乔达摩佛陀或者在以前或以后的轮回里的情节，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早些时候，别的神灵形象在佛教朝拜中就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尤其是在大乘体系中，这一体系从犍陀罗起穿过中亚，直至中国，大为盛行。它最喜欢的对象是菩萨，或者称为“佛陀的选择”，这在我们的画幅中已经大量体现出来。对服装和珠宝的钟爱，对以前和以后佛陀的王子化身而言，都是很正常的，除了一个以外，地藏菩萨（Kshitigarbha），他总是穿着和尚的袈裟出现，这一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某些菩萨是以印度的风格出现的，由于具有特色的徽章和色彩，它们很容易就被认出来。福彻先生最先研究并出版了来自尼泊尔佛教旧原稿中的微型。因此，我们经常碰见文殊菩萨（Manjrsri）骑着他的狮子，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骑着他的大象，金刚手菩萨（Vajrapani）带着他的闪电，弥勒菩萨（Maitreya）拿着念珠，以及佛教中其他著名的形象。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在中国佛教中，她被转化为“观音”，是受人爱戴的“慈悲女神”。在姿态、身形和服装方面，这些都十分忠于原始的风格，就如同希腊的佛教艺术已经固定化的那样。这种对传统风格的坚持，在所有宗教插图中都有类似的表现。这些众多的画幅当中，菩萨们都无一例外地作了修改，后来发展成为中亚的佛教艺术或者说是中国风格，这一点非常有趣。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后面的这些菩萨图案，往往在设计和施画上要优越得多；但是对它们进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困难的。就如同手持香炉或透明钵的菩萨一样，有些种类显然是新的神话创作。在其他图画里面，我们也试图寻找一些可以辨别的特性，但也是徒然。如另一幅插图，它的画幅除了缺少彩带以外，实际上是非常完整的，里面有两个在颜色上再现的生动形象就是如此。左边的菩萨波浪型的身形和雅致的服装，以及装饰品，表明它们与在新疆废墟中发现的壁画和粉饰雕塑

没有实质的区别。从腰间垂吊下来的浅粉红色长袍，深绿色类似衬衫的长袍半遮着胸膛，圣带外面是紫色，里面是绿色，优雅地绕在肩膀上，身体上和胳膊上，都对应着中亚图画和雕塑中印度佛教圣徒所穿的传统长衫。然而，中国的影响通过帐帘优雅而随意地垂落和流动飘逸而表现得尤为明显。

优雅的动作，自由流畅的线条与搭配和谐的色彩，在右边那位菩萨优美的身形中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既没有可以辨认的徽章，也没有别的任何标记，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这个菩萨。它是一个侧面的全身像，画中的菩萨正大步地向前跨出。他右手举起，拿着一个粉红色的东西，很大一部分菩萨精美的发饰被遮住了，它的姿势与菩萨垂下的右手去抓飘起的衣服正好达成平衡。身体的运动通过泥釉彩饰法表达出来，鲜红的长袍旋绕在腿和脚上，圣带在他的背后回旋，它也通过天棚上悬挂的配玉流芳的摇摆和环绕头顶珠宝的光环所反映出来，惹人注目的曲线形和精美金饰显然是中国的风格。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里的光环仅仅是没有色彩的圆盘，而不像通常那样是色彩绚烂的圆圈。

中国本土艺术的风格似乎将尘世4个地方的守护神都兼容并包了，他们看上去已经是中国佛教受欢迎的崇拜对象，人们对待他们的许多画像总是小心翼翼的。他们都穿着战士的服装，从头到脚武装得严严实实。中国原稿提供的微型彩饰画使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认出北方之王——多闻天王（Vaisravana）带着他的戟，东方之王——持国天王（Dhritarashtra）手持弓箭，南方之王——增长天王（Virudhaka）手持棍棒，西方之王——广目天王（Virupaksha）手持长剑。

另一群小神在画幅中出现得也比较多，他们是“地区的保护者”或者称为“护法神”（Dharmapala），也长着中国人的样子，尽管他们的特征来源于希腊佛教雕刻。为了表现金刚手菩萨（Vajrapani）的愤怒，他们的肌肉很发达，所以，就如福彻（Foucher）先生观察的一样：“他们让人想起日本强壮的妖魔，如同想起喇嘛教

(Lamaistic) 崇拜的可怕妖怪。然而，需要指出他们看上去既不是四肢过于发达，也不是凶恶下流那种。”总之，让人轻松的是，画家们表现出来的这些形象不论是在画幅上，还是在壁画中，它们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女性的神仙尤其少。“敦煌图画向我们揭示的神殿显然是迎合了其施主的口味，并且是在和尚们悉心指导下建成的。”福彻先生的话讲得的确很公正。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八章

## 巨型绘画和其他艺术珍品

这一类绘画大都尺寸巨大，主要用于墙壁的装饰，他们几乎都对神祇进行了精巧细致的描绘。我们发现这些绘画不但蕴含着，同时也显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类绘画的许多作品中，我想先提及一幅成功复制原作的精美绘画。它是第一卷中的彩色卷首插图，几乎一模一样地再现了这件罕见艺术品的原状。这件绘画作品描绘的是北方地区的天王，多闻天王（Vaisravana）。他乘着云朵飘过了海洋，后面紧跟着一群天国的侍者和恶魔。在他的左手边升起的云朵上是被缩小的佛塔，多闻天王右手持戟，而在他的肩膀后面是一团团的火焰，表明他正在全速前进。他身上华丽的锦缎服饰和迷人的金色光环显然经过精心的制作。由于复制品的尺寸比较小，所以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另一方面，精湛的工艺也为我们展示了国王身边众多变化多样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神情。每个恶魔身上所使用的个性化的手法，好像使这些怪异的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像希腊佛教艺术中一幅著名的描绘恶魔（Mara）部队的作品。在上面所提到的绘画作品的最左边，是一个年老的恶魔战士，正准备射箭，他的目标是一个即将逃到天国的半人半鸟的迦楼罗（Garuda，佛教典籍记载中的金翅

鸟——译者)。大海里巨浪翻滚，显示了无穷的自由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日本精美的艺术。远处的背景是弥楼（Meru，即须弥山——译者）山，山脉代表着印度神话中的喜马拉雅。整个故事场景由“北方王”来收尾。整幅绘画作品表现了制作者娴熟的技巧，相信它在远东艺术的任何一派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

绢画中用来表现佛教天国故事场景的居多，但是由于它们大都场面巨大，并且人物拥挤，所以在这里很难详细描述。通常佛陀（Buddha）坐在莲花盘上，处于整个画面的中心，精巧的结构大都类似于中国寺庙的阶梯形台阶，如来佛陀周围是许多的神祇和天国侍者。尺寸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的两个或更多的菩萨(Bodhisattva)，坐在如来佛陀的身旁，或被对称地摆放在分开的亭榭里。在下面装饰精美的台阶上，我们可以看见一大群头顶光环的人，它们代表阿罗汉（Arhat）或神灵。漂亮的姑娘随着犍陀罗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她们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组成了气氛欢快的场面。装满莲花的罐子经常出现于台阶之间，远处美丽的景物为天国酒宴的欢快气氛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背景。

没有长时间的研究，我们很难确定每幅绘画所要表现的佛教神话故事是形形色色天国故事中的哪一种。从艺术的角度或宗教研究的观点看，也同样如此。不管它是世界最西边遥远的天国净土（Sukhavati)，还是垂死的玄奘所幻想的获得重生的地方，弥勒（Maitreya）天堂，显然这些绘画的虔诚的供奉者和制作者所期望的极乐世界，是一个包含人世所有好的东西的人间天堂。虽然这种幻想与“大彻大悟”的真正目标，即真正的涅槃（Nirvana）还相差甚远，但是我们确实能感受到所有这些绘画作品都透出庄严、宁静、欢愉的气氛。她们的建筑装饰显然是中国式的，这一点很有趣。但是整体的设计和神祇的形象，比如说他（她）们的模样等，是完全来自于印度和中亚的模式。不管怎样，将我在“千佛洞”所拍摄的壁画照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许多作于丝绸上的大型绘画都是尺寸缩小后的复

制品。

根据其中一幅5英尺高的绘画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绘画的颜色效果。图画的右边是文殊师利菩萨（Bodhisattva Manjusri），骑着由印度黑人牵引的狮子；左手边是另一个普贤菩萨（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他骑在也由印度黑人牵引的大象身上。作品上方是一排站着的4个菩萨（Bodhisathva），表示观世音（Avalokitesvara）或中国传奇中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绘画的底端是供奉人和他们家中妇女的画像。令人好奇的是，他们中有人的装束像和尚。中间的汉语题记为我们提供了事实依据，我们从中知道这幅画制作的时间是公元864年。

许多绘画作品并不属于上面所提到的种类中的任何一种，但它们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在这里，我仅仅提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卷主要描绘的是佛教地狱中审判的故事场景。2个囚徒被推上了审判席，他们被强制戴上“镣铐”或木枷，当时中国的律法经常使用这些刑具，而2个审判官同时一手拿着圣书，另一只手捧着如来佛陀的小雕像，一副庄严和拯救世人的样子。

我还想说一下我从封闭的石窟里找到的有关类似图画艺术的其他一些作品，虽然它们仅仅在某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我指的是刺绣。它们中最主要的是一幅差不多有9英尺高的壮观画卷，这幅画在第九版复制为彩色。作品中央的人有真人般大小，神情很庄重，姿态颇具古风，他就是如来佛陀；后面的石头表明，此场景是发生在Gridhrakata或“兀鹰洞”（Vulture grotto）。在如来佛陀的生活故事中，此地非常有名。离佛陀最近两侧的2个人，看上去一脸沮丧，也许是在石窟被封前希望得到照顾和保护，看上去他们代表的是最早的掌管戒律的官员。右边年老的迦叶（Kasyapa）依旧能被认出。再向两边，是两个描绘精致的菩萨（Bodhisattva），他们一脸虔诚。在这个地方最古老的壁画中，有一些与上述场景非常相似。在他们的上方，有两个漂亮的乾达婆（Gandharvas）站在云彩上，撑着佛陀头顶上的遮盖。绘

画的下方是供奉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妇女，他们也是一脸崇敬的表情。在一条黄色条带的两侧本来应该绣着题记，不幸的是现在已经丢失了。

刺绣所使用的丝绸，其颜色一直保持着光鲜和炫目。它之所以比复制品要好很多，是因为复制品有其不可克服的工艺技术方面的一些不足，不能完全表现其原貌。我们想把这幅画缝到一块新的画布上，这是很有必要的。这项工作由在刺绣艺术皇家学院学习的温特（E. A. Winter）小姐承担，她凭着自己所学的技能，细心制作，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可见，制作这幅作品所需要的时间要多长。在最后得到妥善保管之前，这块刺绣珍品就有破损之处，这在早些时候尝试修补时就已发现，这进一步确定了先前由其他方面考证中得知的、它所具有的宝贵价值。

⑯千佛洞石窟寺庙里现代人绘制的中国风格的灰泥像，把玄奘描绘成阿罗汉（Arhat），旁边为侍从



M. Aurel Stein


⑲千佛洞藏经洞里古代坐垫表面的丝绸刺绣

在这里，我还得多提几句精美刺绣坐垫封面。它的花饰不禁让人惊叹，不仅因为其颜色鲜艳和谐，而且它与新疆和中国的现代刺绣业的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不是有封洞的确切时间，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室内工艺作品是在公元10世纪制作的。

在对这些古文物进行研究时，引起大家好奇的是有关丝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是从那些在奇妙的洞中发现的文物中找到的。据发现，数量极多的三角顶饰已经和它们绘制过的条带脱离，被放在它们的主体部分里。它们上面织了多种色彩相结合的图案，这与在埃及和拜占庭时期的基督教古墓中发现的丝织品样式极为相似。这些多种色彩相结合的图案已为西方的考古学家所熟悉，通常认为是西亚“萨珊风格”的传统设计。

我们发现了有一幅绘画设计精美，采用玫瑰花饰和棕叶饰作为图案，还加以均匀排放的飞鸟作为点缀；另一幅画是由铃铛和四叶饰构成的美丽的菱形花纹，那些铃铛和四叶饰呈亮绿色和粉色，并用雄鹿或天鹅的素描作为装饰。这些奇特又恰如

其分的编织图案，以及它们的颜色，让人联想起从埃及的早期基督教徒坟墓中发掘出的古代丝织品。史特拉兹高斯基教授在中东艺术史研究方面颇具声望，他称这些发掘所得的丝织品图案为“科普特”(coptic)。他对我的材料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的来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洞中很多还原物中找到的一些锦缎的残片，其风格也与它有密切的关联。对这些已经展出过的残片珍品的图案进行全面修复，应该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在“千佛洞”中发掘的绘画中，有几幅特别精致的丝织绣帷，这使丝织文物引起的问题更为有趣。其中一幅是一手工编织品残片上绘制的，这一残片构成精美的三角顶饰飘带的边缘。暂不考虑其制作的精细，这幅绘画的设计大意是一个鸭子戏水的池塘，周围种满了各种不同种类的色彩迷人的植物。这些也与古埃及和近东所使用的图形有相似之处。

另外一件作品是一件保存完好的丝绸封面，大约2英尺长，用于写卷卷轴。它的丝绸绣帷呈窄条状，质地精良，缝制样式精美。整个图案采用了棕叶饰和相连的漩涡饰，显示了它的中国特征。这件艺术卷轴封面好像是特意设计的，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令人惊奇的疑问的答案。我们发现它用厚制锦缎的宽条作为装饰，显示了西亚“萨珊”风格，两只飞着的狮子卷着尾巴，相互对视。这种手工编织的封面，显示出不同风格的交会，似乎也告诉我们远方的文明也曾经传播到了敦煌，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这些具有“萨珊风格”样式的丝织锦缎来自何处一时还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绘画的设计借用了古希腊艺术的风格，就如同米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的古代国家）和伊朗采用古希腊艺术一样。但是，根据这一点，我们还很难断定，这些与埃及发掘的“科普特”文物有相似风格的绘画，是产于或来自于米索不达米亚或波斯“萨珊风格”流行的地区。在那里和近东，无论生产何种丝绸，都是

开始于公元550年，那时养蚕业被引入拜占庭王国，而养蚕业一定是来自于中国或来自于和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丝首先长途跋涉，从盛产丝的中国运到波斯，然后再将织成的锦缎运回中国的边疆——敦煌？这一过程，现在总计需要至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从中国离敦煌最近的产丝省到敦煌，在本世纪末只需要不到3个月的时间。而且，中国在汉代以前，丝织业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在敦煌长城发现的这些精美丝绸和锦缎残片就可以完全证明。

十七八世纪，中国陶瓷业生产、出口符合欧式设计的瓷器，现在中国又想谋求长期的对外贸易，因此精心模仿“西方”的样式，这是否有可能呢？或者，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早期传播养蚕业、作为工业中心的和田。和田和阿姆河地区，与伊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是否有可能生产精美丝织品，而且其风格极为接近“萨珊风格”呢？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更多的研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隐秘的寺庙石窟中，我很高兴我们发现的文物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M. Aurel Stein

# 第六十九章

## 一座多语种的“寺庙图书馆”

在这座隐蔽的“寺庙图书馆”中，所保存写卷的模式和特征证明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种之间在过去曾经相互影响。对它们迅速浏览之后，我们就足以了解在亚洲相互联系的文明中，佛教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在过去相继的年代里，佛教对敦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由于印度是佛教教义的发源地，同时我个人比较青睐关于古印度各方面的作品，因而我想先谈一下历经磨难而保存下来的梵文写卷，它们都属于佛教宗教文学。虽然它们的数量和流行范围相对比较小，但是瓦利·普森（L.de la Vallee Poussin）教授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研究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关于北方佛教梵文著作历史的经文，而这些经文由于佛教的变迁在印度国内已经全部遗失了。我先前提到了一本很大、目前仍然保存完好的、写于棕榈叶上的写卷，该写卷中含有一部著作的一些片段和著作的年代记载。毫无疑问，这本具有特殊价值的写卷出自印度。其他的写于纸上的写卷显然是过去那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经文修订本。

卷轴和婆提文书数量极多，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古文学方面的价值，

它们大都写于纸上，所用的是在中亚地区使用的各种印度婆罗谜字体，但不是印度语。它们的写作特征很自然的会让我们把这些写卷与一种或几种曾经在新疆东部使用的尚知语言联系起来。20年前，我的朋友霍恩雷博士第一次接触到出自库车和和田的古代写卷残片后，开始对那些未知语言进行研究。对此，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可以将新的材料交给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学者，他是研究这方面的领域中的开拓者。由于这些材料数量非常多，所以初步的分析研究尚不能完成。但是，到目前为止，由霍恩雷教授出版的简明扼要的短评，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的成果，为将来的进一步阐述打下了基础。

至今为止，经研究发现，不是所有、但其中大部分的经文所采用的是一种“未知语言”，这在以前的调查中似乎已经了解。这种语言曾在和田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使用，但都用于宗教文学和非宗教事务的记载。虽然说这种语言的印欧性已经逐步为人认识，但是仍然难以让人理解，也包括它与印度和伊朗语言群之间的联系。因此，霍恩雷教授成功地鉴别出两本保存完好、内容俱全的书，金刚能断经（The Vajracchedika-sutra）和大阿弥陀经（The Aparamitayuh-sutra），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发现，它们是梵文原作中著名佛教经文的原版翻译。最终，我们发现渴望已久的“双语”经文。如果没有它，我们似乎不可能揭开“南部未知语言”这个谜。

我们发现这些写在汉语卷轴背面的经文前面，经常是复杂的字母表和音节符号表。开始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但是霍恩雷博士的研究证明它们具有重要的古文学价值。这一发现一下子解决了我们阅读那些常使用中亚婆罗谜文字中草体经文的困难。

许多卷轴和婆提残片，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西方佛教传播的领域。这些卷轴和残片所使用的起源于叙利亚语的文字，很像以前回鹘所使用的文字。在这里，

这种文字用于一种伊朗语的记载。来自柏林大学一位十分精通东方文化的学者穆勒教授，第一个发现残片中文字的相似性。这些残片由格伦威德尔教授从吐鲁番带回，他在考察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用粟特语写的残片。这种语言是中部波斯语的一支，古粟特人曾经使用过，和现今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种语言十分相近。

通过汉语和其他方面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佛教在很早的时候就从印度，经过现在的阿富汗，流传到吐鲁番这个地区，然后不断发展繁盛，直到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穆勒教授对吐鲁番地区的这些残片进行了研究，证明既信奉佛教，又是摩尼教信徒的粟特人，曾在北方地区，也即今天的新疆，广泛地分布着，他们仍旧使用各经文的粟特语翻译本。

在“千佛洞”隐蔽的“图书馆”的藏品中，发现了粟特文写卷，写卷表明当时伊朗的影响力完全扩展到了东方，延伸到了中国。在穆勒教授所能进行研究的材料中，包含对佛教经典文学的翻译。外表和纸张的一致性，表明它们是作于一个中国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也许是在敦煌。迄今，由于缺少有效的语言文字材料，使粟特经文的解释仍具有困难。因此，这些新的内容更为广泛的材料——一幅保存完好的卷轴，经测量长达17英尺多——证明将有很高的文学方面的价值。

关于这些粟特经文，我想顺便提及下面一件写卷卷轴。这幅卷轴目前已和“千佛洞”中的文物分开，被单独存放。从中，我们知道了一门源自更远的西方的宗教和文学。这是一组干净的书卷，宽大约只有4英寸，但长达15英尺，书写十分清晰，所采用的是叙利亚或福音文字（Estrangelo，又作Estrangela，古代叙利亚文字的一种初期形式，一直使用到公元6世纪——译者）的特有形式。因为根据穆勒教授在从德国到吐鲁番的探险中得到的惊人发现，叙利亚或福音文字已被认为是摩尼教的代表性书写手法。

摩尼教和它的教义是东方所有的宗教信仰同化（Syncretistic）宗教中最奇怪的，

它奇妙地融合了基督教的教义、拜火教信条和佛教的哲学。摩尼教教义及其信徒曾广泛地扩散到整个中亚地区，有的甚至到达中国，时间是在新疆东部被认定是佛教中心时期的后半期。根据一些中国历史记载，我们知道摩尼教把回鹘中的许多信徒计算在内，公元8世纪末期中国对新疆东部的控制减弱，并在50年之后撤去对西藏的统治，突厥部落从甘肃的最西边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北角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吐鲁番两个多世纪一直主要处于回鹘的统治下。因此，确切地说，中期的波斯国和早期的突厥人对当地的破坏应该是造成摩尼教文学废墟的首要原因，原来认为在这个以突厥人为主的地方，摩尼教和佛教能和平相处，因为突厥有着一颗对不同种族的宽容之心，他们愿意给不同种族用宗教形式拯救世人的机会。或许在敦煌这片中国土地上也是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可以解释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佛教圣地的那些被保存下来的经文和文物之中，应该含有摩尼教的一册写卷。摩尼教以巴比伦为教会的中心，根据宗教之父中许多的文章显示，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处地中海沿岸基督教的有力竞争对手。

但是除了官方历史的这个有趣的特点之外，来自“千佛洞”的摩尼教文物也具有很高的文学方面的价值。柏林皇家人种博物馆的著名的突厥研究学者、德国对吐鲁番的第二次成功探险的领导者冯·勒柯克（A. Von Lecoq）教授，很乐意发表他的独到发现。在最近由皇家亚洲学会发行的月报上，冯·勒柯克教授在一篇文章的注解中阐述道，敦煌发现的写卷中含有最有价值的经文，迄今为止，认为它们是用早期突厥文字写成的摩尼教信徒或外行的“Khuastanift”或忏悔祷告文。经文的开头大约有1/10已经丢失，所幸的是依靠珍藏在柏林的残片，可以将之补充完整。虽然没有研究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们已经足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冯·勒柯克教授的话说：“这册写卷保存极其完好，所用的摩尼教字母书写清楚，完全可以辨认，对于那些对研究古突厥语言感兴趣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帮助。”



⑲8千佛洞王道士居住寺庙附近的佛教洞室遗迹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件出自那个被封的“图书馆”中的独特文物。这些写卷尺寸很小，有100多页，所用文字是突厥的早期文字。写卷中使用的如尼突厥（Runic Turki）文字，直到最近，我们才从著名的鄂尔浑碑铭记载中查对出来。

在敦煌，我还发现了一些残页。它们使用的字体与北方的神秘字母看上去很相似。在米兰的废墟中，我找到了一张前面提到的类似残片。但是，前面提到的写卷从头到尾是完整的，而且它是采用那种字母书写的文学经文中最大的一本。

出于对我的尊敬，汤穆森教授接受了出版的任务，和他交流一番之后，我觉得

这本写卷可能有着更大的价值，原因是它很有可能是用突厥语书写的一部原作，不是一些佛教的经文或对其他经文的翻译，正像最近发现的许多使用早期突厥语的文物。书中收集了很多关于人和动物的短篇小说，提出了一些对孩子和青年人进行道德引导方面的观点，还记录了作者自己的其他出版作品，以及创作的地点和时间。由于记录采用了突厥通常使用的循环记年法，因而时间不能准确地确定，但是这部写卷应该不晚于8世纪。

从叙利亚字体发展而来的、为粟特经文所采用的所谓的回鹘字体，在6本书中得以展示。这6本书代表了佛教经典著作的古突厥语翻译本，其中一些书以卷的形式保存良好，大多有上百页，书中有大量的中文红字写印（Rubrics）和注解。我的朋友丹尼森教授确信其中至少有2卷是对俱舍论（Abhidharmakosa）评论的不同部分的翻译，俱舍论是一部著名的关于佛教玄学的作品，敦煌第一个将它的梵文原作译成了汉语。除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内容之外，我们有望对这些回鹘文版本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罗森教授现在正在进行这项工作，这将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早期突厥语言词汇的了解。

我已经作了解释，为何我会在汉语训练这方面感到那么的难过。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接受一次汉语训练，因为考虑到那些数量极多的汉语书卷，对于那个隐蔽的“图书馆”来说，似乎已经超出了它的容纳量，对于我也显得太多。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我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不过采用任何一种筛选方式都有可能从那些种类繁多的书堆中完全区分出汉语写卷，在这些书堆中公文和非宗教性的作品似乎要多于佛教经典著作。虽然蒋师爷是一位在东方接受研究方法教育的学者，但是对他来说，在当时的条件背景下，很难找到时间进行系统的收集筛选。至于我，我几乎只是凭着猜想和假设，认为种类繁多的写卷中，可能有历史方面和古物方面价值的材料应该是那些看上去年代久远、保存不是很好的、时间距石窟被封时间较长的作品。

伯希和（M. Paul Pelliot）是一位著名的汉学教授。自从在索尔本神学院(Sorbonne)任职以来，他一直在远东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09年我回到英国之后，听说法国政府委派伯希和教授作为领队，协同法国几位资深的学者到敦煌——这个我曾逗留的地方，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考古行动。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我迫不得已留下的、由不可信赖的王道士保存的大量写卷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由于伯希和教授精通中国的文学和书籍学，特别是佛教方面的学科，所以他成功地对成百上千的捆扎结实的书堆进行了细致筛选。那时，王道士看到我们做事小心谨慎，而且并未引起严重的后果，因此看上去不是特别担心，现在他更加放心了。给了他足够多的报酬，王道士同意伯希和教授挑选和带走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学的任何写卷。教授初步的工作，就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这是竭尽全力收集历史遗产的结果。

1910年上半年，伯希和教授回到法国，表示希望能研究一下我从石窟里收集到的汉语写卷。我感到特别高兴，接着，他便开始了做目录的工作。教授花了足足两周的时间，不懈努力，废寝忘食，进行了第一阶段迅速而详细的检查，成果让人非常满意。根据目录显示，中国写卷的总数多达9000册，其中大约有1/3的写卷含有完整的经文卷轴，大约2/3是一些脱落下来的记载和经文残片。

经文中大部分属于佛教名著、中国和日本版本的佛教文学著作一类。完整的卷轴作为最古老的写卷，毫无疑问，有助于将来对那些经典经文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是，总的来说，它们没有提供很多新的信息，供我们立即使用。可是，那些脱落下来的记录，与法令、禁令、账目的记录截然不同，它们经常标有确切的时间，展示了当地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在敦煌发现了这些文物后，才算有了这一类资料，在这之前，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资料。

最后，在那些写卷残片中，还发现许多是属于非宗教文学的作品，包括历史、

地理、词典编纂等，这些记载对于发展更高层次的汉语言研究有着巨大的作用。

上面我所引用的、伯希和教授所做的初步简短分析，证明了我根据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本能挑选那些数目和种类繁多的写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更有理由对伯希和教授表示感激，正是因为他对写卷固有的兴趣，促使他不懈努力，忘我工作，准备了系统的目录表，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比伯希和教授更有学识和判断力，更有资格来完成这项工作。我很高兴大英博物馆董事会已经答应出版这本目录表，书中还将收录我所收集的那一部分。

在最后，我想提及西藏写卷。放在这里来说，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还没能开展广泛而有效的研究，体例比较混乱。但是根据我的朋友、印度政府的资深“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教授和阅历丰富的西藏研究学者里丁（C. M. Ridding）女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大部分的卷轴和“婆提”文书都包含有一些来自西藏的著名佛教经典。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章节和祷告文的反复出现，以及一直吸引着虔诚的藏民去追求精神价值的半机械化程序，已经解开了我一开始产生的疑问。但是，当需要对甘珠尔和丹珠尔所收集的西藏佛教文学的经文进行评论时，除了那些无穷无尽的《般若波罗蜜多菩萨经》（Prajnaparamita）等，仍然有数量极多的材料值得仔细地研究。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那些最古老的写卷的年代，这些写卷将被收入印度国家图书馆的目录，这也就是将来保存它们的地方。

M. Aurel Stein

# 第七十章

## “千佛洞”的装饰艺术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隐蔽庙堂中珍宝的搜寻工作，所以很少有时间对寺庙洞穴进行一番细致的探查。这些寺庙洞穴大大小小，大概有上百个，它们就像蜂窝一般聚集在河道左岸陡峭的悬崖上，分列于王道士庙堂的上下。但是，由于我经常沿着这条大约1英里长的洞穴群散步，所以我对于比较重要的大石窟寺庙的位置和特征都比较熟悉。王道士3月31日离开，因此我立即停止了“挖掘”工作，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石窟寺庙上来，由于先前对它们就很熟悉，使我很容易就开始了对它们艺术特征的调查研究。

很快我就确信，如果说那个夏天，除搜寻写卷之外，我将留出多余的时间进行其他的考古学方面和地理学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选择对洞穴的艺术特征调查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根据我委派的测量员制作的洞穴大致方位平面图显示，从带有前厅和走廊、深达54英尺的大型内殿，到尺寸非常小的小型庙堂，各式各样独立的寺庙洞穴总计超过500座。它们大概可以分为3类，其中最大的一类是处于南边的，包括所有现在仍有人参观朝圣的寺庙石窟。处于王道士庙堂上方的是这一类洞穴，右边的是较小的第二类的部分洞穴。

第三类洞穴还要再往下走，它包括一些小洞穴，没有留下任何装饰过的痕迹，显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入了。这里悬崖的底部受到河水的冲击，在它50~60英尺的最低、最陡峭的石阶上，许多易碎的岩石表面曾经有路径和通道，但是现在，这些通往各式各样石窟的路径以及石窟间的通道已经完全崩塌碎裂了。那些过去应该是专门用于连接的木制走廊和楼梯，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属于北边一类的小洞穴大多数可能是用于和尚的居住之地，而不是用来做庙堂。

南边的那类最大的石窟寺庙采用不规则的装饰和布置，以避免给人以整体划一之感。随着一个一个洞穴的挖掘，根据它们不同的高度，洞穴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仅仅很短的距离，例如靠近王道士的寺庙，在2个神龛之间是一座巨大的端坐的如来佛陀，是否有可能辨别出一些东西与规则的排列或层次一致呢？在许多高处洞穴的前面，是木制的楼梯和游廊，虽然大多数已经腐烂，不能再使用，但是它们最近一次修复留下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它们在别处的位置也可以根据那些支撑椽木的岩石上所凿的洞孔判断出来。这些辅助结构腐朽程度的不同，表明修复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同一座神龛中的壁画装饰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以及雕像粉刷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那么多的洞穴被人遗忘在此，只要任何一位虔诚的捐助者愿意出钱进行修复，都可以再度用于献祭，但是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许多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其中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坐落于地面的大型石窟寺庙都可以追溯到唐朝，甚至更远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这些装饰中最好的作品是属于同一时期，虽然还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总是与原先的构造相符。很多古老庙堂的门廊壁画装饰采用的风格，与内殿中历史更为久远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但和通往王道士佛堂的秘密入口的墙壁上所绘制的一排巨大的菩萨的风格极为相似，据此，我可以断定在10世纪的某个时期，“千佛洞”曾经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盛。也许那时正值蒙古人统治，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中亚和东亚的广大区域里

一直确保了安定和欣欣向荣的贸易。但是，修复工作在其他时间也一定不断进行，虽然前厅和走廊的洞穴墙壁的泥灰表面最容易遭到破坏，但是从壁画装饰所表现的不同样式特征就可以看出来。

拍照和绘制准确的平面设计图，是记录这些非凡卓越的佛堂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在成千上万的洞穴中进行一系列的选择。幸运的是，它们的建筑布局大致相同，因此在进行挑选时，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前面，我已经描述过了每一座寺庙内殿是如何只允许光线和空气进入里面的洞穴，又是如何用宽敞的走廊或通道连接的。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走廊的布局。内殿的外面是大一点的佛堂，佛堂大都有前厅，与内殿的宽度一样，但是稍微有点窄，而且经常类似于游廊，都有木制大门。连接在高处相邻的佛堂，过去主要采用通道，这些通道从一个前厅通往另一个前厅。

通常内殿的深度大于宽度，比如说，王道士的寺庙就是54英尺深，46英尺宽。一般来说，大一点的佛堂有一个U字形的平台面向走廊，大都装饰精美。平台的中心是一座巨大的如来佛陀的泥灰像，佛像后面是后幕和顶棚，它们与岩石分开，上面用绘画进行装饰。在主要的佛像两旁是一群雕像，总共10个，代表了圣徒、菩萨和立于最角落里的当地的看守人。但是，经常只有莲花盘座，才能证明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在平台与内殿之间，必然留有通道，这样朝圣者就可以围着佛像绕行以表示尊敬，这种仪式来自于古印度模式。通常呈正方形的、略微小一点的内殿里，相似的佛像群被摆放在平台上，这些平台处于宽敞的壁室或凹室中。有几处内殿的中心还没有挖空，留着用作泥灰佛像的方形岩石摆放在旁边。在一座佛堂的内殿后墙上，有一尊巨型的、躺着的、已经升天的如来佛陀或是涅槃像，这一场景在“千佛洞”中极为罕见，显然中国的艺术家对此并不很欣赏。

内殿的顶部通常很高，形状类似于一圆锥体截去了尖顶。在殿的中心的一排向



⑲千佛洞南边的佛教石窟群

后倾斜的台阶上，有一箱子似的容器，表面绘制着生动精巧的画面。在两个寺庙中，巨型端坐的如来佛陀雕像的高度超过80英尺，摆放在这里需要特殊的建筑布局。内殿如此之高，照明只能通过前殿处于3层或4层上的连接处，通过凿于松软岩石上一段狭窄的、在紧急情况下用于逃跑的楼梯可以到达连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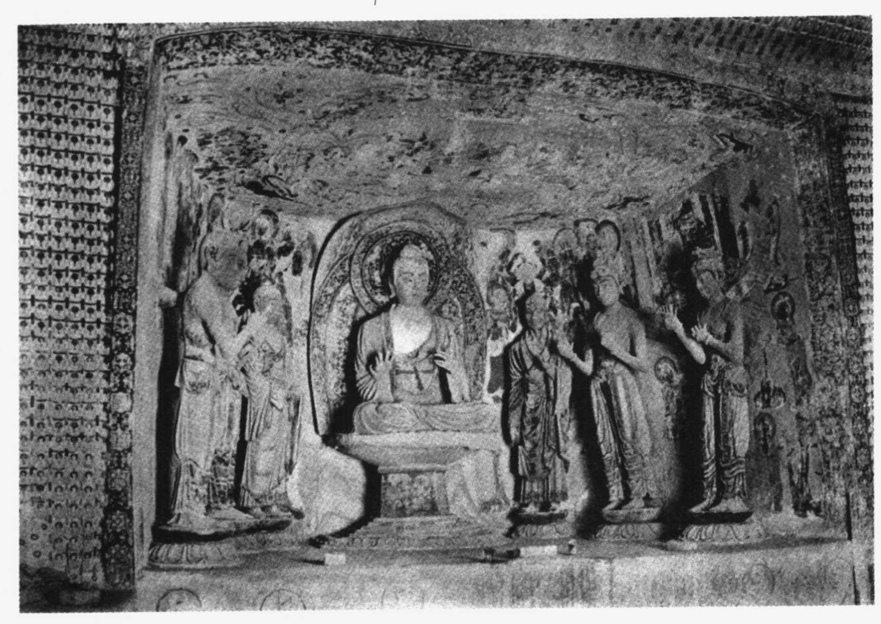
内殿的雕像遭受胡乱的装饰，不仅出于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之手，而且出于虔诚的修复者之手。由于雕像的模型整个是用灰泥粉刷，所以，这些雕像一定经常有灰泥剥落，暴露于空气中。对许多完全破碎、古老的雕像检查一遍，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制作和做模型的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与我在敦煌看见的一群“画像”或雕像所使用的手法一致。我在敦煌时，这些人来进行了一些修补工作。正如我在和田地区看见的、毁坏的庙堂，雕像的中心通常有一粗糙的木制框架构成，扫帚似的芦苇捆用来支撑顶端，然后借助做模型的木制工具，把湿的泥灰特别粗糙地抹到

木制框架上，最后再连续地用颜料粉刷。

如果工艺技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和新的修复工作必然会导致在设计和美术加工方面的不断衰退。源于唐代的小型的雕像还可能存在，但仅仅只剩下半部分，而且手和脚已经不是原来的，但是不管这些古老的作品到了何处，那些精美的四肢模型，端坐的姿态，织物和谐的搭配，一眼就能让人和后来的修复者僵硬笨拙的部分或这些粗糙的现代“创造”区分开来，虽然后者的修复工作让人讨厌，人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传统风格影响的痕迹。这种传统风格反映了古希腊风格佛教艺术模式，从塔里木盆地传入，直到今天一直影响着当地的雕塑艺术，尽管它已经十分衰败。

大概地说，在这些石窟寺庙中，雕塑遗迹比和谐一致的图画作品更能说明对源于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成分的保存，不管它们是哪一年代的，这可完全有悖于对中

⑳⓪千佛洞一小寺庙里的佛像及其信徒和菩萨灰泥画像



M. Aurel Stein

国风格的一种尊敬。壁画中的图画作品很显然表明，很少有雕像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主要的人物是这座寺庙专门供奉的玄奘——中国著名的朝圣者和阿罗汉（Arhat)。

然而，在敦煌，中国的风格对于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清晰地展现于壁画中，或者用一个更为确切的词语，采用黄色以使色彩晦暗画法的墙壁绘画。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最具有价值的艺术特征，是完好地保存了丰富多彩和大多可能追溯至唐朝的大型壁画。精通东方绘画艺术和宗教图解的人，只能用手工细致的仿制色彩，这样才能准确反映这些壁画表现的精神、精巧的人物装饰以及和谐的色彩等。对它们进行广泛的研究，或者从中获取材料，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此只能把这些工作留给我的照相机去完成。人们对这些遗迹一如既往地崇拜，当地反对恶意破坏文物的行为，以及企图进行“博物馆式的掠夺”的迷信思想，保护了这些精美的图画艺术。

前面已经提到了在大型内殿中发现了保存最为完好、年代最为久远的壁画。在那里，由于照明条件比较落后，因而拍照变得特别困难。只有在早晨的几个小时之内，绘画墙壁的表面的特定部分才能接受光照。而且，有时候隔几天就有强烈的大风从北方吹进沙漠谷地，拍摄工作由于灰尘的弥漫而经常受到严重的影响，有时甚至不得不停止。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大量努力来收藏胶卷底片和我作的具体详细的文字记录，我尽我所能，带走在这些洞中发现的墙壁装饰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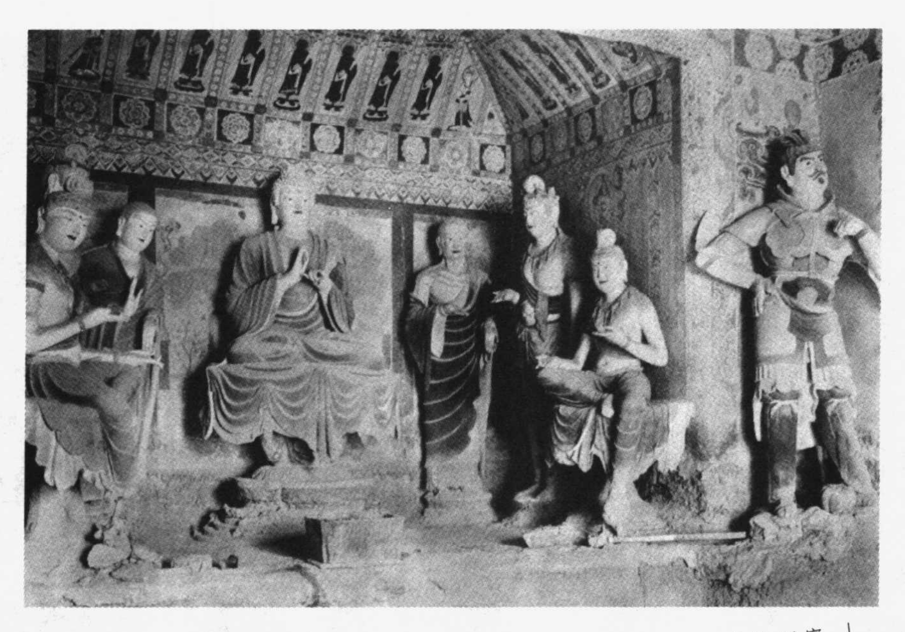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并不想描述我所熟悉的每个寺庙石窟中的壁画。相反，我打算解释装饰图案中几个最具有典型性的特征。这些装饰图案经常出现，而且非常有趣，从所有的复制品中举一部分例子就已经足够可以证明。在较小的寺庙中，雕像群大都摆放在一个较大的壁灶里或凹室中。墙壁和房顶装饰采用菱形花纹和一排排微小的、

模版印刷的如来佛陀像，轮廓和姿态都相似，仅仅只有服饰的颜色、光圈等有所变化。在和田地区的发掘工作，使我对这种风格十分熟悉，唐代的时候，这种风格在佛教盛行的整个中亚地区一定很普遍。这样一来，即使一个小小的内殿就有“千佛”，这些模版印刷墙表面上画有菩萨和其他圣人的大型画像，或者像精美的花式窗格、云朵和类似的东西。主要人物的背面是鲜艳的光圈和一簇簇火团，这种装饰特别引人注目。凹室的顶部通常画有一群神祇，例如如来佛陀在阿罗汉中登极，巧妙地采用了透视画法进行绘制。

在这些较小的庙堂的两侧墙壁的中心，通常是一幅巨大的壁画版画，上面讲述的是佛教天国拥挤的场面。我已经提及过这些壁画版画，当我在讨论丝绢上的较大的绘画时，说到丝绢上的绘画经常看上去像这些版画的微缩复制品。在一幅复制品中，我们看见如来佛陀坐在他的莲花盘宝座上，两旁是一些菩萨和天国侍者的小画像。分布于两侧和后面的，是作为建筑背景的亭子。亭子有鲜艳的树叶遮蔽，亭子里面是其他神的画像。在神坛的前面，主要是3个从莲花槽中升起的平台，它们之间相互有桥连接。

非常奇怪，中间的平台让我回想起了我很熟悉的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地区古老的莫胡勒（Mogbul）花园，花园的人工湖中心总能看见一个大理石平台。3个升起平台的中间平台上面，一个女子正在棋盘格状的地上翩翩起舞。一排排神职乐师，也许代表着紧那罗（Kimnara，乐神名，天龙八部众之一，形态似人，而实则非人——译者），正在两旁吹奏各式乐器。两旁的平台上是两位佛，他们面前摆放着装满水果的碗盘，看上去好像正在欣赏迷人的芭蕾舞。在从属这类的一些版画中，我还发现了半人半蛇的龙王（Naga）和龙女（Naginis）的画像，他们正在水中嬉戏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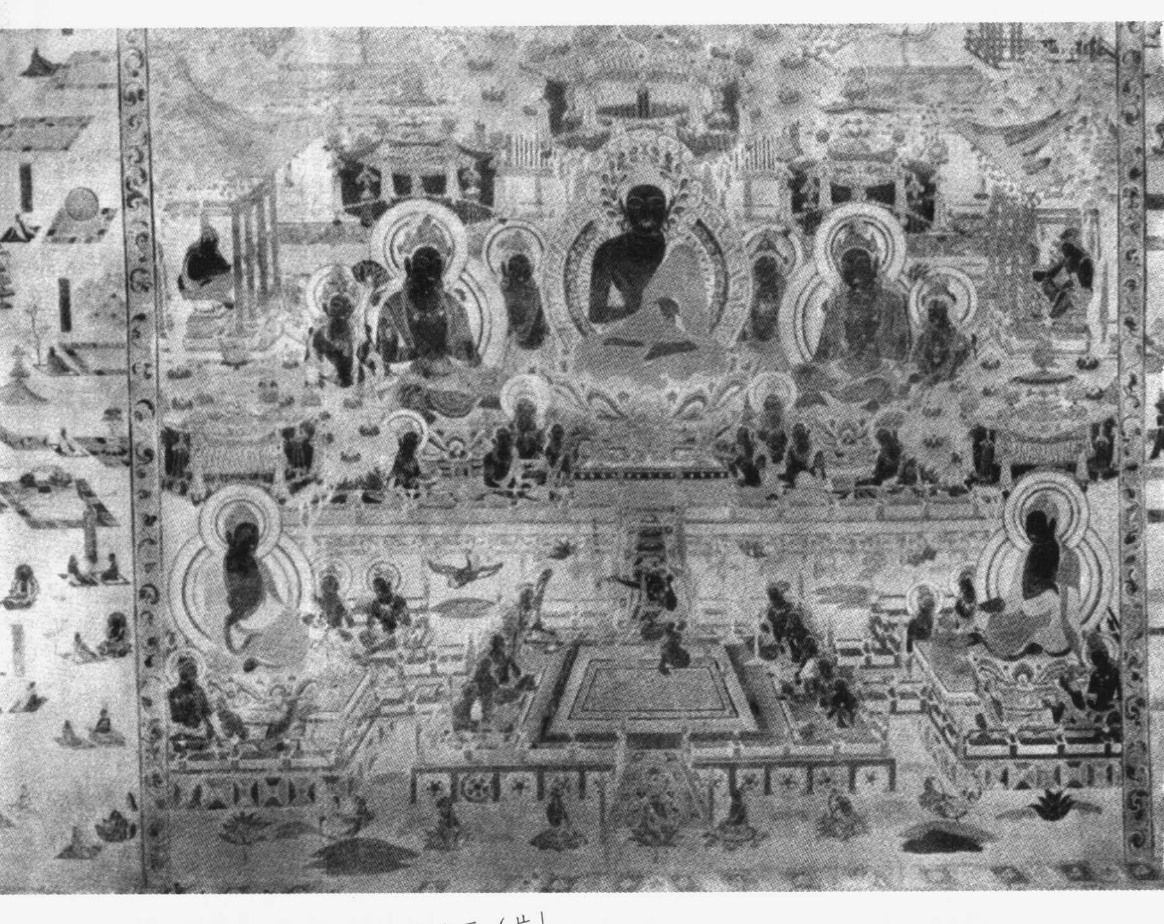
这些作品和即将描述的较大寺庙中的作品所产生的迷人之处，照片不能很好地



⑳千佛洞佛教石窟寺庙的凹室，内有现代人绘制的佛像及信徒、菩萨、世俗人物灰泥画像

表现出来。设计和人物，以及人物的服饰和样貌方面，大都通过这些版画向我们展示它们鲜艳和谐的调和色彩。它们的风格继承了希腊佛教的艺术，正如这种艺术在中亚地区的发展。但是，当开始研究其手法技巧时，甚至包括这些被认为是最具有传统的作品，发现它们的处理方式也明显不同。无论何处，都可以发现仅仅轻轻地挥动一下刷子，中国图画艺术的特征就展示于这些壁画和古和田版画中精美的人物素描图画中。这些变法自然而然会让人更加注意色彩效果，深紫色、棕褐色、蓝色为主，特别惹眼。通常采用泥土的颜色，中间的莲花池所采用的淡绿蓝色眼睛感到较为舒适，这些都是佛教天国场景中经常采用的色彩。

中国的风格毕竟只能作为修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希腊罗马古典宗教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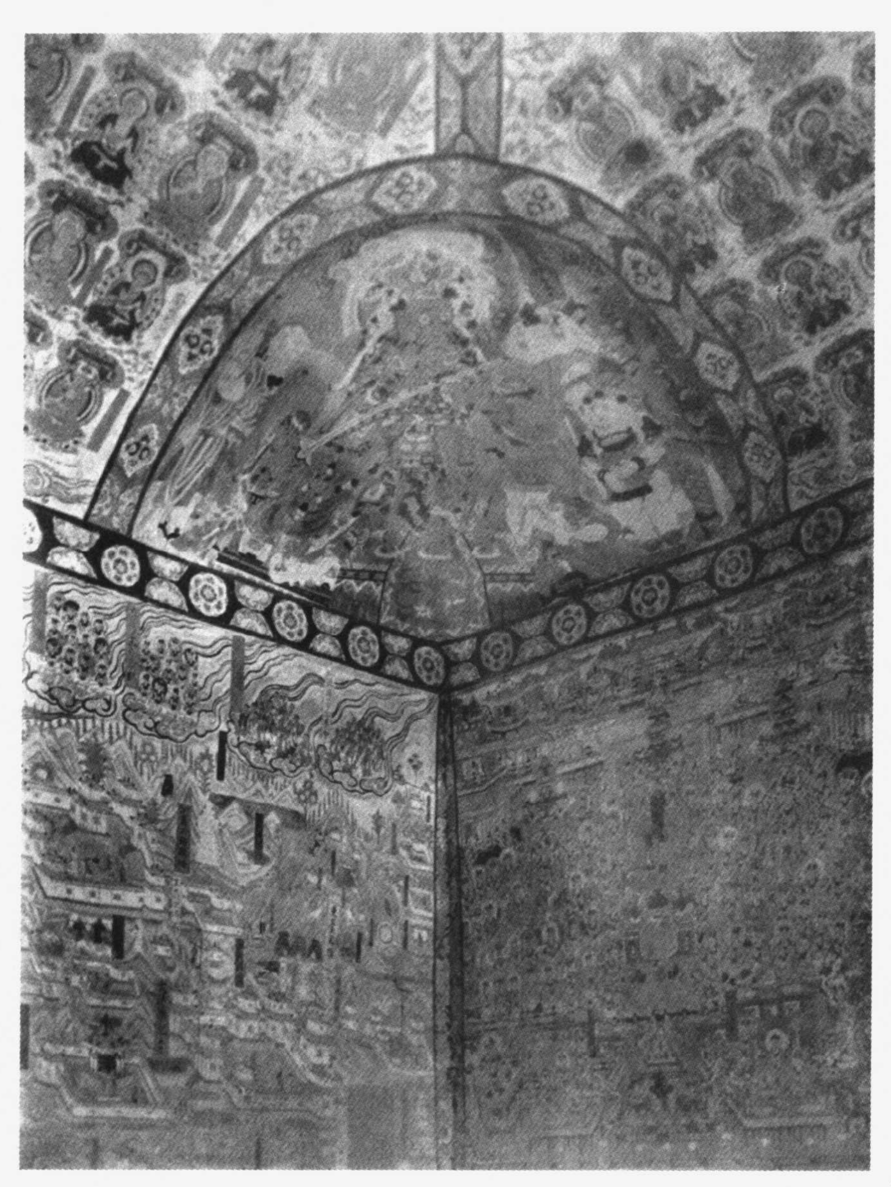
⑳②千佛洞石窟寺庙墙上的壁画（片段），描述佛教天国的场景

(Hieratic) 场景的处理方法，这些场景由传统的印度背景构成。在一些较小的侧墙版画中，中国的风格有自由想象的空间，护壁板的装饰是描绘僧侣在生活中非宗教性活动、耕作和旅行的场面。这些小的场面可能主要是用来展示本生故事 (Jatak)，或者说佛生前的故事，它们通常有写满中文题记的或者是“漩涡花饰”(Cartouches) 作为陪衬。不管是因为没有古希腊佛教艺术模式作为指导，还是其他一些原因，这里整体的处理方法看上去绝对属于中国的艺术风格。事实上，从装饰的角度看，工匠的努力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经常会体现出一点单调和混乱，但是不乏蕴含奇妙的生活和逼真的活动。

一些较大佛堂里的壁画属于这一类中的大型版画，它们挨个排列，内容主要是传统的天国故事场景。它们的排列，能帮助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暂且将千佛洞中所采用的传统风格搁置，在这里我想先提一下王道士石窟北边一个小内殿中的绘画。这里看似好像是真的壁画，而不是通常在一面简单的墙面上采用的晦暗画法。正中间最大的人物是观世音，代表着最为仁慈的“千手观音”。两边的光圈环绕下的人物大都是一脸恭敬，而在高处的一朵云彩上飘着设计漂亮的乾达婆 (Gandharvi)。

根据一些迹象，表明它的内殿里保存着许多它原有的墙壁装饰，而且为其他一些洞穴作了样式。主要人物背后的屏风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满是泥灰的、粗糙的现代佛塔。屏风下面是几排巨大的菩萨，上面画有类似于菊花的大顶棚，顶棚上可以看见升起的、精美装饰的屋顶。下面侧墙组成的墙脚处，拱肩中是4个怪异的战士形象，他们显然是中国人的模样，代表着那里的守护神。

内殿的墙壁全是绘画，大约12英尺高。北面和南面的墙被分成了5块版画，每一块宽达9英尺，而剩下的都是相互连接的作品。在它们的创作中，佛教天国在版画中作了巧妙的改动。朝着入口墙壁上的绘画讲述的是衔接紧密的故事，它们可能吸取了本生故事、庙堂、僧侣的住处和根据照片区分开的旅行场面。进口两侧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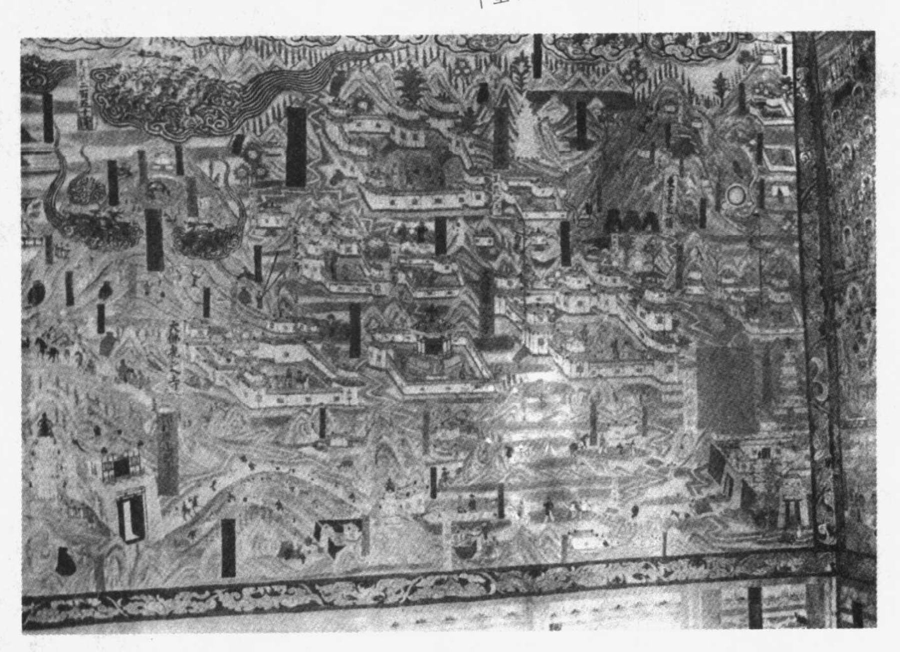


⑳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北角的壁画

矮的墙壁上方描绘的是大型的旅行场面，下方在护壁板中绘着几排衣着华丽、手捧供品的女子，可惜护壁板已经破裂。她们中所有的人头饰都非常精美，头上挂有很大的垂饰和球状的发式，华美的珠宝首饰和不同的方式显然说明她们有着不同的级别。这些护壁板中有一个上面写着中文题记，蒋师爷对它进行了解释，沙畹先生也证实它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个寺庙石窟是于田（yu-tien）或和田的一个公主捐助的，她所处的年代和这些壁画提供的许多详细资料正是伯希和先生所期望得到的，他在对它们进行着潜心研究。

在通向这个内殿的宽敞通道或走廊墙壁上，精美的壁画已经遭受较大损坏。但在南面的墙上，一幅尺寸巨大、活泼生动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奇怪的是，它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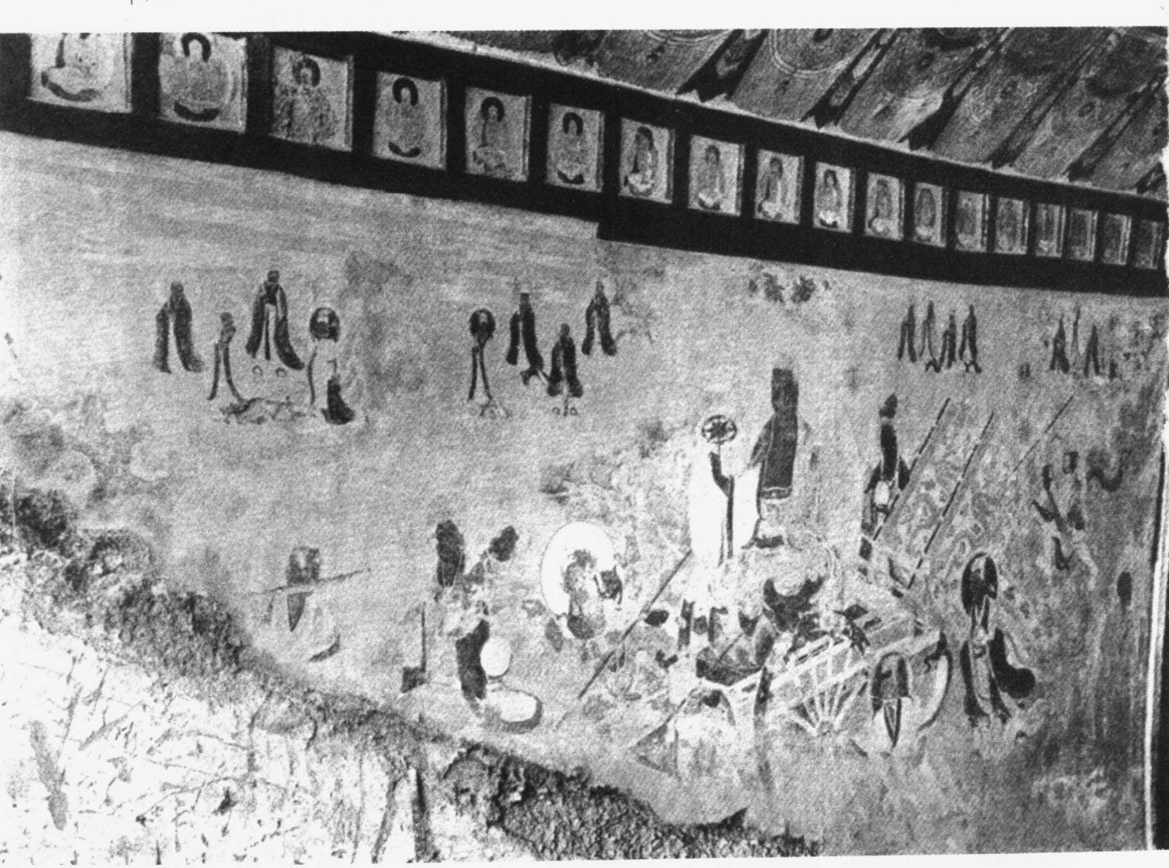
(204)千佛洞石窟寺庙门廊南墙上的大壁画（片段），佛坐在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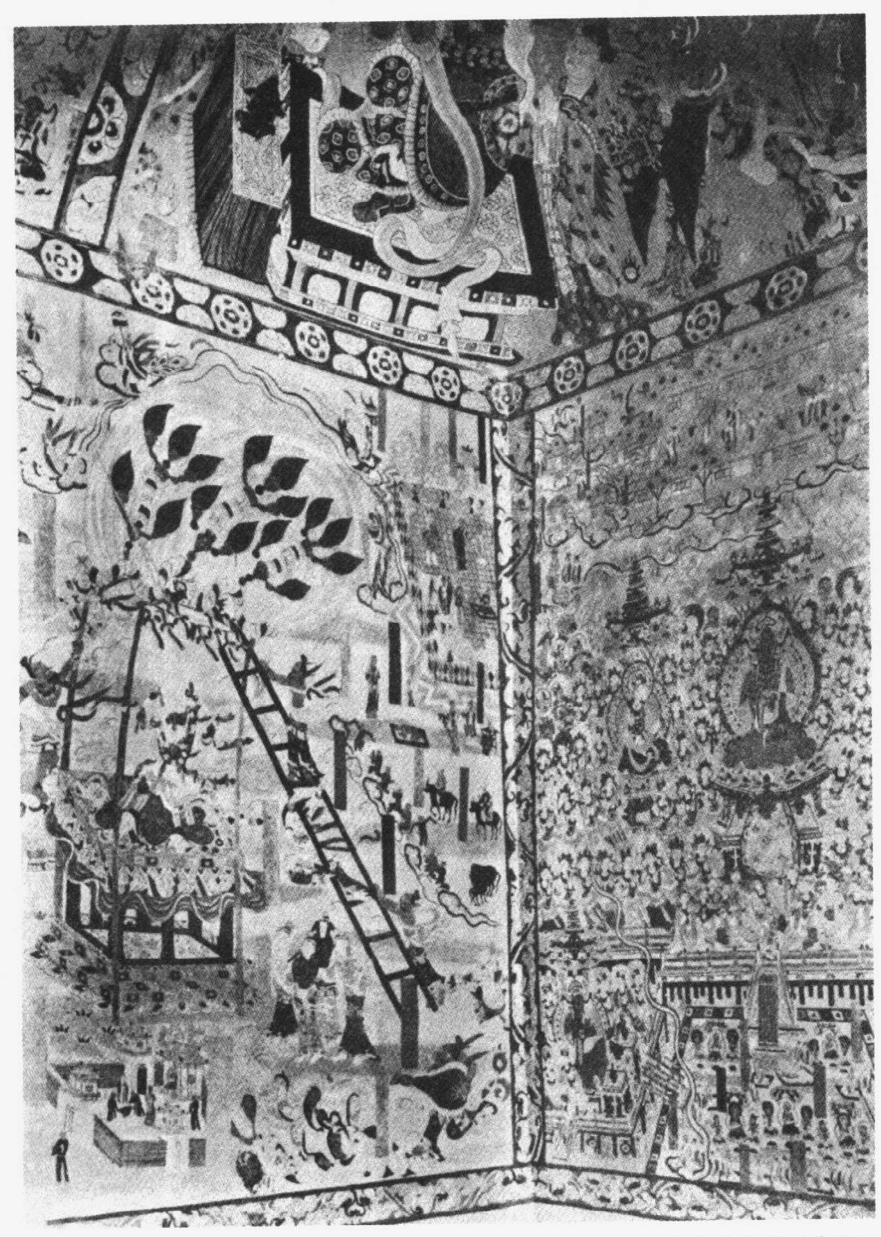


让人联想起一些古威尼斯图画描绘的色彩、壮观的场景和自由的节奏。作品描绘了一位端坐的巨型佛，他正站在一辆装饰华丽的车上，车子穿梭于云间，保持着飞快的速度。他高举右手，象征着要“最高权力的车轮”飞速旋转。淡紫色的衣服披于肩上，而从腰部往下包住身体的是一件漂亮的深蓝色长袍。身后飘动的是两条壮观的龙，背景为白色，用绿色和蓝色百合花作装饰，尾部的拍动表明龙正飞快移动。一大群神和全副武装的侍者飞在车的两侧和后面，作品的上方是精巧绘制的云朵，上面是一小群站着或跪着的神。

最后，我再提一个坐落于该地最南端的大洞窟，来结束这次对庙堂图画装饰粗

⑳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墙上的壁画（片段），描述佛教故事





⑳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南角的壁画（片段）



⑳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北角的
壁画（片段）

略的考察。这里，一般的主题类似于和田公主寺庙的主题，制作中的一些细节表明后者曾是前者直接采用的模式。但是，使这座庙堂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幅精细的壁画作品，该作品占用整面后墙，长大约有27英尺，所描述的故事情节看上去在当地很受欢迎，因为在这里和我后来参观的“各式佛洞”中重复出现，但是我未能找到它的传统解释。

作品的右边部分，照片中所拍摄的，特别值得注意。它采用了生动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一次强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中间是一个类似于帐篷的有顶盖的结构，它好像就要被吹走，幕帘，帐帘，伴着大量的流苏，在空中随风飞舞，而穿着华丽的人物可能代表一个显赫名贵，立于顶棚上，没有光圈，身体前倾，好像是为了平衡身体，以免摔倒。一些长着胡子的侍者，衣服和头发在风中缠绕，他们爬在梯子上，想去固定顶盖和飞舞的幕帘。另一组人物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在上下的角落里描绘的事情显然不属于主要的故事情节。

转向另一边，即作品的左边部分，我们发现强风引起的纷乱好像因为平静高贵的佛或菩萨的出现而变得平稳，佛身穿一件和尚式的拼缀长袍，右手扇着扇子，头上装饰复杂的顶盖由云朵卷支撑着。在神像的前面和后面是一群人，他们相互独立，都表现出痛苦的神情：一个人双手抱头，另一个人双手绑在身后，而一个满脸忏悔的妇女双手向佛伸出，好像在乞求宽恕。上方是一个好像僧侣的人，看上去准备敲击悬于空中的大钟，其他人伸出手臂，好像指着远处发生的事情。壁画的中部在内殿中心平台的幕帘后面，因而照相机无法把它拍摄下来，中部同样也是描绘了人和物体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场景。

在其他地方，我也发现这些类似风格绘制的场景，我不禁得出结论：在每部作品中，艺术家想要表现的主题是“圣徒”（holy one）展现出的温文尔雅的姿态，与强风摇晃远处的皇室帐篷之间的对比。这是给有罪过的王子的一道警告，还是一

些相似的传奇呢？不管它真正的解释说明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作品的原设计者缺少应有的艺术想象力和技巧。

在几个星期未受打扰的艰苦工作中，由于这里有真正的艺术珍品吸引着我的注意，所以在我与王道士打交道时，一直保持着紧张和担忧。白天要处理大量的材料，晚上又要做记录，我仅有的放松时间是在傍晚时分，爬上荒芜的岩石峡谷，进入"千佛"山谷，山谷迅速向上伸展，并变得狭窄。一次尘土飞扬的傍晚，当我回到帐篷，等待我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吐尔地，我忠实的邮差，带来了满满两大袋的邮件。阿不旦古怪的老毛拉指引他沿着阿尔金山贫瘠的高原，那儿的水比沙漠里的还要少，不过没有酷热这个问题。在每一个绿洲，租一匹小马不停地前进，吐尔地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成功地从和田来到了这里。

他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一路上，大多数时候，小马不仅要驮人，还要驮给养。我完全能想象吐尔地一路上所经历的重重困难，炎热，沙尘暴，又经常缺水。但是，我这位可信赖的邮差还像往常一样古板呆滞，不爱说话。他不允许有一点东西被别人夺取，除去勉强答应代我向在和田和叶城之间都认识我的所有官员转致"撒拉姆"（Slam，阿拉伯问候语——译者）。自从2月份开始，我便失去了所有来自印度和欧洲的书面消息，现在经过4个月的等待，一大堆信件不期而至，就像夏天沙漠中的大雨，让人精神振奋。大多数来自欧洲的信件还是去年12月份寄出的，但是我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迅速阅读这一大堆的信件，可能接近200封。当我最后全部读完，强风又一次吹击山谷，使我不能入睡，只有等到白天，开始新的工作。

不久以后，学识渊博的汪知县来拜访我，使我稍稍有些分心，但这已经太迟了，无法再影响我与王道士的交易，而且我深信我可以唤起中国朋友在学术上的共鸣。但是，当我从蒋师爷处秘密得知，汪大老爷的拜访是受兰州总督的派遣，吩咐他必

M. Aurel Stein

须阻止我的挖掘工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时，对于此，我不禁感到有些不自在。我的考古活动显然会转向古墓，而这是中国古物收藏家知道的唯一的古文物发现地。因此，一般人有偏见，可能认为我是个人冒险，而当地政府却将面临麻烦。一份来自坐镇肃州、负责甘肃偏远地区治安的军队机构的报告说道，他们已经开始面临这方面的麻烦。我在敦煌地区长期的逗留显然遭到警告，但是汪还想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可以指出我完全是在“戈壁中”进行挖掘，没有带来任何伤害。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来自官府的阻挠，比起我激起人们的愤怒，所带来的障碍可能更大。因此，我不得不小心谨慎，把蒋师爷送进城几天，让他把公文送交总督，并说明我的工作情况。通过官僚方面的这些礼节，蒋师爷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障碍最终被消除了，但是我从蒋师爷那里得知，当地的衙门官员的焦虑不安还有其他原因。许多年以前，当地官员和部分顽固的敦煌开拓者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收入评估的斗争，最后，出于当地总部的威力，以后者失败而结束了这场斗争。但是，在那些官员的头脑中一直有着担忧，害怕这种决定的实施会激起这些所谓“帝国拥护分子”的反抗。因而，汪为了这件事情也一直头疼不已。他的军事同僚、年老的林大人谈笑风生，因为我要离开，特意前来拜访我。交谈中，他说到要让我安全离开这个地方，任何阻止行动完全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们的想法也的确有道理，所以，我最后决定带着我所有的行李装备去安西，而不是当初我所设想的，把东西寄存在衙门里，直到我从山里回来。

6月13日，我结束了已经付出巨大艰辛的石窟发掘工作。骆驼已经从山里被带了回来，它们吃了草，但是懒洋洋的。草原上的炎热，使人们根本不想用它们来载重，或者说甚至根本不想长时间把它们留在那儿。所以当在第二天晚上，5辆有3匹马牵引、用来运送东西的大车从敦煌赶到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后来，我想到，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安全地离开这里，与当地官员紧张程度的加深有关。第二天

早晨，我在王道士的庙堂和他亲切道别，最后一次参观那些让我神往的石室中的绘画。和蒋师爷在敦煌大肆进行了“发掘”后，我踏上了直接去往安西的路。

离开时，我心里感到很悲伤，但绿洲看上去格外的绿，沁人心脾，我深深地铭记着这一切，好像一位隐士挣脱了另一个 The bais。在那里，我整天忙碌着收拾材料记录，和我的按办朋友们道别。在汪大人凉爽成阴的衙门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和学识渊博的学者朋友最后一次交谈，谈到了当地的文物。他的老母亲，头发斑白，显得非常高贵，刚刚从陕西过来，与儿子、媳妇团聚，一个多么和平宁静的完整的家庭！我怎么能够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有一场血腥和掠夺呢？然后，我去了林大人家，共进了一顿简单但十分丰盛的晚餐。

白天的热气已经消散，我从我在敦煌搭帐篷的院子出发。在这座城的东门外一个大型寺庙前，我发现站着我的中国朋友和一排官员，他们都穿着盛装，来为我送行，这是来自于古东方的一个真实场景，这座寺庙门廊里的多彩木制品留给了我一幅引人注目的作品，这是我对敦煌的最后一个印象。当我到达绿洲边缘前，天已经黑了。半夜时分，我在沙漠中一个孤独的路边驿站搭起帐篷。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回想敦煌留给我的所有印象。这些工作所带来的紧张是巨大的，但是同时我也得到了放松，因为从现在起，我可以不再在酷热的沙漠中进行考古工作，而开始山中的地理探险。




# 第七十一章

## 安西——西部屏障

安西，是敦煌所属的“独立政府”的司令部。它作为仓库和新的基地很方便，因为它正好位于“城墙环绕”的肃州和中国的大路转向哈密和新疆东部的交会点。不管我在塔里木盆地的冬天探险的计划如何，我都要经过安西，我可以放弃向南边探险的计划，而向南山最西边的雪域地区进发。那是一条十分有趣的路线，这对我们将会很有好处。我们沿着山脚边酷热而十分漫长的边界前行，山脉是光秃秃的，山体裸露。6月16日，我们来到了瓜州口（Kua-chou-kou）一个简陋的路边驿站，驿站的设计模式遵循了整个绿洲的古老名字。第二天，骑马走了15英里，穿过了灌木覆盖的郊野，我们来到了安西城。一路上，只见贫瘠的广阔荒地，村庄和城镇的废墟相互间隔，据说它们中大多数都是毁于东干人叛乱的时候，比起现在那些星星点点、散落的田园，废墟房屋显得更引人注目。

因此，当看到安西萧条的景象，我并不感到惊讶。这座城市的名字很响亮，“西部的屏障”（要塞)。过去，在唐朝的辉煌时期，统治整个新疆的政府官员坐守于此。然而，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整齐的街道，坍塌的城墙围起一个巨大的长方形，但已经荒芜。与安西比起来，敦煌倒像是座繁荣的城市。城镇离疏勒河不

远，处在一片密集的耕作带的东边，大约有几英里宽，那就是主要的绿洲。

幸运的是，我不用在这又脏又乱的地方寻找住所。我的朋友汪大老爷已经给这里的长官安代信（En T'ai-tsin，音译——译者）发了封书信。他把我安排在了西门外半英里远一个破旧的寺庙里，仅有的一个大殿可供存放箱子，也是我白天避开酷热的场所。在后面的小果园，我支起了帐篷，作为晚上栖身之地。附近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屋子，好心的寺庙管理员通常把它锁起来。里面全是棺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尸体正等着被送回外省的祖家。幸运的是，直到快离开前，我才知道了这些情况。

虽然我很想马上开始进行山区的探险活动，但是拖的时间仍然比我想象的要长。长官怎么说都算不上个聪明人，但是他心地很好，很有礼貌，虽说有点紧张。他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把行李放在他的衙门里保管。不过，我向南前进所需要的交通工具看上去还很难解决。来安西不久，我就意识到虽然长官官衔很大，可这个地方的资源却十分有限。灌木覆盖的草原由于东干人的入侵，而遭受很大的破坏，现在正慢慢地恢复，草原上除了一些破落萧瑟的村落之外，在他所直接管辖的区域里，仅有几座远处山脚下星星点点的村庄，而在那里，他的命令很少能迅速地得以执行。我也有理由相信，胆小的总督一直都担心我的挖掘会带来麻烦，虽然汪大人已经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真相。我已经坦率地表明我参观桥子边缘村庄附近废墟的意图，安西一个维吾尔族商人告诉我有关废墟的一些情况，算是为推迟安排所需要东西的理由作一个补充。

幸而我只用了6天的时间，就克服了这些困难。不仅完成了许多写作任务，而且还在附近地区进行了有趣的考古观察。我坚信，4月见到的从敦煌延伸到30英里外的古长城线，在安西向东延续了这条线。靠近安西正西方，我们见到了规模宏大的塔群建筑，它们是近些年才建的。在一次勘测过程，测量员无意中遇到了2座较

M. Aurel Stein

小的塔，它们离新城的西南方大约有4英里，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勘察时，我很快确定，在尺寸和建筑方式两方面，它们与我们熟悉的敦煌沙漠中的瞭望塔完全一致。

一个古代土堤的残留物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它们高出地面4~5英尺，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就是延伸到这里的古代长城。切开土堆，我们发现了通常见到的嵌于土壤和沙粒中的胡杨层，这些汉代城墙遗迹之所以保存下来，显然与这里的地面上光秃秃的沙砾有密切关系。而在其他地方，东边和西边，地面上覆盖了灌木丛，由于渠水的泛滥，到达这里的湿气足够毁掉城墙的所有遗迹。10月1日，当再次参观这个地方时，我发现许多废弃的宽带已经被淹。现存破裂的、黏土砌成的塔相互间隔1英里，它们附近的黏土矮墩似乎向我们证明了它们的来源。但是，除了一些古代的陶器，我没有发现可以获知年代的遗物和文物。

更让人奇怪的是，依稀可见的古城墙和现在的从敦煌到安西的主要道路相交会。在一座保存较好的烽火台附近，我发现建有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小走道。看上去，烽火台的中心很可能是古代的，但当地延续下来的传统和选择穿过长城道路的地点有关系，中国的传统是把交会点看成是一个地区的界限形式上的标志。

位于目前的安西东南方大约2英里的地方，是被毁的城池。它建于贫瘠的废弃沙砾之上，这里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值得探查研究。根据当地人们的讲述，它是在18世纪末期被废弃的，后来又一再遭到火灾的毁灭。它的内部都是房屋建筑，外围城墙用碎裂的黏土修建，十分坚固，厚度达到5英尺之多，形成一个大约600码见方的方圆。但是，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年代不可能很久远。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风蚀作用对它们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一定的程度上说，东面的城墙和西面的城墙，内部都已经破裂，原因是沙的移动造成对墙不断的摩擦。许多裂缝一直到达地面以下5英尺或6英尺，而且在东北角，城墙已经下陷得很低，完全被夷为平地。

缺口还不是太大，一般来说，东面城墙的缺口总是比西面的要宽，在摩擦所产生的喇叭形凹处，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底部开始研究。根据测量结果，东墙上的切口平均尺寸是13英尺深，8英尺宽。盛行的东风和东北风携带的沙穿过这些缺口，在东墙的西边和里面堆成了18~20英尺高的沙丘，墙外还有小的流沙丘。从东墙缺口吹进的沙，后来都会从开阔的内部，吹到断裂的西墙，接着对西墙进行摧毁。这样，西墙和东墙缓缓地遭受腐蚀，最终将全部倒塌，而朝着北边和南边的城墙由于与盛行风向平行，因而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小。还有什么例证，可以更好地说明为什么罗布泊的古代中国驿站的东墙和西墙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仍能够寻找到南墙和北墙的踪迹呢？更让人惊奇的是，安西东门前面的半圆形防御工程还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虽然它的底部有几处被流沙破坏。显然，在这里流沙避开了障碍物，而改变方向，转向了旁边。

接着，我又考察了现在安西城的城墙，我发现东墙面临着倒塌的危险，原因同样是受到无情的敌人——著名的“安西风”的进攻。为了防止从顶部破裂，自从东干人暴乱被再次镇压之后，这座特别的墙面被用坚固的石头砌成低矮的挡墙，作为保护措施。可是，我发现一个15~20英尺高的沙丘已经在里面形成，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减少了沙从上面的袭击。可是流沙仍然沿着原来的路线，开始摩擦下面的黏土防御物。许多地方已遭破坏的墙壁，看上去好像不久以后也要倒塌。同时，我在安西周围几乎没有发现风蚀作用留下的任何痕迹，附近的沙不断流动产生了罗布泊沙漠中典型的雅丹沟渠，或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有些地方下陷的现象。毫无疑问，在这些看上去极为缺水的地区，植被覆盖已经足以保护土壤。安西周围所有的树木和灌木都向西延伸生长，这一点没有必要再强调了。

在这里逗留期间，刮了一场连绵的沙尘暴，我们的行程因此变得更为有趣。但是除了沙尘暴之外，酷热仍然困扰着我们。6月22日晚上暴雨渐渐停止，第二天大

部分时间紧接着下起一阵阵小雨，我感到一阵轻松。自从8月份在喀让古塔格山高处的艰苦探险以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场真正的雨，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但是，这也提醒了我，若继续向前，将不可能再有持续不断的干燥天气，如同敦煌的沙漠一样，可那正是我们考古工作所需要的。那天，这里的人答应我提供车辆，把我的行李运到桥子。当我看见浸在水中的田野和小路，天空的色彩是真正的欧洲色彩，我不再为必须在Cathayan耽搁而烦恼了。

6月24日，我终于能够离开安西了。将所有的行李，写卷，文物，以及直到9月份才有用的收藏工具，都运到了衙门，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和顾虑。3辆小型车足够把它们运到衙门，早上9点，我看见行李以及大部分队员安全出发了。我自己和蒋师爷还得去衙门拜访一下，做个道别。同时，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使我确信把东西寄存在大老爷的办公地方是十分安全的，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得出的结论。胆小的大老爷给行李和文物安排一个比较通风的房间，从他私人院子里就能看见这个房间。大老爷对我非常热情，在砖块砌成的柱礅上放了粗大的横梁，贵重的行李被放在上面，以避免和地面接触。将由依布拉音伯克照看它们，确保每周一次把它们搬到太阳底下晾晒，防止过潮。

前天，下了一场大雨，除此之外，在这座风吹日晒的安西城，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让人害怕。让忠心的依布拉音伯克来照看，确保经常检查留在这里的贵重东西，仍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从数字和印章，就可以看出按办承担了保证行李的所有责任，依布拉音每周履行的检查也将有助保持官员的责任感。每个箱子都捆绑复杂，被放在模仿古代样式制作的木制密封箱中，盖上印章，确保安全。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对里面物品进行的“未经允许的检查”。蒋师爷按照规定的样式，在一张闪闪发光的红色纸上写了正式的收条，当安代信（En T'ai-tisn，音译——译者）在上面签字，并用他硕大的官印盖上章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下子解除了先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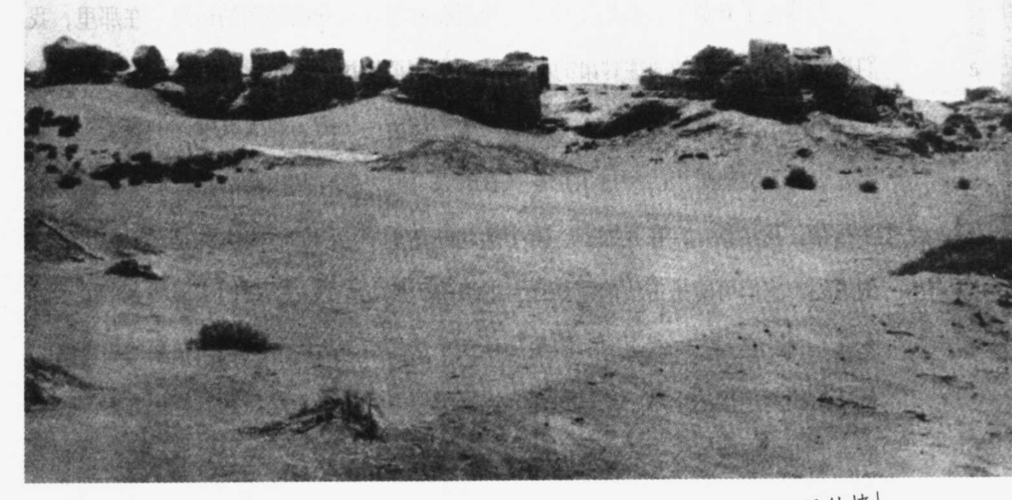
对危险的防备心理。

去拜访电报所时，我就显得不是很正式了。电报员是位姓李的先生，他专门管理从肃州到哈密唯一的一条线路。在安西逗留期间，我了解到他在这里并不出名。在敦煌附近，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的英语非常出色，这使我十分惊讶。当他来找我时，我才发现他根本不会说英语。但是，他的第一次拜访就已经充分显示了他那绅士般的风度，学者般的气质，我和蒋师爷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当他表现出自己关于古文物的欣赏和知识才华的时候。所以，我很想再次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真诚的关照，以及准确地完成我与喀什噶尔和北京之间的电报联系。

他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院子里摆着花床，门前是许多小树，这和肮脏、荒芜的安西形成了鲜明对比。先前的降雨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清新空气，风蚀过的破裂墙面显得更加清晰，坑坑洼洼的地面到处淤积着一个个小水塘。在李先生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显得井井有条。在他小小的接收室里，整整齐齐地陈列着一排排书、画卷、中国古生物样本，以及一些从甘州带回的古代黄铜乐器。坦率地说，从整个屋子的陈设和布局，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位官员，他认真，细致，风雅，知识渊博，实事求是。

他在兰州传教处和电报局所接受的英语训练还不足一年，但是从他书写简单英语信笺的能力，以及在英语阅读和西方文化知识上所表现的欣赏水平这两个方面判断，这个短短的训练获得了成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印度学生花费了李先生所用的6~10倍的时间，辛辛苦苦地学习，也很少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里，我不想探讨上述差异的原因。对我来说，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对于一个满脑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欣赏水平的人来说，若想让他接受一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语言学方面的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

李先生的儿子10岁了，聪明伶俐，身体结实。他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由老师



|⑳安西小镇废墟东北角的风蚀墙|

给他们讲解从当地官员的家族史到中国名著的基本知识。他穿着干净整齐，举止文静谦恭，看上去俨然是他父亲的翻版。作为临别前的礼物，李先生送给我一把扇子，上面有精美的书法，可是我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回赠。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位安西朋友能够欣赏一下我向伦敦订购的布舍尔（Bushell）教授撰写的《中国艺术手册》书中选用的许多插图，不过，这本书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千里迢迢，送到安西这个亚洲的交会点。

官员们回访了我，把赏钱具体分发给他们的部下，然后送到我的营地，等等这一系列事情之后，下午2点，我开始向桥子出发。我没能收集到任何有关桥子的地理位置的确切资料，根据做我的向导（一位衙门差役）模糊的言语，桥子离这里有一段距离，应坐落于越过矮山东南方的某个地方。草原在安西镇东面延伸，虽然有数不清的浅沟阻挡，沟中的雨水溢出了饱经风霜的沟堤，但是我们还是很快越过了贫瘠的大草原。

大约走了6英里，我们来到了引导疏勒河水进入安西绿洲的运河。在那里，我们离开了高低不平的通往甘肃的国道，而转向了南边，向山中进发。虽然山体低矮，寸草不生，但是我们还是意外地感受到了一丝清凉，因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太阳光直射，酷热难当。穿过了荒凉孤寂的大草原，延伸到山脚的是大约3英里宽的沙石路。我注意到，在我面前，两个隆起的黏土堆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英里。我立刻想到，它们可能是古代前线烽火台的遗迹，比如说，先前我们未能找到的安西的东墙。当从它们中间经过时，我更加证实了这一点。近距离观察，很容易就能看见低矮但相互连接的土堆，这就是用来连接瞭望塔的古老土堤。和其他地方一样，它的走向也和河流平行。我没有时间再去参观腐朽的塔楼，但我对它们的特征毫无疑

|209敦煌地方长官汪大老爷及其夫人和母亲|



问。很高兴，我能亲眼看见这远在东边的古长城遗迹。

显然，和毁于东干人叛乱时的许多其他的路边驿站一样，这里也有一座很大的废弃驿站。在它附近，我们穿过了一条狭窄的草地和丛林。草地和丛林由运河水灌溉，但是水已经溢过了原有运河的堤岸。鲜绿色和黑灰色的斜坡沙石路，与红色、棕色微染的山体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头发灰白的老衙役是我们的向导，可是他不知道任何一座驿站或一条沟渠的名称。现在，1英里之内，地面迅速地升高，十分清晰的车痕引着我们进入了裸露的山崖和一座常见的干涸河床的碎岩坡。强烈腐蚀的山坡十分陡峭，蜿蜒的峡谷穿梭其中，峡谷十分狭窄。我不禁有时问，笨重的车辆是如何从这个地区找到一条通道的。但是，除了岩石雁列山岭（coulisses），峡谷从来没有完全封口。即使封口了，那么在一面山的尽头，也会有一条方便的低矮山脊通往另一个通道。

就像经常观察的那些荒芜的山脉一样，风对山体的侵蚀、龟裂远远比水要大，肉眼不是总能区分出峡谷的哪一部分呈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当我们穿过一处大低谷时，气温一下子下降了很多，我想这里可能是分水岭，从大约5700英尺的高度，一下子坠入一个小小的锯齿状山脊和迷宫般的峡谷里。山崖由粗糙的砂岩和页岩构成，在夕阳的照耀下，色彩绚丽，五彩缤纷，红色、黄色、棕色交相辉映。我忠实的伙伴、蒋师爷，没有想到山中温度变化如此之大，我看见他将丝袍和夹克衫紧拽在胸前。当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时，我知道他心里十分担心和顾虑。听到向导含糊的回答，可能还有50里，合大约10英里，或者更远，他十分沮丧，说道他还没有吃早餐。然而，习惯了旅行中的这些突发事件后，他不肯接受我留在午餐盒中的几块饼干。

接下来的5英里，是在岩石的峡谷中攀上爬下，就如同10个月的平坦沙漠之旅突然之间变成了在山间漫游一样，一开始时让我兴奋不已。最后，我们来到了一

片宽阔的峡谷。这个大盆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足足15英里宽，三面环山，有一座山的山顶还有白雪覆盖。云朵很快群集在较高的山上，在黄昏之前把山脉给隐藏了起来。整个山谷的绿色看上去特别奇怪，可能是因为长时间面对灰色和黄色的沙漠，所有眼睛一下子还无法适应。远处大片的深绿色土地告诉我们是绿树围绕着的绿洲，而其他剩下的大片地方覆盖着浓密的芦苇、绿草和灌木。大部分看上去是沼泽地，那些光秃秃的泥土地面上的孔洞说明那里是盐碱地。

很快，引导我们前往桥子的狭窄的车辙，变得像一条排水沟，或连续不断的沼泽带。已经快晚上7点了，乌云开始下沉，大雨就要来临，我们企盼着快一点到达绿洲。先前的车痕消失了，我不禁怀疑人们是如何把车拉过这一片沼泽地的。夜幕中，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巨大的红柳灌木隐约中高高耸立，像树丛一样，我们还以为到了桥子。我年老的向导骑着一头小驴，在前面快步地走着，不说一句话。黑幕降临，沿着光滑不是很清晰的车痕，我不禁担心何时才能看见我们的行李。最后大约晚上10点钟，吵闹的狗吠声告诉我们，我们到达了一块有人居住的地方，证明是桥子一个偏远的农庄。向东多走了半英里的“衙役”已经筋疲力尽，他引着我们来到一些农庄前，称这里是绿洲的主要地带。花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把一些人从睡梦中叫醒，有12条也许更多的狗围着我们狂叫。农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或听说过有什么车辆经过。这些甘肃边界上的以固执、无知为特征的，老实又机警的农民们由于军事命令，拒绝提供任何关于车子可以通过的路线的建议。虽然所住之处十分肮脏，蒋师爷对因权力在这里不起作用而感到愤恨，但他仍然十分高兴，毕竟有了住处。然而，我不准备轻易放弃，蒋师爷十分满意地吃着我的干饼干。黑夜里，在他意识到之前，蒋师爷已经吃完了小盒中所有的饼干，没有给我剩一点。我们又开始新的探寻，雨已经停了，但是呆滞的村民中没有人愿意当我们的向导。“衙役”正在苦苦地思索，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这片绿洲的一部分，称之为“南桥

子”，这也许值得搜索一下。黑夜中，我们没走多久，遇见一位老人，可他没有一点方位感。在孤独的庄园里，磕磕绊绊，他称这里就是“南桥子”，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可是有关我们的车辆和人还不知道。于是，我决定一定要在衙役称之为“南桥子”最好的住房那里，住上几个小时，等到天明再说。

当我们把村民再次叫起时，时间已是午夜。一个小小的四边形院子，摸起来、闻起来好像是猪圈。每个方向都有一座相互独立的传统风格的房间，它们是耕种者所有。村民的妻子和儿女正在睡梦之中，但庄园的主人还醒着，现在起来热情地招待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中间的房子清空。当我拿着一盏微小的、火苗摇曳的煤油灯，走进屋子的时候，它看上去像一幅伦勃朗风格的绘画（rembrandtesque），但画的背景不是非常吸引人。从安西到这里，我一直随身携带着营地椅，所以我不用在肮脏的睡炕的毯子上和家禽们或在肮脏的泥地上度过一夜。茶水很快就准备好，我的小篮中有杯子，当我煮了几个鸡蛋作为午夜餐时，我不禁庆幸我能在干燥的屋檐下，奢侈地在营地椅上休息一下。

M. Aurel Stein

# 第七十二章

## 桥子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很早就起了床，准备开始一个新的搜寻工作，寻找丢失的行李。这时候，发现行李就在附近，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行李是由一匹小马驮回来的，这匹小马本属于车队，是安西从这个村庄征用的。大家一下子就知道，它是从大队人马昨晚留宿的地方丢掉的。这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凉爽清新的早晨，小溪清澈见底，沿岸长满了绿草和芦苇，经过昨晚一场大雨的洗涤，都变得湿漉漉的。天空已经放晴，万里无云，只是在南边和北边的荒山上还蒙着一层雾和水蒸气。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带回到了英格兰的郊外，温和的色彩和清晰的轮廓围绕在我的身旁。

向南大概 2 英里的庄园里，茂盛成阴的榆树分散排列，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没有找到的“南桥子”。最让我吃惊的是，高大的榆树和柳树掩盖下的是一座用墙围起的小城镇，这就是绿洲真正的中心。穿过一扇半边被毁坏的大门，我们来到一个用篱笆围起的地方，大约有 1 平方英里大小，形状也不规则。穿过最里面高高的泥墙和房屋倒塌后留下的一片废墟，我们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庄，三四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曾经人口稠密的地方。虽然还是清晨，可已经到处是悠闲的农家和许多活蹦乱跳的

孩子。很快，我们被引到了一块地方，这里有许多别致的庙堂掩映在漂亮的老榆树下，成了晚到队伍的庇护之地。

令我欣慰的是，我所有的东西都安全到达了，没有被淋湿。赶马车的人没有走直线，而是迂回而行，因为直线是沼泽地，很可能会陷入，所以他们沿着沼泽地的边缘而行，经过了平头石（p'ing-t'ou-shih，音译——译者）一个偏远的村落。让细心的提拉巴依帮助我选择住处通常总是让人失望，但是这里有许多房间可供大家居住，他成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房屋管理员。我发现我的营帐用品被摆放在寺庙通风的游廊里，离进门处很远，靠近城墙的西南角。因此，我不会受到附近吵闹的信徒、马驹、骆驼和其他噪音的影响。

我们住的寺庙前面是一个长满绿草的院子，十分安静，它的巨大的凉亭面朝北边。为了保证安逸和舒适，还剩下两个大棺材要搬走。幸好这些留作纪念的容器证明是空的，所以把它们移到另一个庙堂应该不会触犯人们虔诚的信仰。很快，寺庙学校里的席子和我的行李堆中的毯子，被系在宽敞的大堂前面的栅栏上，以保证我的隐私。洗过澡，吃过饭（既是早饭又是晚饭），我的精力一下子恢复了，又回想起昨天晚上不愉快的经历。

虽然桥子镇破败不堪，可它非常寂静，这正适合了我繁忙的工作。我还有许多耽搁延误的信件要回复，忠实的吐尔地要把他们带回和田，我也迫不及待地想去参观那些古老的遗迹。幸好白天的时间比较长，我可以在太阳升起时骑马去探察古迹，而在下午酷热、暴晒袭来之前，回来写我的回信。我巧妙地安排时间，可以兼顾两者。

在安西，我对“老古城”就有所耳闻，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而且给人以很多启发。它坐落于南桥子的正南方，大约5英里远。它与现在的绿洲分开，先是一块灌木覆盖的草原，接着是一条十分狭窄的地带。这里的地面一部分受到了风

蚀，另一部分则被裹有芦苇和红柳的低矮沙丘吞噬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用墙围起的城镇的遗迹。城镇是传统的中国样式，呈现不规则的四边形。城镇向外延伸大约至少有6平方英里，除了有泥灰砌成的塔楼和由墙围起的围场和遗迹，还有很厚的陶器品遗骸，表明过去的房屋现在已经全部被侵蚀掉了。

很快，我发现在围墙围起的地方，我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发掘；但是由缓慢的风蚀作用和村民的劫掠造成的毁坏，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仅仅剩下黏灰泥砌成的围墙，到处是由砖块碎片、炭石和一些坚硬的碎岩组成的大土堆。没有被厚沙覆盖的大量红柳，以及缺少生气的树木，表明在附近就有散发有害湿气的地下水。通过对附近的地面自废弃以来的自然变化进行研究，我获得很多启发。许多被风吹净的、从土壤中拾起的铜币，向我们表明，这个地方在整个唐朝时期，至少到公元12世纪，都一直有人居住。从它被废弃到现在，看上去时间应该不长，但这足够对废墟和这里的土壤产生影响，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在罗布泊的北部沙漠中，在观察更为古老的遗迹时，我所发现的引人注目的特征。

它附近的城镇和曾经用于耕种的土地，是一块平坦、肥沃的黄土地，这块地延伸至从山脉南边向下倾斜的贫瘠沙砾斜坡的边缘。由于缺少地表水，这片地带表面已经没有了植被。它向东、向西扩展延伸至少有16英里，就像我们在疏勒河盆地所看到的风的杰作，这里也已经被强烈的风给挖空了，雕琢成数不清的小田垄和沟渠，而且走向一律都是由东向西。对我来说，这荒凉的场面太熟悉了，这里非常逼真地再现了罗布泊的景色。地面被摩擦得不是很深，大约在2~5英尺之间，显然这是因为这里的地表失去草皮保护的时间还不足1000年。这些从碎石覆盖的山体上滑落下来的粗沙，它们逐步的损坏过程有助于风蚀的破坏作用。但是，向东延伸直到肉眼看不见的，宽阔的被侵蚀的黄土地带上，没有留一点沙。在这个巨大的城墙内包含着一个四边形，东面和西面长大约有530码，北边620码，南面500码。在原来

的地面上，沙丘连续不断地堆积，现在高达20英尺。东面的墙和安西古城中的一样，已经被侵蚀成连续不断的大缺口，但是，在围墙之内堆积起的沙丘，使西墙免受同样的侵蚀，虽然西墙的顶端已经出现了缺口。一旦这些口子到达足够的深度，风将再次肆行无忌，将沙吹进内部，迅速向西推进。接着，侵蚀就会在墙内开始，彻彻底底地把围墙破坏掉，就如同它在墙外所产生的破坏作用那样，被沙丘覆盖、垂死挣扎的围墙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北边和南面只剩下侵蚀后的塔基和泥土所砌堡垒的残迹。特别奇怪的是，这两面墙由于他们的方向和强风的方向平行，所以所受损坏很小，这与我在楼兰看到的古城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锁阳城（so-yang-cheng），作为一个荒废的古城，对于桥子人来说，还是很熟悉的，这里我就不具体谈了。这座城的防御工事和其他的防御结构，清楚地展示了在这个地区现存的城镇中，我们仍能见到的一种筑城艺术。这种艺术自从唐代开始或者可能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保持不变。但是，作为本地的一个奇异特征，这

|⑳桥子镇废墟东部碎石坡下的风蚀地面|





㉑桥子村古寺庙大门的亭子

可能是因为本地的环境，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这一点。每座城有两堵面朝东的墙，里墙和外墙间隔距离大约是200码。外墙必须经受侵蚀的所有力量，只剩下了一条腐蚀殆尽的碎片。里墙已经有了许多的缺口，但是它巨大的基石仍然连接在一起，防御工事和门还能够辨认出来。是否有可能当外墙已被无情的狂风侵蚀得不能再修补了，才建造里墙作为保护呢？在放弃这座城之前，人口已经减少，这表明这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

不管怎样，显然这座小城最终变为一片荒芜是经历了异常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或突然的就完成的。从流沙中暴露出来的残骸堆的顶端，我发现了房屋的遗迹。显然，房屋建造得很拙劣，年代久远。出于好奇，来看我的勘察工作的一些桥子村民声称，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房子曾经有人居住过。在北边多沼泽地的草原

上，牧羊人喂养他们的小马驹，过去他们常常会在那里寻找住所，以抵御冬天冰冷的大风，即使是现在，有的来废墟挖硝石的人仍在毁坏的古城中暂时居住。在西墙的墙根，我发现不止一处烟熏的小洞，这些就是人们挖空后，在废墟中的暂时住处。在最大洞穴的前面，一个整理过的垃圾堆上，有一个小小的泥塑神像，和我在独立农庄或者绿洲的田边经常看见的泥塑一样。通常用来点燃取香的松枝放在神像的旁边，显然在这个破败的避身之处，人们仍然来这里供奉神灵。但是幸运的是，不信神的高（Kao）大老爷、我们积极的军事总管，从垃圾堆上面拿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小文物，他认为那对我的研究一定有用。这是一个刻于木头上的雕像的一部分手臂，装饰非常精美，风格和我在罗布泊地区看到的木雕刻所采用的犍陀罗极为接近，亮丽的色彩仍然保存完好。毫无疑问，这个文物所属的雕刻一定是个历史较久的作品，但是我们无法找出它原来所在的地方。

在蒋师爷的监督下，我对几个遗骸堆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没有发现书写的记载和其他具有考古价值的实物，但是一些陶器和瓷器的碎片却证实了我的结论，它们所属的年代可以追溯至这个城镇有人居住的时候。在城镇的东面，有一座装饰精美的佛塔，坐落于方圆1英里坚固的泥石基之上，部分表面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坚固的黄色泥灰。造型和设计结构表明它建于宋代的后期（公元11~13世纪），那时正值西夏（shi–hsia）部落统治甘肃地区。过去，佛塔南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寺庙，但现在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下一些硬砖和细小的碎片，闪着漂亮的绿色釉光，在低处的浮雕上面是卷状的装饰，这些也许是用作屋顶的瓦片。

佛塔的砖房上有很大的缺口，表明寻宝人已经进入过，盗窃的步骤对于我来说很熟悉，因为我在新疆考察文物时见过很多。他们在挖洞时，没有顾及在北边和东北边沿着台阶的边缘排成一排的小佛塔，洞穴直径一般是10~12英尺。由于这寻宝人造成的破坏，一些佛塔已经完全倒塌。那些还没有倒塌的佛塔里面常常有一个小

小的内室，只有1平方英尺或2平方英尺。在一些洞中，我发现摆了成百上千个微型佛塔，它们用黏土做模型，和我在哈达里克（khadalik）发现的极为相似。显然，这些小泥土佛塔，都是用两个或三个模子制作，是一个虔诚的捐助者想根据传统的观念，用它们来代替塔中那些神像的遗迹。

另一面围墙离佛塔的西北角只有400码，看上去正好是在外围墙的外面，有两个巨大、相互靠近的泥灰结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看上去是小炮台，沿边形成了大约60英尺宽的面积，整整20英尺厚的墙壁高高耸立，但是，十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正式路口和其他的楼梯可以到达它们的顶部。我从这个巨大的防御物的一个角落的裂缝进去，但是没有找到任何遗迹能说明这些奇怪结构的用途，直到我发现在占了大半面积的松软沙土上，有一些裂开的厚木板。木板的长度正好是一具棺

⑫桥子旧城的佛塔废墟



材板所需要的，我没有把自己的猜测告诉给跟着我的两个桥子人。我把一个角落里的沙土清理掉，露出同样的厚板，里面围着一具尸骨。显然，这些巨大的围墙不是用来保护活着的人，而是用来保护死了的人。对外面的地面进行观察，发现流水已经将之侵蚀，寸草不生，原来它过去一直是用作一个墓地，人骨的一些小碎屑表明由于侵蚀作用，原来的坟墓便消失了。

前面曾提到过附近的城镇和耕地，以及关于供水的问题，当然这也特别有趣。水不可能来自泉水注入的沼泽地，那是用于灌溉桥子绿洲的，察看一下地面，就能知道这些水源处于南面塔基地面以下很低的位置。从锁阳城倾斜了数英里一直到山脚，都可以看见贫瘠的沙砾斜坡，表明这里寻找不到任何水源。城东的地面被风蚀得千奇百怪，不仅有陡峭的水泥灰台阶，而且其间还夹有凹地，让人想起一个蚀刻的影线，当经过这里时，我看见了一条向南延伸的低矮的沙砾山脊。

正如我所想的，它是一条运河的航道，布满沙石的山脊顶端仍有河岸的痕迹。运河水自身携带的沙砾和粗沙，逐步抬高了河床，如我们在从和田到安西每一个绿洲所见到的那样，在停止灌溉后，保护了运河免受不断的损坏和强风的袭击，以免挖空黄土。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运河的岸堤现在会高达10英尺，或平均高于周围的地面。沿着运河，我们走了整整3英里，来到一处巨大，但形状不规则的碎石堆，很显然这是运河边一些水塔或小炮台的遗迹。

从这里向前，运河的痕迹从皱褶的地表完全消失。在远处的西南方，有一条白色泥土峭壁，看上去是一条已经干涸，沉入沙砾斜坡的河道。最远处山脉上峭壁南边有个裂缝，说明这条河道也用作另一个高原的灌溉。虽然目前没有积雪，但是有可能不时会有一些水源。我想，桥子西面和东南面的沼泽地来自地下的灌溉水很可能就是来自这条河道。但是不管怎样，目前引地表水来灌溉旧城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这里比较干旱，不管它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仅仅局限于这个地区。

M. Aurel Stein

# 第七十三章

## 万 佛 峡

天气酷热，加上后来又不能租到运输的骆驼，使得我不得不推迟在这片远山脚下有趣，但又十分干燥的土地上所进行的考察。我派遣忠实的吐尔地，跟着老向导穆拉赫，艰苦跋涉穿过高山到阿不旦，带着沉重的信袋去敦煌。之后，在6月29日的早晨，我们开始了对南山最西边的探险工作。在这个时候，就离开桥子那凉爽宁静的寺庙，好像有点太早。然而，我知道，巨大辽阔的山区才是我想要考察的地方，而且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都会在那里度过。

刚开始的行程令人愉快，我们一直向西，经过了一片绿草遍地的迷人平原，到达踏实（t'a-shih）绿洲。像桥子一样，这里看上去大约有200座田园，但是它们较为分散，而且绿洲中有大量的土地尚未开垦，表明这里缺水，或者缺人。现在，我已经很了解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他们并不担忧在我们经过的这片美丽牧场上没有一头牛的存在。在第一次到达敦煌时，我所遇到的所有人，从许多方面，都对任何类似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表现厌恶之情，不论是在边疆生活的人，还是生在遥远东方的城里人，他们的这种厌恶情绪都十分强烈。这对我可是件痛苦的事情，我知道在这里不可能得到牛奶，不管牧场多么繁盛，除非附近有穆斯林或东干人居住，而

在这些地方,这些过去曾参与反叛的人是不允许居住的,他们要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

在最近的一次叛乱中,踏实(T'a-shih)没有逃脱叛乱带来的毁灭,这从一个只修复了大半的寺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寺庙很奇特,正好处于围墙围起的中心村庄的外面,寺庙中有一些通风的住所。我在敦煌的战士朋友,是东干人叛乱中的显赫人物,从西宁撤退才12年,就又准备对踏实进行新的进攻。在寺庙的外围墙上,仍可以看见从敦煌派遣过来、做中途拦截的当地军队临时修建的许多孔眼和其他的防御工事。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好走到一条主要道路。这条道路把安西,来自北边的新疆、蒙古的大路和西藏以及横穿柴达木(Tsaidam)高地的可可淖尔(Koko-nor)地区连接了起来。

我知道,在1904年,达赖喇嘛从拉萨去乌尔噶(Urga)的时候曾经走过这条路,也许哪一天,沿着这条路还能碰见从西藏朝圣归来的虔诚的蒙古人或布里亚特(Buriat)人。虽然我知道许多地理知识,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正是在我来到踏实的那天晚上,布鲁克中尉(lieutenant brooke)葬身于此。他是个勇敢的英国旅行家,充满了热情活力。他从西宁边界出发,想尝试着绕道先去拉萨,但是在西藏的封锁线受阻,被迫退回到这条我正要经过去探察敦煌河源头的路线。我是6月底时在肃州第一次看到关于他的文章,但一直到4年之后,在费尔森(fergusson)先生发表的文章中,我才知道我们俩所走的路线是如此相似。

在踏实,我们没能拿到先前答应给的新交通工具。然而,有人听说大车可以通过这条路,沿路前进,能到达万佛峡(wang-foi-shiah)的石窟寺庙。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是我还是说服来自桥子的人带我们上山,即使他们有很长的夏日假期,因为我现在很想马上进山,而且山里凉爽,我们暂时可以使用我们的骆驼,而没有其他的危险。我们沿着踏实河河床前进,河床已经被冲击成皮埃蒙特山的沙砾。向上再走十多英里,靠近远处山脉流出河水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群大约十多个小的石窟

寺庙，它们位于河的右岸，聚集在山崖上。这个地方的确可以称得上"小千佛洞"，虽然壁画种类不太繁多，题材也不广泛，但却显示出了和"千佛洞"的壁画在设计和制作方面相同的风格。大多数小洞穴中的绘画已经被毁坏，里面所有的粉刷雕像都是近代的。

稍作休息后，我穿过了风景如画的河谷。寸草不生的两山之间，我惊喜地发现在那里一片狭长的绿地，茫茫一片，景色迷人，灌木繁茂，树木点缀其间。由河水灌溉的这片肥沃地带再向前几英里，就又回到光秃秃的岩石和碎岩。有一处山崖皱缩成一条狭窄的风道，这儿离踏实大约有15英里，我发现这里有条路用巨大的石墙作防护，石墙一直延伸，穿过谷地，达到远处陡峭的山坡上。显然，这是一个规则的峡谷旧貌，清楚表明疏勒河沿岸的古代联络路线上的中国居住点，经常遭受来自西藏高原边界的攻击，也许还有来自北边和西边沙漠的袭击。

继续向前几英里，山谷逐渐变成一个满是灌木丛和树木的小盆地，这里就是蘑菇台子（Mo-ku- t'ai- +zu）。对于4头勇敢的骆驼来说，这里是再好不过的牧场，因此我们把它们留在这里，至少有一个晚上，让它们享受一下十分需要的"长假"，而我们却推着大车，沿着平稳上升的戈壁前进，又一直走了4英里，我们发现河谷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峡谷，这里就是有名的万佛峡，或者说是万佛洞。除了它的大名之外，我十分清楚这块圣地根本不可以和敦煌的"千佛洞"相提并论，但是它奇特的荒芜景象却留给人深刻的印象。深深的裂谷底部宽大约有200码，沿着它的西边，发源于石包城（shih-pao-cheng）雪山的河流冲过了坚硬的岩石，几乎垂直的山崖上有一些大洞穴寺庙，绵延大约0.75英里。在谷地，沿着一条细小的沟渠是一条狭窄的果园带和耕种带，和那些皱褶的大约有100英尺、黑洞点缀的石墙比起来，它们显得很高。

沿着陡峭的小路下去，迎接我们的是三个满脸笑容、体形肥胖的道士。我很快发现了极好的安身之处，它处于一个洞穴前、类似院子的游廊里，这个洞穴里有一

M. Aurel Stein

尊巨型端坐的佛像。搬下来行李花了好长时间，趁这段时间，我在傍晚时分对周围迅速浏览了一下。数量极多的小神像和佛塔，沿着右边山脚上升的台阶分散开来，看上去它们一直受到了妥善保管，每一个都透出一种宗教的气氛，栩栩如生，十分逼真，经常受到虔诚信徒的捐助。显然，这里没有遭到东干人叛乱部队的破坏，而且附近山南边较为富有的蒙古牧人可能给这些道士提供丰盛的食物。我们现在处于海拔 6200 英尺的高度，伴随着夜晚令人舒适的清凉，和河水冲击河床发出的声响，我们等待着晚餐，一直到深夜。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呀！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忙着考察和拍摄神龛。虽然这些神龛规模比较小，建造的年代也可能比较晚，但是在建筑布局和艺术装饰的所有重要方面，它们与千佛洞的洞穴寺庙都十分的相似，因而在这里不需要作详细的描述。右面主要的洞穴分成两层，一层是在离河床 20 英尺高的台阶上，另一层则更高，高度在 50~60英尺之间。下面的 5 个最主要的洞穴由于前面建有游廊而十分黑暗，洞中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巨型端坐的佛像之外，还有一尊躺着的涅槃佛像，高达 30 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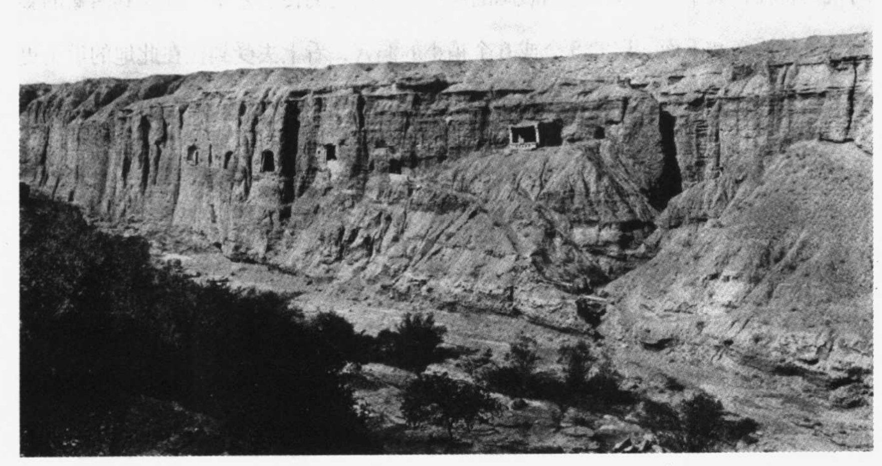
由于这些洞穴中所有的粉刷雕像都曾被大量地修复过，所以它们表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特征，其中一些大型壁画版画的风格表明当地的传统艺术曾经受到西藏的影响。这些洞穴和下面一层的 5 个或 6 个稍小的洞穴，看上去受到住在此地的道士更多的注意和虔诚信徒更多的膜拜。道士们声称，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 30 多年，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甚至为自己找好了以后的栖身之处，来自安西和桥子的人对他特别尊敬。即使一向不相信圣人这种说法的蒋师爷，也称他为“圣人”。

到达这位圣人所住洞穴附近的上面一排洞穴，要通过在岩石间开凿的粗糙楼梯。然后，走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桥，穿过一道很深的岩石裂缝，经过一个前半部分已经倒塌的洞穴，我们来到了最北边 13 座相互连接的石窟寺庙。每个石窟都有内殿或类似的殿堂,内殿或殿堂每边的墙大约有20~28英尺。一个很高的石窟通常有20英尺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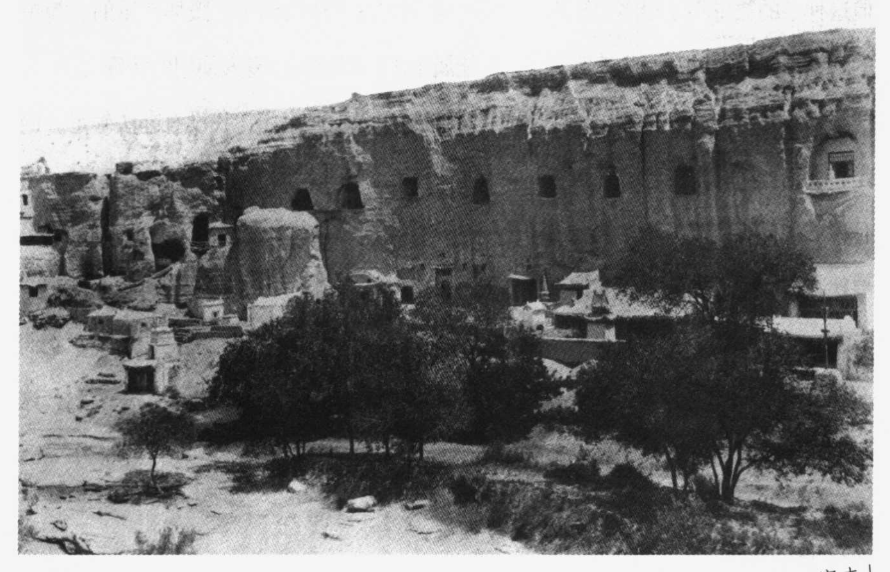
30英尺深，有接受光线和空气的走廊和通道，在走廊或通道前有前堂，前堂与内殿一般宽，但比较狭窄，前面是照片中能看见的一个露天走廊，面向悬崖。神龛之间本来通过狭窄的通道来连接，从一个露天走廊，通过岩石表面，到达另一个神龛，但是现在，好多地方的通道已经倒塌，或变得不牢固，因此，后来开凿了一个粗糙的、连接前堂的孔道，同时在破碎的墙面上绘制了图画。

所有这些石窟寺庙的墙面都用壁画装饰，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用灰暗手法绘制的墙壁绘画来装饰。走廊的墙壁通常展画着一群身穿红袍、头戴宽檐黑帽的和尚，面对他们的是几排尼姑，头饰精美，球状的帽子边沿有花垂，这与我们在“千佛洞”看到的样式完全一样。内殿和前殿的墙壁所画的，有时是一群装饰精美受人尊敬的大型菩萨像，有时是一组版画，佛坐在莲花盘上，周围簇拥着许多菩萨。佛教天国的场景，用一场“绝美的芭蕾舞和音乐会”栩栩如生的描绘作背景，这在千佛洞的许多壁画中都已见过。其中一幅中就展现了装饰的两个主题，甚至有令人奇怪的、

|⑬石堡城河左岸万佛峡石窟寺|



M. Aurel Stein



㉑④石堡城河右岸万佛峡石窟寺

传奇般的风作为背景，在前面第七十章中谈过，在两个内殿的后墙上有一幅图描绘了这样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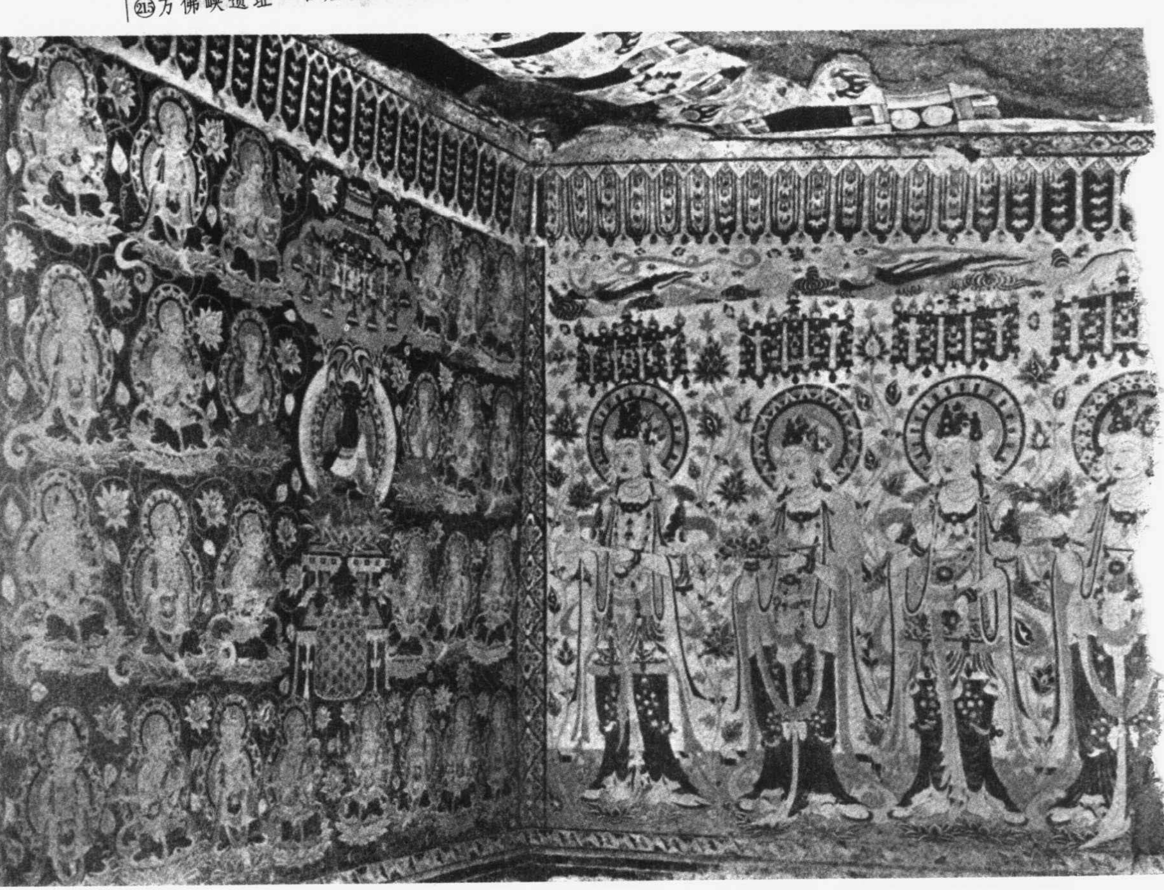
壁画一般呈现同一种风格，显然是采用同一种模块、年代相近的复制品。这些正是我在“千佛洞”的墙壁绘画所要寻找的，现在毫无疑问，充实了我收集的资料。这些壁画的制作技术看上去十分拙劣，暗示它可能绘制的年代较晚，或者工匠的技术较差。在一些洞中，粗糙的深颜料代替了古老作品中的细致线条，说明过去大量地使用了模板。

我找不到任何题记记载，来说明“多佛洞”神龛所建造的年代。但是，石窟墙壁上朝圣者留下了大量的中文刻字，能帮助我们确定它们所属的年代。看上去，它们大多数属于蒙古王朝统治的末期，时间可能是公元1331—1367年。在这些汉语刻字的旁边，有一些较短的回鹘字体的刻字，或者是后来的蒙古文字和藏文的刻字，

但这种字的数量不是很多。还有一两行中亚婆罗谜字体的刻字，毁坏严重的、简短的阿拉伯文字，以及一些其他文字，可能属于11~13世纪西夏人使用的特殊文字。

这些在壁画绘制后留下的朝圣者的纪念到底属于何年代，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无论如何，汉语刻字证明寺庙应该是有朝圣者在14世纪的中期来这里朝拜，而且他们的样貌应该与现在大致一样。很可能，入侵对于这个远在山中的地方的破坏，要比在敦煌附近作为模式的神圣石窟大很多。左侧大约有10个洞穴，分成不规则的三类，它们离河面距离较高，里面的壁画在设计和绘制方面比后侧的要粗糙，它们分布没有规则，这说明了它们建成的年代相对来说较晚。但是，汉语刻字表明，这里石窟建造的时间要早于公元14世纪。

㉑⑤万佛峡遗址一石窟寺门厅的壁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3
作者=（英）奥里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　伏霄汉译
页数=792
SS号=11567826
DX号=
出版日期=2004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